感知苏州

陈其弟⊙著

GAN ZHI SU ZHOU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知苏州 / 陈其弟著. -- 扬州 : 广陵书社, 2011.6
ISBN 978-7-80694-703-6

Ⅰ. ①感… Ⅱ. ①陈… Ⅲ. ①苏州市—概况 Ⅳ. ①K92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3491号

书　　名	感知苏州
著　　者	陈其弟
责任编辑	徐大军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维扬路349号　　邮编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1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703-6
定　　价	32.00元

苏州旧闻(代序)

在苏州呆了20多年了,新闻天天看,广告日日新。喜新厌旧也许就是人类的本性,在人们的生活中,新旧交替,司空见惯:从时间上说,每隔365天就要除旧迎新,过新年;从穿着上说,人们永无止境地追求着服饰的新款式;从饮食上说,解决温饱后的人们总想着尝尝新口味;从居室来讲,除了结婚要新房外,旧房也要常常装修见新,室内家具也希望添新或更新……

渐渐地,人们总会厌倦那没完没了、不厌其烦的重复广告。也许是因为从事史志工作的缘故,本人对虚假更是深恶痛绝,因为真实是史志的生命。我曾经在一次单位内部会议上戏言:"要找十全十美的东西,不妨到广告里去找;想找十全十美的人,肯定可以在悼词中找到。"新闻尽管有其时效性的优势,但也由于它的时效性要求,总免不了会出现"周老虎"之类的假闻。旧闻是相对于新闻而言的,它是已经将昨日的新闻变成了今日的历史,经过时间的沉淀,滤去了令人生厌的"虚情假意",给人的感觉是:唯其旧而更耐看,唯其旧而更想看!有人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人说,历史与现实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让后人感到迷茫和惊愕。

曾几何时,记者的职业是那么抢眼,少不更事的我,也曾跃跃欲试。真的很感谢某新闻媒体的那位人事干部,正是他的"慧眼识珠",认定我"刻板较真"的脾性不适合"记者"的职业,才使我避免了人生道路上"误入歧途"的曲折,死心塌地地专注于苏州的旧闻——编修苏州地方志。皇天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的磨炼,终于结出了硕果:2004年和2006年我先后点校出版了《吴中小志丛刊》、《吴邑志·长洲县志》;2008年和2010年,又相继结集出版了两本修志理论著作《苏州地方志综录》、《感悟修志》。前两种著作是对大学四年古文献专业学习的检验和回报,后两种是对20多年修志

工作的感悟和小结。也算是给在我成长道路上曾经无私付出辛劳的师尊们一点小小慰藉吧！

本来想搞一本《苏州地方志综录》的姊妹篇，把多年来撰写的有关苏州的人、事、物的短篇汇总成集，取名《岁月悠悠话姑苏》，但又觉得似乎有“戏说”的意味，不甚满意。之后，随着二轮修志的展开，既要考虑和探讨续修《苏州市志》的事情，还得关注和指导各下属市、区的业务，有时甚至还要顾问乡镇志和部门志、专业志的事儿，真有点“自顾不暇”的感觉，于是就将此事搁置了起来。

现在，得闲将这些文章初步理了一下，大体分了类，本想再配上些图照，以富观瞻。但一想到本办已有《老苏州》系列，还是让它素颜吧！曾发表的文章后写明最初发表的报刊期号(时间)，并引入当今信息用语“链接”，给读者提示些值得参考的相关文章和著作，以彰显本书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为了简洁起见，我本想把书名定为《苏州旧闻》，但觉得似曾相识，好像已经见到过类似的书名了。之后，又经过了一番“挖空心思”，终于想到，吾书之本意在于求真，也就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让读者看到一个未经“化妆”的本色苏州，直接命名《本色苏州》，岂不更贴切？于是，写下这段文字，仍然称为“苏州旧闻”，作为本书的“代序”，目的是让读者知道我的本意，仅此而已！

近来，在《中华读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好标题是成功的一半》，说“书名是一本书的招牌，目录是一本书的骨架”；“如果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我们写出令人满意的书名和目录就是好的开始”。还说“读者一眼就能看明白全书的内容是好书名首先应该具备的特点”，另一个好书名应具备的就是“简洁和好记，让人过目不忘”。作者要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读者，对书名是否满意。以上种种说法颇有道理，看来书名不是随意而为的。经过几天的琢磨，想到了一个自以为满意的书名，那就是《感知苏州》！

2010 年 7 月 13 日

目 录

苏州旧闻(代序) / 1

苏州印象

苏州印象 / 2
苏州称天堂的由来 / 4
也说天堂 / 5
苏州古典园林 / 6
苏州山水 / 8
苏州的民居 / 22
苏州的氏族大姓 / 23
松鹤楼菜馆 / 28
陆稿荐熟肉店 / 35
苏州的古城古镇古村 / 40
水城苏州二题 / 42
周庄与沈万三 / 46
不妨去乌镇 / 49
重访黎里古镇 / 51
太湖中的西山 / 53
苏州的桥 / 56
灭渡桥与觅渡桥 / 58
风雨万年桥 / 59
苏州的博物馆 / 61
从苏州博物馆之憾说起/ 63
苏州的古塔 / 65

苏州地名

小议苏州地名的人文内涵 / 70
以方位命名的苏州地名 / 74
以动物命名的苏州地名 / 77
苏州地名与古代旧衙 / 80
历史名人与苏州地名 / 83
悬桥巷与历史名人 / 85
南濠与石路 / 86
话说南濠街上的几把火 / 90
平江路:小巷深处多名流 / 92

苏州人物

苏州名人 / 100
苏州的宰相 / 111
归乡舟载石 千秋赞陆绩 / 120
苏东坡与苏州两丘 / 123
范仲淹与苏州 / 124
张士诚与苏州 / 127
重新解读沈万三 / 130
南濠街上两名士 / 133

清官况钟 / 137
清廉勤政的贺御史 / 139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 141
“泽被东南”张国维 / 146
金圣叹与哭庙案 / 148
民不能忘“豆腐汤”/ 150
以清节为天下第一的陆燿 / 151
近代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王韬 / 154
状元女婿徐枕亚 / 156
双林巷走出曲学宗师 / 158
版本目录学泰斗顾廷龙 / 164
潘承洞与哥德巴赫猜想 / 170

苏州风俗

吴中年俗之乞讨 / 174
吴中年俗之祭灶 / 175
吴中年俗之年关与岁朝 / 176
吴中年俗之拜年 / 178
吴中年俗之接财神 / 179
苏州的轧神仙庙会 / 182
八月十八游石湖 / 184
太平天国的奇风异俗 / 185
苏州的时令食品 / 188
苏州的小吃 / 189
苏州方言 / 191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 / 194
吴梅与昆曲 / 196
苏州评弹 / 200
特殊读音的苏州地名 / 202
苏州历史地名臆说 / 204

苏州书事

苏州人的刻书、藏书、著书、读书 / 210
苏州藏书楼 / 212
山塘的书院学舍 / 218
苏州的书店 / 222
从《天堂苏州》邮册之憾谈起 / 225

苏州之谜

岁月悠悠话姑苏 / 229
西施之谜 / 236
吴王阖闾墓之谜 / 238
历史上的金阊亭在哪里 / 240
周瑜墓之谜 / 242
灵岩秀绝冠江南 / 244
吴中第一碑:韩蕲王神道碑 / 246
唐伯虎点秋香事迹考略 / 248
玄妙观的无字碑 / 250

苏州印象

历史学家眼中的苏州：

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时物，其次为成都，则战国时物，其所以历久而不变者，即以为河道所环故也。

——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苏州城河》

外国友人眼中的苏州：

苏州漂亮得惊人，与其家乡水城威尼斯非常相似。(《马可波罗游记》)苏州由此而得“东方威尼斯”之名。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称赞苏州古城为“鬼斧神工”。

苏州人自我陶醉：

“鱼米之乡”、“人间天堂”、“丝绸之都（丝绸之府)”、“园林之城”、“东方水都(东方水城)”、“城中有园”、“园中有城”、“假山假水城中园，真山真水园中城”。

“双面绣”：一面是历史传统，一面是现代文明；或者说，一面是经济，一面是文化；一面是“古”，另一面则是“洋”与“新”。在传承历史悠久文化的同时，也造出了一座让人惊叹的现代化高科技工业园区。

苏州印象

顾颉刚先生曾说:“苏州城之古为全国第一,尚是春秋时物,其次为成都,则战国时物,其所以历久而不变者,即以为河道所环故也。”如此说来,苏州是古老的,当然意味着其历史也是悠久的,而且顾先生将其功劳归于环城河。

有人将苏州比作东方威尼斯,这一点也不为过。苏州城除了环城河外,城内有以三横四直为骨干的河道,以及经纬交织的上百条长短水道。伍子胥在建城之时,就设立了与陆城相辅相成的八座水城门,使城内与城外的水相贯通,既解决了生活用水,又成为交通之道,还能调节旱涝。在宋《平江图》和明《吴中水利全书》所载的《苏州府城内水道总图》上,苏州城的水城特征极为详尽直观。加上伍子胥开凿的胥江,以及历代地方官员开凿的山塘河、元和塘、至和塘、江南大运河等,它们与环城河(城濠)相连,就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水乡古城风貌。

有人说,苏州最出名的是古典园林。不错,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环秀山庄、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艺圃、耦园、退思园等9座古典园林已被作为江南古典园林的典型代表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正如鲁迅所说:“越是地方的东西,越具有世界性。”其实,苏州的特产有很多,古代有状元和优伶,因此,除了古典园林外,昆曲和古琴艺术先后被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如今,苏州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下辖5个县级市都已列入全国百强县前十。常言道:物质财富易得,文化遗产难求。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比拼的就只能是文化了,可历史文化是不可再生的东西。苏州全市拥有539处各级文保单位,500处控保建筑,790处古构筑物,60处古建筑、古民居,就此而言,苏州是一座文化宝库。难怪李瑞环在考察苏州时曾经说过:苏州古城保护好了,

这是最伟大的，没有哪个比得过。苏州不仅仅是苏州人的，而且是中国的，全世界的！

一本本地方志真实地记载着苏州的历史。苏州的山并不高，却有着无数先人留下的足迹和墨宝：灵岩山上的馆娃宫遗址、玩月池和玩花池，承载着春秋时期吴王与西施的浪漫与悲情；虎丘山的生公讲台，诉说着佛教文化在苏州的传播；小小寒山，却留下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六次大驾光临；还有那穹窿山上都穆写的“朱买臣读书台”、大石山上王铎留下的“仙坪”大字、小王山上的“露天书法”等等，无不透露着苏州这些小山的人文与灵气。苏州的大街小巷虽不奇特，却走出了无数的状元进士；苏州的地名看似平淡，却不仅仅代表一个具体地点的符号，还蕴含着一段或长或短的历史，记述着一个个活灵活现的故事。还有那悠扬的苏州评弹，以苏州话特有的软糯，说唱着人间的喜怒哀乐；松鹤楼（饭店）、黄天源（糕团店）、朱鸿兴（面店）、陆稿荐（熟肉店）等百年老店，尽管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惨淡经营，但尚具活力，仍能保持老字号的荣耀；轧神仙、石湖串月、天平红枫节、寒山寺听钟声等颇具地方特色的岁时习俗，都是那样的独特和耐人寻味。

一位哲人说过，了解过去的一千年，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后的五百年。苏州的人类文明可追溯到一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三山岛遗址）。悠悠岁月，苏州的先人为我们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也奠定了苏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

有人说，个性即生存，风格即价值。一个没有个性，没有特点，没有文化含量的城市只是缺乏灵性的建筑堆砌，它的光鲜的外表下，掩盖的是城市的自我迷失和渐渐消亡。苏州人深深懂得：一个城市，如果失去了它固有的文化特征，也就失去了这个城市的根和魂。苏州古城内街巷并行，水道陆衢，小桥流水的风貌依旧。说实在的，苏州城内的街巷确实不宽畅，但唯其小，才更显其精致；苏州城内的桥也不大气，但花桥、乌鹊桥、黄鹂坊桥、枫桥，一座座古桥，因文人骚客的吟咏而闻名，也因而增添了古桥的文化内涵，两者相辅

相成。这也许就是古城苏州最基本的特征。尽管苏州城已经走过了2500多年的沧桑岁月，阅尽了无数人间冷暖，所幸苏州至今保持了其“水苏州”的特征。

（原载《苏州政协》2007年第六期）

苏州称天堂的由来

提起苏州和杭州，人们总会用一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作比喻。天堂，原为宗教用语，是指天上神仙及世人死后灵魂居住的极乐世界，后人逐渐用来比喻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苏州和杭州，都是长江下游开发较早的文化名城和旅游胜地，苏州一带更是在汉武帝时就已是“江南一大都会”。至唐朝，白居易称“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又说“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陆广微《吴地记》称“苏州名标十望，地号六雄”，是江南唯一的雄州。范成大《吴郡志》记载，“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可见，唐代苏州已富甲天下了。加上自六朝以来，大批北方豪族纷纷南迁，在苏州建立众多的私家花园，苏州独擅山水之美、园林之胜，物产丰富，且土风清嘉，与连年战乱的北方形成鲜明的对比，无疑是人间天堂了。因此，到了宋朝，民间已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元初奥敦周卿又在《双调·蟾宫曲》中用此来描写苏杭的美丽富饶和文化之发达：“西湖烟水茫茫，百顷风潭，十里荷香……春暖花香，岁稔时康。真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此以后，这一民谚随曲流传到北方。明代郎瑛《七修类稿》、清代李玉《清忠谱》都引用了“上有天堂，下说苏杭”。至于苏州为什么要放在杭州之前，郎瑛的说法是：“杭在唐，尚僻在一隅未显，何可相并？苏自春秋以来，显于吴越；杭唯入宋以后，繁华最盛，则苏又不及也。……若以钱粮论之，则苏十倍于杭。”看来，在明代人眼中，称苏杭而不称杭苏，还是有讲究的。时至今日，杭州已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苏州则是江苏省的省辖市，论

城市规模恐怕苏州已不及杭州，但苏州的经济仍处在全国各城市的前列，人民生活水平也较高，“天堂”之名仍名副其实。

值得一提的是，每年清明前后，总有数十万从上海来的扫墓大军来到苏州这个人间天堂，祭扫他们安息在苏州西郊各公墓上的先人。由此看来，苏州不仅仅是人间天堂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已成为了仙界的极乐世界了，也就是说兼具了“天堂”的本义和引申义。

（原载《江苏掌故》，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版）

也说天堂

看到 2 月3 日《姑苏晚报》登载的《世说天堂》一文，文中根据《中国古代名句辞典》认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为元代奥敦周卿《双调·蟾宫曲》首见，并自责生于江南的汉人反不会自吹自擂，而藉女真人的溢美之词，将此八个字流传下来。本人也是不喜吹擂之人，但也想对《世说天堂》补述一二。

“天堂”一词原为宗教用语，指天上神仙及世人死后灵魂居住的极乐世界。《宋书·夷蛮传》转录释慧琳《均善论》云：“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救身，孰与从理以端心？”显见，天堂与地狱对称。后人逐渐用来比喻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据有关史志记载，“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称之为人间天堂已毫不逊色。宋代范成大《吴郡志》就有“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谚语记录。说明此说在南宋已有，且在吴中流传已久而成为谚语。虽然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八字有文字上的出入，却也道出了同样的含义，符合谚语的随意性。就此八字而言，清代李玉《清忠谱》上《闹诏》还有另外一说：“自古道：上说天堂，下说苏杭。”如此说来，江南的汉人并非真的生在福中不知福，早在南宋以前就将自己所生活的苏州、杭州比为天堂了，而且还由著名的

田园诗人范成大记录在有名的《吴郡志》中，绝非名不见经传的奥敦周卿《双调·蟾宫曲》可比。

（原载《姑苏晚报》1996 年 2 月 29 日）

苏州古典园林

苏州是座驰名中外的园林城市，自古就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说法。因为苏州园林集中了我国江南园林建筑之精华，是世界上任何地区所少见的。苏州古典园林已作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引起广泛关注。苏州有线电视台于 1999 年 12 月拍摄了一部六集专题片《苏园六记》，详细介绍这些园林的精华和艺术价值，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市民多次要求重播。

苏州园林建筑历史久远，上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梧桐园，吴王夫差在灵岩山上所盖的馆娃宫，不过那是最早的王家花园。到了魏晋南北朝，北方大量的豪族世家南迁，带来了中原文化，同时苏州的宜人环境为官宦富家提供了极好的造园条件。于是就诞生了有名的吴中第一园 —— 辟疆园，据说大书法家王献之也曾经慕名来游。唐宋以来，苏州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许多达官贵人都把苏州首选为归田后颐养天年的“天堂”，因此购地营宅者趋之若鹜，在住宅的后面往往都要建造后花园，这就是留存后世的宋元明清以来的私家园林。据《苏州府志》记载，明代苏州有大小园林 270 处。这些园林的一个共同特色是：因洼疏池，营建亭榭，或以山取胜，或以水见长，园林和居室紧密相连，具有居住和游览的双重作用，以达到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得林泉之趣的效果。在富有诗情画意的园林里，山光、水声、月色、花香均可供人欣赏，园内可望、可行、可游、可居，把生意盎然的自然美色和艺术美融为一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苏州现存大小园林 69 处，其中有建于宋代的沧浪亭、网师园，建于元代的狮子林，建于明代的拙政园、留

园,建于清代的怡园、耦园、鹤园、环秀山庄等。

1997年12月4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第21届会议批准,由中国政府推荐的以苏州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为典型的苏州古典园林正式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0年11月30日,在澳大利亚东部城市凯恩斯召开的第2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上,苏州又有5家古典园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增补名单,它们分别是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园、退思园。

此次增补的园林中,沧浪亭、狮子林、退思园都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耦园和艺圃为什么也被列入此名录呢?

耦园和艺圃

位于苏州城东北小新桥巷的耦园,东部花园占地0.26公顷,西部住宅占地0.46公顷。一面临巷,三面萦河,是典型的水乡宅第园林。清初由保宁知府陆锦所建,名涉园,后为崇明祝氏别墅。光绪年间,安徽巡抚署两江总督沈秉成,辞官流寓吴中,购得此园,聘名画家顾沄策划,扩建西花园。为表示伉俪觞咏终老之志,沈将花园定名为耦园。1932年杨荫榆曾在此园创办二乐女中。1940年著名学者钱穆又在该园笔耕二年,著书立说。1941年此园又被实业家刘国钧购得,并加整修。此后,又经1962、1979年两次全面整修,对外开放。花园东部以山为中心,构思别致,尤以黄石假山见长。北有重檐楼厅的城曲草堂,楼厅设小院三处,为储香馆、藤花舫、无俗韵轩。中部黄石假山,以"邃谷"通道将山一劈为二,东为主山留云岫,西名桃屿,山势陡峭挺拔。山东有池一泓,名受月池。山水间水阁临池而筑,山水真趣油然而生。阁内置明代遗物落地罩,全罩跨度4米,高约3.5米。用杞梓木制成的"岁寒三友"贯穿在银杏木制作的罩体之中,精美绝伦,堪称苏州一绝。池东石径山坡,有吾爱亭,小巧玲珑。四周花木茂盛,湖石点缀其间,环境幽静。西花园为沈氏扩建,前置月台,书斋老屋居中,后藏书楼。园内湖石假山点缀,花木散

植，典雅清新，自成一景。

艺圃在阊门内，前门为文衙弄5号，后门为十间廊屋10号。宅园面积0.38公顷，其中花园占地4亩。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初为袁祖庚之醉颖堂，崇祯年间为文徵明曾孙文震孟购得，取名药圃。清初，山东莱阳姜贞毅流寓吴中，将文氏废园辟为别业，更名为敬亭山房。其子姜实节又建思嗜轩，辟艺圃。园内有念祖堂、绣佛阁、香草居、红鹅馆、乳鱼亭诸胜，一时成为文人墨客吟诗作画的聚会之地。道光年间，艺圃归绸缎业，更名为七襄公所。后来这里曾经散为民居。1982年才全面整修，1984年国庆节对外开放。艺圃布局合理，水面集中，居园中心，风格自然，质朴典雅。池北水榭延光阁，临池而造，靠石条支撑着半伸出水面，其临水跨度为苏州园林水榭之冠。池西有一芹芦小院，院中置湖石、花木、石峰，玲珑窈窕，是园林建筑的佳构。乳鱼亭三面临水，梁架有明式彩绘，古朴雅致，为园内唯一明代建筑，是苏州园林的珍品，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苏州山水

苏州山水虽比不上桂林山水甲天下，却以其灵动妩媚而闻名。一句“真山真水园中城，假山假水城中园”，道出了苏州山水的整体概貌。

苏州的主要地貌是长江三角洲的冲积平原，平原西部有一些大约生成于距今2亿至1.6亿年前印支—燕山运动隆起后，经长期风化剥蚀形成的山丘。这些山丘共有大小100余座，主要分布在吴中区、高新区及常熟市，面积约221平方公里，一般海拔在100~200米，最高的穹窿山也不过341.7米。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丘陵，但苏州人却毫不含糊地一概称之为山，甚至在虎丘后面还不厌其烦地加上个“山”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仙”和“龙”其实是虚幻的东西，真正能使山水富有灵性的，还是人，与人有关的人文。苏州的山水无不浸润着历代名人的遗踪，或题字，或吟诗，或游记，他们就是苏州山水中的“真仙”和“真龙”。

苏州“真山”中最有名的当数苏城西北的虎丘山，初名海涌山，相传远古时代原系海湾中的小岛，因为有吴王阖闾墓等原因，已成为“吴中第一名胜”。黄山（今又称横山），为烈士陵园所在，每逢清明时节，各单位都要前往祭扫革命英烈。上方山是国家森林公园，是苏州科技大学、苏州教育学院等高校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集中区域，那里有越城遗迹和范成大遗韵。灵岩山因山上多灵芝石而得名，又因吴王、西施的诸多名胜而成为旅游胜地。天平山别称白云山，又因范仲淹高祖葬于山之东坞而称范坟山，山上有万笏朝天、龙门一线天等奇观。

其余山体较大的有穹窿山、七子山、清明山、尧峰山、玄墓山、邓尉山、阳山、东山、西山、虞山等。位于苏州高新区的狮子山下是著名的苏州乐园主题公园；介于藏书、光福、胥口交界处的穹窿山是有名的道教胜地，山上有“炼丹台”和“朱买臣读书台”；光福的潭山蕴含丰富的硫铁矿；凤凰山和尧峰山是公墓区；邓尉山和西山两处是赏梅胜地，前者就是“香雪海”所在地；天池山上有钵盂泉、虎跑泉、洗心泉多处清泉，山之东坡习惯称华山，乃一山两名耳！虞山是有名的风景胜地，因周太王次子虞仲葬此而得名，山上有剑门奇石、破龙涧诸胜；西山是太湖中的群岛，旧称太湖 72 峰中，西山占 41 座，主峰缥缈峰高 336.60 米，是太湖 72 峰之首；东山在宋代还是太湖中的岛屿，100 多年前，因东北面一条连岛沙嘴和陆地相接而成半岛。主峰莫厘峰高 293.50 米，相传是伍子胥迎母处，亦称胥母山。又传隋莫厘将军居之，故称莫厘峰。

假山乃指园林中所叠而言，苏州最著名的假山有：北宋“花石纲”遗物两处，分别是留园内的冠云峰和苏州第十中学（原苏州织造局）内的瑞云峰；环秀山庄内的湖石假山号称独步江南，那是清

代叠山大师戈裕良的杰作，堪称巧夺天工，尽得造化之妙；狮子林的假山，奇峰林立，洞壑宛转，向有“奇石甲天下，叠置尤巧心，直以数弓地，幻作丘壑深”之誉，被称为“假山王国”；惠荫花园的“水假山”堪称一绝，整座假山堆叠在水池上，常年得水滋润，独有韵味，有“小林屋洞”的雅称；在吴江新建仿古园林静思园里，还有一座采自安徽灵璧的镇园之宝——庆云峰，是被奇石收藏界人士叹为观止的奇石，高 9.1 米，重 136 吨，通体 1600 余孔，孔孔皆通。除此之外，苏州的邓尉山上有一座“真假山”，值得一提。在圣恩寺后面的山坡上，有一座太湖石“假山”，但那不是人工堆砌的，而是大自然的杰作，故称“真假山”。

说完了“山”，再谈“水”。苏州自古号称水乡泽国，境内湖荡密布，江河纵横。全市 8488 平方公里面积中，水域面积为 3607 平方公里，约占 42.5%。全市共有大小河道 2 万余条，总长 1457 公里；大小湖荡 323 个，计 28.07 万公顷，其中 500 亩以上 129 个，千亩以上 87 个。除太湖外，较大的湖泊有阳澄湖、淀山湖、澄湖、昆承湖、元荡、独墅湖等。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苏州的历史步伐总与治水齐步并进。太湖古称震泽、具区，又名五湖、笠泽。《尚书·禹贡》中有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记载。据说是因其水泛滥震荡难定，故称“震泽”。伍子胥“相天法地”造阖闾大城，专门开凿了连接太湖胥山口与古城胥门的胥江，最早就将太湖水确定为苏州的水源地，滋润和养育姑苏城内的百姓。“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治吴，开挖了黄浦江，又称申江，以确保吴中大水的宣泄。在苏城北面相城区，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叫黄埭的镇名。此后，西汉吴王刘濞开挖了盐铁塘，隋朝开挖江南运河，唐代白居易修筑山塘，北宋疏浚至和塘，直至 1958 年开望虞河（连接太湖与长江）、太浦河（连接太湖与黄浦江），还有上世纪 70 年代的围湖造田运动，80 年代的运河改道工程等等，都是苏州人与水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有的主人公已被融入苏州的历史，长留在人们的

心中，如伍子胥、春申君、白居易等等；有些却因有违科学发展观，如围湖造田是在“以粮为纲”形势下的不得已之为，破坏了大好的湖光山色，为此，苏州的石湖已经“退田还湖”，恢复水面；有些工程甚至成为“难言之隐”，如运河改道，在解决当时水上交通安全问题的同时，带来的却是苏州城里的死水微澜，必须靠人工抽调城外的水冲刷才能确保其水质……

据说，在上世纪末，有位中央领导到苏州视察，说苏州解放以来干了三件大错事：其一，是“大跃进”的时候拆掉城墙造小高炉“大炼钢铁”；其二，是80年代的运河改道，让城里的水变成了不会流动的死水；其三，是90年代开辟干将路，在古城内形成两路夹一河的格局，打破了苏州“小桥流水人家”的整体风貌。因为，这三件事是在错误指导思想下的错误行为，最终成了古城保护史上不可原谅的败笔！

（原载《苏州政协》2009年第四辑）

链接：《苏州山水志》，2010年1月广陵书社出版。

又：

川

湖

太湖，《寰宇记》云：“在苏州西六十里，纵广二百八十三里。”即《禹贡》之震泽，取水常震动之义。或曰：震东方泽，在东也。《周礼·职方》：“扬州薮曰具区，浸曰五湖。”《尚书正义》云：“扬州浸薮同处，水谓之浸，泽谓之薮。”《尔雅》云：“吴越之间具区，其湖周回五百里，襟带吴兴、毗陵诸县界，东南水都也。具区者，大为之防。”《越绝书》云：“太湖周三万六千顷，其千顷为乌程，去县五十里（颜真卿《石柱记》云‘四万八千顷’）。”张勃《吴录》：“五湖者，太湖别名，以其周行五百余里，故名五湖。”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则谓之五湖。”《水经》云：“震泽在吴县南五十里。”又云：“太湖中有苞山，又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谓之三山。”杨泉《五湖赋》曰：“头首无锡，足蹄松江，负乌程于背上，怀大吴以当匈，岸岭崔嵬，穹隆纡曲，大雷、小雷淜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极也。（熊按：太湖西无

锡,东松江,南乌程,北吴郡)湖东有岸岭山,去太湖三十余里。"《山海经》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区。"陆鲁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车之气,故一水五名。"又云:"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唐志》:"太湖占湖、宣、常、苏四州之境,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一百二十里,中有山七十余所,其水原自西南,接纳长兴等县上流诸水以入吴松江,又东流二百余里以入海(《祥符图经》'二百六十里')。"

诸书所引:

《国语》:越伐吴,战于五湖。子胥谏吴王:"与我争五湖之利,非越乎?"又云:范蠡灭吴,返至五湖而辞越。太史公"上姑苏,望五湖"。

司马相如《赋》叙上林诸水云:"丹水、紫渊、灞、滻、泾、渭、酆鄗潦潏,入川分流,相背而异态。灞、浐、黄、濛,东注大湖。"按:沈括以大湖为太湖,且云"相去数千里,何缘相涉?盖误读大为太耳!"

《水经》又讹太湖为洞庭湖。《扬州记》亦云:"太湖一名洞庭",盖洞庭山在太湖中耳。岳州之南所谓洞庭湖,《水经注》云:"洞庭陂也。"而岳州集古今题咏,刻石龛于岳阳楼上,如吴中皮、陆唱和,苏舜钦笠泽、洞庭之诗,皆在焉。乃知地志多傅会也。

沈存中《论郭璞江赋》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湖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孔安国曰:"自彭蠡江分为三,入于震泽,复为北江入于海。"此皆未详考地理,盖江、汉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绕出五湖之下流,径入于海,何缘入于五湖?淮、汝自径徐州入海,全无交涉。《禹贡》云:"彭蠡既潴,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以对文言,则彭蠡水之所潴,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泽也。震泽之原,皆山环之,了无大川。震泽之委,则多大川,亦莫知孰为三江者。盖三江之水无所入,则震泽壅而莫[为]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后震泽底定,此水之理也。存中之言如此。或谓三江既入,入于海也。意存中以三江之水未入海,则震泽壅滞;既入海,则底定耳!或谓扬州水患既平,三江入海,无泛溢之患。震泽定,有浸灌之功,非此有所入而后彼有所定也(互见《三江考》)。

郏子高[侨]《水利书》:"太湖积十县之水,一自江南诸郡而下,出领[岭]阪重复间。当其霖潦积贮,溪涧奔湍,迤逦至长塘湖。又润州、金坛、延陵、丹阳诸邑,皆有山原,并会于宜兴以入太湖。一自杭、睦、宣、歙与天目等山,众流而下杭之临安、馀杭,湖之安吉、武康、长兴以入太湖。"赵彦卫云:"太湖上原有三:一自宁国、建康等处入溧阳为金渊,即子胥沉金之所,至镇江之金坛、延陵,为长塘湖。至常州宜兴、武陵、晋陵,为滆湖。又自宜兴环无锡,平江之吴县、吴江,

湖州之乌程为太湖。又东为松江;其二自宁国、徽严界聚上流之水,下杭州界,合临安之新城、於潜、昌化等县水入江涨桥运河北,自湖州市入太湖;其三自广德界聚山北及上原水,下入宜兴、安吉、长兴等水以入太湖,由松江入海(彦卫又指此三原为《禹贡》三江,尤谬)。"旧志亦云:"太湖西南湖州诸溪,从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诸山溪水,并下太湖。"

五湖别称见于传记者,《寰宇记》引虞仲翔云:"太湖东通长洲松江水,南通乌程霅溪水,西通义兴荆溪水,北通晋陵湍湖水,东连嘉兴韭溪水,凡五道,谓之五湖。"《后汉·冯衍传》注引虞翻说:"太湖有五,曰湍湖、洮湖、射湖、贵湖,与太湖而五,并太湖之小支,俱连太湖,故名。"《水经》引地志曰:"江水自石城东出,径吴国南为南江,又东北为长湫,历河口注江,出东注具区,谓之五湖口。五湖谓长塘湖、太湖、射湖、贵湖、上湖、湍湖(《史记正义》五湖亦同《水经》。程大昌云:长湫,即太湖。熊疑河口当作湖口,别有考证)。"梁大通《吴郡水灾议》:漕大湫以泻浙江,岂长湫、大湫皆指太湖而言邪?《寰宇记》又引韦昭《三吴郡国志》:"游湖、莫湖、胥湖、贡湖,就太湖为五。"《常州志》引韦昭说:"胥湖、蠡湖、洮湖、阳湖,与太湖为五。"刘芳实《经史机要》:"太湖、胥湖、蠡湖、洮湖、湍湖为五湖。"《史记正义》及顾夷《吴地记》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贡湖、胥湖,皆太湖五岸五湾为五湖。菱湖,在莫里山东,周回三十余里,西口阔二里,与莫湖连;莫湖在莫里山西北,与胥湖连;胥湖在山西南,与南湖连,各周回五六十里,西连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长山东,湖西口阔二里,东南岸树里,西北岸长山,湖周回五六十里;贡湖在长山西,口阔四五里,口东南长山南即阳村,西北连无锡县老岸,湖周回一百九十里,湖身向东北长七十余里,西亦连太湖。"《史记正义》云:"笠泽江,松江之别名",又云"笠泽即太湖"。《扬州记》曰:"太湖一名震泽,一名笠泽,一名洞庭,则江湖通为笠泽矣。"

夏驾湖,在吴县西城下,吴王寿梦避暑驾游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河内悉为民田,不复有湖。犹于河旁种菱,甚美,谓之夏驾湖菱。

游湖,在太湖中。《独异志》云:"禹治水至游湖,风涛甚。有二花虬龙负舟而过,左右恐惧,惟禹安然无畏。"

金鼎湖,在太湖中。《吴地记》云:"昔吴王泛舟五湖,金鼎沉此,命渔人簇三舟连网漉之,不得,因此而名。"《物类相感志》云:"震泽有金鼎湖,天将雨,则有黑沫浮于水面,有顷,雨至也。"

梅梁湖,在夫椒山东。吴时进梅梁至此,舟沉,其梁遂失。每至春首,则水面

花生(《洞庭记》)。

菱湖,东西九里,南北五里,连太湖。旧传湖中有青白龟子板,往往人见有取之者,即有风雨之异,觅之无踪。

石湖,去郡城西南十里,盖太湖之派,范蠡所从入五湖者。今为吴中绝胜(事具别条)。

上湖,去吴江九里(湖不甚广,杨万里诗云:"上湖名是实全非,只合松江雁鹜池。若与五湖通谱系,滹台湖是太湖儿。")。

庞山湖,在吴江东南,其水上源西接太湖,从甘泉桥出运河下,源自庞山湖,出急水港,由白蚬江入淀山湖而注之海。

莺脰湖,南去吴江四十五里平望南。旧以湖形似莺脰,故名。或讹为莺斗,其义无取。其源有两:一自湖州霅溪东流,由南浔至本县界荻塘,出安德桥;一自西南湖州乌青镇烂溪,由莺脰湖并出安德桥,入运河分流。又作两路:一自南流出曹龙港,至汾湖,由汾湖出孙塔港,入淀山湖而注入海。

阳城湖,在长洲东北,与昆山合界。

包湖、傀儡荡,与阳城湖三水合为一,在昆山西北。

陈湖,在昆山西南七十里。

淀山湖,在昆山南八十里,属松江府界。东西三十六里,南北十八里,汇苏、湖、秀三州之水,水由西南趋东北,入吴松江、大江,入于海。

昆承湖,在常熟东南五里,长三十六里,广十八里。《水经》云:"广长各十八里,东南入昆山界,东出白茆浦,入扬子江。"又云:"昆湖在昆山北,承湖在昆山西北,本二湖,合为一焉。"

尚湖,在常熟西南四里,长一十五里,广九里,北出黄思浦,入于江。

虞湖,《十道四番地》云:"湖周五十里,至天高气清,良辰美景,则有波涛溢起,高二丈许,鼓荡山峰云(注云:'涛若与虞山神共会,作涛以为戏。')。"

马泾湖,郏氏书作"马荆",及有作"马京"者。故老相传,昔人洗马于此,马忽惊跃前足,有物色白如带萦绕然,人遽解之,流血数升,弃所缠物于岸傍,有戏沃盥之者,蠕蠕而动,倏忽渐长,盘若一席,众惧,急走,而风雨大至,震雷数声,此物忽不见,始知龙也。此与《酉阳杂俎》白将军事相类,疑传讹也。

震泽,乃三江之源,上接太湖。一江东南流五十里,入小湖;一江东北流二百六十里,入海;一江西南流七十里,入震泽。《书》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今为镇于此,去郡城西南一百二十六里,镇有底定桥。

女坟湖,在吴县西北六里。《吴地记》云:"吴王葬女,取土成湖。"又《郡国

志》云:“玉女坟,在郭西,以水绕墓,因名女坟湖。”

叶泽湖,在吴江谢里东南。

黎湖,在吴江庖村西。

新湖,在吴江庖村西南。

汾湖,在吴江芦墟西。

沙湖,在长洲,通湖漾,由至和塘以达于海。

巴城湖,在昆山,上接阳城湖,入大七浦等港入于海。

雉城湖,在昆山,上接江湖港浦,由大七浦入于海。

鳗鲡湖,在昆山,上承江湖,流入浪港等浦入于海。

滮台湖,在长洲,宝带桥在其东,上源受太湖之水,过桥入运河九城等港,支流入黄天荡、车坊漾。一流入金泾淹,由沙湖下至和塘;一流由陈湖下吴松江。

契跨湖,在吴江。

蠡泽湖,在吴江。

笑面湖,在吴江。

长荡湖,在吴江。

江

三江,《史记正义》曰:“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下文于分流号三江口,此三十里太近):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娄江(三百里,当云二百余里),于其分处号三江口。”顾夷《吴地记》云(顾野王《地理志》同):“松江东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水经》云:“松江自太湖东北流径七十里,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吴越春秋》称:“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此亦别为三江、五湖,称谓不与《职方》同。庾仲初《扬都赋》注:“太湖东注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东北入海为娄江,东南入海为东江,与松江而三也。”右古迹如此,先儒蔡仲默取以证《禹贡》之说,但《正义》微有讹误耳。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一名松陵。旧经云:“松柏险隘,故名松陵,又名笠泽。”《吴越春秋》:“越追奔攻吴兵,入于江阳松陵。”《国语》:“吴王起师,军于江北,越军江南。”《左氏传》:“越伐吴,吴子御之笠泽”,即此地也。按:《水经》:“松江分流,东北为娄江,东南为东江,皆入海。”又引《吴记》曰:“一江东南行七十里,入小湖为次溪,自湖东南出为谷水。”旧经云:“三江东流五十里入小湖。”

《元和郡县志》:“松江在吴县,过甫里,经华亭,入青龙镇,旁有沪渎村是也。江流自湖至海凡二百六十里,岸各有浦凡百数,其间环曲而为汇者甚多,赖疏沦而得免水患。”又谓:“松江东流,聚为小湖,西北接白蚬、马腾、谷湖、瑁湖,谷湖即谷水也。”《续志》云:“松江受太湖,一自长桥流入同里港、犁湖瀼,由白蚬江入薛淀湖;一白甘泉桥,由松江尾东径叶泽湖,自急水港至白蚬江,入淀湖而注之海。”熊按:松江亦云吴松江,指吴县之松江也。其地即今之吴江县,实太湖之支流。东江、娄江,又松江之支流,而娄江与娄门、娄县同称,其遗迹尚可考,东江弟古书简质直云东流之江耳,若以今地名指实以应之,则穿凿甚矣!盖东江、娄江,当时深广与松江相为长雄,其支渠别派入海者甚多,但此三江为巨川耳!《水经》亦云:“东南地卑,万流所湊,涛潮泛决,角地成川,支肆交渠,多号纷夥,故川旧渎,难以取悉,盖此类也。”

东江,在松江东南。见前。

新洋江,在昆山县东南六里,自吴松江流入本县。邑志云:“本有故道,钱氏时尝浚治之,其源出于松江而其流溉于冈身,中有横塘通小虞浦,其余支港皆通运河。”

新江,嘉祐间,县丞沈某略弯取直以开新江,东入于海,西入于松江、太湖,南入于陈湖,北入于鳗鲡湖等瀼。江之南北有大浦四十二,在昆山。隶它邑者不在焉。

江之南:石浦、道褐浦、箭市浦、金灶浦、千墩浦、陆浦、张潭浦、棠梨浦、同丘浦、诸天浦、张浦、凡规浦、六直浦、甫里浦、渡头浦、东齐浦、剎刀浦。

江之北:界浦、真义浦、黄渎浦、薛庄浦、乐浦、心续浦、华翔浦、梁舍浦、大虞浦、小虞浦、社城浦、广浦、马仁浦、天明浦、下驾浦、木瓜浦、顾墓浦、金城浦、三林浦、瓦浦、北矮浦、徐公浦、安亨浦、顾浦。

娄江,一名下江,乃松江东北之支流也。见顾夷《吴地记》及《扬都赋注》。按:殷奎《昆山志》云:“自县治西,岁久湮塞,居民围而为田。宋至和中,又筑堤成塘,娄江故道不复见矣。今郡城东之娄门东行七十里,得古娄县治,皆以娄江得名。自是而下,东北入海,水势洪驶,并无迂曲,娄江旧迹昭然可见。”朱氏《续志》曰:“昆山塘,自娄门历昆山县,以达于海,即娄江也。今俗讹为刘家港云。”

白鹤江,本松江之别源,在嘉定界,与今上海县合界。

旧江,亦松江之别流,相传吴松古迹也,在嘉定界。

白蚬江,在吴江北江泽村北谢里东南,连长洲界。

姚城江,在吴江韩城村东南。

青龙江，在嘉定县西门二十六里，与今上海县合界。

蟠龙江，在嘉定县南五十五里，与今上海县合界。

大海，在县东四十五里，东北距崇明止隔一水，约五十余里，与淮浙分界，俗谓之海洋，自东南吴松江口直下，正大海也。

口

蠡口，在齐门之北。去门十八里又有蠡塘，在娄门之东。相传鸱夷子乘扁舟下五湖，潜过此，以出招大夫种，因名。

胥口，在木渎西十里，出太湖之口。《吴地记》云："在姑苏山北十二里，因胥山得名。"周益公《游山记》云："太湖东边两山对峙，南曰胥山，北曰香山，中有水曰胥口。"

三江口，《吴越春秋》云："范蠡去越，乘扁舟出三江口，入五湖。"

溪

越来溪，在横山下，与石湖通流。《范志》曰："相传越兵入吴时，自此而来，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史记正义》："越自松江北开渠至横山东北入吴，即此溪。来读曰厘，吴音也。"

香水溪，在吴故宫中，俗云西施浴处，人呼为脂粉塘，吴王宫人濯妆于此。古诗云"安得香水溪，濯郎衣上尘"。

乌角溪，去郡城西北四十二里，与无锡接界，其水西透太湖四里，东入运河，而溪界其间，故名坞角。杨备："郎中作乌悫，今作乌角，疑误。"

烂溪，在吴江，上承湖水，流入莺脰湖。

韭溪，在吴江唐塔村。

车溪，在吴江县。

穆和溪，在吴江县。

黄家溪，在吴县。

潭

投龙潭，在龟山下，皮、陆有诗。《林屋纪遗》云："嘉定初，民于山下采藻，获吴越王所投金龙玉简，简以银制，长九寸，篆文隐然，皆以朱漆填钗，题云：'太岁壬戌'，时宋建隆二年也。民争银，诉于县，县宰吴机索没入官。其简文，山间好事者皆传之。"

勺头潭，在吴江，承汾湖诸流，入姚城江。

沙盆潭，在阊门外。

渎

练溆，在太湖鸿鹤山西南入平湖，北通官溆，本吴王练兵之地。王充《论衡》曰："阊间尝试其士于五湖之侧，皆加刃于肩，血流至地。"僧文鉴《洞庭记》则谓："吴王游五湖经此，曰此水洁白如练影之涵空也，故名。"《苑志》曰："旧传吴王开以练兵。"

沪溆，在松江东，义海泻曰沪，即西黄渡浦也。

交让溆，在子城北，今有交让巷，俗讹为甘浆巷，即此地也。今为民居所侵，仅有污池丈许可考。

湾

明月湾，在太湖石公山西二里，世传吴王尝玩月于此，皮、陆有诗。

冯家湾　萧家湾　商量湾

已上三湾并在嘉定，即江湾也。

销夏湾，在洞庭西山之趾，吴王避暑处也。水口阔三里，深九里，烟萝塞望，水树涵空，杳若仙乡，殆非人境也。皮、陆有诗。

可盘湾，《洞庭记》云："吴王游湖，从此度军，忧险难达，益增瞻眺，曰亦可盘也，故名。"

死亭湾，在阊门外七里。汉朱买臣妻耻而自缢处也。《寰宇记》亦云："嘉兴县北十七里，有死亭湾，买臣妻葬此，谓之羞墓。"按：《寰宇记》："买臣妻死郡舍后园"，前说皆未足据。

赤门湾，在葑门外。

河

市衢旧有运河，堙塞之后，人皆聚阊而居，开凿为难。嘉定间，郡守赵彦橚自锦帆泾终始衡纵四出，凡开一千一百余丈，阛阓之地，楼宇下瞰，掩映可观。唐人诗有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复其旧矣。谢南有《重浚河记》。

荻塘河，在平望，西通湖州九十里。

西新河　北新河　新开河

已上三河并在崇明县。

塘

走狗塘，吴王作。按《越绝书》："阊间走犬长洲"，恐此即田猎之地也。

莲塘，在吴县西十二里，产藕无渣。

坛塘，在吴县东南三十五里大江边，一名陌城。《吴地记》云："夫差祭子胥之所。"

金银塘，伏滔《诗序》云："姑苏台东有丹湖万顷，内有金银塘。"按：齐[萧]

唐题徐祐山亭诗云:“九曲胥门占胜居,金银塘外小山池。”今齐门外常熟塘上亦有金银塘桥,而《越绝书》云:“丹湖昔闻之”,则当时已不可考矣。

至和塘,自郡城东属于昆山,亘七十里,北纳阳城湖,南吐松江,旧名昆山塘,由唐以来,修筑未备。至和中,调民兴役,始遂克成,故号今名。淳祐中水,复大修之。详见郑霖《重修昆山塘记》。

塘南北有浦:南小虞、大虞、梁里、心渎、景浦、薛庄、黄渎、真义,右八浦以通于江;北自小虞、梁里、尤泾、高塘泾、朱昌泾、黄渎,进入吴泾以通于湖。

盐铁塘,亦名内河,始自黄窑,缭绕数百里,南接昆山,西连江阴。

常熟塘,自齐门北至常熟,凡百里。唐元和中,郡守李素命长洲宰李嘏、摄常熟令李仲方分任董役而成,纪功立碑,刘允文撰、刘苑书,元和四年二月也。

梅里塘,在常熟县北,入杨[扬]子江。

福山塘,在常熟县,自松江下北。

支塘,在常熟东七十二里,本昆承两湖之支川也。淳祐中重开,程公许有记。

吴江石塘,凡九里,皆累石为之,上有桥九,三江观澜惠政,仙槎万顷,三山定海,甘泉通津,实江湖交激之会也。筑堤为路,此唐王仲舒为庾节日。继后守令,多有修筑者,而王文乃云:李云庆为秀州通判,自平望至吴江为石堤五十里以除水患,至今赖之。按:此则徐铸后来所筑,是续前人之功,或作文者失于审而然耶?宋大中祥符转运使徐爽闻奏置开江营兵一千二百人,专修塘岸,南至嘉兴一百余里。后开江营兵废罢。宋庆历八年,县宰李明等始大筑塘路,建造长桥。绍定五年,郡守吴渊添石重修,江湖风水冲激,不免有朝修暮坍之患。元监州那海捐俸募则,广市巨石,甃叠为塘,庶水无冲激之患,人无厉揭之忧,固而能久,厥功懋哉!

练祁塘,在嘉定县,东西长七十二里,正界县市,西通湖中之流,清彻[澈]而深,波澄如练,故名。其后江水不通,遂开水路,接东海之潮,至今有浑潮之说。积淤深浅,随潮之往来也。

樱桃塘,在昆山北十二里,元大德间,参政朱清申请开浚,名曰新塘,东达娄江,西通傀儡荡,南通吴塘,北至常熟塘。

太仓塘,在昆山,自吴塘桥直至周泾出海,宋时湮淤,潮汐不通。至元时,娄港不浚自深,日往月来,不数年间,朝夕两汛,可容万斛之舟。于是,宣慰朱清自淮而浙,创开海道漕运,每岁粮船,必由于此入海。

浦

三楼浦，在嘉定，有上中下三楼。或云：昔有人乘楼入海，故名。

荡

白荡，在吴江，受练溪、鸳脰湖水，一流由黎泾入运河，下汾湖；一流入盛墩漾。

三江荡，在吴江。

莼菜荡，在吴江，承淀山湖以入江。

黄天荡，在长洲。

尚泽荡，在长洲。

鹅肫荡，在长洲县西无锡界，由冶长泾入常熟塘。

漾

车坊漾，在长洲。

南麻漾、北麻漾、盛泽漾、清头漾、马尾漾、黄家漾、木瓜漾，已上并在吴江界。

范青漾，在昆山。

浒

百家浒、大泗浒，二水合为一，在昆山县北，南自新洋江入松江，西自牛尾泾、清水港、樱桃塘入于鳗鲡浒。

江家浒，在昆山县西北二十里，又在鳗鲡湖北。

淹

金泾淹，在长洲，上承诸湖之水，下流由龙涎等泾入至和塘。

彭山淹，在吴县，上承太湖水，流入运河诸港。

泾

箭泾，一名采香径，事具古迹类。

锦帆泾，在府治官街西，纵贯乐桥南北市郭。俗传吴王锦帆游乐于此。嘉定十年，赵彦倓疏浚以达运河。

采莲泾，在城内东南隅，运河之阳也，今可通舟，两岸皆民居，亦有空旷为蔬圃，此种莲旧迹也，上有采莲泾桥。

小娘子泾，在常熟县治前。

山塘泾，在虞山西南。

井

吴王井，在灵岩山腰，大石泓也。相传为吴王避暑处。

虎丘石井，《祥符图经》云："陆羽泉，羽字鸿渐，尝烹茶于此，盲天下之水第

三也。"按:井在云岩寺藏殿侧,俗名观音泉。

毛公炼丹井,在吴县洞庭山毛公坛侧,色白味甘,即炼丹井也。其傍又有古池,深广袤丈,旱岁不竭,即毛公泉也。

丁令威井,在阳山下。僧以为丁令威所居。《图经》:"吴县界有丁令威宅",殆是欤? 钱氏时,有泉出于寺中,因名仙泉,后改曰澄照寺。

王桥井,在昆山县东南。

圣井,在常熟县北一百九十步。《吴地记》云:"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吴人,宅有圣井,阔三尺,深十丈,井傍有盟,盟即坛也。"

泉

白云泉,在吴县西二十里天平山,唐白乐天为郡,尝游览赋诗。比年,寺僧又于白云之上石壁中得一泉如线,尤清冽云。

水月泉,在吴县洞庭山缥缈峰下水月禅院。唐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大中祥符中,易今名。山傍有泉甘洁,岁旱不涸。

柳毅泉,在太湖之滨,虽大风挠之不浊,虽旱不耗,此所以为美。

碧琳泉,在吴县支硎山下,水泓渟不数斛,甘美可爱,大旱不竭。朱伯原文尝见之。韩魏王诸孙居吴者,墓于其侧焉。又寒泉,有石平广,泉流其上。

憨憨泉,在虎丘山路侧,恐即虎跑泉。今横山自有酽酽泉,在宝华寺。

海眼泉,在昆山县马鞍山下。开宝六年重作石阑。

留爱泉,在昆山县驷马桥西。

池

天池,在华山,老子《枕中记》云:"此地可度难,池中生千叶莲华,服即羽化。"

月池、砚池、玩华池,并在吴县西二十一里砚石山顶上,虽旱不竭,其中有水葵甚美,吴所凿也。

朝夕池,在长洲苑,谓潮水朝盈夕虚,因名。

(辑自洪武《苏州府志》卷第三)

苏州的民居

苏州城内的民居是江南水乡民居的杰出代表，无论是布局构图、空间处理，还是建筑手法、装修艺术等方面都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格。幽深整齐的小街小巷、八横七竖的河网水系，将古城的民居勾画得小巧、宁静和水灵。从建筑布局上看，苏州民居大体可分为面水民居、临水民居和跨水民居三种类型。

面水民居建在宽 4～6 米的濒河街巷一侧，面水沿路，排列成线。河岸上一行垂柳，半截石栏。现平江路大新桥巷、大柳贞巷等处即如此布局。这类民居多为深宅大院，纵向轴线院落式布局，少则三四进，多则五六进，成前街后河格局。

临水民居一般位于河道与道路相互平行的中间地带上，紧贴河道，叠石为基，临河建宅，布局紧凑，进深浅，占地少。不少民居还挑石为基，建筑飞临水面，形成古人描绘的“人家尽枕河”、“楼台俯舟楫”的优美画面。这类建筑在平江路和学士街较为典型。

跨水民居多建在狭窄的河道上，凌水建宅，以小桥相系，有机地组成一户住宅。现在饮马桥东侧、鸭蛋桥附近尚存这种结构的住宅。

苏州经济文化发达，历来是达官贵人的聚居地，民居中明清建筑比比皆是。这些住宅包括家祠和花园等部分，由多组轴线构成庞大的建筑群。中央轴线上建门厅、轿厅、大厅和住房；左右轴线上布置客厅、书房、次要住房和杂屋，成为三组以至多组纵列的院落群组。各组之间有连通前后的交通线即备弄，兼作防火和巡逻之用。房屋一般朝南或东南。考虑到江南水乡的气候特征，非常注意防潮、散热和通风。因此门窗面积大，多数为落地长窗，南北敞开，院墙上开漏窗。后部住房多为两层，通风性能良好。院落狭小，东西横长，夏天较为凉爽。为避免日光西晒，苏州人称为

"倒西太阳",东西两面往往用高墙封闭。客厅和书房前,凿池叠石,种植花木,构成幽静的庭院,供人修身养性。这些后花园,就是通常讲的苏州私家园林,人民路乐桥附近的怡园就是顾家的后花园。苏州民居建筑多为木架承重,面向门庭的门楼多用精美的砖雕装饰,门窗装饰也非常讲究,有很多雕刻有精致的吉祥图案。厅堂内根据各人爱好可以挂些字画,梁架也饰以少量雕刻。苏州现存规模较大的有钮家巷潘宅、铁瓶巷顾宅、马大箓巷邱宅和梵门桥弄吴宅等。

苏州的氏族大姓

中国人的姓氏源远流长,据说伏羲氏时就开始"正姓氏,别婚姻"了。在先秦时期,姓和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用来表示母系的血统,一直到了周朝,还有女子称姓,男子称氏的规定。最初的姓大概是部族名称,经过不断发展,分化成许多不同的部落。为了便于区分,同姓部落就有了各自的名称,即氏。后来氏专指部落首领。在上古时代,只有贵族才有氏,而且可以世袭。到了一定阶段,氏就开始演变成家族的标志。上古时代的姓现在能够查到的总共只有几十个,而一个姓可以分化出许多氏,同一个氏的后人还可繁衍出不同的氏,因此,氏的数量大大超过姓。我国现在使用的姓氏中有99%其实是由氏演变而来的。其源流不外乎祖父的名或字、封邑名、官职名、祖上谥号,及居住地等几支。

苏州最早的氏当推源出于姬姓的吴。泰伯、仲雍南奔后,来到江南,先在今无锡一带建立吴国,后移至苏州。到了吴王夫差手里,已称霸诸侯,其子孙就以吴为氏。历史上吴姓出了战国军事家吴起,秦末农民起义领袖吴广,西汉长沙王吴芮,东汉大司马吴汉,唐代画家吴道子,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璘,元代画家吴镇,清代平西王吴三桂以及文学家吴伟业、吴敬梓等。

苏州以陆、顾二姓为多，因此，旧时苏州人每询问敲门者："陆顾？"意即来人大凡不出此二姓。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注："《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据说顾为越王勾践之后裔，三国时有丞相顾雍，晋有名画家顾恺之，南朝陈有文字学家顾野王，唐有诗人顾况，清有思想家顾炎武，近现代有历史学家顾颉刚、目录版本学家顾廷龙等。苏州顾姓主要有南石子街顾和怡园顾两支大族。陆姓出过三国时吴名将陆逊、陆抗，晋代文学家陆机、陆云，唐代"茶神"陆羽、文学家陆龟蒙。苏州陆姓有三支：明建文帝后裔天官坊陆，中吉由巷吴江陆和阊门下塘状元陆润庠一支。朱氏源出曹姓，苏州历史上出过西汉名臣朱买臣、北宋文学家朱长文、明末思想家朱伯庐，清代阳山朱氏也盛极一时。

清同光年间，潘、翁、彭、沈系苏州显贵，可称四大家族。潘氏有贵潘、富潘之分：贵潘为官，潘世恩做了数十年大学士，其孙潘祖荫官至工部尚书；富潘经商，以油酱业为主，苏州人熟知的潘万盛就是富潘老字号。翁指常熟翁家，翁同龢是两朝帝师，其父翁心存官至工部尚书。彭指葑门彭家，彭蕴章为道光间文渊阁大学士，其子彭祖贤官至湖北巡抚。沈氏名人有唐文学家沈既济、书法家沈传师；而明代吴门画派创始人沈周，则开创了沈氏家族繁盛的传统，其一门五代均以诗文书画著称。更值得一提的是，沈周的弟子文徵明，生活于一个流寓苏州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竟盛极八代而不衰。清时则有吴江沈桂芬，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此外，还有耕读世家渡桥袁氏，从元代诗人、藏书家袁易起便人才辈出。诗人袁学澜就住在苏州官太尉桥西（现吴都学会在此办公），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也是其后代。太仓钱氏据说是吴越王钱镠的后裔。东山席家，以拥有启园（又称席家花园）而知名，据史料记载，康熙皇帝南巡时曾多次光临该园。木渎严家来自东山，严家淦就是严家的后代，严家花园现已修复开放。

苏州的氏族大姓，就是这样演绎了一出出精彩的历史剧，造就了姑苏文化的灿烂辉煌。

（原载《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一期）

链接：《苏州名门望族》，张学群等编著，广陵书社2006年7月版。

又：

氏族

吴之著姓凡三十余，自汉以来，朱张顾陆望于郡，故有朱文、张武、陆忠、顾厚之目。又云：虞魏顾陆，吴之旧姓。或云：虞魏之昆，顾陆之裔，岐嶷继体，老成奕世。陆士衡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猗欤盛矣！

朱氏《千姓编》云："朱高阳之后，周封于邾，后为楚所灭，子孙乃去邑氏朱，望出沛国又吴郡。"或曰：朱氏盛大者有九族，吴郡居其一。今郡之穹窿山有朱氏墓碣，字已漫灭，其可读者云："一十六世四百二十九年居下邳，自平始三年避地，至会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籍于吴。"此唐时子孙追叙其先过江岁月云。

张氏：《白氏》文云：汉侍中张朅避地渡江，始居于吴，故其子孙称吴郡人。晋丞相嘉，以孝悌闻于郡，故其所居号孝张里。《元和姓纂》云："吴郡张氏本出黄第四子睦，字选公。后汉蜀郡太守始居吴郡。裔孙显，齐庐江太守；绍，梁零陵太守。"

顾氏：本越王勾践七代孙，封于顾余（顾城在濮州范阳）。汉初居会稽，以邑为氏。韦夏卿撰顾少连碑谓：顾氏复徙吴会，自晋司空和洎梁给事中耀，至少连十三代矣。《世说叙录》有顾氏谱甚详。《姓苑》云：吴郡顾氏，汉有荆州刺史顾容。又晋有固乘，亦有故姓。

陆氏：妫姓，田敬仲之后也。十一世齐宣王少子通，封于平原般县陆乡，即陆终氏之故地，因以为氏。通谥元侯，生恭侯，发为齐上大夫，生二子，曰万、曰鼐，孙贾为汉太[大]中大夫。万生烈，为吴令，死葬胥屏亭，子孙遂为吴县人。十世孙颍[颍]川太守闳，生三子，曰卯、曰温、曰威，号颍[颍]川枝。威生扬州别驾续，又生三子，曰稠、曰逢、曰褒，稠为荆州刺史，号荆州枝。稠生二子，曰肃、曰谦，肃为丹徒令，号丹徒枝。《世说叙录》：有陆氏谱，陆景献自有《吴郡陆氏宗系谱》一卷。

暨氏：暨姓出吴郡，元祐间，唱名有暨涛（暨，吉屑切），时作洎涛呼，不应。是时，刑部侍郎苏颂云："恐是暨音以结"，呼之即应。《三国志》有暨艳，乃吴人，既而问之，果平江人。

归氏：《左传》：胡子国姓归，为楚所灭，子孙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以姓为氏者，世居吴郡。

寿氏：吴王寿梦之后。吴大夫寿越，又有寿于姚。今吴中尚有此氏。

赏氏：《姓苑》云：赏氏，吴中八族也。晋有赏庆，为郗鉴主簿。

儿氏：吴郡有语儿，生而能语，子孙氏焉。

姚氏：虞舜生于姚墟，故因生以为姓。王莽乱，舜后子恢过江，居吴郡，改姓为氏。

虞氏：武王封仲雍之后于虞城，晋灭虞，子孙以国为氏。

吴氏：本勾吴国，今苏州城是也。越灭吴，子孙以国为氏。

孙氏：姬姓，卫武丁之后，孙耳食邑于威，生武仲，亦曰孙仲，以王父字为氏。齐孙武奔吴为将，武之子明，食邑于富春，自是，世为吴人。

诸氏：（音遮）后汉洛阳令诸施，吴郡人。今吴郡有此氏。

蓦氏：（音胥，又音湑）望出吴郡，见《姓苑》。

言氏：孔子弟子言偃，吴人，今后裔多居常熟。

帛氏：《姓苑》云：吴郡人，汉五威将军帛敞，后汉有帛宣，《神仙传》有帛和，晋有高僧帛道佺。

笮氏：（侧迫切，亦作迮）《风俗通》：楚有笮伦，今吴郡有此姓。《吴志》：汉中有笮融，居丹阳。

岑氏：讳晖，字公孝，党锢难起，逃于江夏山中，徙居郡，生亮，亮生伯，伯生轲，为吴郡、会稽、鄱阳太守（《唐书·姓系表》）

阎氏：姬姓，武王封泰伯曾孙仲奕于阎乡，因以为氏。又云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阎康王，封于阎"。康王封于阎城。今苏州有阎桥，后世恐无取。

容氏：黄帝时有容成造历。《礼记》"容居，吴人。"

曲氏：本鞠氏也，周人。汉《尚书》"鞠谭子闳避难，改为曲。"唐有曲信陵，吴郡人，居洞庭。

汤氏：宋有道人汤惠休、正元道人汤灵澈、宋州刺史汤柔（并吴人）。

崇氏：商时侯国也，周文王灭之，子孙以国为氏。唐开元登科有崇颖，宋朝登进士第有崇大年，皆吴郡人。

沃氏：商王沃丁之后。《神仙传》"有沃焦，吴人。"

胥门氏:《左传》:"吴大夫胥门巢",巢居吴门,胥以所居为号,其后遂为氏,今作胥氏。

甪里氏:汉初"商山四皓"有甪里先生者,本与周同姓,名术,秦伯之后,在洞庭西山居,故以自号,子孙遂以为氏,或作甫氏。后汉有甪若叔者,乃其后也。

冷氏:即伶氏。《风俗通》云:"黄帝时典乐伶伦之后,今多作上音。"唐贞元中,监察御史冷朝阳,吴人。

是氏:是仪黜书衣,判是仪无首,族变勾吴。《三国志》:是仪本姓氏,孔融嘲仪氏,字民无上,故改为是。(《文苑联珠》)

钱氏:彭祖裔孙孚为周钱府上士,因官命氏焉,子孙多居下邳。汉哀平间,钱逊为广□太守,避王莽乱,徙居吴之乌程。五代时,广陵王元璙为中吴军节度使,卒葬吴下,子孙因家焉。

范氏:陶唐之苗裔。周宣王杀杜伯,其子隰叔奔吴为范氏。越有范蠡,破吴,辞越居洞庭之东山。唐又有范隋,为处州丽水县尉,守时乱,遂家吴地,子孙遂为吴人,即文正公之高祖也。

富氏:世家京洛。嘉祐中,富严守苏州,善吴中风物之美,因居不去,子孙遂为吴郡人。

严氏:本庄氏,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前后有庄助、忌,皆有夫子之称。又有庄光,后以犯明帝讳,改为严氏。

章氏:本出姜姓,太公望之后,封于彰[鄣],子孙以邑为氏。后去邑作章。嘉祐中,浦城章粲为苏州教官,就居于此,故南北二族,粲居城北,号北章;惇居城南,号南章,其二氏甚盛。

武氏:著姓开封,南渡后定居姑苏,后有名如愚者,早孤,依故人龚相能,刻厉读书,业文词,以祖泽入仕。

傅氏:《广韵》馀字下注云:"傅馀氏,本自傅说,既为相,其后有留于傅岩者,因号傅馀氏。秦乱,自清河入吴。汉兴,还本郡。余不还者傅氏,今吴郡有之。"

蒲氏:本出山阳,有蒲中行者,元祐间为台官,论列苏轼,不学无术,收买私盐,时多薄之。建炎南渡,占籍吴中。弟安行者,有女嫁赵不衰。

(辑自洪武《苏州府志》卷第十六)

松鹤楼菜馆

菜馆简史

苏州松鹤楼菜馆坐落在观前街中段(141 号),正对大成坊,是苏州现存历史最久的正宗苏帮菜馆。

松鹤楼初创时为面馆,加入面业公所。“松鹤楼”之名最早出现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重建苏州面业公所的石碑上,据此推测,松鹤楼应创建于 1780 年之前,迄今至少已有 200 多年历史了。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一向经营面点的松鹤楼扩大为菜面馆,店东为徐金源。当时松鹤楼只是三开间一角楼面的小店,主营卤鸭和卤鸭面,带卖饭菜。卤鸭为时令熟菜,每年农历五月下旬开始供应。苏州市民素有夏季吃“雷斋素”、“三官素”的习俗,在开始素食前,往往要上松鹤楼吃卤鸭面“封斋”,年复一年,相沿成俗。除了卤鸭面,松鹤楼还推出焖肉、爆鱼、爆鳝、素浇面。最初的饭菜品种就是在各色面浇的基础上加工烹制而成的,如酱方、焖肉豆腐、炒三鲜、小蹄膀、红什拌、汤头尾、毛血汤等,属于中低档一类菜。后来饭菜业务逐渐超过面市,老板徐金源才着意转向饭菜方面发展。

宣统二年(1910),徐金源积劳病故,由其子徐培根继承。但培根不谙菜馆经营,常年住在上海,仅年终来苏州取看“红帐”,一任执管者中饱私囊。到民国 5 年(1916)已是山穷水尽,不得已以招牌年租 60 石大米(时每石合 7 元银洋)、生财出盘 800 元银洋、10 年为期租盘给徐金源生前挚友张文炳,租契自民国 7 年生效,易名为“和记松鹤楼”。

新组成的和记松鹤楼是合股企业,股东 6 人(张文炳、苏子和、王觉初、邹景高、陆仲康、沈增奎),每股银洋 200 元,推张文炳为经理。开张之前进行了一番修缮,还增添了陈设,调整了帐房、掌勺。

在菜面的品种、质量和服务等方面作了改进，以经营苏帮传统特色菜肴为主，提高高档菜比例，多方承办衙门官厅、望族富户的宴会、喜庆筵席，营业和利润迅速上升。民国13年(1924)，张文炳为提高松鹤楼的地位和声望，会同天兴园、鸿云楼、南新园三家饭店，联名向苏州总商会申请注了册。当时松鹤楼的主打菜有：原汁鱼翅、虾子刺参、白汁元菜(甲鱼)、虾丝烂糊、松鼠桂鱼、清熘大玉(即虾肉)、秃黄油、卤鸭、荷叶粉蒸肉、红烧头尾、西瓜盅(即用西瓜挖空作盛器)、网包鲥鱼、蜜汁火方、响油鳝糊、鲃肺汤、炸虾球、白什拌、青鱼卷菜、糟熘鱼片、口麻锅巴汤(天下第一菜)、炸肫、三黄焖(黄焖鳗、黄焖栗子鸡、黄焖着甲)。

民国18年(1929)，观前街拓宽时，松鹤楼在原址翻建扩建为600多平方米，楼上隔成大小9间，可设30桌；门悬高僧悟禅大和尚手书金字招牌，墙上书"各色大菜，驰名京沪；只此一家，并无分出"字样。次年1月18日落成开张，俨然成为地方名流宴请时首屈一指的大菜馆。30年代，梅兰芳偕金少山、马连良等来苏州赈灾义演，冯玉祥、李烈钧等爱国将领莅苏，地方各界都假松鹤楼设宴。当时就读于苏州东吴大学的蒋纬国也不时偕同学到松鹤楼就餐，最爱吃的就是卤鸭面。

民国23年(1934)，张文炳病故，其子张之钧继任经理。因他有鸦片癖，又缺乏经验，在日伪时期乃至抗战胜利后仍入不敷出，勉强支撑。

解放初，张之钧抽资出走，协理殷某也脱离松鹤楼，松鹤楼由工会负责人张雪康等8人组成临时维持生产委员会，45名职工集资800元集体经营。1956年公私合营后，恢复特色经营，四季冷热菜肴有182种之多，常年供应苏帮菜70余种。"文化大革命"时期易名为东方红饭店，只供应大众化菜肴。1972年，为了适应日益增多的外事接待，松鹤楼扩建了外宾楼和厨房。

改革开放后，松鹤楼几经改造，80年代初面积扩至3600平方米，新建三层大楼，内设蟹泉、松鹤、友谊、乾隆、凤凰、鸳鸯、和合、

迎宾8个大厅，寒山、虎丘、沧浪、太湖、九龙5间雅室，全部采用苏州传统工艺品装饰。全楼可设200余桌，列苏帮名菜馆之首。常供名菜名点百余种，1984年营业额达267万元。这年7月15日，应北京饮食界之邀，苏州松鹤楼在北京台基厂大街的“克隆”店开业，面积1300平方米，设12个以苏州园林命名的餐厅，可容400人同时就餐。工作人员107人。苏州主要提供烹饪技术，先后有18名红、白案特级和一、二级名厨轮流操作。当年就被评为北京市先进集体。1989年，苏州松鹤楼菜馆被评为首批国际旅游定点单位。1990年入选全国商业酒店(饭店)50强。1993年松鹤楼又对所有餐厅进行了装修，次年“松鹤楼”获得了国家工商局的商标注册。1996年，松鹤楼卤鸭荣膺“中华名小吃”，同年松鹤楼菜馆被国内贸易部命名为首批国家特级菜馆。至2003年，松鹤楼已拥有48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400平方米的标准停车场，25名特级厨师、27名一级烹调师。店内有大小餐厅7间、大小包房12间，一次可容纳1000人同时用餐。2004年底，松鹤楼菜馆又开始为期1年的整体重建和装修，其定位是古典式风格，设计理念更具人性化，使顾客在享受地道苏式美食的同时，享受身心的愉悦。

经营特色

传说松鹤楼草创时期，只是一家十多平方米的小面店，后来的发迹与成名跟乾隆皇帝有关。有一年，乾隆南巡至苏州，便服来到松鹤楼，点了一只“全家福”(即现在的炒什锦)。此事后被传扬出去，由此松鹤楼名声大振。事实上，松鹤楼的成名，关键在于该店选料新鲜，烹调精细，一代又一代厨师在继承苏式菜肴烹调技艺的基础上，汲取苏州船点船菜的制作技艺，不断改进、创新，使菜肴具有浓而不腻、清而不淡、色泽典雅、造型秀美的特色，并以鱼馔最为著名，被中外人士誉为苏式菜肴的王国。

早在同治、光绪年间，松鹤楼面店即注意面浇的时令性。农历五月下旬新鸭上市即开始供应卤鸭面，交秋后新鸡上市，即代之以新鸡面。爆鱼也非常讲究，不用青鱼就用草鱼，绝不用杂鱼；

夏令鱼缺,就以爆鳝应市。其焖肉也别具特色,操作精致,口味适中,入口即化。浇头还可以"过桥"(用小盆子另装),爱好"杯中物"的顾客可以先以浇头佐酒,然后吃面;也可以带点浇头回去馈送亲友。

张文炳接手松鹤楼后,在管理上分帐房、堂部、厨房、面部4个部门,各司其职,互相制约,环环扣紧,难以滋弊。在质量方面,苏州的一位美食家写于民国12年(1923)的《醇华馆饮食脞志》称:"寻常菜馆多以鹅代鸭,松鹤楼则曾有宣言,谓苟能证明其一腿之肉为鹅而非鸭者,任客责如何,立应如何。"和记松鹤楼进货方面严格规定"三不进",即不进鹅,不进鲤鱼,不进黑鱼,这在苏州同业中可谓独此一家。张文炳常言:"做生意最要紧就是取信于顾客,真正做到货真价实。"服务方面可概括为:一视同仁,注重礼貌,笑脸相送,招待周到。张的座右铭是:顾客是衣食父母,决不可以貌取人。即使在1930年代,松鹤楼成为苏州首屈一指的大菜馆时,仍坚持经营部分低档菜肴,并接洽向附近旅馆、酒店、居民、钱庄、商店的外送小菜服务,叫菜也不论多少,不嫌麻烦,送钿不争,以薄利多销取信于民。当有人问张文炳为啥勿多增高档菜时,他语重心长地说:"不能做独门生意,看起来高档品种赚钱多,但是普通生意对象多,所谓薄利多销,松鹤楼是靠三鲜、小蹄膀起家的。"

大胆放帐也是松鹤楼的经营特点。凡十拿九稳的对象,记收赊欠,逢节结算。虽周转上吃些小亏,但可以拉牢老主顾,增加营业额。客户来结算时,还要馈送"节菜"表示谢意。节菜要看平时生意大小区别对待。据松鹤楼老职工回忆,在以往的经营中从未有"坏帐"发生过。后来松鹤楼还根据顾客需求,整桌筵席还可分两次吃,叫"吃半桌"。更绝的是,松鹤楼为了招揽顾客,经常在前后门当众出虾仁,剔蟹粉,以示货色新鲜。

50年代,以3号服务员孙荣泉为代表的松鹤楼人,提出了"三勤、四快、五心、六满意"(接待顾客勤、送茶水毛巾勤、介绍品种勤,招呼开票快、饭菜上得快、桌子收拾快、接受意见快,接待顾客热

心、介绍食品耐心、收拾桌子细心、听取意见虚心、提醒顾客行李物品当心，顾客上门满意、清洁卫生满意、吃时满意、送别有礼满意、不吃也满意、出门想想也满意）的服务理念。1959 年孙荣泉赴京参加群英会，松鹤楼成为苏州饮食业的标兵。

总之，这一系列的经营理念和特色，才是松鹤楼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旺的根本所在。

名菜简介

松鹤楼是现存苏帮菜馆中声誉最高的老字号，堪称苏帮菜之代表。这与菜馆历来重用苏帮名厨高手掌勺有很大关系。从纯粹的面馆向菜馆转型时期，经理张文炳本身就是从小学厨，曾是官衙司厨的烹饪好手，他有着与苏子和合伙开办天和祥菜馆、金和祥菜馆的经验，盘下松鹤楼后，即委其阿舅陈仲曾掌勺。陈自幼随姐夫学厨，聪慧过人，苏帮菜肴之炖、焖、煨、焐传统技法，无一不精，大有出蓝之势。陈在烹制时，特别注重火候。例如红烧鱼块，从起油锅至烧好，对炉灶的火候有四次不同的要求，各道操作程序的间歇长短，以吃几筒水烟为标准。他上灶烧菜，总是那样从容，速度却比别人要快。还有一个特点，他从不尝咸淡，然而只只菜肴口味适中。与陈搭档的砧墩师傅费建森也是一流高手，其刀工超人。同样一只“排南”（薄片南腿），别人切 25 片左右，他可以劈到 40 片，比叶受和茶食店的云片糕还要薄。用料、刀工、火候等方面的有机结合，使每道菜色、香、味、形俱入佳境。

有人说，松鹤楼的“松鼠桂鱼”是因为乾隆大闹松鹤楼而成名。其实每一道菜的好坏，往往是出在众人口里，完全不用附会帝王之“金口”。1983 年 11 月，该店名厨刘学家参加了在首都举行的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大会，当场表演“枣红桔络鸡”的全套操作过程，博得了专家、同行与各界人士的赞赏，满堂彩声不断，荣获大会颁发的“全国优秀厨师”的奖状和奖杯，载誉而归。这一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为特级红案（掌勺）、白案（桌面）厨师有张宜根、刘学家、陆焕兴、孟金松、屈群根、朱阿兴、刘祥发，

还有服务员技师顾应根等，他们都是来自于松鹤楼。1992 年，特一级厨师刘学家、特二级厨师谢长明等在新加坡第八届国际沙龙烹饪大奖赛中荣获团体银牌，次年李俊生、谢长明又双双拿回了全国烹饪大奖赛华东区冷盆、热炒金牌。奠定松鹤楼菜肴在苏帮菜馆中的地位的，正是一代又一代的名厨，他们既有继承又有创新，用自己的技艺不断征服顾客，才使得松鹤楼在几经坎坷之后，仍能盛名不减当年。

松鹤楼的主要菜肴有松鼠桂鱼、原汁鱼翅、白汁元菜、清熘虾仁、荷叶粉蒸肉、网包鲥鱼、响油鳝糊、虹桥赠珠、枣红桔络鸡、翡翠虾仁、雪花蟹斗、母油整鸡、饼子野鸭、鸡油菜心、青鱼甩水等数十种。

松鼠桂鱼，是早已公认的松鹤楼名菜。因以桂鱼作原料，将鱼烹制成昂首翘尾的松鼠的形状而得名。桂鱼喜栖息于平静水域湖底深处，夜间活动觅食，且生性凶猛，以其他鱼虾为食物，肉质细嫩，骨疏刺少，营养价值很高。经出骨、剞花、扑粉、油炸、串滋等一系列要求极严的工序后，加工成头大口张，尾部翘起，肉似翻毛，形似松鼠，浇上虾仁、笋干、番茄酱卤时还会嗤嗤作响，犹如松鼠的叫声。此鱼色泽金黄，外脆内嫩，卤汁酱红，甜酸适口，微咸且鲜，声、色、香、味、形均具特色。苏州人对食鱼极讲究季节，应时则贵，失时则贱，唯独对桂鱼视为常年美味。围绕松鼠桂鱼，从乾隆皇帝下江南到电影《满意不满意》，曾演绎了许多动人的传说。一些早年离开家乡的老苏州，只要一回来，总爱到松鹤楼品一品正宗的松鼠桂鱼，可见苏州人对它的钟爱。

碧螺虾仁为吴门传统名菜。在苏式菜肴中用河虾制作的菜颇多，如油爆虾、盐水虾、碧螺虾仁等等，其中碧螺虾仁以洞庭东、西山特产碧螺春茶叶，俗称“吓煞人香”作调料，与新鲜太湖白虾仁（“太湖三白”之一）一起烹调而成。新碧螺春的清香加之河虾的鲜味，别具韵味。上桌时如以茶叶点缀围边，则色香味俱全，益加增色，是苏州春季特有的风味菜肴。

响油鳝糊，因鳝糊上桌后盘中油还在噼叭作响而得名，也是松鹤楼的特色菜之一。制作响油鳝糊除掌握烹调技术关键外，须上桌及时，否则，油降温后浇到鳝糊上没响声，那响油鳝糊就名不副实了。黄鳝在苏州，要到入夏才受到人们的珍重。此时黄鳝大量上市，肥壮且无泥土气。吴俗有“小暑黄鳝赛人参”之说，因此响油鳝糊也是一道时令菜。该菜黄鳝软糯，卤汁浓润，故称糊。吃口咸中微带甜，有葱、蒜、姜丝、胡椒粉等作料，很受百姓喜爱。

白汁元菜，亦写作白汁圆菜，也是苏州传统名菜。20 世纪初，经先后在天和祥、松鹤楼工作的名厨陈仲曾悉心改进后，声名更噪。圆菜乃甲鱼之雅称，甲鱼蛋白质、脂肪、糖、维生素等营养成分丰富，苏州人常以春、秋两季吃甲鱼，用来滋补身体。苏州食俗以桂花开放以后至初春季节的甲鱼为贵，过了菜花季节即称“蚊子甲鱼”，不再视为珍馐。此菜选用 750 克左右的青乌背、白玉腹甲鱼（过大肉老，过小味腥）。配料必有山药，太仓产者更佳。制作时先将甲鱼宰杀，将其内脏、趾、尾、嘴尖，在热水中刮黑衣，揭甲壳，斩成数块，洗净，并辅以山药、笋、香菇、葱姜、盐、酒等调料。一般须大量烹制，小锅复烧。上席时卤汁稠浓，如乳欲凝，裙边明润如脂玉，香软脱骨，咸中带甜。也有人以其较甜，名为“蜜汁圆菜”。

西瓜鸡，是苏州传统时令名菜。用夏天消暑的佳品西瓜，与鸡炖制，味美清香，富有营养。西瓜鸡以 750 克肥嫩母鸡为主料，断开脊背，斩头去爪，取出内脏，洗净，加清汤、火腿、笋片，放旺火烧沸，并焐至鸡烂。在一只约 2500 克西瓜上雕一盖，去瓜瓤，在瓜皮上雕上文字或图案，在沸水中略烫，再入清水浸凉，然后将鸡放入西瓜内，倒入鸡汤，并放进火腿片、笋片、香菇、绍酒、葱姜等，加原汤，盖上瓜盖，蒸几分钟后便可上桌。西瓜鸡鸡肉鲜嫩，汤清瓜香，为夏令时菜。

（原载《苏州老字号》，古吴轩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版）

陆稿荐熟肉店

陆稿荐熟肉店坐落在苏州观前街东首醋坊桥堍，创建于清康熙二年(1663)，距今已有三百多年，是目前苏州历史最为悠久的熟肉名店。

店名由来

陆稿荐以自产自销苏式卤菜而闻名遐迩。最早的店址在城西东中市崇真宫桥畔，规模不大，也无牌号，是一爿夫妻老婆店。店主叫陆蓉塘，妻子弥姐有一手祖传的煮肉技术。凭着弥姐烧制的酱肉，小店生意聊足糊口。店西神仙庙当家道士也常常光顾陆家肉店。可惜好景不长，随着都亭桥以东和皋桥以西市面的日益繁荣，陆家肉店生意渐趋清淡。有一年夏天，酷暑难熬，人们茶饭不思，根本就不想吃肉，店堂里冷冷清清，陆氏夫妻进入了两难境地：歇业吧，断了生计；开业吧，杀一头猪却卖不掉多少肉，当时没有冰箱，在夏季高温状态下很快就会变质乃至发臭。夫妻俩一筹莫展，一心盼着夏天早点过去。

一天午后，一个衣着褴褛的跛足老乞丐经过店门口，忽然中暑倒地，陆蓉塘虽是屠夫，却生性慈善，夫妻俩手忙脚乱地把乞丐扶进屋里躺下，给他喝了碗凉茶，又在其额头敷了块冷毛巾，将他救醒，并用肉汤煮了碗泡饭给他吃。晚上，该乞丐就躺在小店屋檐下。陆氏夫妇在自身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供其食宿近半个月。临行，那乞丐指着地上那堆作为卧具的稻草说："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只此稿荐，留下烧肉。"陆氏夫妇也不以为忤，笑着点点头。

谁知，当他们将此稿荐投入灶膛烧肉后，锅中竟飘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异香，这香味飘出店堂，引来了不少寻香而来的顾客，不一会儿，一锅熟肉就光了。街坊邻居七嘴八舌地问陆氏夫妇："今

朝的肉为啥这样香?"陆老板也不知所以然,随口道:"侬碰着仔仙人哉!"乡邻们突然想起前几天店门口有个叫化子,天天夜宿于此,现在已不知去向,加之附近有一座神仙庙,于是,认定那乞丐就是神仙。至于是哪一位神仙,有人讲,跛足者当是铁拐李,也有认为是吕洞宾的。人群里有位书生,想卖弄一下学问,向陆老板追究道:"睡在你店门前的叫化子有啥特点?"陆想了想说:"只记得他一直拿着两只破钵头,口对口放在头下当枕头。"书生道:"两只钵头口对口正好是个吕字。"又问老板娘:"叫化子身上着啥衣裳?"答曰:"衣裳很破烂,腰里扎仔一根破草绳。脚上一双鞋子后跟已烊脱哉!"书生念念有词道:"绳、纯音同,烊、阳同音,肯定是吕纯阳来过了。"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读书人的说法似乎具有某种权威性,陆老板自己也想不到随口说的一句玩笑话,竟然被那书生说出这么多道道来,也将信将疑起来,自感遇到了神仙。为了纪念此事,陆老板就将店名改为陆稿荐。

店史小记

陆稿荐熟肉素负盛名,在苏城肉业独树一帜。道光年间《吴门表隐》中就有记载"陆稿荐蹄子"是"业有混名著名者"之一。咸丰十年,遭战乱而损失殆尽。同治五年(1866),又在崇真宫桥原址重振家业。光绪二十七年,后裔陆伟、陆念椿等因经营不善,连年亏损,将陆稿荐以 150 元押金 ,3800 文月租金,租押给枫桥人倪松坡,又将阊门外吊桥堍杜家老三珍斋肉店(生财牌号),以 640 元卖给倪松坡。翌年,倪将设在观东醋坊桥的肉铺易名陆稿荐(后称大房陆稿荐),又将西中市皋桥肉店易名老陆稿荐,并在临顿桥堍开设协兴肉店,倪氏委四个儿子各营一家,一时成为苏州肉业中的巨商。

民国时期,苏州肉业中以陆稿荐为名号的店铺近 20 户,只有大房陆稿荐所制熟肉、卤菜最为得法,也最为苏州人认同。成稿于 1934 年的《醇华馆饮食脞志》称:"熟肉店以陆稿荐、三珍斋两家最为驰名。其出品以酱鸭、莲蹄为上,蹄筋、酱肉次之……熟肉之最佳

者,莫如观东之老陆稿荐。”大房陆稿荐以“大房”为商标(以麦穗为底座,加添“大房”两字,并注明“只此一家,并无分出”标记,并向国民政府登记为注册商标),讲究选料,肉选用“湖猪”(太湖流域良种),头尖爪细,皮薄肉嫩,烹煮易烂,肉味香糯。鸭选用娄门大鸭,体大形美,胸宽颈短,肉质肥嫩。烹制精工,尤其是卤汁的配制煎熬成为业中绝活,五香酱肉、蜜汁酱鸭、酒焖汁肉、糖蹄、酱蹄筋等誉满苏城。

大房陆稿荐由倪松坡传给倪柜香,又传给倪肇鸿。1935 年倪肇鸿病逝后,由倪柜香的外甥陈士贤主持。日伪时期,业务才得以维持。

解放前夕,大房陆稿荐经营艰难,一度衰落。解放初,该店职工进行生产自救,每人集资 10 元作流动资金 。1956 年,公私合营时店铺资产为 993 元。1958 年, 大房陆稿荐工场撤并归平江区食品厂,1963 年又恢复陆稿荐工场。1966 年,大房陆稿荐更名为苏州熟肉店。1979 年恢复陆稿荐老字号,除恢复传统产品外,还根据市场变化和现代人的口味, 由单一酱肉类 10 多个品种逐步扩大至烧烤、糟制、熏制及酱卤 4 个大类 100 多个品种。大房牌五香酱肉、秘制酱鸭、酱猪头肉、酱汁肉、苏式拆烧等,自 1981 年起,相继获商业部、省商业厅优质食品、名特食品称号。1983 年,食品公司投资 70 万元翻建老店,添置冷库、空调、电梯等设备,改革生产工艺。1985 年 2 月,地处观前街 8 号的新营业大楼落成开业,比原店扩大了 3 倍,营业面积 400 平方米,分生肉部、卤菜部、副食品部和一个快餐厅。当年营业额达 230 万元,比扩建前增长 50%。1986 年改为陆稿荐苏式卤菜厂,并与中国食品协会共同开发了苏式菜肴、卤菜工业化生产科研项目。

特色卤菜

陆稿荐之由来,也许是一个附会的传说,但它能在长达 300 多年的岁月中经久不衰, 主要还是靠一代又一代的卤菜制作工人不断摸索和创新,使其苏式卤菜在制作和风味上都自成一格。

陆稿荐供应的苏式卤菜，以讲究新鲜和时令为特色，常年品种有80多个，其中苏州酱鸭、苏州酱肉、苏州酱猪头肉、苏式拆烧均为部优产品，其它如酱汁肉、蛋松、肉百页、熏鱼、熏虾、油鸡等为时令卤菜。试简介一二。

苏州酱肉，又名五香酱肉，系苏式卤菜中著名的传统产品。该产品脱胎于“东坡肉”，选用瘦肉型湖猪之带皮肋条肉，加上酱油、绍酒、食盐、白糖、香葱、生姜、茴香、桂皮、新会皮、桔皮诸佐料，制作成外观类似“东坡肉”，而内在质量又略胜一筹的五香酱肉，不带卤汁，便于携带。1981年，陆稿荐生产的“大房牌”苏州五香酱肉获部优产品称号。其特色是：皮呈麦黄色，肥膘洁白晶莹，精肉略呈微红，咸淡适中，软糯入味，鲜美宜人，香味芬馥，入口而化。

酱汁肉，又名酒焖汁肉，是苏州著名时令卤菜之一，供应时间为每年清明节前的三四天至立夏，约一个月左右。特别在清明节这天，苏州人往往有以酱汁肉祭祀祖先的习惯。陆稿荐的酱汁肉在《吴门表隐》已有记载。制作原辅料为带皮肋条肉、绍酒、食盐、白糖、红曲米粉和桂皮、大茴香、细葱、生姜。成品色泽鲜艳，红似桃花，又近似玫瑰，食之鲜甜，咸淡适中，酥而不烂、肥而不腻，卤汁既香又甜，以热吃为宜。

酱猪头肉，是苏州卤菜业常年供应的卤菜，它集香、糯、味美、价廉于一身，常年供应，深受市民喜爱。于1981年还荣获商业部优质产品证书。制作酱猪头肉的原辅料为整只猪头、绍酒、食盐、茴香、桂皮。其特色，皮呈深麦黄色，香味独特，烂糯入味。酱猪头肉则是在此基础上根据苏州人的口味，改进烹饪方式，粗货细做，辅料、火候等都十分讲究。夏令季节生产的糟猪头肉，糟香扑鼻；清明期间生产的酱汁猪头肉，红艳爽口，与常年供应的酱猪头肉构成了猪头肉的黄、白、红三色三种口味。

苏式拆烧，原系广东卤菜，上世纪50年代引进，逐步改造成适合苏南人口味，常年生产供应，是筵席冷盘的常用菜肴。陆稿荐生产的拆烧，1983年被评为江苏省优质食品，1984年又获商业部优

质产品证书。苏式拆烧制作的原料是鲜猪肉的后腿纯精肉、红曲米粉、熟猪油或食油、细盐、绍酒、白糖、香葱、生姜、桂皮、大茴香及适量硝水加工而成，色泽褐红，甜中带咸，咸淡适中，味美肉嫩，是佐酒下饭的佳肴。

苏式酱鸭，又名秘制酱鸭，最为著名。加工酱鸭，常选用苏州娄门大鸭和太湖鸭，鸭肥、肉嫩、皮白，用酱油、绍酒、食盐、白糖、香葱、生姜、砂仁、丁香、八角茴香、桔皮等做佐料，加以红米熬制的卤汁，色香味形俱全。特色是色泽酱红呈琥珀色，形似整鸭而又丰满，甜中带咸，味鲜肉嫩，齿颊留香，是佐酒佳肴。1982 年，陆稿荐大房牌酱鸭荣获商业部优质产品证书。

传统食品“现代装”

陆稿荐历经了 300 多年沧桑，是苏州传统老字号中的翘楚。其招牌品种酱肉、酱鸭更是脍炙人口，红遍沪宁线，许多上海顾客到苏州必至观前街陆稿荐，带上一盒。近年，中外游客纷至沓来，陆稿荐的酱肉、酱鸭也随之“身价倍增”。然而，受前店后坊、现烧现卖的局限，以及不易携带、不易保存的“胎里毛病”影响，1999 年之前，陆稿荐的生产规模一直在 300 万元以下，至 2003 年接近 600 万元。其中，酱肉制品年销售在 100 吨，酱鸭年销售超 5 万只，难以进入更为广阔的市场。

其实，早在 10 多年前，陆稿荐就开始尝试真空包装和提升产品档次，然而受制于体制、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因素而未果。上海等城市的客商早就向陆稿荐抛来“绣球”，邀请陆稿荐前往设立销售窗口，一些海外客商也对陆稿荐的产品表现出深厚兴趣，但就因为这一“障碍”，一直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

2003 年，陆稿荐完成了改制，新成立的董事会“走马上任”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建立现代化生产基地。据苏州陆稿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亮透露，投资 500 余万元的陆稿荐生产基地已在相城经济区太平工业园启动，目前已开工的生产基地占地 9 亩，预计将于年底投产，其中，新开发的真空包装陆稿荐精品卤菜将

于明年春节前与顾客见面。这是迄今苏州传统卤菜中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它为闻名遐迩的苏州传统卤菜插上了现代化的“翅膀”。

注：本文参考了《苏州市志·商业卷》、《中国名菜佳点故事》（东方出版中心 1996 年版）、《中国苏州菜》（轻工业出版社 1991 年版）、《苏州传统食品》（苏州市食品工业办公室 1987 年编）等。

（原载《江苏老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8 月版）

苏州的古城古镇古村

苏州现有两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中国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常熟是 1986 年公布的第二批 38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两条中国历史文化名街：2009 年入选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的平江路，2010 年入选第二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的山塘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江苏省共有 10 个，苏州拥有 6 个：第一批 2003 年 10 月 8 日公布，全国共 10 个镇，苏州占 3 个，分别是昆山市周庄、吴江市同里、吴中区角直；第二批 2005 年 9 月 16 日公布，共 34 个镇，苏州市有 2 个，它们是吴中区木渎镇、太仓市沙溪镇；第三批 2007 年 6 月 9 日公布，共 41 个镇，苏州市有 1 个——昆山市千灯镇。古村落的代表：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吴中区西山镇明月湾村，被列入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

1995 年以来，根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规定，省政府分批公布，前三批有 6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城、13 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 处历史文化保护区。苏州市先后列入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的有：吴中区东山（首批）、西山（现改名金庭）、光福、木渎（已升格），吴江市震泽，太仓市沙溪（2001 年第二批，已升格），昆山市千灯（第三批，已升格）。2006 年 12 月第四批公布江苏省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各4个,苏州占3席:常熟市沙家浜镇,吴中区明月湾村、吴中区陆巷村。2008年5月,吴江市汾湖镇和昆山市锦溪镇也被列入省级历史文化名镇。

苏州市现有建制镇61个,其中13个为历史文化名镇。古镇、古村落与古城三位一体,文物遗存丰富,除了现有的6个全国历史文化名镇、7个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和14个市级控制保护古村落外,苏州目前还有基本保存或局部留存历史文化遗存的古镇20余个、古村落20余个,其他具有历史文化遗存的村庄55个,它们也是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镇古村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千百年的记忆。全市村镇现有国家级文保单位32处,市级文保单位280余处,保留着较有价值的明清古建筑及较为完好的传统民居270余处,基本保持传统风貌的古街80余条,古巷弄360余条。在吴江汾湖镇0.45平方公里的黎里历史街区,有各式弄堂85条,其中暗弄70条,明弄15条,以姓氏命名的弄堂57条,名称极富特色,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街巷布局。

为进一步推动古镇、古村落保护,扩大保护范围,深化保护内容,根据《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办法》的规定,苏州市于2007年2月开始组织评选首批苏州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以确保更多古镇古村落得到有效保护。经过推荐、申报、踏勘和评审,常熟市梅李镇、古里镇、尚湖镇,昆山市锦溪镇(已升格),太仓市浏河镇,计5个镇;常熟市南门坛上历史文化街区、吴江市汾湖镇黎里历史街区、太仓市沙溪镇直塘历史街区,计3个历史街区;常熟市古里镇李市村、吴江市盛泽镇龙泉嘴村、吴江市平望镇溪港村,计3个村,被苏州市人民政府命名为苏州市历史文化名镇(村)。

水城苏州二题

从饮用水的变迁看苏州的水环境

自古以来，苏州市民向来饮用河水，也有饮用井水的习惯，这一点可以从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60 年代起，城区居民逐步饮用自来水。到了 80 年代后期，开始有人注意到自来水也并不卫生，于是有的厂家投其所好，生产了一种净化器，装在自来水龙头上，据说其中的活性碳，可以滤去水中的杂质。还有的厂家生产了一种矿化器，说是经过它流出来的水就是矿泉水了。不过，不久许多厂家发现了饮用水这个市场，开始大量生产桶装纯净水，并且同步推出电热饮水器，很快又有一些家庭改用纯净水。从表面上看，饮用水的变迁似乎体现了苏州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它正无言地诉说着苏州水环境逐渐恶化的历程。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苏州人开始对自来水的直接饮用的安全性产生怀疑的时候，国家环保总局于 2000 年 3 月 28 日公布：苏州市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而且是江苏省唯一获此殊荣的省辖市。

回顾苏州城市居民的饮用水变化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最早当然是河水和井水均可饮用，此后，河水仅可作为洗濯用水，居民大多饮用井水。在 1934 年吴县卫生局对城市公用浅井水质的调查显示，370 口井中，符合卫生标准可以饮用的占 33%，消毒后可饮用的占 55%，完全不可饮用的占 12%。日伪时期，苏州卫生防疫处对 221 口井作调查，发现可饮用的井仅 6 口，煮沸后可饮用的有 64 口，过滤煮沸后可饮用的有 30 口，不适合饮用的有 121 口，占 54.75%。60~70 年代，随着城市工业化的起步，工业废水日渐增多，加上生活污水以及逐步使用农药、化肥的近郊农田灌溉排水，特别是城市新村发展过程中，为解决粪便的出路（原来由农民进城运往农村肥田），有人设计了所谓无害化处理设施——化粪池，严重污

染了市区潜水，人们明显感到井水有异味，不得不在井里加放漂白粉之类的净化物才能放心饮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以大力推广自来水的饮用，来解决百姓的用水问题。到了90年代，自来水的普及已到了近郊农村。

再说，苏州的城市河道网，建城开始是作为排涝沟而凿，继而形成完整的供、排水系统，起着净化环境的重要作用。从宋《平江图》上显示的苏州城市格局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市内河道总长约82公里，如今仅长35公里；原河宽一般在5~10丈，现在只有4~6米，有不少不足3米，最宽不过10余米。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由于历史的原因，碎砖瓦砾不断倾倒河中，使河道逐渐变窄和淤浅；化粪池的增多（据《苏州市志》记载，1985年已有1600多），使得所谓经过化粪池净化处理过的生活废水不断排入河道；工业废水，特别是化工和造纸废水的超标排放，生活垃圾的随意抛投，城市建设中人为的填河为道，以及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广大农民为图省力，大量使用化肥，多年没有罱泥，使河中各种有机沉积腐烂得不到及时清理，使得本已缩短变窄的河床逐年淤积升高。80年代的运河改道，又使市河水流速度减慢，降低了河水的自净能力，几成死水。尽管1977年，苏州在几个城门口建成了4座泵站，进行机械换水，日排量6.5立方米，可远远不能解决问题，每年雨季苏州城内的一些低洼地还是经常遭淹。这些泵站固然还可以起排涝作用，但却无法根本改变城内的水环境。

苏州的水环境治理也得综合考虑。据说，大量使用地下水，会使地面沉降，因此，从苏州的长远利益来说，哪怕井水不污染也不能一味地使用，而且必须禁止使用深井水。值得欣慰的是，自从2000年8月26日江苏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颁布《关于在苏锡常地区限期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决定》后，实行限期禁止开采地下水，2003年12月31日起在地下水超采区禁止开采地下水，2005年12月31日前苏锡常地区全面禁止开采地下水。苏州各级各部门对此高度重视。据2001年11月15日

召开的“苏锡常地区地下水封井工作会议”上透露，苏州市已经封深井 686 口，保护地下水资源工作初见成效。2004 年，为了迎接第 28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苏州进行了大规模的污水集中处理管道联网，解决了一部分化粪池和居民生活废水问题，但是离天蓝水清的目标还有距离。

有人说，水是苏州的灵魂。一个城市，如果失去了它固有的特征，也就失去了这个城市的“根”和“魂”。苏州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水域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42%。苏州古城就是因为有水陆并行的双棋盘格局、“人家尽枕河”的特色而独步天下；苏州古典园林也因为有着移山水之胜于闹市之中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很难想象没有水的苏州会是什么模样！

李瑞环在考察苏州时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苏州古城保护好了，这是最伟大的，没有哪个比得过。苏州不仅仅是苏州人的，而且是中国的，全世界的。”而苏州的保护关键就是保护水，一个没有水的灵性的苏州将只是建筑堆砌，它光鲜外表下掩盖的是城市的自我迷失和渐渐消亡！

运河与苏州

苏州是水乡，境内河网密布，自古以来水道就是苏州的主要交通通道。为了交通的便捷，我们的先人经常要对河道进行裁弯取直，于是就有了我们称之为运河的人工河道，比如越来溪、太浦河、望虞河、浏河等都是。最著名的当然要数京杭大运河的江南段，也称江南运河。

运河，一名漕河，在西城下，其水自吴江来，北流入无锡界。嘉靖《吴邑志》云：“《春秋传》称‘吴城邗沟，通江淮’，盖吴王夫差北伐齐时所开，出师由此河以通江北也。”可见，江南运河的雏形在春秋时期已经形成。又据隆庆《长洲县志》引陈循《宝带桥记》称：“苏州府城之南半舍，古运河之西，有桥曰宝带。运河自汉武帝时开，以通闽越贡赋，首尾亘震泽东壖百余里。”则苏州沟通闽越的运河段，开凿于汉武帝时，目的是为了运送闽越的贡赋。流经苏州

的运河,在漫长的岁月里,至今已有多次改道,每次运河改道都对苏州产生不小的影响。据史料记载:“至隋炀帝大业六年敕开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郡八百余里,面阔十余丈,拟通龙舟巡会稽即此河。自阊门北码头抵胥门馆驿,长五六里,东西两岸居民栉比,而西岸尤盛。中途有一大湾,水尤深广。昔尝连西岸为湖,亦名曰夏驾湖,传云吴王避暑处。凡此河中荆襄川蜀大船多于东泊,盐艘商贾则于西泊,官舲铓鼓昼夜不绝,绮罗箫管游泛无禁,盖西阊之盛,自唐以来为然,刺史白公之诗言之详矣。至冬尤多白鸥群飞水面,雪意阴风,江乡妙境也。自此过钓桥水北流,由南濠至枫桥将十里,人烟相续,而枫桥为盛。”隋唐时期的古运河称为漕运河,以运送漕粮为其主要功能,流经苏州,是从枫桥沿上津河,过渡僧桥折向南,穿过南星桥、万年桥,环绕城墙向东南流去的。到了明末清初,由于苏南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苏州城西河段万商云集,千帆纷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乾隆年间徐扬所绘全长 1255 厘米、宽 35.8 厘米的《盛世滋生图》(俗称《姑苏繁华图》)长卷上得到证实:当时,运河周边的大小港湾船只拥挤,阊门至胥门的夏驾湾,川蜀大船停泊于东,商贾盐船停泊于西,官船往来其间,水上交通运输十分繁忙。但是日显拥挤的水上运输,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常发生船只堵塞和碰撞沉没事件。于是大运河苏州段就有了第一次改道:将运河水引流向南,利用天然河荡彩云塘沟通胥江,借用胥江进入市区的河段,沿枣市街南侧,穿过泰让河,再入护城河,经盘门、觅渡桥至尹山桥,南与吴江运河段相连。这次运河改道使胥江地区繁荣起来,特别是沿胥江形成了一条繁华的枣市街,使这一地区成为仅次于“金阊门”的“银胥门”。

到了 1976 年,由于当年 10 月,一条水泥船在吴门桥桥洞里沉没,因无法垂直起吊,加上此处水流湍急,一时引起后面的船舶连锁相撞或沉没,堵住船队长达 2 公里多,断航七昼夜。按 70 年代中期的运价,每天运费损失 50 万元以上,断航七昼就意味着损失达数百万,此事还惊动了国务院。1986 年底,大运河苏州段整治工程

经国务院、国家计委批准，被列为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西起横塘大庆桥，穿过横塘市河，经新郭、龙桥，至宝带桥，整个工程全长 9.3 公里。这个工程从根本上解决了苏州段运河的水运压力，并大大增强了运河苏州段的运输能力。然而，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运河改道在减轻城河水运压力的同时，也带走阊门、胥门一带的繁荣，最终导致了枣市街一带的商贸渐趋冷落。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运河改道对苏州的影响远非仅此而已，苏州城内河道水质的恶化、苏州连年的水淹，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运河的改道客观上减弱了入城水量和水的流速，影响了河道的自净能力，加快了河道的淤积速度，并且使旅游部门在 80 年代一度开办过的水上特色游因水质问题而夭折。改造后的干将路，在全线疏浚沿线河道后，不得不采取定期换入自来水的办法来保持其与道路的般配。

苏州号称为东方威尼斯，发臭的水质显然与此雅号很不相称。可喜的是，在“十五”规划中苏州市政府已将“水变清”作为努力方向，并实施引望虞河水入城工程，增强苏州城内河道的水的流速。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苏州城河中鱼儿自由遨游的那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周庄与沈万三

一提起周庄，人们就会联想起沈万三，这恐怕要归功于周庄人超前的文化意识和经济意识。记得在 80 年代，一些报刊杂志上津津乐道于江南模式——乡镇企业成为苏南经济的半壁江山之时，周庄人并没有亦步亦趋地学人家大搞那些依托当时紧缺经济带来的看似颇具活力的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而是利用陈逸飞那幅画带来的效应，抓住机遇，编修好《周庄镇志》，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周庄的知名度。与此同时，也投入相当的财力修复“沈厅”，又从千灯镇移来三座石拱桥，增添水乡古镇的韵味。从而

吸引了一些电影、电视剧组的纷至沓来，成了江南水乡古镇理所当然的典范。

其实，周庄作为水乡古镇并不比周边其他古镇优越多少，比如：千灯镇有顾炎武故居，黎里镇有柳亚子故居，角直镇有叶圣陶故居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圣寺，同里镇有陈去病故居和现在已被增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退思园，哪个不比周庄强？周庄除了沈万三也拿不出更吃香的“硬件”了。说到底，关键在于人的意识，也许这正是沈万三经济头脑的“遗传”吧。

《明史》上说，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南京城，其中三分之一是沈万三资助的。尽管地方志上说，自元末沈万三之父沈祐由湖州南浔迁居今天周庄银子浜，后来又迁到薛巷，都不是现在“沈厅”的位置。张士诚据吴时沈万三已死，根本不可能再去资助朱元璋。但是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沈万三家确实已经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资产。据方志记载，沈万三的两个儿子沈茂和沈旺倒是以“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金”以及米、甲士、马匹等，“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万计”。民间传说，沈万三家有个“聚宝盆”等等，当然不足为信，较为可信的倒是旧志书上所说“由通番而得”。看来，早在元末明初，沈家就有了与外通商的意识，并在经营活动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在当时人眼光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于是便有了“聚宝盆”的猜测。

20世纪80年代的周庄人，似乎得到了沈万三的“真传”，他们用异乎常人的眼光瞄准了文化和旅游，舍得投入，加强维护。在90年代，全国各地一片“拆”声中，他们反其道而行之——保护，使旅游成为全镇的支柱产业，还举办了周庄国际旅游节。2000年“五一”长假期间，周庄先声夺人，游客人数毫不逊色于虎丘、拙政园等老牌旅游热点。在大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想尽办法脱困扭亏的时候，周庄人已经依托旅游这一“拳头产品”，成为苏南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旅游的发展，有效带动了全镇饮食服务等相关领域的发展。

如今，周庄人打着沈万三这一品牌，从“万三蹄”起步，已经完成了“万三”系列食品的开发，“万三”系列成了旅游者馈赠亲友的极佳礼品。沈万三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会为其后辈的“精明”而感到自豪的。

链接：

吴根越角西塘镇

西塘是浙江嘉善县的一个小镇，位于苏州东南大约 70 公里的地方。从苏州驱车前往可以走 318 国道，在吴江黎里镇的东大桥往南经汾玉往东，也可到芦墟镇向南经陶庄、下甸庙前往。

西塘，古名斜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相争的交界处，故有吴根越角之称。在宋代这里已成市廛。明清时期，“街衢依河而建，民居临水而筑”，形成了“桥多弄多廊棚多”的特色。悠久的历史，给西塘留下了浓郁的文化底蕴，在明清 427 年里，西塘出了 19 名进士，31 名举人。民国时期，著名诗人柳亚子常到西塘吟诗会友，有 18 位西塘文人参加了柳亚子创办的南社。

游西塘，“清虹桥影出，秋雁橹声来”。104 座桥，古厚淳朴，风韵各异。游西塘，“门前街道屋后河，深长弄堂百条多”，122 条弄，幽深奇妙，弯曲自如。游西塘，“雨天不湿鞋，照样走人家”，千米长廊可使游人体味到绵延了若干个世纪的朴实、恬静。游西塘，“流光异彩杜鹃美，花中西施天女舞”，有数百年种植史的西塘，已培育出一百三十多种杜鹃，如果是花季那真称得上是繁花似锦。西塘的游程一般可依如下顺序：陆坟银杏、烧香港、倪天增祖居、圣堂、烟雨长廊、送子来凤桥（下船）观古镇沿河风貌、七老爷庙（上岸）、黄酒工艺陈列馆、环秀断虹、石皮弄、种福堂、西园、薛宅。如果是散客，游览线路可以随意点，到了镇上可先买一张联票和游览图，按图索骥边走边看；也可以不买联票，到一个景点买一张票，这样更灵活，因为联票只能游览其中规定的 11 个景点，另外一些私人住宅景点还得买票入内。而且，这联票上没有写明什么景点可以游览，什么景点得另外买票，必须到了入口处才知道，因此也有很大的盲目性。

西塘的特产主要有善酿酒、八珍糕、六月红河蟹，风味小吃有水豆腐、烧卖、粽子、青团子、立夏塌饼等，特色菜肴有馄饨鸭、狮子球、肉嵌鲫鱼、油盐南瓜、面筋汤、红烧鳗鲡、粉蒸肉、炒鳝腐、祥符蹄等。其中善酿酒行销加拿大、日本及东南亚地区，曾多次获奖，已被载入《中华美酒》名册；八珍糕是西塘传统

特产，创办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系列食品有八珍糕、绿豆燥片、芝麻燥片、椒盐桃片、状元糕、芝麻酥糖、五香豆等，生产厂家主要是种福堂食品厂、钟和堂食品厂、西塘嘉福食品厂；阿牛粉蒸肉是一种美食药膳，具有解暑清热，散淤止血的功能，口味极佳，深受国内外游客的青睐。

不妨去乌镇

长期生活在喧闹的城市中的人们，难得有一个长假，如果再到同样是人满为患的热点去旅游，不但无法放松休闲，反而会徒添烦恼。如果要清静悠闲，不妨到像乌镇那样的小地方去。

乌镇地处浙北平原，古运河畔，拥有近 7000 年文明史和 1300 多年的建镇史，文化底蕴丰厚绵长。镇区内河网密布，港汊纵横，民居临河，水阁傍桥，一派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

乌镇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茅盾的故乡，与吴江的桃源相临，从苏州驱车前往，大约需要 2 小时多一点。古镇给人的最大感受就是一个“古”字。到了镇口，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别具一格的双桥，桥体石制，两桥如同双胞胎，平行横跨古镇主河道上。据说还有一句好听的口彩叫“左右逢源”。镇口的另一景观是入口处的木栅，有点年纪的人也许还能记起，以前的小镇尽头就是用这样的木栅作为镇区的封闭防盗设施，因此，许多镇上至今还保留着“东栅”、“西栅”、“南栅”、“北栅”的地名。

那么，乌镇有什么好玩的景观呢？古镇主街东大街是一条修长的石板街，不宽，大约 3 米左右，沿街两侧是民居和店面。从外表上看，如果哪家电影或电视剧组要拍摄清朝末年或民国时期的影视剧的话，根本不需要修饰，一应店牌都是原汁原味的匾额，有传统的中药铺、染坊、典当、酿酒作坊、纺纱、缫丝、织布、木器雕刻。有的作坊还有现场操作，如用传统工艺现酿的白酒、现做现卖的定胜糕等。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一个床的“博物馆”。那里有我国各具特色的床 34 只，木质有红木、榉木，式样有明式、清式，也有民国时期的。床上有各式各样的雕刻，有人物，有动物，有花草。给人印象最深的要数称为“福寿双全”的那一只了，床前左右分别是“福”和“寿”的篆体字雕刻，床体两侧均刻着一个个“孔方兄”，显示了家人对新人的良好祝愿。另一个展馆就是木雕馆，该馆内的所有展品都是从别处拆迁现场收集而来，大到有东南亚风格的巨型柱形图腾雕，小到来自江南各地木器上的雕饰物，可谓是一个中国木雕博览，在那里可以领略到我国民间木器雕刻的精细与别致。

到了乌镇，茅盾故居和茅盾当年读书的地方当然是不能不去的。故居基本保留着当年的格局，也有茅盾的生平介绍。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钱币馆，据说是一位当过海员的乌镇人，到过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收集了各国的银币，也有些纸币。喜欢收藏的人固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普通人士也能在那里大开眼界，增长见识。皮影戏作为我国的传统文艺样式，也可以在乌镇一饱眼福。修真观是与苏州玄妙观齐名的江南三大道观之一，现在已经修复，里面有与十二生肖相对应的塑像。奇怪的是后院居然还有送子观音在此栖身，可说是佛道合一了。

午餐可以吃点乌镇小吃，如粉丝牛肉汤之类。也可以上饭店，那里的塔菜不妨尝尝。饭后，可到修真观前的休闲广场休息。观的对面是一座古戏台，12 时准时演出桐乡花鼓戏，免费观看。道观前的街也叫观前街，街西有一家老字号冯久丰专卖各种乌镇特产，每 500 克的价钱是一样的，可随意取货论斤购买。如果有雅兴的话，还可以雇条小船在水上游览一番，河水较清。据当地居民说，乌镇为了解决居民的生活用水出路问题，曾投入巨资，在主要街道的石板底下铺设了下水管道。因此，居民室内完全可以使用现代生活用品，如抽水马桶、淋浴器等，但是关上门，每家的风格都与古镇融为一体，毫无“与众不同”的突兀感。也许这正是乌镇“旧城改造”的成功之处，也是它“修旧如旧”的迷人之处。

重访黎里古镇

黎里是我的故乡，柳亚子故居就在古镇中心街上。镇东九成湾上的黎里中学是我的母校。自 80 年代初离开家乡至今，已经近 30 年了。尽管这么多年来回过几次黎里，但是都没好好地审视过古镇风貌。今年五一，得闲携爱人一起回黎里，得以重访黎里古镇。

镇区所在的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时期。相传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越之间著名的檇李之战就发生在今镇西南圩甘南村陆家荡，后来此处就成为吴越的分界线，直至今天仍然是江浙的界湖。这里还留存了两个很怪的地名御儿滬、鬼头潭，也与这段历史有关。“御儿”乃“御吴”的同音，这点在今天浙江嘉善田乐(与黎里隔水相望)一带的方言中可以得到证实。鬼头潭乃因吴俘越兵，埋头颅于此而得名。

嘉庆《黎里志》云：“黎里，宋时号村。建炎中，遭寇焚掠甚惨。至元始成聚落。”“一名黎川，又号梨花里。旧传村南多梨花。”又曰：“本镇东西距三里半，周八里余。民居稠密，瓦屋鳞次，沿街有廊，不需雨具。镇之中曰中市，有上下两岸、东西南北四栅，上岸多士夫之家，崇尚学术，人夜诵读声不绝。镇之东曰东栅，每日黎明，乡人咸集，百货贸易，而米及油饼为尤多。舟楫塞港，街道肩摩，其繁阜喧盛为一镇之冠。”如今丁字形的三里半长街依然如故，特别是两街夹一河的水乡古镇风貌没变，整条市河的石驳岸完好无损。沿河自东而西的跨河石桥有十几座之多：揽胜桥（在镇东雄丰村，亦名揽桥）、梅兰桥、青龙桥(古名际恩，俗呼相家桥)、迎祥桥(俗呼汝家桥)、道南桥(是桥西堍系水中筑起)、梯云桥(俗呼唐桥)、进登桥(俗呼夏家桥)、鼎新桥(古名通济，俗呼新桥)、登瀛桥(俗呼浒泾桥)、大陵桥(俗呼庙桥)、明月桥(一名民悦，俗呼杨家桥)、清风桥(在镇北，古名普宁，俗呼新丰桥)、望恩桥(原桥有二亭，故又名亭

子桥)、秋禊桥等,古意盎然。

袁枚《随园诗话》中有一段文字记载了黎里昔日景象:“余过吴江黎里,爱其风俗醇美、家无司阍,以路无乞丐也。夜户不闭,以邻无盗贼也。行者不乘车、不着屐,以左右皆长廊也。士大夫互结婚姻,丝萝不断,家制小舟,荡摇自便,有古桃源风。”极力赞美黎里淳朴的民风。他还写过一篇《黎里行》:“吴江三十里,地号黎花村。我似捕鱼翁,来问桃源津。花草有静态,鸟雀亦驯驯。从无夜吠犬,门不设司阍。长廊三里覆,无须垫角巾。家家棹小舟,目不识车轮。勾栏无处访,椰蒲声不闻。丝萝不外附,重叠为昏姻。不知何氏富,不知谁家贫。更有奇女子,嫁与贤郎君。双双来执贽,宾宾拜起频。留住小眠斋,款如骨肉亲。我喜风俗美,更感古谊敦。逝将去故土,十万来买邻。非徒结张邴,兼且联朱陈。有女此地嫁,有男此地婚。庶几子与孙,永作羲轩民。”诗文中所称“奇女子”和“贤郎君”乃《黎里志》作者徐达源及夫人吴琼仙,夫妻双双拜袁枚为师。从袁枚的诗文中,我们很容易得出黎里是个“宜居”之地:“行者不乘车”,乃步行街;“夜户不闭”、“邻无盗贼” 是社会安定最高境界;“不知何氏富,不知谁家贫”,所言当时贫富差距不大;还有那“长廊三里覆”,可以雨天穿绣鞋不湿;街坊邻居对外来客的“款如骨肉亲”,真堪比“桃源”福地。袁枚也很想在此长期居住下去,一句“逝将去故土,十万来买邻”,道出了作者的憧憬之情。

如今周庄、锦溪、同里、角直、千灯、木渎等水乡古镇都已经开发成为了几 A 级旅游景区了,而黎里却依然保持着那份恬静。下岸的长廊还断断续续地保留着那份古朴, 市河里的水还可以作为一般的洗刷之用,99 条颇有特色的弄堂没有被经济的大潮冲垮, 周、陈、李、蒯、汝、陆、徐、蔡黎里八大家族的故事仍然在老人的口中传说。除了城隍庙、东圣堂等寺庙已被修复外,玛瑙庵、罗汉寺、八角亭都只保留了个名称。

志书中记载的黎里八景分旧八景和新八景,且都有两种说法,摘录下来,供大家作探古寻幽之资。旧八景:一曰吴山耸翠、黎水澄

清、拙庵故居、登瀛遗迹、岳宫旛影、楔湖夜月、月湾渔舍、罗汉钟声，一曰瀛桥联袂、楔湖流觞、毗卢晚眺、玛瑙春游、蕉泽菱舟、月湾渔舍、鸭泾帆影、鹤野歌声。新八景：一曰书院春风、楔湖秋月、鸭泾帆影、罗汉钟声、中流阁势、鹤渚渔歌、烟村夕照、揽桥积雪，一曰玛瑙春游、楔湖秋月、罗汉晓钟、中立晚眺、鸭栏帆影、鹤渚渔歌、江村夕照、揽桥残雪。

吴江境内无山，不知黎里何来的“吴山耸翠”。“鸭泾”和“鸭栏”，据说与陆龟蒙有关。记得曾在甪直看到过陆龟蒙的斗鸭池和陆龟蒙墓，难道陆龟蒙曾经到过黎里养鸭？不过嘉庆《黎里志》还真有此记载：“鸭栏泾，在镇之东南已字圩，陆龟蒙养鸭处。”又云：“鲁望别墅，在镇之南陆家荡北，唐高士陆龟蒙尝筑室于此。”“天随桥，俗呼袁家桥，跨已字、染字两圩。初建无考。康熙初年，里人重建。乾隆五十八年，里人蒯嘉玢创捐，僧静安募建。”并有诗为证，徐蝉《春暮同人天随桥行散》：“最好村南共踏青，天随桥接鸭栏泾。东风铃语来中立，落日螺痕指洞庭。袅袅烟云生杂树，飞飞鸥鹭满前汀。冶游此地真堪画，傍水茅庵户半扃。”陈阶琛《过天随桥》：“陆家湖北鸭栏西，信步寻春路欲迷。忽见溪头横略彴，绿杨如画暮烟低。”诗中“中立”是指“中立阁”，俗称八角亭，“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从上述诗文的指位来看，这个地方在今天镇东南的建民村。

在镇上走了一圈，拍了些照片。回来后写下了上述文字，聊表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太湖中的西山

2000年10月6日，是载入世界航空史册的日子。那一天，国际航空联合会在苏州吴县成功举办了一次“飞越2000挑战极限——环太湖世界特技飞行大奖赛”，来自英、美、法、德、捷克、匈牙利、俄罗斯、立陶宛等国的世界特技飞行锦标赛前12名飞行员都来到吴

县，在太湖上空作单机或多机编队特技飞行表演，同时，还邀请了我国16支航空俱乐部队，进行跳伞、热气球飞行、动力伞飞行、热气艇飞行表演。最为扣人心弦的当数那天下午3:50许，由中国飞行员组成的试飞小组，驾驶国产轻型飞机穿越中国内湖第一长桥——太湖大桥1号桥主桥洞。该桥洞净宽26米，10月份桥洞净高为6米，其难度远胜于1999年外国人驾机穿越湖南省张家界天然洞穴天门洞，已成为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太湖大桥是连结吴县胥口镇与太湖中最大的岛屿西洞庭山（简称西山）的纽带。西山又因“四面皆水包之而得名”为包山。该岛南北宽11公里，东西长15公里，82平方公里，有4.5万居民。千百年来，岛上人出入全赖舟楫，交通十分不便。1994年吴县人民自己集资建成了北起渔洋山麓，跨越长沙、叶山两岛，到达西山岛的太湖大桥。大桥全长4308米，共有181个桥孔，1号桥最长，长1722米；2号桥最高，中心桥孔高22.5米，太湖中最大的七桅渔船可以扬帆而过。中国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作现场直播时，从电视画面上可以看到飞行区外作为飞行界定范围的就是太湖渔船。3号桥最精致，它贴水而筑。

西山的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可上溯到大禹治水，“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相传大禹曾召集各路诸侯到西山岛边的禹期山商议治水方案，禹期山此而得名。大禹治水，惠及百姓，为了纪念他，当地人民便在湖中的东西南北各建一座祠庙，如今尚存禹王庙。

说西山不能不说林屋山。因山有洞，又名洞山。洞顶平整如屋，立石如林，故名林屋洞，俗称龙洞。据《仙经》记载，林屋洞为左神幽虚之天，居十大洞天之第九位，故又称天下第九洞。唐宋时期许多道教高士曾隐居于此。林屋山顶的凭浮阁自古就是赏梅胜地。西山又是毛公炼丹修道处，据说在包山坞旁边的毛公坛，是毛公得道处，因此称为毛公坛福地，被道家列为第四十九福地。

西山还是佛教胜地，西山镇梅益村包山坞的包山禅寺，俗称包山寺，始建于六朝初，唐天宝年间寺僧曾达千余人，成为江南一大

丛林。太湖胜景在西山，西山胜景在石公。石公山位于西山岛东南隅，因山前有巨石摩空临波，状若老翁而得名。石公之胜在石，闻名天下的太湖石就主要出产在这里。石公山有奇峰、奇石、奇洞、奇景，更有罕见独特的奇观——日月双照。每岁农历九月十三傍晚，在落照台可以看到日落水面、月升湖上，日月东西对照的奇观。山上主要景观有：橘香亭、漱石居、御墨亭、归云洞、印月廊、翠屏轩、来鹤亭、断山亭、一线天、夕光洞、云梯、联云亭、明月坡。少林寺海灯法师 1956 年云游至此，见这里山清水秀，便卓锡石公庵当了住持，1966 年才离去。1989 年圆寂后，部分骨灰还葬在此山，海灯灵骨塔又成了石公山的新景点。

西山历来是王公贵族消夏之地。早在春秋时期，位于缥渺峰南的梭山、龙山之间的消夏湾即被吴王选为避暑消夏胜地。西山又是历代名人隐士向往之地，据史志记载，汉代王玮玄、韩崇、刘根（即毛公），梁代杨超远、叶道昌，唐代周隐遥、周若山等人，都曾到此学道。而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与西山更有着特殊的关系，至今遗迹犹存。

西山又是名副其实的花果山。全镇拥有 3.5 万余亩果园，有梅、桃、李、杏、樱、梨、杨梅、枇杷、石榴、枣子、银杏、板栗、桂花、柿子、柑桔等 60 多个花果品种，年产果品数百万担。这里“月月有花，季季有果”，绿化覆盖率达 80% 以上，已被国家林业部批准为国家森林公园。

2007 年 6 月 24 日，西山镇领导在新闻通气会上介绍，西山镇更名为金庭镇已经江苏省政府审批通过，区民政部门负责人也证实 5 月 30 日获得批复。网络和媒体对此议论颇多，多数意见认为此举欠妥。据《现代快报》报道，在当地电视台的相关调查中，81% 的观众反对更名。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历史地名的关注。笔者原发表于《传统文化研究》第十二辑（群言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的《浅议苏州地名的人文内涵》一文，也相继被《苏州政协》（2008 年第二期）和《姑苏晚报》（2008 年 10 月 7 日）转载，文章名省去了“浅议”

二字。2009 年苏州“两会”期间，苏州政协文史委员会又将立法保护老地名作为十二届二次会议第 012 号提案，希望筑牢“苏州古城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据说《苏州市地名管理条例》已经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2009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但愿“金庭”之憾不再在苏州重演！

苏州的桥

苏州是水乡泽国，除了利用舟船作为交通工具之外，就是凭借众多的桥梁，形成贯通陆路的交通网络。从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史实来看，早在六七千年前，今吴江梅堰龙南一带已有沿河的原始村落。依河而建的村舍之间是一条小河，河道中有一批排列整齐的竖插木桩，上面搁上木板就形成了一座简易的木桥，这便是我们苏州已知的最早的桥梁。

古城苏州自公元前 514 年吴国建立都城以来，经过千百年的人工开挖和整治，至唐宋时期，苏州城内水道体系已相当完备。据宋《平江图》测算，当时城内河道约 82 公里，除内城河（一环）外，有横河 12 条，直河 5 条。水多势必桥多，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以“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诗句来形容苏州的河和桥。唐代另一位诗人杜荀鹤则以“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道出了古城苏州建在川渠交织的水网上，河街相邻，水陆并行，近水人家临河筑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特点。

在苏州游览几乎举目见桥，最多时，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 25 座桥之多。宋《平江图》上有桥 314 座，明末《吴中水利全书·苏州府水道总图》所示 300 座，清末《苏城全图》标绘桥梁 311 座。《苏州市志》统计，1985 年苏州市区共有桥梁 361 座，还不包括园林里的桥梁。“姑苏城外寒山寺”侧的枫桥，风格奇特的宝带桥，巍峨壮丽的觅渡桥，盘门三景之一的吴门桥，拙政园内的小飞虹，网师园内的

袖珍小桥引静桥，还有山塘街上的青山、绿水桥，石湖的行春桥，不论是单孔、三孔，还是九孔乃至五十三孔，或大或小，每一座桥都有一段建桥佳话，印证着社会发展的一段历史。

古代桥梁在唐代以前都以木梁木栏为主，即诗人所称的“红栏”。到宋代，逐渐以石取代木。苏州各市(县)区以及下属的乡镇也分布着大量的古桥，据调查统计，现有各类古桥近 200 座。被称为“桥乡”的角直，至今保存风格各异的明清古桥就有 40 余座。

如今除了石头以外，又有了水泥混凝土质的桥。1970 年新建的红旗桥(今名姑胥桥)是苏州第一座大跨度现代桥梁。为了方便行车，许多主干道的桥梁形式也由石级拱桥改建成水泥平桥。自从沪宁铁路横贯山塘街，造了立交桥以后，立交桥也成了苏州桥梁的新宠。在干将路改造中，古城中心的乐桥也改成了下沉式立交，改变了苏州古城内地面交通没有机动车立体交通的历史。

1994 年 10 月建成通车的太湖大桥，全长 4308 米 181 孔。全桥由三座特大桥组成，是当时我国内湖第一长桥，远远望去宛如一条银练，飘落在太湖群岛之间，为开发和利用太湖资源提供了极为便利的交通条件。

进入新世纪，苏州的桥梁建设突飞猛进：2002 年 9 月 30 日竣工的苏州官渎里立交桥，由主桥和匝道桥组成，主体为三层互通蝶式立交，是华东最大的城市立交枢纽；2003 年 9 月 30 日竣工的苏州索山桥，是国内跨度最大的自锚式悬索桥；2004 年 1 月通车的金鸡湖大桥，除了解决交通问题外，已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又一亮丽的景观；位于苏州(常熟)市和南通市之间，总投资 64.5 亿元，全长 32.4 公里的苏通大桥，2008 年 6 月 30 日正式通车，其斜拉桥主孔跨度 1088 米，主塔高度 306 米，斜拉索的长度 580 米，斜拉索用钢强度级别达 1770 兆帕，单根最长 577 米，创造了最大主跨、最深基础、最高桥塔、最长斜拉索四个世界之最。

链接：《苏州古桥》，徐文涛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灭渡桥与觅渡桥

苏州有句俗谚叫做“造塔修桥全要神仙帮忙”,因此许多古桥的修造都有神仙相助的传说。苏州城东南横跨大运河的灭渡桥也不例外。

传说从前有个过路客商打扮的人,在苏州城河南边,要到葑门外大街去。正巧那里有一只小网船在撒网捕鱼,客人要请他摆渡,就对他说好话:“巴望你一网打一条大鲤鱼!”话音未落,渔夫果真网到一条金色大鲤鱼。客商见他网到鱼后还是不睬自己,继续撒网,仍笑嘻嘻地说:“巴望你网到一条大鲤鱼!”收网时,网里真的有一条比前一条更大的银鲤鱼。如此反复了 18 次,渔夫已网到了 18 条大鲤鱼,仍旧没有罢手摆客商过河的意思。这可惹恼了客商,改换了念词:“金鲤银鲤请听好,快快都往水里跳!”转眼间,舱里 18 条大鲤鱼都跳回到河里去了。渔夫看着一条条刚网上来的鲤鱼又回到水里,更加不肯摆渡了,还同客商吵了起来。客商却不同他争吵,从腰间解下一条“青龙带”,抛向天空,飘带被抛到云端里,落下来便成了架在河上的一座高高的石桥,客商走上桥,倏忽不见了。渔夫这才恍然大悟,晓得遇到了仙人,懊悔不迭。从此,人们从运河南面上葑门外大街就不必再觅渡和摆渡了,可以从桥上直接走过去,根本上消除了渡船,因此这桥就被冠以灭渡桥之名。

由于这里是苏城东南赤门湾去葑门的必经之地,在没桥以前,行人只能依靠渡船,渡工常借机欺凌过往人等。昆山僧人敬修也在此屡遭摆渡舟人横暴,之后,乃发誓募捐建桥。在其同乡陈阶、张光福的支持下,终于在元大德二年(1298)十月开工,四年三月竣工,历时一年有余,取名“灭渡”,是为了“志平横暴也”。在以后的岁月里,饱经风霜的灭渡桥也历经明正统年间苏州知府况钟重修,清同治年间以及 1985 年先后重修。桥为薄型单孔拱式,东西走向,通长

81.30米,净跨19.30米,矢高8.50米,两坡各设53步石级。采用增大跨度而不作多孔设计,以适应水流湍急、过往船只体大、往返频繁的需要;在拱顶与面石间不加填层,并尽量增加桥身坡长,使之平缓易行,高而不峻,稳重大方,堪称江南古桥梁之典范。1982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南门路东端,灭渡桥北,斜跨古运河的觅渡桥,是1975年为解决苏城外围卡口而新建。此桥单孔钢筋混凝土双曲拱结构,宽15米,长75米,跨度60米,西引桥长55.75米,东引桥长39.80米,南引桥长26.60米,桥名取自灭渡桥之讹称。

风雨万年桥

苏州古城西南有一座胥门,亦称姑胥门,是苏州城通往太湖和吴王离宫姑苏台的必经之路。战国时,春申君黄歇测知太湖水位高过苏城,为免遭泛滥之灾,就把胥门封闭,从此以后胥门就没有了水门。到了唐代,陆门也废,百姓杂居遗堞之上。北宋绍兴年间,郡守王映在盘门里河西城下建体势宏丽的姑苏馆,并于古胥门城楼上建姑苏台,堪称吴中伟观。元至元十六年(1279)元兵南下,平定江南,苏城城墙悉遭平毁,胥门亦未幸免。至元二十九年,因治安关系修复城墙,在开濠时于姑苏驿故址得"胥门"石刻,于是重辟胥门。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据苏,于阊、胥、盘、葑、娄、齐六城门加筑瓮城,加强城防。

胥门在元朝与其他五门一样都有吊桥。明嘉靖年间,严嵩看见胥关吊桥的紫石很是古朴,便派人将它拆下,运到其家乡江西袁州城建成万年桥。此后,苏城六门惟独胥门无桥,风水先生乘机附会说,苏州城西峁嵲山(即今狮子山)与胥门相对,山形如狮,不宜建桥引其狰狞之势入城。因此,在将近200年的历史中,胥门始终无桥。即使偶而有人提议建桥,亦往往因种种原因作罢。嘉靖年间有

人首先“违众建桥”，此时，适遭倭寇之乱，苏城士民便怪罪建桥，自发将其拆除。康熙二十八年(1689)吴江沈在宽倡仪募款建桥以利往来，得到了一些商民的支持。可是，刚打好桥桩，胥门外南濠街上就发生火灾，数千家商肆的货物化为灰烬，以后几天又接连几次火灾。这时，风水先生借题发挥，专文呈送官府，称胥门城濠阔30余丈，要造桥必然极高，方可通运船只，且城中仓库、监狱都在西南，如专在此建一高桥，站在桥上即可窥视城内虚实。“非设险固圉之意”。诸力主建桥者闻讯，率众上门毁其家，捕官出面重惩了闹事者。巡抚郑端为此还专门请吴县、长洲二县令汇议，最后议定不宜建桥，于是将原建桥材料移作修葺吴县学宫和瓜泾桥之用。直到乾隆五年(1740)，由于苏州经济更趋繁荣，在此“往来问津者日以万数，待船以济则苦杂众，有风涛之虞”。于是知府汪德馨力排众议，在巡抚徐士林的支持下集资建桥，费时二年建成长32.5丈余，广2.4丈，高3.44丈的三拱石桥，取名万年桥，以喻永久；并在西堍建石牌坊，题额“三吴第一桥”。后经嘉庆二十五年、咸丰元年、同治元年三次大修，民国25年为利于车辆上下，在石级上铺设水泥道轨二条。1937年日军侵占苏州后，又将石级、道轨拆去，改为弹石斜坡，并同时拆除石牌坊及万年桥东西两侧的民房，建成新马路与原有的城外大马路(今阊胥路)相通，供日军车辆出入苏城之用。1944年6月8日上午11时许，一辆满载煤的日军货车自西而东入城，致使万年桥坍塌，于是，胥门再次成为不便进出的城门。

1952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将万年桥改建为钢盘混凝土现浇连续梁桥，宽6.8米，长43米，仍为三孔，中孔跨度14.5米，两侧桥孔跨度各10米。随着经济的发展，万年桥逐渐成为苏州城西部的一个卡口。为此，1970年苏州市政府又在万年桥北侧城濠上新建一座长94米，净跨80米，宽12.5米的五孔钢混T梁桥，取名红旗桥。1984年又加宽桥面一倍，改名姑胥桥，这样就从根本上减轻了万年桥的车、人流压力，甚至取代了万年桥的主导地位。如今，在环古城风貌带建设期间重新建造的三孔石拱桥万年桥仍然静静地依偎在

古胥门旁，默默地注视古城苏州的变化，注视着曾被风水先生援引为不祥之兆的狮子山成为苏州乐园，仿佛陷入了无限的沉思……

（原载《档案与建设》1999 年第九期）

苏州的博物馆

博物馆里那一扇扇或古朴或高雅或现代的大门，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条超越时间、空间、种族和类别的通道。

博物馆的藏品，以其丰富的内涵，引领我们沿时间的长河溯流而上，去目睹我们祖先如何从远古一路走来，创造文明，展示辉煌……

苏州堪称博物馆之乡，最早的博物馆可从 1958 年说起。那时范烟桥担任苏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力主成立苏州地志博物馆。经市领导批准后，与顾公硕、陈涓隐等人在文庙开始筹建工作，着手征集文物。至 1960 年，改称苏州博物馆，并从文庙迁至忠王府。

苏州的许多博物馆很有特色，如 1992 年秋建成开放的我国第一座园林专题博物馆苏州园林博物馆，坐落在东北街 202 号。2007 年经过近一年的建设，苏州园林博物馆新馆于 12 月 4 日正式对外开放。坐落于景德路明代大学士申时行的古宅“春晖堂”的苏州中医药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家中医博物馆，2002 年 10 月 22 日开馆。还有位于山塘街 2005 年 11 月 18 日正式开馆的苏州商会博物馆。桃花坞大街北面的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落户在建于民国时期的朴园，2006 年 1 月 6 日举行揭牌仪式，这是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该博物馆的揭牌同时标志着苏州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心工程正式启动。2009 年 2 月，常熟中医药博物馆开馆，这是目前我国县级市中最具规模、最富内涵的中医药博物馆。该馆设在常熟市中医院门诊四楼，面积达 500 平方米，由历史馆、名医馆、药具馆、中草药馆和书法馆

等八大部分组成。

现在全市各类博物馆至少有 60 家。2008 年 5 月 18 日起,苏州首批免费开放 16 家博物馆等场馆,名单如下:

1.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 常熟市沙家浜镇芦苇荡风景区

2.顾炎武故居 昆山市千灯镇

3.苏州博物馆 东北街临顿路口

4.苏州革命博物馆 三香路 1216 号

5.苏州碑刻博物馆 人民路苏州文庙内

6.苏州民俗博物馆 园林路潘儒巷口

7.苏州市档案馆 三香路 998 号

8.苏州籍两院院士风采展览馆

9.苏州横山烈士陵园 横山西麓

10.东渡苑,也叫“鉴真东渡纪念馆”,古称“黄泗浦”,位于张家港市东郊的鹿苑镇,为纪念唐代高僧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而建。2005 年春节正式对外开放。

11.常熟市档案馆 常熟市金沙江路 8 号

12.常熟博物馆 常熟虞山东南麓、北门大街 1 号

13.郑和纪念馆 太仓市浏河镇

14.昆山市昆仑堂美术馆 昆山市前进中路城市广场科技文化博览中心三楼

15.苏州工业园区展示厅 园区金鸡湖东行政中心,又称管委会、现代大厦一楼

16.苏州戏曲博物馆 中张家巷 14 号全晋会馆内

此外,苏州还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博物馆,如:苏州佛教博物馆(穿心街 3 号)、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中张家巷 3 号)、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西北街 88 号)、苏州丝绸博物馆(人民路 2001 号)、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景德路 274 号)、苏州国宝钱币博物馆(东北街 204 号西侧)、苏州古典园林艺术陈列室(北塔公园内)、枫桥史迹史料陈列馆(寒山寺东侧)、纪念范仲淹陈列室(天平山岁寒堂)、叶圣

陶纪念馆(甪直镇)、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常熟市古里镇)、常熟市碑刻博物馆(常熟市塔后街)、常熟市翁同龢纪念馆(常熟市虞山镇翁家巷)、常熟市庞薰琹美术馆(常熟市区南隅)、顾炎武纪念馆、昆曲博物馆、玲珑石馆(以上均在昆山市亭林园)、周庄博物馆(昆山市周庄镇)、中国古砖瓦博物馆(昆山市锦溪镇区丁家弄内)、中国历代古钱币馆、唐志云篆刻艺术馆、昆山市古董馆、张省美术馆、东俊根雕艺术馆、明清家具馆、中华民俗收藏馆(以上均在昆山市锦溪镇)、吴江博物馆(吴江市松陵镇吴江公园旁)、柳亚子纪念馆(吴江市黎里老街)、吴根生钱币博物馆(吴江芦墟)、太仓博物馆(太仓市西门街8号)、宋文治艺术馆(太仓市县府东街12号)、吴晓邦舞蹈艺术馆(太仓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前)、高仁岐油画艺术馆(太仓朱棣文小学对面)、张家港博物馆(暨阳西路2号)、虎丘云岩寺塔陈列室、苏州美术馆(沧浪亭后4号)、三山文物馆(吴中区西山镇三山岛)、吴中水乡妇女服饰展览馆(吴中区甪直镇)、吴作人艺术馆(定慧寺巷)、中国根雕博物馆(昆山市玉山镇下塘街)。

从苏州博物馆之憾说起

自2006年10月6日，耗资4.2亿元的苏州博物馆开馆以来，参观者真可谓络绎不绝，赞美之声也不绝于耳，原因何在？从官方来说，那是地方官员的形象工程，还可以博得在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不忘文化建设，很符合中央“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政策；从普通百姓来说，因为那是贝大师的封刀之作，即使不懂任何建筑设计者，也会附和几声“不错”，免得人家说你眼钝，只好像皇帝的新装那样，人云亦云！

可我从知情人士处获知，其实该建筑并非那么完美：其一墙体渗漏，其二办公室在地下，其三库房也在地下，其四池塘中的鱼已经死了几批，其五位置放在全国文保单位忠王府和世界文化遗产

拙政园附近不合适。

大家知道苏州地处江南，多雨潮湿，贝大师的设计，没有更多的关注这一客观事实，一味地追求现代气派。这样的设计，要求一年四季保持恒温恒湿，必须常年开中央空调，实在是对能源和资源的一种极大的浪费！在我们提倡可持续发展和节约型社会的今天，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某周末，我去了一趟老家吴江，与我搞水产养殖的哥哥谈起博物馆池塘中的鱼已经死了几批的事情。哥哥说，肯定是池塘里酸性太重了，原因是刚造好的水池一般是用了水泥的，而水泥是酸性的，必须在放鱼前用些石灰中和，达到鱼适宜的PH值就行了。可博物馆没这样做。还有选址问题，我认为选在原工人文化宫的地方更好，北面又是图书馆新馆，两馆在一起可以相得益彰！当然这已经是“事后诸葛亮”了，不可能改变既成的事实了，但是我觉得还有必要把我的想法说出来，供大家商讨的。

苏州的最大特色就是一个“小”字：商店是“前店后坊，自产自销”，宅院是“前宅后院，自娱自乐”（即私家园林），城市风貌是“小桥流水，前街后河”。可我们某些长官却一味追求“做强做大”：GDP要与上海等直辖市相比，当然这好看的数字也造就了连续数任市领导升任省部级领导；造个博物馆要请世界一流的设计师设计，其设计费可想而知！据说苏州博物馆每平方的造价要远远超出用于开奥运会的“鸟巢”，这难道不是纳税人的钱？

2008年5月，经过全国博物馆评估委员会评估推荐，国家文物局初审通过，苏州博物馆成为首批79家全国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不知依据的是建筑大师的杰作，还是博物馆内部的馆藏？

还有落成于2007年11月17日的苏州工业园区重元寺，其大雄宝殿高38米，建筑面积2330多平方米，是国内寺庙中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46米高的观音阁，是国内最高的水上观音阁。阁内33米高的观音像为国内最高的室内观音像，通体采用80吨青铜贴金铸成，重量也为国内之最。一个寺庙刷新了四项全国纪录，真为苏州“长脸”啊！2008年12月30日，在苏州寒山寺又落成了世界最大

诗碑和最大佛钟。据了解，已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创“世界纪录”。其中“寒山寺大佛钟”重达 108 吨，高 8.608 米，最大直径 5.242 米，钟面刻有七万多字的《大乘妙法莲花经》。“寒山寺大碑”总高为 16.9 米、重约 400 吨，其正面刻有唐代张继所诗、俞樾所书的《枫桥夜泊》，背面则刻有乾隆御笔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一下刷新了两项世界纪录！可又有谁知道这“风光”背后的艰涩？据说重元寺维持经费巨大，难以为继，不得不收费！寒山寺大佛钟音质沉闷，乃无限放大，不合音理所致，2009 年新年的钟声仍然只能用旧钟撞响！寒山寺大碑“前诗后御笔”，不合常规！

真是人心不古，连庙的和尚都不甘寂寞，挥霍着善男信女的捐赠，刷新着一个又一个的纪录！

苏州的古塔

塔是我国古代“佛塔”的简称，俗称宝塔。佛塔起源于印度，常被音译为“窣堵波”或“塔婆”（梵语 stupa 音译），主要用途是藏高僧的舍利子或经卷。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也是佛塔的又一梵文译法，古书还可写作“浮图”。

苏州的建塔历史可上溯到 1700 多年前的三国东吴时期。据史志记载，赤乌四年（241），西域康居国高僧性康不远万里来到吴郡（今苏州），讲经说法，传布佛教。吴大帝孙权特为他在盘门建一座寺院。赤乌十年（247），孙权为报答母恩，又在寺院中造了一座 13 层的舍利塔，这就是苏州历史上最早的塔。后因唐天福二年，塔顶放光，而改称瑞光塔。

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他的大力倡导下，江南各地大兴土木，建寺造塔，一时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苏州有不少著名佛塔，就是在梁代始建的，如报恩寺塔（即北寺塔，由梁僧正慧始建 13 层，当时称通玄寺塔）、灵岩塔

(梁天监二年建)、光福塔、昆山千灯秦峰塔(延福教寺塔)、昆山华藏寺凌霄塔(已毁)、寒山寺塔(当时寺名妙利普明塔院)等。隋文帝杨坚也笃信佛教,他在仁寿年间还曾下诏各州郡建塔,并且附发了塔的样式。据记载,当时全国共建成了 111 座塔,其中有苏州的云岩寺塔(虎丘塔)和上方山楞伽寺塔。吴越国王钱镠和宋朝皇室都崇尚佛法,因此,我们可以从绘制于南宋绍定年间的《平江图》碑上看到,苏州城里有报恩寺(毁于宋建炎四年兵燹,绍兴末重建为9层塔)、瑞光塔寺、万岁院(吴越时称罗汉院)双塔(宋雍熙中判司王文罕建)、妙湛寺塔、白塔、虹塔等 14 座塔,城外有云岩寺塔、半塘寺塔(亦称稚儿塔,晋义十一年诏建,宋绍兴七年重修)、枫桥寺(寒山寺)塔、天平山塔、灵岩山塔等 5 座,共 19 座。宋代是苏州建塔的高潮期,常熟虞山镇的方塔、梅李镇的聚沙白福宝塔和昆山慧聚寺妙峰塔等都是宋代建造的,此外瑞光塔、秦峰塔、光福塔和吴江震泽镇的慈云寺塔等都在此期间重建。

纵观苏州历史,曾有过 100 多座宝塔,至今保存完好的有 20 多座。最古的虎丘云岩寺塔已有 1000 多年历史。“出城先见塔,入寺能登山”,号称“吴中第一名胜”的虎丘塔已成为苏州的象征。

苏州的塔留存至今的多数为宋塔,就是没有唐塔。1993 年 3 月 7 日,终于在因唐代高僧寒山主持而得名,又有唐人张继诗而闻名的寒山寺动工仿造唐塔。1995 年 12 月落成的寒山寺普明宝塔,仿唐四边五层楼阁结构,结束了寒山寺和枫桥古镇 600 多年无塔的历史。塔的四面分别有赵朴初、沈鹏、谢孝思、费新我等人题写的塔名。

苏州自古有“七塔八幢”的说法。据史志记载,七塔是指城中七塔:第一塔在临顿路白塔子桥东堍,名白塔,现在虽然已无塔可看,但却留下了白塔东路、白塔西路的地名;第二塔在孟子堂东,相传每当月夜,人们都可看到塔顶上有一只巨大的蜘蛛在宫巷口的塔上织网;第三塔在邾长巷口塔弄,名叫虹塔,乾隆二年冬,自摇数天后倾圮;第四塔在司狱司署内;第五塔在宫巷南口,叫雄塔,据说人

在塔下能摇动塔身，乾隆五十七年圮坏；第六塔在濂溪坊名雌塔，相传与雄塔能在烟雾中，用线在塔中横牵而过；第七塔在望星桥西，毁于金兵南下的战乱，当地还有七塔寺前巷。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北寺塔、白塔、瑞光塔、石塔（在专诸巷口）、大同塔（在北寺塔后）、双塔。至于八幢，是指形方如塔，层层供佛的八棱形柱状构作物：一在孔副使巷中，亦名方塔；一在装驾桥南堍；一在洙泗巷南口；一在石塘桥北小桥头；一在桃花坞石幢弄底；一在因果巷；另外在西美巷况公祠内、思婆巷口也有过此类塔幢，只不过都已不存，只有甲辰巷砖塔硕果仅存。

链接：《苏州古塔》，徐文涛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苏州地名

地名是民族文化遗产。

——联合国第5届地名标准化会议6号决议

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联合国第6届地名标准化会议9号决议

小议苏州地名的人文内涵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文化，什么酒文化、茶文化、扇文化、服饰文化、烟具文化，似乎什么都可以挂上“文化”两字，也只有挂了文化才显得风雅，这种泛文化现象好像还有点欲罢不能、方兴未艾的势头。其实有些所谓的“文化”是毫无文化内涵可言的。笔者以为苏州的地名倒是应该归入“地名文化”之列，因为它有内涵，有底蕴，与苏州的地方历史文化直接相关，蕴涵着浓厚的人文气息。

1999 年，苏州经济广播电台主动与笔者供职的苏州地方志办公室接洽，联合推出了一档《地名大搜索》专栏，很受听众喜爱。此后，频频有人上门来查问地名。去年为了迎接第 28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召开，南护城河两侧首先建成环古城风貌带，东端起始点为灭渡桥，而该桥北斜跨古运河上的单孔钢筋混凝土双曲拱桥却名觅渡桥。为了弄清到底是“灭渡桥”，还是“觅渡桥”，苏州电视台的记者又专门来采访。据史料记载，这里原是吴江人进苏州城或苏州城里去吴江的必经之地，在尚未建桥时，只依靠渡船，行旅必须寻觅船只摆渡，也即觅渡。据说在元大德年间，昆山僧人敬修因屡遭渡舟人横暴，乃与同乡陈玠、张光福立志募捐建桥，造福于民，于大德四年三月竣工，取名“灭渡”，“志平横暴也”。后经明清多次重修，1982 年被列为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75 年为解决苏州城外围卡口而建的公路桥，则是因处在原觅渡位置而命名为觅渡桥。不久前，苏州电视台和《扬子晚报》的记者，又先后为范庄前是否有一个俗称蓖箕街而采访笔者。据说苏州原有两条蓖箕街，一条在文庙前，一条即范庄前，均以街道铺路石板形似女孩子梳头发用的蓖子而得名。范庄前还是因范仲淹“留街不留头”保下来的千年古巷。笔者以为，传说归传说，范庄前的价值并不在其形制，而在于因范仲淹在此创办义庄而得名。原来巷内有一个建于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先忧后乐"牌坊,可惜1966年拆了。同样,文庙的价值也不仅仅是一座供奉孔子的庙,而在于范仲淹始创了府学。两宋以后,苏州的科举功名大盛,出了许多状元、进士,这与范仲淹的大力提倡教育有关,于公办了府学,推而广之,各州县分别兴办州学、县学;于私办了义学(在义庄内),同样具有示范意义,苏州的富家豪族竞相效仿,创办义庄、义学。于是,苏州的一些世家大族科第连连,相继出现了"进了葑门第一家"的彭家彭定求、彭启丰祖孙会元状元;潘家(贵潘)潘世恩、潘祖荫祖孙状元、探花等。值得庆幸的是,范仲淹两处公私办学的地方,尽管都已不见蓖箕街的踪影了,但至今仍是苏州的学府: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苏州市景范中学。

历史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它需要承载体,除了文字形式即史志书籍以外,承载着苏州的历史、苏州的人文的,正是苏州的旧地名。与苏州历史人物掌故有关的地名,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阊门内至德庙桥,系因筑于泰伯庙前而得名。泰伯乃奔吴始祖。孔子曾说过:"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推崇备至。苏州人当然也要纪念这位先贤。纪念性建筑尚有阊胥路南泰让桥、乐桥东让王庙。锦帆路乃吴宫子城围城河"锦帆泾"遗址,因吴王曾在此泛锦以游而得名。干将坊则因其正东有干将墓、干将门(即相门)而得名。胥门内伍子胥弄则因伍员居宅而得名。阊门内专诸巷则系巷内原有刺杀王僚的勇士专诸墓之故而命名。城西木渎则因吴王建造姑苏台时运木,木塞于渎而得名。灵岩山下直达胥口的河流,俗称箭泾,亦称采香泾,乃因吴王种香于香山,令美女往来采香而得名。横塘境内的越来溪,分明在告知后人,经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的越王勾践,是从这里进攻吴国,复仇灭吴这段历史。苏州城北的蠡口、城南的蠡市,均与越相范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密切相关。黄埭乃因战国四君子之一春申君黄歇于此治水而名。木渎西之藏书则因汉会稽太守朱买臣未显时,常采樵读书,藏书于穹窿山破庙中而得名,至

今穹窿山上尚有朱买臣读书台遗址。拙政园东有条南北向的百家巷，是因东汉顾训五世同堂，家有百口而名。新郭之称，则始于隋平陈后，隋文帝认为苏州郡城无险可凭，而迁郡城于横山之下，但仅31年后（唐武德七年）又复还故城了。山塘又称白公堤，乃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修筑此堤而名。阊丘坊之成名与苏东坡有关，苏轼为杭州刺史时经常来苏州，曾说过两句名言“苏州有两邱，不到虎邱，即到阊邱”。如今他的另一句话“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已成为虎丘旅游推介的广告语且不说，东坡念念不忘的另一丘则是指朝议大夫阊丘孝终。东坡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阊丘任黄州太守，两人诗赋往来，甚为相得。阊丘辞官后返苏，东坡常去探望，因其所居之巷口立有牌坊，人们便称之阊丘坊。王废基（讹作皇废基）处原为姑苏王张士诚王宫，张兵败纵火将它化为灰烬，于是就有了王废基之名。学士街乃因明代大学士王鏊之子为其父建造一处养老之所怡老院而得名。还有一条横巷天官坊，据说也是因房子的主人即王鏊位至天官而得名。乐桥北侧的尚书里则因其主人吴宽在成化年间连中会状，官至礼部尚书而得名。文衙弄为文徵明曾孙天启间状元文震孟所居。申衙弄乃“太平宰相”申时行住宅之一而名。三元坊则因乾隆年间，苏州钱棨连中三元（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苏州知府奉诏建了三个牌坊而得名。双林巷则由天启间，文震孟同族兄弟二人，同榜进士而得名。事有凑巧，清同治年间，巷内吴氏兄弟吴大澂、吴大衡亦同榜入翰林，城中人往往只知道吴氏而不知文氏兄弟之事。五卅路是因为1925年苏州各界为声援“五卅运动”捐款，事后用被上海总商会退回来的款项修筑了从言桥到十梓街一段马路，取名五卅路以示纪念。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有人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放眼当今世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无一不是举世无双。苏州古典园林甲天下，是苏州最耀眼的“明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当之无愧！苏州古城建城2500多年以来，城址基本未变，顾颉刚先生认为苏州城为全国第一古城。

照理说,完全可以以整个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在第21届遗产中心主席团会议上,在同意苏州古典园林成为推荐名单的同时,也建议中国政府考虑申报苏州古城,认为苏州的文化价值远不至于四个园林。当时只报古典园林的典型例证(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庄),是因为考虑到近年来苏州的城市建设"建设性地破坏"了古城的整体风貌。尽管如此,古典园林的申报成功,也不是孤立的,它有赖以存在的人文环境,数以千计具有独特风貌的小巷。而小巷的文化除了依存于巷中的古建筑外,就是巷名及其巷中的人文。地名是时间的见证,也是历史的化石,一个个地名中蕴含了苏州的昨天和前天。地名应该是最民族、最有地方特色的承载体。

对苏州古地名的记载考释,除了一些旧方志外,最为翔实的当推王謇先生的《宋平江城坊考》。该书对宋《平江图》碑上65座坊表、314座桥梁,还有公署、军寨、学校、楼台、亭馆、园第、寺观、祠庙、坛墓、河流、湖泊、山陵、古迹等610余处名称的称谓、方位、沿革等,一一加以考订。1982年,苏州市地名委员会曾编过一本《苏州市地名录》,并有"重要地名来历及含义",可资参考。1995年出版的《苏州市志》专门设了一卷"城巷河桥",较全面地反映了苏州古城地名1985年时的现状(《苏州市志》下限1985年)。最近,获悉张家港市在编辑一套《张家港市乡镇地名志丛书》,以撤并前的乡镇为单位各编地名志,其中已有两种《锦丰地名志》、《西张地名志》先期出版,较好地保存了城市化进程中,作为最基层的村镇地名面貌,为后世提供了一笔蕴藏丰富文化内涵的历史遗存。

旧地名不断消亡,新地名逐渐涌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横贯姑苏城的一条干将路,自东而西将相门路、狮子口、新学前、濂溪坊、松鹤板场、干将坊、铁瓶巷、镇抚司前、通和坊,以及沿路两侧的升龙桥下塘、顾亭桥下塘、桐桥东路、司长巷、多贵桥巷、桐桥浜、言桥下塘、后梗子里、梗子里、广福里、祝家桥巷、登平里、紫兰巷、豆粉园、打线弄、双成巷、鹰扬巷、大八良士巷、小八良士巷、顺平里、

太平桥弄、郎中里、升平桥弄、乘马坡巷共33条巷名化为乌有。苏州城东护城河东纵贯南北的莫邪路又将原相门北河沿、后庄、庄先湾、北栅头等“吃掉”了。虽然此路名较之新区的珠江路、长江路来要好得多，至少意在与干将路相呼应，也与苏州历史名人有关，但毕竟少了些底气和内涵。笔者认为，大规模合并街巷的形式不可取，一条7公里长的干将路，使用了超千的门牌号，既不利于查找，又不合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风格。盲目改名更不可取。以苏城北面的陆墓古镇为例，得名于唐宰相陆贽之墓，如今改为陆慕，说是为了好听点，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殊不知，宰相葬地本就属于风水宝地，根本不会有什么好忌讳的，改称陆慕反而抹掉了此地的历史底蕴。只要有点知识的人，都不会因为将“墓”字改作“慕”，就认为这个地方是个值得羡慕之地了。

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即将推出一部《苏州旧街巷图录》，收录380幅照片，最大限度地展示苏州古城拆迁及街坊改造前的街巷面貌，并配有文字，说明街巷的历史，既可作为《苏州市志》“城巷河桥”卷的增补篇，又可资文史爱好者对苏州地名文化的研究参考。我们编辑此图录的目的，就是想给苏州街巷（地名）这一祖宗留下来的特殊遗产留个影，它是我们苏州的魂，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挖掘和呵护，在城市化进程步伐不断加速的今天，尽可能减少城市建设的冲击力。笔者以为，别让承载我们苏州传统文化的地名过早、过快地消亡了，是我们苏州子民义不容辞的职责。

（原载《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二期）

链接：王謇《宋平江城坊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张维明校理。

以方位命名的苏州地名

苏州是一座美丽的水城，街道多临水靠河，至今保留着水陆并

行的双棋盘格局，三横三直水道排列有序。街道的命名也十分有趣，耐人寻味。如果稍微注意点观察，就会发现苏州大街小巷的地名以方位词命名的不少，这些地名往往以某一众所周知的建筑物为参照物，再加上一个方位词，从而形成一条街名、一条巷名。现就这类地名作些归纳介绍给大家。

苏州是水城，桥梁特别多，因此也就少不了与水和桥有关的地名。如南星桥至吊桥的南码头和北童梓门至四摆渡的北码头，分别是以前阊门内的两个水码头，它们是阊门昔日辉煌的见证，如今已成为城濠内侧的两条街名。南濠街和北濠弄都因阊门外城濠而名。类似地名还有太子码头、盛泽码头等。此外还有众多以桥为参照物的地名，如：甫桥西街、望星桥北堍、望星桥南堍、吉水桥沿河、桐桥西圩、言桥下塘、张广桥北街、都亭桥南河沿、兴隆桥下塘、庆林桥下塘、张香桥下塘、迎风桥下塘、任蒋桥下塘、吉水桥东街、吉水桥西街等。与河有关的地名还有河西街、河东街、金狮河沿、河沿街、埃河沿等。

苏州是具有 2500 多年历史的古城，因此以城门为参照物的地名也很多。如阊门内下塘、阊门横街、阊门西街、胥门内大街、胥门外大街、盘门城根、盘门东城脚、盘门横街、南门城根、葑门西街、相门北河沿、娄门外大街、娄门外下塘街、齐门外大街等等，不一而足。

苏州城市格局至今仍保持宋《平江图》上的框架，原因是历代治所较少迁移。除了唐武德年间迁治至新郭外，府、县乃至巡抚衙门都在古城内，因此以官衙为参照物的地名也有保留至今的。如现在饮马桥至姑胥桥被称作道前街的一带，是明清两朝官署的集中之地，自东而西，今 17 中学所在地前原称卫前街，是苏州卫的治所；今苏州人民大会堂址原是苏州府治所在地，治前道路称府前街，至今此地仍属府前街道；今道前街 170 号是按察使司署，俗称道台衙门，署前街道才是名副其实的道前街。又如司前街，古称织里桥南街，因后在此设司狱司署而改称今名；南接道前街，北接东支家巷的府东巷则是因为地处苏州府台衙门之东而得名；原苏州

湖笔厂的所在地是明代镇抚司衙门，因此湖笔厂前的干将路段，曾称镇抚司前；与阊丘坊巷相对的史家巷，曾称县后巷，原因是今玄妙观牛角浜后曾是宋长洲县署所在地；还有东起养育巷西接水潭巷的古吴路原称吴县前（抗战后改今名），南至通和坊北接古吴路的吴县直街也因明清两代为吴县县署所在地而得名。

吴人自古佞佛，因此苏城内外寺庙很多，以寺庙宫观为参照的地名也少不了。如苏州的热闹中心观前街，就是处在玄妙观之前，其实它的全称应为玄妙观前街。类似的还有清洲观前、卫道观前、定慧寺前、承天寺前、宝莲寺前、蒋庙前。当然也有加上后、东、西等方位词的，如路头堂西街、后财神弄、后青莲庵场；也有前后相对的，如泰伯庙前和泰伯庙后，1972 年已并入阊门内下塘；红庙东、红庙西、红庙前、红庙后，1980 年分别改名朱公桥东弄、朱公桥南弄和朱公桥北弄。

吴中重学，自宋范仲淹首创府学之后，历代官吏都很重视办学，因此苏州状元成为有名的“特产”。如今苏州两院院士在全国的比重也毫不逊色于前人。旧学前这一地名，就是因宋代曾作长洲县学于此，明嘉靖二十年，县学东迁至今平江实验学校一带，因此，就称原长洲县学前的道路为旧学前，相对而言称今平江实验学校之前的干将路段为新学前。此外，还有南学前学地、新学前学地等都与学宫有关。

苏州城中多名人宅第，因此，名人宅第也往往成为地名的参照物，如范庄前是指范仲淹义庄前的小巷；申衙前是指申时行宅第前的街巷。类似的还有包衙前、谢衙前等等。

苏州园林甲江南，如今已有 9 座代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更多的园林也将作为增补。园林名胜古迹作为地名参照物的有：与西园相对的东园，是留园的原来称呼，现在已被用作苏州城东娄门附近的现代公园之称；南园、北园曾是苏州游春玩景赏菜花之地，现在成了一个地域性称呼，当然还保留着一条北园路。另外这类地名尚有沧浪亭后、虎丘山门内、虎丘西路、皇宫后等。

没有参照物，以两物互为参照的地名更多，如东大街对西大街，东北街对西北街，东采莲巷对西采莲巷，上津桥对下津桥，白塔东路对白塔西路，东美巷对西美巷，东街(蓟门)对蓟门西街，东中市对西中市，东汇路对西汇路，东百花巷对西百花巷，东吏厍对西吏厍，东高墩对西高墩，东小桥对西小桥，东脚门对西脚门，东善长巷对西善长巷，东麒麟巷对西麒麟巷，北显子巷对南显子巷，西灰场对东灰场，东花桥巷对西花桥巷，东支家巷对西支家巷，东混堂弄对西混堂弄，前梗子巷对后梗子巷，前姚家弄对后姚家弄，东大营门对西大营门，前管弄堂对后管弄堂，南丁家巷对北丁家巷，前小邾弄对后小邾弄，前南新巷对后南新巷，糖坊湾南对糖坊湾北对糖坊湾中，前莲花巷对后莲花巷，内马路对外马路，东杨安浜对西杨安浜，外五泾弄对内五泾弄，南五泾浜对北五泾浜等很多，不胜枚举，不再一一罗列了。

链接:《江苏省苏州市地名录》，苏州市地名委员会编，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5年7月版。

《常熟市地名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版。

《张家港市地名志》，方志出版社2007年11月版。

以动物命名的苏州地名

苏州地名以动物命名的很多。西部山区有几座山就是因动物象形得名:灵岩山又名砚石山，整个山体像一头伏地大象而亦称象山;天平山像一只金钱豹;金山像一条卧龙;峒峿山因从虎丘顶眺望此山，极似狮子伏地回首，故称狮子山，并有“狮子回头望虎丘”的传说;狮子山北面的何山，因其地旧名鹤邑墟而名鹤阜山;虎丘山的得名，据说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后3天，金精化为白虎蹲踞其上，被人发现而名。另一种说法是，整个山体像蹲虎，头山门像虎头，青石双井为虎眼。当然，由于历代的开山取石，狮子山南顶上的酷似

狮子双耳的两方大石已然消失;金山更是面目全非,取石点已在地平面之下,雨后积水而成池塘,毫无"龙"迹可寻了。

我们再把视线放到苏州城内。当年伍子胥"相土尝水"建城之时,辟有八座水陆城门,陆门八座象征天之八风,水门八座象征地之八卦,其中城南巳位之门称蛇门,上刻木蛇西北向,表示地处东南的越国臣服于吴国。城门因巳在生肖中代表蛇而得名。当然此门在宋初即被填塞废毁了。苏州园林以动物命名的首推狮子林。据说,当年天如禅师在苏弟子买地结屋为天如居,其中竹与石占地大半,禅师喜欢收集奇石,获一最高峰状如狮子,于是取佛经中佛陀说法称"狮子吼"之意,称之谓狮子林。另一园林则是位于韩家巷的鹤园。园中央呈鹤状池塘一泓,园北主厅称栖鹤堂,堂前为廊,廊前铺有鹤形花界,隐含园主栖隐之意。

以动物为名最多的要数巷名和桥名了,大多以传说中的动物,特别是表吉祥含义的龙、凤、麒麟为主。以龙为名的如纵贯苏州南北的人民路,原称卧龙街,后因清帝南巡时,百官在此护驾而改称护龙街;还有南至朱进士巷,北至醋库巷的苍龙巷,据说是通俗小说家冯梦龙的故居所在;北接十全街,曾名南林弄的五龙堂巷;南接阊门吊桥东堍,北至太子码头的聚龙桥;颜家巷东端的青龙桥;东灰堆园北的升龙桥;北至景德路,南至刘家浜的回龙阁;东接平安坊的良龙里。以凤为名的如南至王洗马巷,北至包衙前的凤凰弄;南至钮家巷,北至萧家巷的凤池弄;观前街南宫巷内第一条横巷碧凤坊;宝林弄的凤凰桥;南至十全街,北至干将路的凤凰街。以麒麟为名的如平江路北端横巷东麒麟巷;仓街北端的徐鲤鱼桥,俗称麒麟桥;东至石板街,西转至桥湾街的麒麟弄;众善桥弄、义慈巷在1980年前分别称麒麟弄和麒麟巷等。

以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动物为名的地名不外乎飞禽、走兽和鱼类。苏州别称鹤市,原因是古代士大夫家喜欢养鹤。早在三国时期,陆机的《毛诗草木虫鱼疏》"鹤鸣于九皋"条下就记载:鹤"今吴人园圃中及士大夫家皆养之"。因此虎丘有一景点称养鹤涧。原古市巷

东口有座鹤舞桥，据《吴地记》记载："夫差女胜玉出葬日，仙鹤舞引，群鸣于市，因号桥曰鹤舞。"桥东还有鹤市坊。在鹰扬巷接铁瓶巷处有座市鹤桥，今干将东路上原有松鹤板场等处都以鹤为名。此外，较有名的飞禽类地名有因春秋时期吴王八馆之一而得名的乌鹊桥；在醋库巷南水仙庙前的金雀巷亦名金鹊巷，因一种花色黄赤，状如飞鸟的金鹊花而得名。景德路上黄鹂坊桥，则是因为古代这里曾是黄鹂市场的缘故。大诗人白居易的"黄鹂巷口鹦欲语，乌鹊桥头冰未消"诗句，更将这两个以鸟为名的巷桥知名度大大提高了。以家禽命名的地名也不在少数，如苏城东面的金鸡湖，带城桥东的红鸭桥，南接半边街的鸭行里，南至上塘街，西转至广济路的鸭蛋桥浜，南接思古弄的鸭蛋头，弹子巷口的鸭舍桥，南至元和路北至司长巷的鹅颈湾，尚书里口的鹅栏桥等。

以走兽命名的地名，如南至大石头巷，北至双成巷的牛车巷；玄妙观东脚门之北的牛角浜；因晋高僧支遁饮马于桥下而名的饮马桥；西接齐门外大街的马弄；甫桥西的马津桥；南至谢衙前，北至前庙巷的马场弄；南至大新桥巷，东转至仓街的大马场弄；剪金桥巷中段的乘骝桥；南至桃花坞大街，北至永丰二弄的骆驼桥浜；东至官厍巷，西至河东巷的虎弄（1982 年撤名，并入滚绣坊）；南接书院巷，北至道前街的金狮河沿；大新巷西的金狮子桥；西接望星桥北堍的百狮子桥；东大街内的狮子弄；东接金石街，西至夹剪弄的醒狮路；西跨狗仙桥浜，旧老群堂西南的狗仙桥；东至莲花斗，西至油车弄的猪行河头；石路永新巷、府前朱家园、新苏州商城西侧雍熙寺弄都曾称为杀猪弄。

以水中动物命名的地名，如南至葛百户巷，北至桥湾街的聚鲤弄；乐桥东面因琴高乘鲤升化而名的乘鱼桥；嘉鱼坊西原有鱼行桥；今因果巷曾称乘鲤坊巷；阊门吊桥附近的鲇鱼墩是"文化大革命"中"三把火"之一地；专诸巷在《姑苏志》上记作"钻龟巷"；东至后倪家场，西至思古弄的小鱼池头、大鱼池头；东接清洁路，西到思古弄的吊鳝弄；连接双成巷与西美巷的白鳝桥；南接忠信桥，北接

望星桥的螺蛳桥；东接苏州大学，西接望星桥南堍的螺丝浜等。

除此以外，望星桥北堍原有蟾宫桥，书院巷南有蜜蜂洞，苏州大学东校区蚕桑地，菉葭巷与悬桥巷之间的蚕丝弄，竹辉路南侧的养蚕里，市曹桥南的蛾眉桥巷（后称三山街）等都是以动物命名的地名。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苏州城建的推进，一些地名也随之消亡了。

链接：《江苏省苏州市地名册》，苏州市公安局编，1988 年 10 月。

苏州地名与古代旧衙

苏州城在 25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先后为诸侯国都城、郡治、府治、省会等所在，遗留下一些古代衙门旧址，如巡抚衙门旧址、忠王府旧址等，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但也有些衙门已荡然无存，而在一些苏州地名中保留了一点历史痕迹，或多或少可以从中了解些辉煌的过去。

苏州人都知道，观前街西有一个叫察院场的地方，但又指不出具体位置。实际上，这里原名闻德坊，因明代起，中央政府每年都要从都察院派遣监察御史到各省府州县巡按，考察官吏，任期一年。巡按御史品秩低下而权限很大，负责考核吏治，审理大案，知府以下均奉其命，简称巡按，巡按的办公地点就称都察院。苏州的都察分院有四处：北仓桥平安坊至今人民路观前街西为北察院所在，故名察院场。除此以外，在书院弄巡抚衙门西还有南察院，现在尚存一条小弄叫小南察院；在明泽桥（今名石岩桥）西有西察院；在女冠子桥西有清军察院，由监察御史勾捕逃亡的军士。不过后两处都察院已无从查考了。

在观前街中段南部人民商场一带，苏州人习惯上称之为北局。这里历史上是苏州织染局的所在。明洪武初年，在苏州邵磨针巷中

段建立织染局，作为提督苏杭织造太监监理织染之所，这太监是由皇宫里二十四个太监衙门中最重要的司礼监里派遣出来的。到了明崇祯元年，织染局停织后，房屋坍败。清顺治初年，工部侍郎陈有明总理苏杭织造事，改建明代嘉定伯周奎故宅（今苏州第十中学）为苏杭管理总织局，织造监督尚志则重修明代织染局。顺治十年，工部侍郎周天成在总局后孔夫子巷（今孔副司巷）建南局，即苏州织造局，于是明代织染局址就改称为北局。后来又在桐桥内设南新局，顾家桥西设北新局。康熙四十一年，北新局改建成侍郎孙岳颁的赐宅，因此从草桥到顾家桥一段街坊叫做孙岳颁场，后来误作松鹤板场。咸丰十年，北局和南新局均毁于战事。织造作为替皇室督造和采办绸缎的五品官，其品秩虽然比四品知府低，但做了织造就取得了钦差的身份，还肩负着随时密奏地方各种情况的职责，也就是皇帝的耳目和亲信，因此，康熙、乾隆皇帝共 12 次下江南来苏州，都没有住在府衙或其他衙门，而选择了总局（南局）后面的西花园作为驻跸的行宫。咸丰十年，太平军东征时，南北两局全毁于战火。同治十年，织造德寿重建南局。辛亥革命后，成为警察训练所。1928 年为振华女中所在地。解放后改为江苏师范附中、苏州市第十中学，现在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饮马桥到学士街口这段街，今称道前街。原来由三部分组成，自东而西依次为卫前街、府前街、道前街。从养育巷到歌薰桥，原是苏州水利分司署，明弘治十四年改为按察分司，由按察司的佐官分理兵备等事项，称为分巡道。后专门治理兵备事宜，故称兵备道，或苏松常兵备道。清康熙二年改为分守苏松常道署，衙门前的街道便称为道前街。民国时期，这里曾是江苏高等法院所在。解放初为苏州人民政府办公处，1959 年改称苏州市人民委员会，现为纺织、物资、电子、化工、环保等局（控股集团公司）办公处。养育巷以东至西美巷即今人民大会堂所在，是明清时期苏州府治所。况公祠原是府治的后花园，在况钟为苏州知府期间，曾在此守孝并处理公务。后人为纪念这位勤政廉洁的“父母官”，特将它建成供奉他的祠

堂。府治前的街道称府前街。解放初,这里成为中级人民法院的所在地,1959 年改建为吴县第一招待所。府前街以东至饮马桥,今第十七中学一带是苏州卫指挥使衙门所在,衙门前的街道原叫卫前街。明初规定:要害地方,郡设所,连郡者设卫。各卫又分统于都指挥使司。明代又于诸卫置镇抚司,专门处理卫自己内部的案件。苏州镇抚司位于铁瓶巷与通和坊间,在养育巷与新春巷之间至今仍保留着一条叫镇抚司前的街道名。

南接东大街,北连养育巷的司前街,古名织里桥南街,是因为在清宣统年间,苏州城区有六座监狱:江苏按察司监、苏州府监和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监狱及苏州模范监狱。其中江苏按察司监和苏州府监设在今苏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处,因而这两个监狱前的街道称为司前街。

类似的街道还有:养育巷横巷古吴路的名称是抗日战争后才改的名,在清代称吴县前,是因为明清时期吴县县衙位于古吴路东西吏厍之间,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吴东弄、吴西弄和原正对县衙前那条南北向的吴县直街这几个地名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中考察其大体位置;原苏州市职业大学校址系明清时期长洲县署所在,它前面有条路称长洲署前,今名长洲路;苏州市第一中学处,系清雍正二年析长洲县设元和县后,元和县署所在,因此在今市一中与其操场间有一条名叫元和路的小巷,此巷古名十郎巷,作县治治所后改称元和县前,民国后改今名。

苏州的地名是历史的载体,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我们可以从地名的演变看到悠悠古城饱经沧桑。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街小巷也曾改为带"红"色的名字,但那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因为这些名字与苏州的文化、苏州的历史毫不相干。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最具地方特色的东西才会永恒!

链接:《苏州街巷文化》,潘君明著,古吴轩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版。

历史名人与苏州地名

苏州素称人文荟萃，在悠悠25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曾涌现过无数名人，也有不少文人墨客、名宦世家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一些苏州的地名中寻找到点点滴滴……

今天横贯苏城东西的干将路，是原人民路乐桥东首的干将坊的东西延伸，而干将坊之名与春秋时期吴国的铸剑名匠干将有关；胥门内的伍子胥弄，相传是吴国谋臣伍子胥住宅所在地；阊门内的专诸巷则是春秋勇士专诸刺杀吴王僚遭杀害后的葬身之地；西接仓街的丽姬巷，相传是西楚霸王项羽爱妾虞姬的出生地；位于西中市东端的皋桥，据说是因为汉议郎皋伯通居住于此而得名；东连皮市街西接人民路的乔司空巷是因三国时官居司空的乔玄住宅所在而得名；萧家巷，据说是东吴大将周瑜曾居巷内，故时称周将军巷，后来因为巷内有萧衍王墓而改今名。

让我们将目光转到唐宋时期。连接阊门与虎丘的七里山塘，因大诗人白居易在苏任刺史时发起开凿，苏州百姓为纪念他的功绩，将这条有名的街道称作白堤；阊丘坊巷则是因为大文豪苏东坡来苏必访之人——北宋朝议大夫阊丘孝终宅第所在而得名；双塔附近的苏公弄是因为苏东坡来苏常住定慧寺啸轩，啸轩边上的小弄便因此而名；范庄前是“先忧后乐”的范仲淹家义庄所在地；颜家巷是因宋代工部侍郎颜度曾居此巷而命名；东接广济路，西接义慈巷的北丁家巷以及临顿路南端北接大郎桥巷，南至干将路的丁家巷，均因宋代淳化间丞相丁渭故里而得名；南接石灰南弄，北通八字桥西街的李继忠巷是里人为纪念被奸臣所害的宋代李继忠而命名；朱家园是因替宋徽宗采办“花石纲”而成为暴发户的朱勔自营园林同乐圃于此而得名；南起十梓街望星桥西堍，北至吴王桥西堍，全长457米的叶家弄，是因宋翰林学士叶梦得居住地而得名；东接三

多巷，西至吉庆街，全长 380 米的侍其巷则是因五举礼部，退为乡先生的侍其沔而得名；富郎中巷是因大中祥符进士、曾任苏州知府、官至刑部郎中的富严告老居吴住所而名；位于阊门内文山寺前的文丞相弄是为纪念南宋末年丞相、民族英雄文天祥而命名的。

东起潘家桥西至临顿路的潘儒巷以及东大街泮环巷口的驸马府堂分别是因元末吴王张士诚之婿潘元绍的住处和驸马府所在地而得名；东连园林路，西接临顿路的桐芳巷，是因张士诚在此筑桐芳阁而得名；今干将路乐桥西原豆粉园，相传是张士诚窦妃墓所在地，巷因名窦妃园、窦废园，到清同治年间才改称豆粉园；另外与张士诚有关的地名还有王废基，是春秋时苏州子城所在地，也是历代衙署所在地，张士诚占据苏州称王时亦作为王府，兵败时，纵火被焚为废墟，从此，官署他迁，这里便成为王废基。

明清时期，苏州成为许多显贵的退隐之地。学士街和东接学士街西连前莲花巷的王衙前，都因明代大学士王鏊居此而得名；东起平江路西至临顿路的大儒巷，因名代大儒王敬臣住在此巷而得名；全长 115 米的唐寅坟当然是因为大名鼎鼎的唐伯虎而得名，但是真正的唐寅坟不在大营弄至蔡家桥，而在城外横塘；南接宝林寺前北连天库前的文衙弄，是因为文徵明曾孙、大学士文震孟居此而得名；东起人民路西至庆元坊的怡园里，古名修竹巷，后因明成化八年状元、官至吏部尚书的吴宽居住巷中，而改名尚书里，又称尚书巷，1972 年改今名；申衙前是累官至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的申时行，晚年辞官闲居苏州的宅第所在；严衙前，古名积庆寺巷，因为明代学士严讷故里而改今名；东起养育巷西至施林巷，全长 400 米的慕家花园则是因清康熙时江苏布政使慕天颜于此建园而得名；十全街东首的尚书里，曾因宋代诗人苏舜钦居此而名苏家巷，后因清雍正时兵部尚书彭启丰宅于此而称尚书第，巷就改称尚书里。三元坊因钱棨连中三元，乾隆皇帝龙颜大悦，赐建三座牌坊而得名等等。

当然，明清以后也有新命名的地名，如裕棠桥原名甘棠桥，因在

民国18年重建时，由苏纶纺织厂资方严裕棠捐资，而改今名。“文化大革命”时期有许多地名被改为带有“红色”色彩，后来已逐渐恢复。近年来，由于城市建设发展道路，在拆迁住房，拓宽马路过程中，一些地名已随之消亡，成为历史，只能到一此史志资料中去查找了。

链接：《苏州名人故居》，王仁宇编著，西安地图出版社2001年5月版。

悬桥巷与历史名人

在苏州古城东部，有一条连接临顿路与平江路的小巷名叫悬桥巷。该巷全长379米，宽2米，古名迎春巷。唐武德年间析吴县设长洲县，在今玄妙观之北建长洲县署，称今史家巷为县后巷。县署东(今旧学前口)有桥名县桥，于是就将迎春巷改名县桥巷，一名员峤里。到了明万历年间，权宦魏忠贤在巷内造真观，为安全起见，专门建造了悬桥控制人员进出，从那时起，此巷就改作悬桥巷了。

在这条不起眼的小巷里，曾住过不少历史名人：明代高士徐波因国变弃家，入鄣山读书，将巷内宅第送给外孙许眉叟，内有精雅宏敞的圆峤仙馆、来鹤亭、碧梧龛诸胜；复社成员、与杨廷枢齐名的郑敷教宅桐庵亦在巷内；清嘉庆七年(1802)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迁居此巷，专门建屋储藏宋刻善本书，于是，巷中就有了著名的藏书楼“百宋一廛”；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朱绶世居此巷，后移居幽兰巷、孔副使巷；悬桥巷27、29号还是清代出使俄、奥、德、荷四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洪钧洪状元的宅第及宗祠；23、25号曾是现代名中医钱伯煊(1895~1986)悬壶济世之处；顾氏祖业顾家花园是清代早期建筑，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先生就诞生在这里；著名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从小生活在巷中潘家祠堂之西，与顾颉刚一起在张氏塾中读书。

除此以外，悬桥巷内还曾有不少名贤祠堂。如丁氏二贤祠，祀

汉梁将军丁宽、唐太常寺卿丁公著；丁参议祠，祀浙江布政司使左参议温处道丁元复；陈五经公祠，祀明翰林院检讨陈继清；潘公祠，祀清户部主事潘世璜；张公祠，祀清旌表善行赠朝议大夫张凤德等等，不一而足。

（原载《华东旅游报·消费者热线》1999 年 8 月 20 日）

南濠与石路

苏州阊门外城濠，以阊门为界，分为南濠和北濠。城濠西侧分别有南濠街和北濠弄。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唐宋以来，以阊门为中心的山塘、南濠一带逐渐繁荣，明清时期南濠街成为江南苏州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商市中心，所以老百姓将“西阊万室俱豪富”的繁华景象称为“金阊门银胥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恨苏州人民的顽强抵抗，曾将大批苏州富户强行迁到苏北盐城、兴化等地，当地人都只知道祖上是苏州阊门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地区曾是苏州的代表，阊门是苏州的古老城门之一，同时也是苏州的象征。至于石路的兴起乃至成为苏州阊门外的闹市中心则要晚至清光绪年间，其历史与南濠不可同日而语。

南濠街上的寺与庙

早期的南濠是指阊门至胥门的外城河，南濠街也包括今天的南濠街和万年桥大街，全长约 2500 米。旧志书上都称南濠街及其以西地区为雁荡村，颇得方外人士青睐。据史志所载，宋元以来的这一带的寺庙有 20 多处，其中不乏名寺大观。最早的寺庙石佛寺可追溯到晋朝，明洪武初年，吴中御史王某上奏皇帝将此寺归并利济寺，庙中和尚不服，甚至进京上访，闹得不亦乐乎。当然，随着岁月的推移，寺庙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乐荣坊石佛寺弄的地名，庙址已建成石路地区的一大商厦亚细亚商厦了。再如幻住庵，是元大德年间明本和尚所建，他云游至此，发现此地

与浙江名山雁荡山同称雁荡，于是结草为庵。著名书法家赵孟頫还亲自为他运砖，并在寺庙中题写“栖云”匾额。后几经兴废，到民国初年仅存临河破屋数间。姚家弄的佑圣观，自古即为沿江七庙之一的大王庙。元至正年间道士杨道常建为观。据说元末战乱时，观内梁上草龙显灵，朽柴变青，下雨灭火，保全了观内建筑。清朝雍正年间，道士施尚音还奏请皇上赐名上圣观，相当荣耀。如今观址已成为苏州市第一医药商店。水仙庙，一名三乡土地庙，是至德、灵岩、胥台三乡的土谷神，建于唐末，供奉水仙柳毅。据说宋高宗南渡时，水仙在胥江显灵护驾，因而被敕封为水仙明王。明朝洪武年间又得御赐铜印，再次受到敕封。清朝雍正初年，被封为德元汇利洞庭神。乾隆帝也降旨让水仙福佑一方，遣官员春秋两季去祭祀。此外，南濠的寺庙尚有金山庵、夺生庵、信心庵、圆照庵、三乘庵、镜水庵、雪庵、净明庵、文林庵、净业庵、华雨庵、白云庵、雁荡庵、祇园庵等。

南濠街上的水与火

明清以来，南濠一带非常繁荣。据说，明朝末年，这里的商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常常焚香供神；祈求神灵保护其生意兴隆，财运亨通。有一次某店家的香灰被风吹入货堆，燃起了熊熊大火，一时间救火声四起。这时小郘弄一家成衣铺的师傅正在做衣，听到外面救火声，出来看热闹，不料放在衣服上的熨斗也耐不住寂寞，点燃衣服凑起了热闹，也烧了起来。转眼间，小郘弄也变成了一条火弄。事后，这位粗心的裁缝师为推卸责任，捏造了“火神吃三牲”的事。苏州民间于是就有了“南濠失火带脱小郘弄”的说法。事实上，南濠街的繁荣导致了南濠地价的上涨，同时也导致了商肆密度增加，以鳞次栉比形容当时南濠街上的店铺是毫不为过的。据史料记载，清朝初期，南濠街横巷中仅容一人进出的巷就有 4 条，有些面对面的店家屋檐相接。如此稠密的建筑，一旦失火，虽然城濠近在咫尺，往往因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参与救火而任其燃烧蔓延、损失惨重，于是就有了南濠水弄。首先

有了姚家弄和信心巷两条水弄。清乾隆初年，巡抚陈大受、知府觉罗雅尔哈善除了对这两条水弄拓宽外，还新辟同善、中正、兴仁三条水弄以备不测，给我们留下了中水弄、北水弄两个地名，却未能从根本上杜绝南濠街火患。据说康熙二十八年，吴江沈在宽倡议建造胥门水关桥，刚刚打好桥桩，南濠街上就发生了火灾，延烧数千家，商店内货物尽数化为灰烬。几天后，又接连发生多次火灾，并导致了一场胥门桥事件。一方是风水先生认为胥门不宜建桥，火灾是征兆；另一方是沈在宽为首的建桥利民说，最后还惊动了巡抚大人出面协调才平息了事端。咸丰十年，清军与太平军在苏州激战，清军兵败之时在阊门外放了一把火，把阊门外山塘、南濠一带化为灰烬。从此，这一地区失去了往日的繁华，将经济商业中心地位逐渐让位给了观前街。虽然清末石路的崛起，曾一定程度上恢复了阊门外的商市，但始终没有超过观前而屈居苏州第二的位置。当然，南濠街上的火并没有就此打住，我们不应忘却的是 1967 年 8 月 23 日，“文化大革命”的“文攻武卫”在苏州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天下午 3 时许，城内的造反派向城外施行火攻，焚毁了阊门吊桥西堍鲇鱼墩附近商店 25 家、民房 326 间，115 户居民遭难，461 人无家可归。这一南濠北端与石路相邻的闹市一角，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片废墟。由于这次人为火灾中将阊门外有名的赵天禄茶食糖果商店毁于一旦，苏州老百姓通常也称这次劫难为“火烧赵天禄”。

石路今昔

石路一带原属南濠雁荡村范围，南濠万人码头，本是官府押解犯人的专用码头，所以称为犯人码头。后来由于商民经常利用码头装卸药材、南北货，每年春秋季节做买卖的船只往往要从此码头排列到山塘河，人流量极大，堪称万人。又因苏州话“犯人”与“万人”同音，逐渐习惯用万人码头，而原来真正意义上的犯人码头反而知道的人越来越少了。

清朝末年，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苏州被列为通商口岸，准许日

本人在苏州开设商埠。为了抢占市场，先发制人，苏州的一批爱国郡绅密商对策，得到洋务派头面人物盛宣怀的支持，决定在商业基础较好的南濠、上下塘地区抢先开设自己的商埠，凭借京杭大运河（未改道前）道经万人码头之利，控制牢传统的水路交通要道。由洋务局出面拓宽义泽巷，使吊桥西堍、渡僧桥南堍明初已成闹市的十字街口和向南数百步的东濒万人码头的姚家弄之间，有一条可通马车的马路。据说这条马路中间铺设了一排石板，覆盖在阴沟上，集散于阊门各码头的船民称此路为石板路，久而久之，就简称为“石路”。这就是最早的石路，实际上就是现在阊胥路北段从吊桥到义昌福菜馆一段。光绪末年沪宁铁路开通，当时平门未开，人们都是从广济路到阊门入城，水路则从万人码头上岸，沿石路入城，汽车站也设在爱河桥，因此，石路成了名副其实的交通枢纽，客流量大增。交通的便利，带来了旅社、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的发展。如建于 1916 年的铁路饭店，始创于 1926 年的苏帮面馆之秀近水台，还有六宜菜馆、义昌福菜馆、五福楼菜馆等等。在发展过程中，石路也发展成为从义昌福菜馆，经人民剧场转向永福桥边，全长 393 米宽 13 米的混凝土路面。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石路逐渐成为金阊区的商贸中心。进入 90 年代，汇丰大厦、苏州亚细亚商厦、石路国际商城、威尼斯商厦、五洲大饭店、八面风商厦、协和大厦等一大批现代化的商贸大楼相继建成开业，使该地区重新成为能与观前闹市相媲美的新型商业区。每逢节假日，日均客流量达 20 万人次。与今日石路相邻的南濠街（北段），结合解危安居工程，金阊区政府在 1998 年对其实施了改造，兴建了神仙庙、金阊亭等新景点，拆除了原来的良记里、仁寿里、安吉里、墩和里、三元弄、太原里、姚家弄、北水弄、木角弄、鲇鱼墩等十条沿用已久的里弄，同时在南濠街和阊胥路之间新辟神仙街和葫芦街，分别位于威尼斯商厦南侧和新华电影院北侧。之后，金阊区利用四月十四轧神仙的传统庙会，进一步做好南濠和石路的商贸这篇大文章，为本地的经济建设服务。

（原载《苏州文博》1999 年第三、四合辑）

话说南濠街上的几把火

苏州阊门外城濠，以阊门为界，分为南濠和北濠。城濠西侧分别有南濠街和北濠弄。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唐宋以后，以阊门为中心的山塘、南濠一带逐渐繁荣。明清时期南濠一带已是“西阊万室俱豪富”，是苏州的商市中心和南北货物集散地。当时的阊门既是苏州古老的城门之一，同时也是苏州的象征，富有的代名词。甚至连一些青楼中的妓女也不无羡慕地冒用了“苏州阊门人”，其知名度可想而知。

商业的繁荣，必然导致地价的上涨。为了更充分利用黄金地段的商业价值，南濠街的商店密度以“鳞次栉比”来形容是毫不为过的。据史料记载，清朝初期，南濠街横巷中仅容1人进出的巷就有4条之多，有些面对面的店铺往往屋檐相接。如此稠密的建筑物，一旦失火通常总要蔓延数十家乃至上百上千家。虽然城濠近在咫尺，也会“近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南濠街历史上火灾迭现，且损失惨重。

据说，明朝末年，南濠街上的商号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常焚香供神，祈求神灵保佑他生意兴隆，财运亨通。有一次，某店家的香灰被风吹入货堆，刹那间，燃起了熊熊大火，附近商家立即投入救火。这时小郏弄一家成衣铺的师傅正在烫衣服，听到外面嘈杂的救火声，出来看热闹，忘记了放在衣服上的熨斗。转眼间，熨斗点燃了衣服烧了起来，并殃及了整条小郏弄。苏州民间逐渐流传“南濠失火带脱小郏弄”的说法。

为了解决南濠街的火患，清乾隆初年，巡抚陈大受、知府觉罗雅尔哈善对姚家弄和信心巷两条水弄进行了拓宽，并新辟同善、中正、兴仁三条水弄。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消防力度，但并未从根本上杜绝这一地区的火患。康熙二十八年，吴江沈在宽倡议建造胥

门水关桥之时，南濠失火延烧数千家，被风水先生附会成狮子山正对胥门城门，建桥会引凶险入城的征兆，致使胥门长期无桥。此后，还是火灾不断。康熙五十二年，再次失火延烧西至普安桥，东至吊桥，北至山塘。失火当时，人群争相过渡僧桥，挤踏死伤很多人，造成惨剧。咸丰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平军迫近苏城，清军为了阻止太平军的攻势，竟然“三令纵火”，顷刻间，南北两濠烈火腾空，三日不绝。市肆尽为灰烬，阊胥间沿城房屋夷为平地。从此，这一地区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苏州商业中心位置逐渐让给了观前街。虽然清末石路的崛起，恢复阊门外的商市，但始终没有超过观前而屈居第二。最后一次人为“纵火”当数十年浩劫的“文攻武卫”。苏州人不会忘记，那是1967年8月23日，苏州城内造反派向城外施行“火攻”，酿成了苏州“文革一把火”（另两把火分别是“苏医”和葑门外哺坊），焚毁了阊门吊桥西堍鲇鱼墩附近商店25家、民房326间，115户居民遭难，使这一南濠北端与石路相邻的闹市一角，一夜之间变成了废墟。由于在这次人为火灾中将阊门外有名的赵天禄茶食糖果食品商店毁于一旦，因此，苏州百姓通常称这次劫难为“火烧赵天禄”或“火烧鲇鱼墩”。

改革开放后，金阊区以阊门外的石路地区为突破口，实施“三产兴区”战略。通过自建联建、中外合资合作等方式，投入资金10亿多元，新建和改造了总面积为1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商业楼群，培育了江苏亚细亚集团、石路国际商城等规模型企业，发展了精品商厦、苏州文化用品商厦等一批专业特色商店，商贸日见红火。1997年，该区又投资2.5亿元，对南濠街北段全面实施改造工程，废除了沿用已久的姚家弄、北水弄等10多条小巷里弄，新建金阊亭、八仙过海等富含传统文化内涵的18景观，新辟神仙街、葫芦街。一年一度的四月十四日轧神仙庙会在这里举行，那时的火爆场面也是水到渠成、无庸置疑的。

（原载《华东旅游报·消费者热线》1999年5月14日）

平江路：小巷深处多名流

据《吴门表隐》记载，平江路古名十泉里，有古井十口，分别在华阳桥南、奚家桥南北、徐家弄北、魏家桥南北、朱马高桥北、混堂巷口、张家桥南、苑桥北，泉名无考。今平江路南起干将路东段苑桥，北接华阳桥过东北街和百家巷相通。全长 1606.8 米，路宽 3.2 米，原为石子路面，1985 年改为小方石人字形路面。路因宋政和三年(1113)苏州敕升为平江府，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平江路建置而命名。实际上，在宋元两代平江已是苏州的代称，今存苏州碑刻博物馆的宋代苏州城市平面图即称为《平江图》。苏州古城区之一的平江区也因之得名。

平江路西侧的一条河流是古城的第三直河（原第四直河），南自葑门十全河起，经望门桥、望星桥、忠信桥、寿星桥、吴王桥、官太尉桥、苑桥、思婆桥、寿安桥、雪糕桥、胜利桥、苏军桥、众安桥、通利桥、胡厢使桥、保吉利桥、庆林桥、潘家桥、石家角桥至东西北街河，上跨 19 座桥，河流全长 2.85 公里，宽 5～6 米。1958、1980 年两次疏浚，1982 年开阔河面重修驳岸，是苏州古城内较为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枕河的河巷并行地区。苏州城建规划上已将沿平江河两岸作为平江传统风貌保护区严禁拆毁，平江区也正着手对平江路沿线作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以求充分利用这一地区的人文资源，参与苏州的大旅游发展战略。

正如苏州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的《老苏州·百年旧影》画册上所言："小巷深深深几许，走进去，可以从现在一直走到从前。"苏州的魅力就在这小巷深处，苏州的文化底蕴也正在这一条条幽幽小巷里。在平江河众桥的两端往往连接了一条条幽静的横巷，一代又一代的名流在这里出现，又在这里消失。

从凤池园到"英王行馆"

南接干将路，北接大郎桥巷的丁家巷，是因宋代官至相位的丁

谓(962~1033)住宅丁晋公宅而得名。据史志记载,丁谓所居,旧名晋公坊,堂宇甚古,有层阁数间,两面戏台在大郎桥堍。相传丁谓曾为苏州请免丁钱,百姓为纪念他,在钮家巷设丁晋公庙供祀,后来成为土谷神祠。清初分长洲县设元和县后为元和县城隍庙,丁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城隍老爷"了。

钮家巷,明初称蓝家巷,是因为开封府人蓝师稷提刑居舍在此而得名。据说,当时蓝提刑的万华堂种植了 3000 株洛阳牡丹名品,盛极一时。到了清康熙年间,史志上记作"鸾驾巷",不知历史上是否曾有哪位皇上的"鸾驾"光顾过。之后又有钮状元居此的传说而改称钮家巷。钮家巷北侧有个凤池园,据说是在周宣王时,有只凤凰停在泰伯十六代孙吴武真家而得名。宋朝是顾氏住宅,明代易姓袁氏、钮氏。清朝康熙时期河南巡抚顾汧(1646~1712)辞官归家,重金购回已易他姓的"凤池园"加以修葺,园内遍植四季花草,有"武陵一曲"、"赐书楼"、"洗心斋"、"康洽亭"、"撷香"、"岫云"、"抱朴"、"见南山"诸胜。园极大,池亦广,亭台楼阁无一不备。到了道光年间,此园分属三姓:东部归陈大业,中部归王资敬,西部归大学士潘世恩(1769~1854)。太平天国时期,英王陈玉成曾在此园驻节数日,因此,人称"英王行馆"。以后,园子逐渐废为民居,仅存纱帽厅亦残破不堪。 1982 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对"英王行馆"加以整修,以垂教后世,基本上保留了太平天国行馆的原状,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萧家巷走出状元夫人

萧家巷,全长 418 米,宽 3 米。《孽海花》里的主人公赛金花就出生在这里。相传东吴大将周瑜故居在巷内,故名周将军巷,又曾名九曲墙巷。据传巷内有萧王墓,醋坊桥东原有萧氏双节堂,又名闲贵堂,中有古桂数千株,又有名为"己高"之亭。既为宋代名将周虎所得后,就改巷名为萧家巷。据《吴县志》记载,归安(今湖州)姚觐元罢官后曾寓此巷,与其子姚慰祖筑咫进斋用来藏书。

常熟人曾朴写的《孽海花》虽说是小说,但也有历史的痕迹,

是一部“以赛金花为经，以清末三十年朝野轶事为纬”的长篇叙事小说。

赛金花祖籍安徽休宁县（曾朴说她原籍盐城）。据说她祖父曾与人合伙开过典当，还算富裕，可到赛氏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她本姓赵，小名彩云，小时候最爱吃“状元饭”（红苋菜和猪油拌饭，苋菜是血红色的，拌成红色米饭，徽州人叫这个名字），因而家人曾戏言“这丫头长大后必嫁红状元”，想不到一句戏言后来还真应了验。光绪十三年正月十四日，24岁的她果然嫁给了苏州状元洪钧（时年50岁），而且还是红（洪谐音）状元。当年五月，她便以公使夫人的身份随洪钧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在德期间，赛氏生一女，名德官。至于《孽海花》所言她与瓦德西私通一事，纯属小说家之言。

据说洪钧是曾朴闱师的闱师，从辈份上讲洪是曾的太老师，因此曾朴在京任内阁中书时，常到洪家走动，称赛氏为“小太师母”。关于这一段公案，曾朴自己也承认是完全为行文需要“铺叙数回”、“虚构来迹”。光绪十九年，洪钧在北京亡故，赛氏扶柩回苏后，就和洪家分手。以“曹梦兰”的化名，在沪上重操旧业，“状元娘子”的名声曾轰动上海。戊戌变法那一年，赛氏去了天津，之后又到了北京，眼看着同胞惨遭列强的杀戮和伤害，凭着出使时学得的外语，与德军统帅瓦德西论理，要求他约束部下，严肃军纪，保全并救护了许多同胞。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赛氏因妓院里发生了妓女服毒自杀案，被拘禁在刑部大狱。据说，苏州末代状元陆润庠与当时刑部中堂孙家鼐是好朋友，陆氏和洪钧是姻亲，洪状元大夫人之子洪洛娶陆氏闺女为妻，陆氏当然不愿洪状元的遗妾飘摇在风尘里，所以借机将赛氏递解回籍。经过一场官司，赛氏倾家荡产，在苏闲居大约一年光景，为了生计她又到上海用“京都赛寓”的名字重开妓院。辛亥革命那一年，因结识沪宁铁路总稽查曹瑞忠而撤榜同居。次年曹病死后，赛氏第三次在上海为妓。1918年6月20日，赛氏又同已有一妻一妾的魏斯炅（时任参议员江西民政厅长）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新式婚礼，改名魏赵灵飞。婚后回北京，

1921年7月魏亡，赛氏迁居香厂居仁里16号，一直到1936年病故，终年73岁。据说，她的后事是街坊凑钱料理，陶然亭的和尚捐地建墓的。

悬桥巷汇集历史名人

大儒巷北面的南显子巷，巷口原有为表彰右史上官涣酉所立的仁美坊。巷内有明嘉靖年间由归湛始建的惠荫园。清顺治六年复社成员少微真人韩馨购得归氏废园作为栖隐之地，联系明遗民。因其主堂称"洽隐"，因此，园子也称洽隐园。可惜康熙四十六年失火，仅存东南半壁奇石秀峰和小林屋。乾隆时重修后易名"皖山别墅"。太平天国时期，该园成为听王府的组成部分。同治年间李鸿章抚苏，设安徽会馆于此，专供安徽人游息，始称"惠荫园"。后又扩建。园中有惠荫八景，园后跨河搭桥可通悬桥巷，作为春秋游人出入之路。至光绪年间，这里已成为会馆、祠堂、花园、公所、机房相结合的建筑群。民国初，曾被租作游艺场。抗战胜利后，女侠施剑翘还在其西部创办从云小学。解放后，会馆、花园都为苏州第一初级中学（后改为第十五中学）使用。1970年挖防空洞时水假山坍落，小林屋洞亦壅塞。1979年规划为修复项目，1982年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1983年曾进行疏浚抢修工作，会馆门厅及部分堂构与假山残址犹存。现水假山及周边一些景观已修复。

南显子巷东接南石子街，街北有宝树园，是清初高士顾其蕴住宅。其孙秉忠筑安时堂于宅中，凿池叠石，建"结蘅草庐"、"澄碧寺"、"芥圃"诸胜，俗称顾家花园。太平天国时被占为王府。战后安时堂改为机织局，园仍属顾氏，仅存残沼一区。顾氏后裔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故居即在此地。现在南石子街与悬桥巷之间长221米、宽4.5米的石子路就称为顾家花园，此巷北端的一座桥也称顾家桥。

悬桥巷全长379米，宽2米，古名迎春巷。唐武德年间析吴县设长洲县，在今玄妙观之北建长洲县署，称今史家巷为县后巷，县署东（今旧学前口）有桥名县桥。于是就将迎春巷改名县桥巷，一名员峤里。到了明万历年间，权宦魏忠贤在巷内造真观，为安全起见，

专门建造了悬桥控制人员进出，从那时起，此巷就改作悬桥巷了。该巷连接菉葭巷的一条长 58 米、宽 2 米的石子路叫楚春巷，据史志记载是因楚相春申君而得名。

在悬桥巷这条不起眼的小巷里，曾住过不少历史名人：明代高士徐波因国变弃家，入鄣山读书，将巷内宅第送给外孙许眉叟，内有精雅宏敞的圆峤仙馆、来鹤亭、碧梧龛诸胜；复社成员、与杨廷枢齐名的郑敷教宅桐庵亦在巷内；清嘉庆七年(1802)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迁居此巷，专门建屋，储藏宋刻善本书，于是，巷中就有了著名的藏书楼“百宋一廛”；道光十一年(1831)举人朱绶世居此巷，后移居幽兰巷、孔付司巷；悬桥巷 27、29 号还是清代出使俄、奥、德、荷四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洪钧洪状元的宅第及宗祠；23、25 号曾是现代名中医钱伯煊(1895~1986)悬壶济世之处；著名教育家叶圣陶(1894~1988)从小生活在巷中潘家祠堂之西，与顾颉刚一起在张氏塾中读书。

除此以外，悬桥巷内还曾有不少名贤祠堂。如丁氏二贤祠，祀汉梁将军丁宽、唐太常寺卿丁公著；丁参议祠，祀浙江布政司使左参议温处道丁元复；陈五经公祠，祀明翰林院检讨陈继清；潘公祠，祀清户部主事潘世璜；张公祠，祀清旌表善行赠朝议大夫张凤德等等，不一而足。

顾廷龙系出吴中名门

菉葭巷原名陆家巷，巷内原有天宫寺，是唐光禄大夫许台舍宅建。初名武平院，门前直街为初春巷，南口有天宫坊，寺前桥底有古井。寺内善财房的淡泉，据《红兰佚乘》记载，可与天平山的白云泉相提并论。巷内 49、50 号民国时先后属陈、杨二姓。宅西部有园，现尚存花厅。佛兰弄 1 号原属净心莲社，假山、树木均毁于“文革”。现在改建为佛教居士林，每年腊月初八有腊八粥供应。

另外，曹胡徐巷郑宅、茅宅，东花桥巷中和里汪宅，大新桥巷庞宅、袁宅，混堂巷费宅，卫道观前潘宅都曾是有名的大宅，有假山有花园，现在多数已废为民居，仅存少量遗迹。胡厢使巷 40 号为唐纳

(马季良)故居,东侧庭院尚存花厅、亭子;卫道观前27号是民国时期的花园洋房,解放后相继由血防站、托儿所使用。小新桥巷的耦园则为市级文保单位,已于1980年7月对外开放。中张家巷的全晋会馆又称山西会馆,为省级文保单位,现在是苏州戏曲博物馆。总之,平江路沿线的小巷,是古城苏州的典型代表,其中有说不完道不尽的人和事。

顾廷龙(1904~1998),1904年出生在东混堂巷,字起潜,号匋誃,又号隶古定居主人、小晚成堂主人,笔名路康。他是当代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顾廷龙系出吴中名门,先祖乃三国时吴丞相醴陵侯顾雍。廷龙先生虽然长期在上海、北京等地工作,却时刻牵挂着故乡,特别是对地方史志更是青睐有加。凡是苏州为修志需要,向他求援时,总是有求必应。记得1987年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所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准备更换封面题签,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顾老。顾老的字端正雅健,深得颜鲁公神韵,不论从封面的美观,还是与史志的"真"、"善"结合得是那样的和谐。因此,从第八辑起我们一直用着顾老所写"苏州史志"四字。进入90年代,《苏州市志》进入了总纂评审阶段,封面设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们再次想到了顾老。如今由顾老题写书名的《苏州市志》已荣获全国一等奖,顾老的字已随《苏州市志》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并必将随志书垂之永远。1995年底,苏州市方志馆批准筹建。翌年1月中旬,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家乡筹建方志馆的消息报告了顾老,并请他为方志馆题写馆名。不久,市志办就收到了顾老题写"苏州市方志馆"墨宝,横竖各一幅,并附信表示祝贺:

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奉示欣悉苏州市成立方志馆的喜信,敬贺敬贺!

我早岁曾闻老辈有此愿望而终未实现。先君顾元昌字竹庵,书法家,尝任苏州中学、苏州女子师范、苏州振华女学诸校书法教

员，并兼《吴县志》之采访，因得略闻一二。修志必须有常设机构搜集资料，专业性较强，不是图书馆可照顾得到的。但是有些材料须与图书馆、博物馆联系和合作。例如资料性东西急于装潢，否则不便管理。

馆牌字样涂就呈教。如有不合，尽可重写。

此致敬礼

顾廷龙上 2.2

在传阅墨宝和贺信之余，有人提出：馆牌题字没有落款和印章，终觉美中不足。幸而顾老在信中提到“如有不合，尽可重写”一语，故我们又向年届九十三岁高龄的顾老提出补写名款，加盖印章，并以繁体字“蘇”取代原简化字的请求。半月后，我们居然收到顾老重写“蘇州市方志馆”条幅，署款为“九三老人顾廷龙题”，并盖有阳文朱印“顾廷龙印”。收到此等字体圆润遒劲、行气布局堪称完璧的墨宝，我们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1998 年 9 月 22 日，苏州市方志馆在宜多宾巷 21 号开馆(2004 年 5 月迁至五卅路 148 号老市委大院 16 号楼新址)。尽管顾老在开馆前一个月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可以告慰顾老的是，方志馆经过 10 年的努力，馆藏 2 万余册各类书籍，影响面已不仅仅局限于苏州。2002 年，为筹建国家·北京方志馆、江苏省方志馆，北京市志办和江苏省志办的专业人员相继前来学习、取经。扬州、南通、无锡、常州等兄弟市，甚至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修志同行也慕名前来苏州学习交流。他们总忘不了参观一下方志馆，并在顾老题写馆名的方志馆门前留影。

（原载《姑苏晚报》2009 年 5 月 10 日）

链接：《平江路史话》，载 2009 年版《平江文史》第二辑。

《苏州古城平江历史街区》，袁以新主编，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 5 月版。

苏州人物

苏州向来具有崇教尚文的文化传统，文化昌盛，人文荟萃。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自唐至清的近1300年间，科举仕进的，苏州辖区共出文状元45名，占全国的7.6%。其中，唐代有7名，宋代有4名，明代为8名，清代为26名（占清代114科状元的22.8%），在中国是出状元最多的城市。进士更多，出了1500多名，其中明代苏州府有进士437名，清代则有600名。至于封疆大吏、征战良将、地方官员、社会名流，有贡献于社稷的苏州人，或外地人有功苏地而为后人推崇的，清道光年间沧浪亭所立名贤祠，初建即列名贤像赞570名，后又续增名贤600余名。名贤祠几经兴废，民国30年（1941）重修后，尚存名贤像赞594名。

吴地名贤，不胜枚举，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伍子胥、军事家孙武；楚霸王项羽；唐代诗人陆龟蒙；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及文学家范成大；明代画家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政治家况钟，文学家冯梦龙，建筑家、明故宫设计者蒯祥；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造园大师计成，叠石专家戈裕良，清两代帝师翁同龢，外交家洪钧；近代民主人士柳亚子，经学大师章太炎，史学家顾颉刚，文学家和教育家叶圣陶，刺绣大师沈寿，现代文学家和作家苏童等。当今两院院士中，苏州籍和在苏工作的院士已有一百多位。

苏州名人

商末

泰伯、仲雍南奔吴地，教民农耕，三以天下让，号为至德，堪称吴地文化的开化之祖。

春秋时期

言偃（前506~前443），字子游，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也是将北方儒家文化传播吴地的第一人，世称“南方夫子”。

干将（生卒年月不详），春秋末期吴人。莫邪，干将之妻。干将与铸剑名匠欧冶子同拜“铸剑子”为师，后皆以工于铸剑著名。据《吴越春秋》载，干将、莫邪曾“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炼了三月，铸成阳曰干将，阴为莫邪两把名剑。参《中吴纪闻》。

伍子胥（？~前484），名员，字子胥。春秋时楚国人。楚大夫伍奢次子。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政治、军事、文韬武略无所不学。楚平王七年（前522），楚王听信谗言，将子胥父、兄杀害，并派人捕捉伍子胥。子胥乃奔吴，投公子光（即阖闾）门下，为其出谋划策，设计用专诸刺杀吴王僚，帮助公子光夺取王位。受阖闾之委，“相土尝水，象天法地，造筑大城（今苏州古城）”。又推荐孙武给吴王。数年间，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伍子胥以功封于申地，故又称申胥。《史记》有《伍子胥列传》。

孙武，齐景公时齐国贵族，因齐国内乱而奔吴。著就《兵法》十三篇。帮助吴王阖闾南服越国，西破强楚，争霸中原，号称“兵圣”。

阖闾（？~前496），一作阖庐，姓姬，名光，故又称公子光。公元前514年，宴请吴王僚，指使勇士专诸藏剑鱼腹中刺杀之而登王位，史称“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为相，筑阖闾大城（今苏州城）。拜孙武为将，败东夷，灭徐国，破强楚。阖闾十九年（前496）亲征越国，战于槜李（今浙江嘉兴西南），阵中受重伤，死于归途。

黄歇(?~前238),即春申君。战国时楚国贵族,曾四出游学,见识广博,擅长舌辩。考烈王即位(前262),任黄歇为令尹(宰相),封春申君,赐予淮北十二县。黄歇为人豪爽,有远谋,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并列,人称"四公子"。考烈王十五年(前248年),黄歇徙封于吴。他注重吴地的水利,相传浙江吴兴的黄浦,江苏江阴的申港河、黄田港均与春申君黄歇有关。相城区黄埭镇,相传也因黄歇在此以土掩水,筑成堰埭,后人取名黄埭以资纪念。《史记》有《春申君列传》。

三国

陆绩(187~219),字公纪,天文学家。一生成就除了著天文专著《浑天图》外,"二十四孝"故事中"怀橘遗亲",为官卸任"载石表廉",即廉石的故事,都堪为后人楷模。

两晋

陆机(261~303),字士衡,文学家。曾任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与弟陆云并称"二陆"。20岁时写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完整的文学论著。他的《平复帖》被誉为法帖之祖。

南北朝

张僧繇,梁天监至大同年间大画家。擅长人物及佛教画,所绘佛像,自成样式,有"张家样"之称,被雕塑者取作模范。亦精绘肖像,作风俗画,尤善画龙,曾有"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故事。僧繇作画,骨气奇伟,"六法"精备。用笔多依书法,有意到笔不到之妙。与顾恺之、陆探微、吴道子并称为中国古代画家"四祖"。

陆探微(?~约485),著名画家。画学东晋顾恺之法,画史上常与顾恺之并称"顾陆"。平生爱画古圣贤肖像,骨秀神清,严正生动。后人谓其画笔迹周密,劲利如锥刀刻划,号为"密体"。亦工绘蝉、雀、马、猴,及绘捣衣、荡舟、斗鸭等,被誉为中国古代"画中四祖"之一。

顾野王(519~581),字希冯,文字训诂学家。曾搜罗和考证古今文字的形体和训诂,著《玉篇》30卷,收字16917个。先以反切注音,

再引群书，解释颇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文字训诂学的重要著作。

唐

张旭(658~747)，字伯高，一字季明。著名书法家。能诗，长于七绝，与包融及贺知章、张若虚都有名当时，号称“吴中四友”。其书法以草书名世，所书“狂草”逸势奇状，潇洒豪放，连绵回绕，别具一格。人们尊为“草圣”。张旭嗜酒，常于大醉后呼叫狂走而后落笔，甚至以头发濡墨而书。酒醒后，自己都认为是神来之笔，不可能再写出第二幅，世称“张颠”。文宗时诏以李白诗歌、斐旻剑舞与张旭草书为“三绝”。

杨惠之，唐开元天宝年间(712～755)雕塑家。先学画，与吴道子同师张僧繇笔法，后专攻雕塑，成为天下第一雕塑手，与“画圣”吴道子齐名。时有“道子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之说。其塑像能抓住人物的外形与神情特征，生动传神，对后世塑像艺术影响甚大，被尊为“塑圣”。昆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吴县甪直保寺圣罗汉像相传出自其手。

沈既济(约750~约800)，唐代苏州吴县人。文学家。通经史，又善作小说，撰有《建中实录》10卷及传奇小说《枕中记》、《任氏传》等。其传奇小说上承六朝志怪余风，下开宋元话本先河，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一枕黄粱”、“黄粱梦”等典故，都源出于《枕中记》。《新唐书》有传。见《吴郡志》卷22。

韦应物(737~约791)，唐代著名诗人，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一说洛阳人。贞元四年(788)秋，由左司马郎中任苏州刺史。在任3年，清正勤政，又能宾礼儒士，顾况、刘长卿、邱丹、秦系、皎然之辈，与之酬唱。其性高洁，以清德为唐人所重，号称“韦苏州”。其诗以写田园风物著名，语言简淡，得建安风韵。著有《韦苏州集》。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宝历元年五月任苏州刺史，翌年九月因病离任。任苏州刺史时，勤政除弊，主持修筑苏州虎丘山塘河堤，使人“免于病涉，亦可以障流潦”。后人纪念他，与

西湖之堤同称之为“白堤”。他离任苏州时，百姓啼哭相送。刘禹锡赠诗云：“姑苏十万户，皆作婴儿啼。”白居易文章精切，最长于诗，多至数千篇，在苏州时也有歌颂姑苏山水和友人酬唱的诗歌。

陆龟蒙(？~876)，字鲁望，唐代长洲县人。隐居甫里(今吴中区甪直镇)，自号江湖散人、甫里先生，又号天随子。不喜与流俗交，虽造门不肯见。他生活清贫，一面亲自下田耕作，一面读书论撰不辍，史称“乐闻人学，讲论不倦”。他擅长诗文，与皮日休友善，互相唱和，同负盛名，人称“皮陆”。所作诗多写闲适隐居生活，写景咏物为多。所著《耒耜经》，是研究农业生产工具的重要文献。

宋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景祐元年(1034)知苏州时，大水成灾，他主持疏浚白茆等五河，导太湖水入江、海，解除了水患，保障了农业生产。他在苏州还创设郡学，成为苏州有学之始。范仲淹工诗词散文，善书法。文章阐述其政治主张，词多写塞上风光，风格较为明健。其《岳阳楼记》中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凝聚了范仲淹毕生心志，成为激励后代志士仁人思想情操的著名格言。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延安人，南宋名将。建炎三年，宋高宗至钱塘，苗傅、刘正彦反叛，韩世忠于平江(今苏州)出兵讨伐。他多次上疏，反对秦桧主和。岳飞冤狱，举朝无人敢出一语，世忠独面诘秦桧，触其怒。韩世忠提兵过平江，曾以沧浪亭为府第。死后追封通义郡王，赐葬吴县木渎灵岩山。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宋孝宗御书“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赵雄奉敕撰写碑文，全文 1.3 万余字。其碑作之高，碑文之长为世所少有。墓南建祠，灵岩山亦被赐为韩氏家山。其墓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吴县市穹窿山仍保留有韩世忠手迹摩崖石刻等古迹。《宋史》有传。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一作致能)，号北山居士，晚号石湖居士，著名诗人。乾道六年(1170)，以起居郎假资政殿学士名义

出使金，不畏强暴，敢与金主力争国权，终于不辱使命，全节而归，受到当时南宋朝野的称颂。晚年退居故里，在石湖筑“石湖草堂”。范成大工诗，与杨万里、陆游、尤袤齐名，合称“南宋四家”。其《田园四时杂兴》诗60首，描写农村风光和民生疾苦，尤为突出。他撰写的《吴郡志》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苏州地方志乘。

明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槎轩，长洲县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今属吴中区甪直），自号青丘子。与杨基、张羽、徐贲同以诗名，称“吴中四杰”。洪武五年（1372），苏州知府魏观以张士诚府重修府治，被谗受诛，高启曾为之作“上梁文”，而被腰斩于南京，年仅39岁。其诗作爽朗清逸，部分作品对民生疾苦有所反映。

况钟（1383~1443），字伯律，号龙岗，别号如愚。江西靖安县人。宣德五年（1430）七月出任苏州知府。在巡抚周忱的支持和协助下，锐意改革，整顿吏治，削减高额田赋，减轻人民负担，兴修太湖水利，设置“济农仓”，清理历年积案，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教育，培养选拔人才等，苏州人民把他比作“青天”。况钟因丁忧、考满，三次离任时，苏州府先后有十三万五千余名群众联名上书，请求夺情起复和留任。明正统七年（1422）十二月卒于任上，享年60岁。“郡民罢市，如哭私亲，七邑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邻郡苏、松、常、嘉、湖之民，赴吊者络绎弗绝。”

蒯祥（1398~1481），字廷瑞，杰出的建筑大师，北京明故宫设计者。吴县香山（今属胥口）人。出身木匠世家。父蒯福“能大营缮，永乐中为木工首”。永乐十五年（1417），蒯祥参加北京宫殿的设计和建筑，被任命为“营缮所丞”。正统年间（1436～1449）负责重建皇宫三大殿及文武诸司。天顺末年（1464），又主持规划建造裕陵。精尺度，擅长榫卯技术，被誉为“蒯鲁班”。

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字元玉，号天全，晚称天全翁。明代大臣、文学家、书法家，吴县人。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主张朝廷南迁。景泰八年（1457）正月，他与石亨、曹吉祥等人，乘景帝

有病迎上皇英宗复位，史称“夺门之变”。徐有贞其人矮小精悍，多智谋，喜功名，于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谙究。晚年放情弦管、泉石之间，好作长短句。擅书法，草书奇逸，骨力嶙峋，风神潇洒；登山临水，酾酒悲歌，笔墨淋漓，风流雅儒，士林推为领袖。《明史》有传。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书法家，长洲县(今苏州)人。少时勤奋好学，“好古力学，至老不倦”。善诗文，为当时文章领袖；擅绘画，尤长书法。平生学宗苏轼，书法亦酷似东坡。好藏书，且多亲手抄录。故居在苏州城区乐桥西尚书里。其待人宽厚，讲人情，重友谊，常慷慨解囊救人之困。卒于任，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晚号白石翁，著名书画家、诗人，“吴门画派”创始人。长洲相城人。擅画山水，初得法于父沈恒吉、伯父沈贞吉，兼师杜琼、赵同鲁；后学宋元，于董源、巨然、黄公望、吴镇、王蒙尤有心得，并能融会变化，自成风格。与其学生文徵明及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居其首。书法学黄庭坚，诗学白居易、苏轼、陆游。其诗、书、画，被时人视作“神品”，称之为“三绝”。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著名书画家。少与张灵相善，学画于周臣；后结交沈周、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等，切磋文艺。29岁中乡试第一，次年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入狱。后游历名山大川，致力绘画，卖画为生。生性不羁，常用“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印。后皈心佛教，自号“六如”。擅画山水，多取法南宋李唐、刘松年，兼学元人。工画人物、花鸟，与沈周、文徵明、仇英齐名画苑，被称作“明四家”。又善书法，和沈周、文徵明、祝允明、王宠同为明代中期的中兴书法家。诗初多秾丽，中年学刘禹锡、白居易，晚年不拘成格，与文徵明、祝允明、徐祯卿誉为“吴门四才子”。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号守溪，晚年又号拙叟。文学家，吴县东山陆巷人。明成化十年(1474)乡试、明年会试均第一，廷试第

三名，授翰林院编修。王鏊秉性耿介，与宦官刘瑾势力斗争，与大学士李东扬力救被刘瑾加害几死的崔璿、姚祥、张玮、韩文、刘健、谢迁、杨一清、刘大夏等官员，得以免死。但终因刘瑾专横，祸流缙绅，自己力薄不能救，遂力求告归。辞官返里后，拙居东山14年。其间廷臣交相荐举，终不再出。著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纪闻》、《震泽编》、《守溪文集》等。嘉靖三年(1524)卒于家乡。墓表坊上镌有唐寅书"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对联。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自号枝山、枝指生，长洲县(今苏州)人。著名书法家。5岁能书径尺字，9岁能诗。稍长，博览群书，诗文有奇气，当众疾书，思若涌泉。青年时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等交游，世称"吴中四才子"。工书法，擅真、行、草、章；尤长草书，名动海内。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天下书法归吾吴，而京兆允明为最。"有"明代草书第一人"之誉。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著名书法家，长洲(今苏州)人。少时学文于吴宽，学书法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并常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相切磋。工行、草书，有智永笔意，大字仿黄庭坚，尤精小楷，推为第一，亦能隶书。擅画山水，师法宋元，多写江南湖山庭园和文人悠闲生活，构图平稳，笔墨苍润秀雅。早年所作多细谨，中年较粗放，晚年粗细兼备。亦善花卉、兰竹、人物。亦能诗，宗白居易、苏轼。以诗、书、画"三绝"兼擅，驰誉艺苑，名满天下。沈周、唐寅死后，推为吴门画坛领袖。

魏良辅(1502~1583)，字上泉、尚泉，太仓州人，昆曲"水磨腔"创始人。他早年习北曲，经过十年潜心研究，在原来流行吴中的南曲声腔基础上，研制成既保留南曲纡徐回环的特点，又兼收北曲雄健刚劲风格的新昆山腔，被后人誉为昆曲的"鼻祖"、"曲圣"。

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吴县人(《明史》作长洲人)。从小过继于徐姓舅家，从徐姓。嘉靖四十一年(1562)中状元，继张居正、张四维后，成为朝廷首辅，"状元宰相"。其为官尚清正，老练稳重，熟谙政术。为相后，政务宽大，赢得一片

赞誉，人称“太平宰相”。其墓在苏州上方山，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明史》有传。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别署龙子犹、顾曲散人、墨憨斋主人等，著名文学家、戏曲家。长洲县(今苏州)人。少有才气，惜怀才不遇。冯梦龙才情跌宕，诗文丽藻，尤明经学。辑有话本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世称“三言”。还编有民歌集《挂枝儿》、《山歌》，散曲集《太霞新奏》，笔记《古今谭概》等，并改写小说《平妖传》、《新列国志》。戏曲创作有传奇剧本《双雄记》。曾修改汤显祖、李玉、袁于令等人作品多种，合称《墨憨斋定本传奇》。另外还著有《春秋衡库》、《春秋指月》、《别本春秋大全》、《智囊》、《智囊补》、《七乐斋集》、《情史》、《笑府》等上百卷。兄梦桂、弟梦熊皆有名，称“吴下三冯”。

文震孟(1574~1636)，字文起，号湘南(一说初名从鼎，字定之)，别号湛持，文徵明曾孙。明末东林党领袖。文震孟博通经史，尤长《春秋》。天启二年(1622)状元，崇祯八年(1635)七月，成为宰相。其性格梗直，品行端庄，以直言多次逆忤权臣，当副宰相仅两个月，便辞官还乡，半岁而卒。其故宅在今苏州市文衙弄5号，园名“药甫”，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明史》有传。

文震亨(1585~1645)，字启美，长洲人。造园艺术家。文徵明之曾孙。其造园专著《长物志》12卷，阐发了独特的造园理论，认为园林必须内外配合，融合直接和间接的各种有关要素，方能形成综合之美。

李玉(1591~1671，一说1596~1676)，字玄玉，一作元玉，号苏门啸侣，又号一笠庵主人。吴县人。明末清初著名戏曲作家，为“吴县派”戏曲作家领袖。明亡后，专事剧本创作。与毕魏、朱素臣、张大复等相友善，研究曲调，从事戏剧创作，形成“吴县派”。作有传奇40余种，今存《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麒麟阁》等18种，剧作为戏班所争演。又编订《北词广正谱》，是研究北曲曲律的重要著作。

金圣叹(1608~1661),本姓张,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明末清初长洲(今苏州)人。明诸生。颖敏绝世,奇才横溢,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生性不羁。好饮酒。能文善诗,绝意仕进。善衡文评书,议论发前人所未发。曾以《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与《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并对后两种进行批改。他将《水浒》七十回以后的情节全部删除,并续上他写的"梁山泊英雄惊噩梦"作为全书的结局。清顺治十八年(1661),金圣叹与一些秀才于顺治皇帝治丧期间,控告县官贪污仓粮,酷刑逼税杖毙乡民的罪行,遭巡抚朱国治镇压,逮捕诸生5人。金圣叹等又与一批群众哭于文庙,以示抗议,朱国治以大不敬罪逮捕金圣叹等13人,是为"哭庙案"。

清

毛晋(1599~1659),字子晋,号潜在,常熟人,著名出版家、藏书家。毛氏汲古阁前后收藏书籍8400余册,并聘请各方名士精心校勘出版。40多年时间里,毛晋共刻书600多种,为中国古代出版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流传下来的毛刻本,至今为学者珍视。

孙云球,字文玉,号泗滨。原籍吴江,迁居长洲。明末清初光学家。他除了研制出近视镜、老花镜外,还制成了显微镜等光学仪器,留给后人《镜史》1卷,对后世光学仪器和眼镜的制造技术的发展有独特的贡献。

叶桂(1667~1746),字天士,号香岩,晚号上津老人,吴县人。著名医学家,中国温病学说主要创始人、奠基者。世居苏州阊门外下塘上津桥,世代业医。叶桂继承家学而博采众长,自成一家。著《温热论》,倡温病卫、气、营、血的辨证和治疗方法,为温病学说奠定了基础。其临床处方精简,用药配伍有独到见解。尤擅治奇经、脾、儿科等病,曾有"天医星"之誉。与薛生白、缪遵义合称"吴中三名医"。

毛宗岗,康熙年间长洲县人,字序始,号子庵,清初小说评点家(批评家)。其父毛纶,字德音,晚更号声山,有文才,曾评论过《琵琶记》、《三国演义》,称《琵琶记》为"第七才子书"。毛纶晚年双目失

明,毛宗岗继承父业,评刻《三国演义》。毛氏父子对罗贯中原本重新加以修订,整顿四月,修订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使之更加紧凑畅达,成为至今流传的 120 回本,为小说流传及价值的揭示作出了贡献。

王周士,元和人,清评弹艺人,善说《白蛇传》、《游龙传》。乾隆南巡时,奉召至御前弹唱,赐以七晶小京官之冠,并随驾回京。在南府中供奉,以说书游公卿大夫间,名著京华。病乞归乡后,在苏州创建光裕公所(后称光裕社)。

惠栋(1679~1758),字定宇,号松崖,人称"小红豆先生",著名经学家。原籍吴县东渚,后迁居苏州城区元和县境,故又作元和(今苏州市)人。祖父惠周惕,本名恕,字元龙,故居在东渚砚溪,故自号砚溪。后徙苏州葑门冷香溪侧,宅有红豆树,故又号红豆老人。父惠士奇(1671~1741),字仲儒,一字天牧,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惠栋传祖、父之学,搜集汉儒经说,加以编辑考订,评赡博识,集"吴派"经学之大成,为"吴派"经学的奠基者与领袖。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著名诗人、诗歌批评家。长洲县(今苏州市)人。初学诗于吴江叶燮。中年以前授徒为生,并以诗名。曾筑屋居木渎山塘街,著书作述,后归居苏州城区。曾为乾隆帝校《御制诗集》,深受赏识,称为"江南老名士"。其论诗主"格调说",拘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少数篇章也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其诗学深邃,曾选编《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辨析源流,指出名家得失,为研究古代诗歌发展的重要著作。

薛雪(1681~1770),字生白,号一瓢,晚号牧牛老叟,著名医学家。吴县人。早年学诗于吴江叶燮,博学多才,不求闻达。善诗,工画。尤精于医,长于温病,与叶天士齐名,为温病大家。临诊多奇验,治学不拘成说。其《湿热论》系探索研究湿热病之力作,条分缕析,深切详明,与叶天士《温热论》齐名,堪称阐发湿热、温热病的姊妹篇。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又号愙斋,清末学者,书画家、金石学家、古文学学家。吴县人。善书画,工篆书,精于金石学与古文字学。著《古籀补》、《古玉图考》、《字说》、《权衡度量实验考》、《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愙斋诗文集》等。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后寓居苏州。著名学者。以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古文经学,诸子学见长。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校正误文,发明古义,为士林所推重。又擅长诗词,旁及小说、戏曲;亦工书法,尤长篆隶。其书张继《枫桥夜泊》诗碑,为其86岁病逝前4月所书,雄浑刚健,被奉为翰墨之宝。

沈寿(1874~1921),女,初名云芝,字雪君,后名寿,晚署雪宦。杰出的苏绣艺术大师。同治十三年八月十三日(1974.9.23)生于苏州。自幼受家庭熏陶,学刺绣。8岁绣制"鹦鹉图"即显露了她的艺术才智,得到亲友们的称赞。光绪十九年与余觉结婚。余能诗善画,夫妻画绣相辅。沈精心绣事,创造出近10种新的针法。其绣品押印题识,署"天香阁"三字,为士大夫争相购藏。宣统二年(1910)绣制的《意大利王后爱丽娜像》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获一等奖。民国4年,沈寿借鉴油画稿所绣的《耶稣像》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一等大奖。

顾颉刚(1893~1980),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著名历史学家。吴县(苏州)人。早年就读于长元吴高等小学堂,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民国9年(1920)毕业于北京大学。20年代,他提出了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编纂出版了《古史辨》,轰动了整个史学界。先后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为整理出版这两部中华民族的历史巨著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圣陶(1894~1988),名绍钧,字圣陶,著名教育家、作家、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毕业于草桥中学,先后在苏州干将坊吉子小学、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编辑,出版有童话集《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鸟语兽言》,短篇

小说集《膈膜》、《水灾》、《线下》、《城中》、《未厌集》、《圣陶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倪焕之》，散文小说集《脚步集》、《未厌居习作》、《四三集》、《邻居》等，以及《十三经索引》，与夏丏尊合著《文心》、《文章例话》等。

颜文樑(1893~1988)，字栋臣，吴县(苏州)人。著名美术教育家、油画家。自小随父学画，曾任振华女中、吴江中学、太仓省立四中、苏州第二女师、苏州第一师范图画教员。民国11年与胡粹中、朱士杰等人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任校长。后赴法国，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留学。回国，仍任美专校长，并兼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代主任，浙江之江大学、上海幼稚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一生为弘扬中华文化，开创美术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原载《苏州名片》，王少东、汪长根、刘文洪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07年5月版)

链接：《苏州历代名人小志》，苏简亚主编，百家出版社2005年8月版。
《吴县历史名人》，吴县宣传部、吴县政协文史委合编，1990年3月版。

苏州的宰相

宰相原本是掌握政权的大官的泛称，后来用以指辅佐皇帝、统领群僚、总揽政务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官职的称谓不是一成不变的，秦汉时期称丞相、相国、三公，唐宋时期之中书门下(简称中书)、尚书三省长官，即中书令、尚书令，明清时之大学士等，都俗称宰相。当然，由于任中书令者必须是在文学上很有声望，非有特殊资望者难获此职，因此中书侍郎(中书令之副职)实际上就是中书门下之长官，唐中宗以后没有加"同平章事"称号的，仍不是宰相。三省长官唐初称左右仆射，多数时候称尚书。由于级别较低，故

须加上“参掌机事”、“参预朝政”、“参知政事”等头衔表示行使宰相职权。大学士实际上是皇帝的顾问，参预机务者称为内阁，入阁大学士号称“辅臣”，首席辅臣就是宰相。宰相本身并无独立的权力，不管当时的地位有多高，仍然是君主的头号奴仆。其最主要的职权就是参预机密，参加诏令的起草、审议和传达。相公本来是对宰相的敬称，不知怎么搞的，后来宰相没了这个专利，成了一般官吏的泛称。再到后来，妇女对丈夫、一般人对读书人，甚至对普通男子的敬称都可用相公。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一些反映古代生活的评弹、昆曲等戏曲形式中加以证实。

苏州的状元堪称土产，综观 2500 多年历史，苏州的宰相也不在少数。历史上第一个位及相位的当推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他虽然是楚人，但投奔吴国公子光(即后来的吴王阖闾)后，辅佐吴王治国强 兵，西慑楚国，南败越国，使吴国有实力逐鹿中原，与晋争霸，称得上是位良相。与之相反，另一位叫伯嚭的人，尽管他也官至相位太宰，可他害死了伍子胥，又使吴国由盛转衰，最后亡国。战国四公子之一的黄歇，在楚考烈王时被拜楚相令尹，封于淮北，号春申君。公元前 248 年改封江东，即吴地。他为相 25 年，治水利民，礼贤下士，门下有食客三千，死后被吴地百姓供为城隍老爷。除了在苏州府城隍庙供奉外，还在王洗马巷建造了他的专祠春申君庙，至今尚存。苏州齐门西北三十余里有一个叫黄埭的镇，据说就是因春申君筑堤堰水而得名。上海简称“申”，吴淞之浦曰“黄浦江”，也因之而来。但是伍子胥、春申君都仅仅是诸侯国王之相，且均非货真价实的苏州人。

三国时期，苏州倒有几位土生土长的宰相。顾雍(168~243)在孙吴为相 19 年，他“为人不饮酒，寡言语”，时称“顾君不言，言必有中”。代孙邵为丞相后，“其所选用文武将吏，各随能所任”(见民国《吴县志》卷六十五)，可谓是知人善任的贤相。赤乌七年代顾雍为相的是陆逊(183~245)，他的口碑也不差，时谓“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逊实兼之”(见《吴郡志》卷二十)。朱据(194~250)，字

子范，也是吴郡吴县人。他相貌堂堂，有膂力，口才也很好，是位文武兼备的人才。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迁都建邺(今南京)，封据为云阳侯，召为驸马。显贵后，他仍谦虚谨慎，礼待士人。赤乌九年升为骠骑将军，赤乌十二年四月，继步骘之后拜为丞相。后因向孙权苦谏不能随意废太子孙和而罢去相职，贬为新都郡丞。中书令孙弘又在孙权面前进谗言，并假传"圣旨"，派人追上朱据，逼迫他自杀于途中。陆逊之族孙陆凯(198~269)，也是吴国贤相之一，在末帝孙皓宝鼎元年为左丞相。《吴郡志》称他"虽统兵众，手不释卷"，原本就是位好学之士。为左相后，不惜忤逆右相，乃至末帝"乃心公家，义形于色"，直至病重之际，仍不望上表，苦谏末帝勤政爱民，信用忠良，疏远奸佞。但他们都只是三分天下时的宰相。

东晋时期，出身名门的陆玩(278~341)，字士瑶，是成帝、明帝时大臣陆晔之弟。因平定苏峻叛乱有功，被封兴平伯、卫将军、开府仪司同三司，后又升为尚书令。公元340年，升任司空、侍中。他为人通达文雅，不以名位论人，好提携后进。为相后，所聘用的都是一贯品行端正的寒族之士，颇得时人好评。

南朝梁代，吴郡也出过一位宰相张稷(449~511)。他为人坦率开朗，聪明而有才干，年轻时，就与堂兄张充、张融、张卷一起知名于乡里，时人号为"四张"。萧衍建立梁朝后，他被拜为侍中、国子监祭酒、护军将军，封江安县侯。历任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吴兴太守等职。在吴兴任上，他施行仁政，颇有政绩。公元508年升任尚书左仆射离开吴兴时，路上挤满了送行的百姓。他为官清廉，家无余财，起程时只带了简单的行装，走在人群中，丝毫看不出是位赴任的宰相。

隋朝有位宰相杨素，他虽然是华阴人，却与苏州有很大关系。开皇八年(588)，他率军大败陈军，被封为越国公。两个月后被拜为尚书右仆射，与高某共掌朝政。次年灭陈，正式改吴州(即原陈所辖)为苏州，这是苏州正式被用于行政名称之始。由于苏州曾被围困，杨素认为原郡城非设险之地，因而在开皇十一年迁于横山之

下，至今这里还称新郭。这是苏州自伍子胥相土尝水建城以来唯一一次迁址。到了唐武则天武德七年(624)，就迁回原址。

唐朝陆元方可算是名副其实为相的第一个苏州人（前此都只能称吴郡或吴县人）。他的祖父陆琛是陈给事中黄门侍郎，伯父陆柬之是著名的书法家。陆元方是在武则天长寿二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后因李昭德获罪，而元方曾附会，被贬为绥州刺史。不久，复为春官侍郎，又转天官侍郎尚书左丞，再拜鸾台侍郎平章事。元方在官清谨，两为宰相，“则天将有迁除，每先以访之”。可谓宠爱有加。其子陆象先原名景初，睿宗皇帝曾对他说：“子能绍先德，是谓象贤者。”于是，赐名象先。他举制科高第，累授中书侍郎，景云元年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知政事。他恬静寡欲，识论高简，为时所推。太平公主用事时，他不像同时宰相萧至忠、岑羲等人那样一味附和，因而，先天二年至忠等伏诛，象先独免其难，深得唐玄宗赏识，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夸奖。死后还被赠封为尚书左丞相(《唐书》作右丞相)。陆象先的后母弟陆景融的四世孙陆希声，唐昭宗时召为宰相。他“博学善属文”，论著甚多。后因“在位无所轻重，以太子少师罢”。(《新唐书》)唐朝还有三位姓陆的宰相，一位是 18 岁中进士的陆贽(754~805)。他出身官宦家庭，贞元八年(792)四月，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吴郡志》称“虽外有宰相主大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惜德宗昏庸，许多治国方略未被采纳，不到三年就被罢相。他死后葬在忠州，归葬地在苏州齐门外六里，这就是陆墓镇名字的由来，改为陆慕是没文化的体现。现在该镇已与蠡口合成元和镇，继而又改为元和街道，成为相城区的治所。第二位是陆贽的族孙陆扆，字祥文，本名允迪。他“文思敏速，初无思虑，挥翰如飞，文理俱惬”(《旧唐书》)。景福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八月，加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九月，因忤上意而责授硖州刺史。五年正月，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光化三年四月，兼户部尚书，进封吴郡开国公。九月，转门下侍郎监修国史。

后又因得罪崔胤而贬官削阶，不久，复授吏部尚书，阶封如故。天复元年秋，昭宗遇弑。次年五月，陆扆被害于滑州，终年59。他是位遭遇坎坷的宰相。从小聪慧，“吴人号神童”的杨收，字藏之，世居冯翊，自言是隋越国公素的后裔。其父遘直在德宗时，“以上书阙下仕为濠州录事参军，客死姑苏”。当时，杨收年仅7岁，由母亲长孙氏亲授十三经。因家里穷，自幼不食肉，母亲信佛吃斋，与他约定“尔得进士第乃可食”。杨收非常争气，非但考取了进士，而且在懿宗时，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政凡五年。杨收之兄发，字至之，较收早登进士第，曾为苏州刺史；杨收之弟严，字凛之，亦举进士。杨严之子涉，昭宗时官至吏部侍郎，哀帝时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人端重，有礼法。

北宋丁谓(962~1033)，“少与孙何善，袖文谒王禹偁”，王大惊之，“以为自唐韩愈、柳宗元后二百年，始有此作”。淳化三年中进士，大中祥符五年参知政事。九年请外为平江军节度使，知升州。天禧初，复参政，代寇准拜中书门下平章事，加司空晋国公。他机敏有智谋，记忆力极强，千百字的文章过目能诵。可是丁的人品不为人称道，他狡诈过人，善耍手段，玩阴谋，到头来落得个客死光州(今河南潢川)的下场。不过，他也曾为乡里请免丁钱，在苏州临顿路、阊门外都有住宅，还留下两处叫丁家巷的地名。与他相反，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和文学家范仲淹(989~1052)，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激励了历代仁人志士奋斗不息，至今犹是人们操守自励的一面镜子。苏州范庄前、天平山的范坟都是范氏遗迹。范仲淹之次子范纯仁(1027~1101)，也于元祐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吕大防、吕公著同掌朝政，是北宋哲宗时的良相。他任相期间，以宽厚待人著称，认为新法不能一下子废除，主张对变法派从宽发落，并屡次进谏垂帘听政的宣仁太后，以致被误认为是前宰相蔡确的同党而罢相，出知颍昌府。可喜的是，在四年以后又重登相位，辅佐亲政的哲宗。绍圣元年(1094)四月，范纯仁辞去了相位，再次出知颍

昌府。后因为遭贬的吕大防求情，屡次贬迁。有趣的是，徽宗即位，又想拜他为相，当时离他第二次离开相位也是四年，终因生病且双目失明而改拜观文殿大学士。范纯仁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家，他人朝事君，待人接物，亲睦宗族，都以“忠恕”二字为准绳。他在熟睡中逝世后，徽宗为之亲书“世济忠直之碑”。章惇(1035~1105)，官至尚书左仆射，元丰三年(1080)参知政事。他为相后对举荐他的范纯仁以怨报德，恢复新法，主张对西夏实行强硬态度，后因徽宗起用守旧派而失势。历史上对章惇褒贬不一，《宋史》将他列入奸臣传，也有人认为应将他列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

南宋范成大，字至能，吴县人，登绍兴二十四年进士第。一般人都只知道他是一位诗人，他的《四时田园杂兴诗》很有名。其实，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隆兴年间，出使金国，有理有节，不辱使命。《石湖志》称“上由是知其忠，劲有大用意”。除中书舍人，淳熙五年，迁中大夫。参知政事两月，为言者所论，以资政殿学士知婺州，后又知明州、建康、留州、太平州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兴利除害，不顾难易，去思遗爱，所在歌舞之”(同上)。可见，范成大尽管只当了两个月的副宰相，在他地方官任上却颇有政绩。还有一位宰相虽然不是苏州人，却不能不说，那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3)。南宋末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担任兵部尚书，不但到过苏州(时称平江)，而且还任平江知府，驻守苏州。明正德十年，苏州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在阊门内建了一座忠烈祠(文天祥死后谥号忠烈)。因文天祥号文山，俗称文文山祠或文丞相祠，祠所在的小巷称文丞相弄。明嘉靖二十年文丞相祠移到旧学前，原址便改为文山寺，今天已是苏州一处尼姑庵。

明代与苏州有关的第一位宰相应该是徐达(1332~1385)。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拜徐达为左相国，他率20万大军为朱元璋消灭了占据苏州的割据势力张士诚。1368年，朱元璋称帝，又拜徐达为右丞相。徐达严明军纪，禁止部下滥杀无辜和抢掠。在攻打平江前，他再次申明“抢掠民财者死，毁百姓民房者死，离营20里者死”。部

队入城后,秋毫无犯,吴郡百姓无不额手称颂。

真正的苏州(吴县)宰相是徐有贞(1407~1472),初名珵,字元玉,号天全,宣德八年进士。他身材矮小,热衷功名,知识广博,因建议代宗南迁坏了名声,多年未得升迁。于天顺元年(1457)正月,乘代宗病重,密谋迎英宗复辟,被拜为学士,入内阁参与机务,加兵部尚书。此人心术不正,为独掌大权,诬杀了于谦、王文。后在权力倾轧中失势,削职为民。常熟严讷(1511~1584),嘉靖二十年进士,后历任太常少卿、礼部左、右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嘉靖四十四年,兼任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成为宰辅,并兼管铨政。他整顿吏治,禁止请托,一改严嵩多年弄权后铨选制度的混乱状况,是明世宗时的贤相。他因病辞相回乡后,悉心侍奉父母,被乡人称为孝子。据《吴门表隐》记载,严讷曾因冒试吴县,遭到众人的围殴,为相后,他特意在吴县直街被殴处建大学士坊以记旧忿。正德年间,吴县东山出了一位宰相王鏊,他死后葬在东山陆巷,牌坊上有唐伯虎的手迹"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在苏州城西阊胥二门之间古药市街西城桥西有一处房子"怡老园"(今苏州市平江学校一带),便是王鏊儿子为他造的养老之所。因他官至吏部尚书,吏部古称天官,其身份又是大学士,房子附近便有了学士街、天官坊、王衙弄等地名。景德路黄鹂坊桥东还有一座王鏊祠,曾长期被用作工艺美术品供销仓库。1980 年全面整修,即今景德路苏绣博物馆处。明万历朝,苏州又出了一位叫申时行的状元宰相(嘉靖状元,官至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晚年辞官回苏州定居。他凭借着一部戏曲评弹《玉蜻蜓》(主角叫申贵升)而家喻户晓。他在苏州的宅第不止一处,《吴门表隐》说有 8 处,分别题名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今景德路黄鹂坊桥到中街路有 4 处,连成一片,这段路原称申衙前,百花巷也有 4 处大宅。庭前都有白皮松,皆用青石阶。西宅有御书"同心匡辟"和御赐大鼓(原严嵩故物),并有东西跨街牌坊,东曰"台衡盛世",西曰"师柱清朝"。其住处赐闲堂在慕家花园。山塘、星桥、冶坊浜有三处米栈。娄门大学士坊、清嘉坊的状元坊、胥

门皇华亭的状元宰辅坊、雍熙寺桥西的荣光奕世坊都是因他而立的。今马医科小学曾是申家祠堂，古吴路上至今仍有一条叫申庄前的巷。其墓在横塘周家桥村西，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长洲文徵明的曾孙文震孟是天启二年的状元，崇祯朝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副宰相)。入阁预政不满3月，便因与首辅不协落职。其故居就是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艺圃，当时称为药圃。明朝末年，吴江也出了个宰相周道登。天启五年秋任礼部尚书，因不肯阿谀魏忠贤而辞官归里，被削职为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天启七年冬天，熹宗金瓶抽签定内阁重称，他被抽中，官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行宰相实权，号称辅臣)。此人虽系进士出身(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却“无学术，奏对鄙浅，传以为笑”(《明史》)。而且在家中广蓄姬妓，其中有一位叫杨爱的小妾，被大妇赶出家门，流落娼门，改名柳如是，成为一代名妓。而身为崇祯朝17年中51位相官之一的周道登，反倒没她的名头响。昆山在明代出了两位宰相：一位是人称顾大麻子的顾鼎臣(1473~1540)，弘治十八年一甲一名状元，嘉靖十七年以礼部尚书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是最末一位宰辅。他生性柔弱，好谄媚，无实权，但他家乡昆山原本没城墙，经他建议修筑了围城，使百姓免受倭寇之祸；另一位是阿附魏忠贤，不齿于苏州人之口的顾秉谦。太仓在明清两代也有一族娄东王氏，声势显赫，“两世鼎甲”、“祖孙宰相”。王锡爵(1534~1610)，嘉靖榜眼，万历二十一年拜为首辅。在他为相期间，曾奏准停止江南织造和江西陶器，减云南贡金，出内库钱粮赈济河南饥民。其墓原在虎丘乡新庄村凤凰墩，地广200亩，1957年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1966年遭破坏。其子王衡(1561~1609)是万历二十九年榜眼。其曾孙王掞，康熙九年进士，累官工、兵、礼诸部务，总纪纲，持大体。康熙五十一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直经筵，也官至宰辅。

南明鲁王时宰相张国维(1595~1646)，浙江东阳人。他为人宽厚，颇得士大夫好评。尽管他不是苏州人，但他曾为苏州建成九里

长的石塘、平望内外塘和长洲至和塘。他抗清失败后赴水死，体现了他对明朝的忠心。苏州人民也没有忘记他，于山塘街绿水桥畔建张公祠纪念，祠前有“泽被东南”四立柱石坊。1909 年 11 月 13 日，柳亚子、陈去病等人成立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首次雅集就选在这里，既体现了对他敬意，又以此表明“反清”的寓意。另一位南明贤相是桂王时的瞿式耜(1590~1650)，常熟人。他是我国早期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驱之一，在城破被俘后为清兵所杀。

清朝顺治年间，有一位叫范文程(1597~1666)的当上了宰相。尽管他已经落籍江西，但是，他祖籍江苏，是宋代名相范仲淹的第十七代孙。长洲人宋德宜(1626~1687)是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二十三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官至宰辅。他为官清廉、谨慎，简任机务，敢于直谏，深得康熙垂爱，是清朝贤相之一。苏州葑门彭家：彭定求和孙儿彭启丰都是“会状”，祖父官做得不大，学问很高，是《全唐诗》的总纂，孙儿则是状元兼宰相。启丰的曾孙彭蕴章虽不是状元，却是道光朝的宰相。潘家：潘世恩是状元宰相(乾隆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其故居在临顿路钮家巷。其孙子潘祖荫虽非状元，却是探花兼宰相(官至工部尚书)，故居竹山堂在平江路南石子街。他收藏的大盂鼎、大克鼎，由其后人捐给国家，如今藏于上海博物馆。潘家祖孙都是帝师。吴江出了两位宰相，一位叫金之俊(1593~1670)，八都曹村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1644 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他便投降。多尔衮率清军进至京城郊外时，他又最先出城投降。清顺治十五年，官至中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他背明降清的行为，受到江南士人的唾弃。在他回乡后，曾有人在其宅门上贴了一副挖苦的对联：“仕明仕闯仕清三朝之俊杰，纵子纵孙纵仆一代岂凡人”(“岂凡”是金之俊的字)。另一位叫沈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同里人，光绪元年官至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从政 30 年，经历 4 朝，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 6 次，乡试复试阅卷大臣 7 次，殿试读卷官、拔贡复试阅卷大臣各 2 次，深受朝廷宠爱。常熟出了 3 位宰相：蒋廷锡(1669~1732)，康熙四十二年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翁心

存是宰相，他的儿子翁同龢又是状元宰相，且都是两朝帝师；翁心存长子同书的儿子翁曾源又是状元，但不曾做官。“昆山三徐”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都是探花，徐元文（1634~1691）虽庸庸碌碌，却在康熙即位后屡经升迁。康熙二十八年拜为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成为宰相。苏州最后一位状元是同治十三年及第的陆润庠，他是唐陆贽的后裔，在京城呆了 30 多年，在宣统二年当上宰相，且长期作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其故居在苏州阊门内下塘街崇真宫桥东。

写苏州的宰相，不是笔者首创，早在 1994 年周劭先生就有同名文章发表在《苏州杂志》上。周先生自称其文“既非学术著作，更不是考据文章，只是随笔所至，聊供谈助”。因此除了谈宰相的“沿革变迁”外，真正谈到的仅仅是明清两代十来位宰相。笔者此次续貂，虽仍算不上考据文章，只是想通过这些从正史、地方志中寻觅出来的宰相（含副职），从一个侧面反映苏州的人文荟萃，通俗点讲，是想为苏州“扎点面子”。尽管有奸相有贤相，但这毕竟是历史的真实。

（原载《传统文化研究》第 11 辑，白山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版）

友情链接：李嘉球著《姑苏宰相》，2008 年《姑苏晚报》连载。

归乡舟载石 千秋赞陆绩

吴陆绩，字公纪，汉末庐江太守康之子。容貌雄壮，博学多识，该览历数。吴孙权辟为曹掾，以直道见惮。出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可越海，载石为重。姑苏陆氏之门，有巨石，号“郁林石”，世保其居。绩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太元》，皆传于世。豫知亡日，为辞以诀。自谓：“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勤读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罹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

卒年三十二。长子宏，会稽南郡都尉；次子睿，长水校尉。

——范成大《吴郡志》人物一

在苏州文庙有一块廉石，那石与三国时期吴郡陆绩有关。

陆绩(187~219)，字公纪，汉末庐江太守陆康之子。陆绩自幼聪明过人，知礼节，懂孝悌。6岁时，在九江拜见袁术，袁给了他几只桔子，陆绩舍不得全部吃完，将3只藏在怀里。临别告辞时，因躬身行礼，桔子掉落在地。袁术问："陆郎出来做客，怎么还藏桔子？"陆绩跪着道出原委："我想留3只给母亲尝尝。"袁术听罢，惊奇不已。从此，陆绩"怀桔遗亲"便传为佳话。后来，有人将此事编入《二十四孝》。

陆绩胸怀韬略，才智横溢，博学多识。最值得称道的是其为官清廉，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他在东吴为官时，就以敢于直谏著称，朝野官员皆"以直道见惮"。后来陆绩出任广西郁林(今梧州玉林一带)郡太守加偏将军。那里气候炎热，疫病流行。陆绩为改善当地百姓的饮水条件，减轻疫病传播，发动群众挖掘水井，被人们称为"陆公井"。陆绩没有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为官廉明清正，肃贪拒贿，从不接受下官一件礼物，也不索取任何当地特产，还将在任内所生女儿，取名"郁生"。

陆绩任满归吴之时，因行李太少，没有足够的财物可以压得住船，又怕船轻不避风浪，就在岸边随意搬了块石头，聊作压船之物。到了家乡，石头就弃之屋边，留作纪念，一时传为美谈。不久，陆绩舍宅建为宝光寺，此石留在寺内。后来寺废为民宅，石留民家，渐渐埋没土中。经历了1400年的风雨历程，到了明弘治年间，检察御史樊祉巡按吴中，听说了娄门内临顿里有块"汉陆公郁林石"的事情，对苏州知府史简说："先哲遗物，应该加以表识。而且还可以教化后人！如果将此石放在偏僻的城东，很难让官吏早晚看到，与埋没没有什么两样！吾将重新处置，让它发挥作用。"于是，让吴县知县鄘鄱、长洲县丞王伦派人将此石移到察院之侧，并建亭覆之加以保

护。樊君将此石正式命名为“廉石”,并在亭楣上题“汉郁林太守陆公”数字,还请吴宽写了一篇《廉石记》,记载此事。

到了清朝,裁撤了察院,察院署改为武弁官舍,亭子亦将废毁。康熙四十八年(1709),苏州知府陈鹏年修建府学文庙。陈公治苏“刚毅而能慈爱,尤以廉干称”,非常钦佩况钟,于是借机在郡学补建况公祠。因为况钟在明代是有名的廉吏,故将廉石移至祠前,希望府学生能以陆绩和况钟为榜样,将来科举获得功名后,能够勤廉爱民。并嘱李果写了篇《移郁林石记》,记录此事。

苏州的清官,包括来苏公务或任职的官员,他们来到富庶的江南,被苏州的人文环境影响,身体力行推崇和倡导清廉的为官之道;也有从苏州走出去到外地任职的官员,他们从“廉石”边的府学启程,踏上仕途,谨记教诲,不辱使命。千百年来,苏州的清官廉吏形成了“民本”思想、“务实”之道,实在也是历史文化名城的宝贵资源。

又 300 年过去了,那块来自广西郁林的“廉石”还在,其貌不扬,赭红砂砾岩石,高 2 米多,形似风帆,存于苏州文庙(仅在 1990 年迁移到文庙明伦堂前)。可它有别于一般的石头,因为它承载着一段人以石清,石以人重的佳话。

如今,“廉石”已经成为苏州的廉政品牌,时刻提醒着当代的公务员,要以先贤为榜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原载《廉石千秋——苏州清官廉吏史话》,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2 月出版)

链接:

儒学提举朱德润,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将就馆,祖母施夫人病亟,祖父秘书君卜窆阳抱山,欲穿圹以为藏。施夫人夜梦衣冠伟丈夫来告云:“勿夺吾宅,吾且为夫人孙。”明日,役者凿地深五尺许,得一石碑,刻曰“郁林太守陆君绩之墓”。别有石刻在傍,曰:“此石烂,人来换石。”果断矣。秘书君命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复梦伟衣冠者谢曰:“感夫人盛德,吾真得为夫人孙矣!”是夜德润

生,其子孙聚居昆山,至今为衣冠巨族。

(辑自嘉靖《昆山县志》卷13杂纪)

苏东坡与苏州两丘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曾说过“苏州有两丘,不到虎丘,即到闾丘”,又说“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因此,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在虎丘留下足迹,赋诗吟咏,为“吴中第一名胜”虎丘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非常留连苏州的山水人物,特别是对虎丘更是情有独钟。晚年寓吴,往来歇息于虎丘东南隅的一处房屋,明苏州太守胡缵宗在此旧址上重葺而成仰苏楼以示纪念。虎丘长老智通禅师与之相交甚笃,在密川时,苏公曾有《与智通长老书》称“近过苏台,不得一见而别,深为耿耿”。苏东坡也常与人在虎丘唱和,留下了《和刘孝叔会虎丘》、《和王忠玉游虎丘》等诗。剑池岩壁上的“铁华岩”和虎丘塔后面的“千顷云阁”,也都是后人以苏东坡《虎丘》诗中“铁华秀岩壁”和“云水丽千顷”诗句命名的。

苏东坡所说另一丘是指朝议大夫闾丘孝终。此公字公显,苏东坡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他任黄州太守。两人同在黄州为官,经常赋诗为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闾丘孝终辞官回苏,在家乡与一些名人耆艾成立九老会。苏东坡来苏必访,与之饮酒赋诗。闾丘孝终所居住的地方曾立有牌坊,人们便称之为闾丘坊。据史志记载,巷内原有梁妙严公主墓,清顺治进士顾予咸在闾丘坊建野园,后改称雅园。其子顾嗣协又在闾丘坊苍南筑依园,与金侃、潘谬、黄玠、金贲、蔡元翼、曹基等人相互酬唱,时称“依园七子”。嗣协弟顾嗣立(康熙进士,号称“酒帝”)在依园东建成秀野园,中有秀野草堂、大小雅堂、因树亭、野人舟、闾丘小圃等建筑,常聚宾朋酬唱,并在秀野园编选了著名的《元诗选》。此后,又有刑部员外郎蒋曰梁、

户部员外郎杨大琛先后居此。嘉庆中，金匮钱锋参军购得依园旧址，重建成息园。同治年间，袁学澜见该园瓦砾碍屐，亭圮池涸，墙壁上尚存苏东坡的过闾丘小圃饮酒诗和钱泳书钱祠碑（嘉庆间所建钱镠分祠）。至光绪年间此园已无人问津。北伐前后，园址面积尚有 8.6 亩。苏州电话局（其间几经改名）曾在闾丘坊薛家园 13 号长达半个多世纪。

如今，苏州虎丘依然是名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一年一度的金秋庙会更是虎丘的“保留节目”，以多姿多彩的娱乐性活动吸引八方来客，成为苏州旅游业的“龙头”和支柱，节假日的客流量更是人满为患。而曾被苏东坡誉为与虎丘齐名的闾丘氏故居闾丘坊却默默地隐藏于苏州的小巷深处，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原载《苏州政协》2003 年第二期）

范仲淹与苏州

一提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范仲淹。历史上苏州“学而优则仕”的人很多，一品当朝、显赫一时的也不在少数，可值得纪念的却并不多。范仲淹就是苏州百姓念念不忘的先贤之一。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宋代吴县人。他生于徐州，两岁丧父，随母亲谢氏改嫁山东淄州长山朱文翰，取名朱说，直到 23 岁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虽然不想与朱氏子同姓，但是怕母亲伤心，因此没有马上提起复姓之事。知道家世后，他更加发奋读书，终于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他以朱说之名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被任命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司理参军。踏上仕途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回苏州“迎其母归养”，欲还范姓。族人以为他要来争范氏家产，便想出种种理由加以拒绝。范仲淹察知个中缘由后说，我“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有了这样的承诺，族里才允许他归姓。

至天禧元年(1017),范仲淹为亳州节度推官,受母吴国太夫人命始奏复范姓。到这时,29岁的他才正式将名字改为范仲淹。

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范仲淹当过京官,也驰骋过疆场,出将入相,推行过"庆历新政",数十年宦海沉浮,但是家乡人民只记住他造福桑梓的三件事:兴水利,办学校,建义庄。

话说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贬官睦州后移治苏州。当时苏州久雨成灾,"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灾民逾10万户。范仲淹到任后,亲自去察访水道,分析水患原因,吸收前人的治水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治水方针,首先疏导吴淞江,再疏常熟、昆山入江通海的支流。以前,昆山、常熟有三十六浦,其中茜泾、下张、七鸦、白茆、浒浦五浦最大,由于潮水泥沙,逐渐淤塞。在整个吴中水利中又数常熟的地位最为重要,白茆港是苏常东北出江的第一河,福山港是太湖水北流入长江的主要通道。范仲淹择要而疏,亲临工程第一线,针对港浦"日有潮来",泥沙淤积的特点,在疏浚的同时,提出了"新导之河,必设诸闸"的主张。他说,闸"常时扃之,御其来潮,沙不能塞","旱岁亦扃之,注水溉田,可救烟涸之灾","潦岁则启之,疏积水之患",并强调开浦置闸后,要"设镇屯兵,专治浦闸",每年春天"理其闸外,清除淤沙",最终达到"工减数倍"的效果。他将治水与治田相结合,妥善地解决了蓄水与泄水、挡潮与排涝的关系,保障了苏、常、湖、秀四州的农业生产,使人民安居乐业。常熟福山等地的人们为了不忘范仲淹的恩德,将浦闸称为"范公闸",修筑的圩堤叫做"范公圩"。

范仲淹不但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而且也是一位很有卓见的教育家。他曾说"国家之忧患,莫大于缺乏人材",这句话就是拿到现在也不过时。在范仲淹任苏州知府期间,他曾在南园买了一块地,准备卜筑安家。一位风水先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谁得了它,必定世代出公卿。范仲淹听说后说,如果我在这里安了家,只我一家富贵,还不如在此建个学舍,让吴中子弟都来受教育,大家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建学之

初，只有二十多人读书，有人认为是不是太大了，范仲淹却说："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庆历四年(1044)，仁宗下诏全国各州郡都要建立学宫，于是，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由此说来，中国古代教育的勃兴，至圣先师孔夫子而外，范仲淹也是功不可没的。自宋以来，吴中"登科者逾百数，多致显"。时至今日，当年的府学所在，仍然是吴中学子向往的学习场所——江苏省苏州高级中学。我们无法否认这都是范仲淹的遗泽。

范仲淹在苏州做的另一件惠及后人的事，是在仁宗皇祐元年(1049)，60岁的他以其"贵时"所得俸禄"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号曰义田。既而，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三面环流，环境优美的义宅，"聚族其中"。义庄内又设有"义学"，"立塾以教其人"。他认为："物本天，人本祖。闾阎之人，有视其祖之子孙如路人，相毁訾，相并兼如仇敌，不知本尔。"他常对其小辈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且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贵富而不恤宗族，何颜以入家庙。"千亩义庄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尽管义庄的受惠者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也就是说义庄主要是为了救济族中的穷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以个人力量举办这样的社会福利事业，范仲淹是有开创之功的。难怪元代奉议郎孙应时在《范氏义庄题名》中感叹道："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非文正公之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

苏州人民一直没有忘记先贤范仲淹，在1989年范氏诞辰一千周年之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并编辑出版了《范仲淹史料新编》。后来又在天平山范氏祖茔建成"先忧后乐"牌坊。坐落在原范

氏义庄内的学校今称景范中学，学校内的范义庄享堂已被修葺一新，学校前的那条小巷至今仍称作“范庄前”。苏州支范氏后裔中“敬”字辈是范仲淹的第三十一世孙，如曾任《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的范敬宜小时侯就生活在庙堂巷十号范氏故居。

主要参考资料：《范文正公集·年谱》、《范文正公神道碑铭》、《范文正公墓志铭》、《范文正公义庄规矩》、《范氏义庄申严规式记》、崇祯《常熟县志》等。

（原载《江苏地方志》2002 年第一期）

链接：《范仲淹史料新编》，沈阳出版社 1989 年 7 月版。

《范仲淹研究论集》，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

张士诚与苏州

在苏州市中心观前街南不远处，有一条叫王府基的小巷，本地人称作“皇废基”，这里曾是张士诚王宫所在地。苏州至今保留着一个奇怪的风俗，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晚，古城的大街小巷里就会有星星点点的香烛插在地上，俗称“烧狗屎香”。据说那天是地藏王生日，张士诚起兵时自称是地藏王转世，而“狗屎”正是其小名“九四”的谐音，这香便是苏州百姓烧给他的。苏州有个方言词“讲张”，据人考证也是因为明初官方禁止人们议论张士诚，一看到有人交头接耳，就生怕在“讲（谈论）张（士诚）”。那么，苏州人何以如此念念不忘张士诚呢？

据史料记载，张士诚（1329~1367），元末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人。因地属两淮运盐使司而人称“淮张”。当初只是个盐场操舟运盐的角色，偶尔也贩贩私盐。元至正十三年（1353）五月，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等 18 人聚众反元，自号诚王，僭号大周，改元天祐。五年十二月，“遣弟士德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熟”。次年二

月，陷平江（今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即承天寺为府第，设学士员，开宏文馆”。十七年八月降元，接受元帝所赐龙衣、御酒，复隆平府为平江路，并“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岁以为常”。但安定下来后，他就有点忘乎所以了，把权柄交给其弟士信，自己却“令其下颂功德，邀王爵”，企图躺在功劳簿上做一个割据一方的安乐王。在邀功论赏之议被元帝否决后，他就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尊其母曹氏为王太妃，置高属，别治府第于城中”。于是上行下效，士信与士诚之婿潘元绍亦“好聚敛，日夜歌舞为乐，将帅亦偃蹇不用命，每有攻战，辄称疾，邀官爵田宅然后起”，毫无斗志可言。终于在二十七年九月，被徐达、常遇春在围城十个月后率部破城，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死。

纵观张士诚割据苏州的 12 年时间，其势力范围大体为：北逾江淮，直抵济宁；南至绍兴，占有长江下游的富有地区。他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先后实施过减少田赋，奖励蚕桑，兴修水利，疏浚白茆江等措施，使凋敝的农村重萌生机。较之元政府的苛政，苏州百姓已相当知足了。难怪在朱元璋所部大兵压境，将苏州城围困了十个月后才破城，其中少不了全城百姓的支持。据说如今平江路上的三家村，就是当年仰、胡、沈三姓聚族死守娄门殉难后，为纪念他们而得名的。

不过，苏州城的久攻不下，惹怒了朱元璋。在进攻苏州之前，他曾命令“毋肆掳掠，毋妄杀戮”，可破城后，却大烧大杀，以致“死者枕藉，积骨如山”。在平定天下后，有一次，朱元璋微服行走在三山街上，看见一老妪坐在木榻中，便同她攀谈起来，问她是什么地方人，答曰苏州人。又问她对张士诚的看法，她说，在大明皇帝起兵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就归附元朝，让苏人免受兵戈之苦，因此，百姓至今感德。在次日早朝时，朱元璋深有感触地说，当初，我认为张士诚对苏州人没有什么深仁厚德，从昨天遇见的老妪身上，我感到了苏民的忠厚，“恐京师百姓千万无此一妇也”。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洪武迁徙”，屡屡将苏城富户迁至京师（南京）、凤阳、苏北

等地。

在明朝初年，深得朱元璋宠幸的魏观出任苏州知府，欲在张士诚王(宫)废基上新筑府衙兼浚城河，被御史张度污为有“兴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嫌疑而处斩，大诗人高启因作了一篇上梁文而被截为八段。从此，明清两代再也无人敢动议在此建府衙了。

除了“洪武迁徙”和高启腰斩事件外，朱元璋还对苏州课以重赋。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苏州占全国1%的耕地，被征用的税粮竟占全国的9.6%。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州人民当然会更加怀念轻赋薄徭又重视知识分子的“姑苏王”张士诚了。

六个多世纪过去了，苏州北寺塔公园内仍耸立着一座隆平造像石刻，又称张吴王纪功画像碑，或张士诚纪功碑。此碑高3.06米，宽1.46米，没有文字，只有图案。据金松岑先生考证，是至正十九年张士诚宴请元使伯颜的情景，上面118个人物栩栩如生，是不可多得的元代石刻艺术品。东大街显圣明王庙，原是张士诚女婿潘元绍宅址，今庙边上地名仍称驸马府堂。盘门内盘溪小学在1964年扩建校舍时发掘过一座“娘娘墓”，系张士诚母亲曹氏墓(张父早亡，原葬泰州丁溪九龙口。至正二十五年张母卒后，将其父遗骨迁来合葬，故亦可称合葬墓)，曾出土过许多精美文物，现藏苏州博物馆。苏州工业园区斜塘镇还有“张吴王墓”，那是张士诚的遗骨所在。

(原载《江苏地方志》2003年第二期)

链接：

元末虎丘筑城

元末虎丘筑城，不载郡邑志乘，吴人罕有知者。明初，高士王宾仲光集《虎丘诗》一卷，中有郝经仲谊诗云：“虎丘山前新筑城，虎丘寺里断人行。”同时和者甚众，吕敏志学云：“山上楼台山下城，朱旗夹道少人行。”曾朴彦鲁云：“阖庐冢上见新城，无复游人载酒行。”僧宁居中云：“公余联骑入山城，老衲追陪得散行。”又周南老正道有《至正丁酉冬督役城虎丘诗》八首，一云“奉檄趋功城虎

丘”，一云“四叠新城绕洞隈”。案丁酉为至正十七年，是年张士诚方降元未叛，不知城何所防也。今山后尚有高垄，似其遗址，未审山前以何处为界，绝无迹象可寻矣。

（辑自吴翌凤《逃志堂杂钞·甲集》）

重新解读沈万三

沈佑生了两个儿子：沈万三和沈万四，哥哥擅长经商敛财，弟弟却爱好书法艺术；

张士诚统治苏州期间，自然要给沈氏这样既是姻亲，又曾多次资助他政权的豪强地主以种种经营特权和优惠，从而加速了沈氏家属的敛财进程；

同里镇原名富土镇，朱元璋打击江南豪强势力，使江南民众谈“富”色变，以致周庄附近的富土镇，也改名为同里镇了。

周庄作为水乡古镇，在人文资源上并不比周边其他古镇优越多少。比如，千灯镇有顾炎武故居，黎里镇有柳亚子故居，甪直镇有叶圣陶故居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圣寺，同里镇有陈去病故居和现在已被增补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退思园，哪个不比周庄强？而周庄，沈万三似乎是最大最强的“硬件”了。

早在元末明初，沈家就与外通商积累财富

《明史》上说，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南京城，其中三分之一是沈万三资助的。尽管从时间衔接上看有很多破绽，但有一点千真万确，那就是沈万三家确实已经拥有了“富可敌国”的资产。

据方志记载，沈万三的两个儿子以“白金二千锭、黄金三百金”以及米、甲士、马匹等，“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筑城甃阶、造铁桥水关诸处，费巨万万计”。

旧志书上说，沈家财富“由通番而得”。早在元末明初，沈家就有了与外通商的意识，并在经营活动中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在当

时人眼光里，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于是便有了“聚宝盆”的猜测。

哥哥万三擅长经商敛财，弟弟万四爱好书法艺术

据《周庄镇志》记载，沈万三的祖籍是浙江吴兴（今湖州）南浔的一个名叫沈家漾的小村子里。元至顺元年（1330），其父沈佑举家迁居时属平江路（今苏州）长洲县的周庄东垞，以躬稼为业。沈佑生了两个儿子：沈富和沈贵，即沈万三和沈万四。

沈富是沈万三的真名。镇志上说：“沈富，字仲荣，一名秀，世称万三。万三者，乃巨富之名，万户三秀耳。故又称万三秀。”明人董谷《碧里杂存》云：“沈万三秀，不知其名。盖国初富者，谓之万户。三秀者，每县分人为五等，曰哥、畸、郎、官、秀，秀最上。洪武初年，家给户由一纸，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第三者也。”

清代学者高士奇在《天禄识余》一书也认为，“沈万三”其实是沈姓与万户、三秀三者组合而成，称沈万三也好，沈秀也罢，都是沈万三秀的略称。沈贵，字仲华，因乃沈万三之弟，故人称万四。初居东垞，继迁白蚬江滨之黄墩港。两人虽是兄弟，但秉性志趣迥异：万三痴迷于经商敛财，万四爱好书法艺术。

资金周转使财富增加，但沈万三并未大兴土木造沈厅

周庄由东垞村演变成人丁兴旺的集镇，同沈家的迁入有关。当时镇西部都是墓地，有人烟的地方就严字圩，镇东南的东垞便是沈家迁来时的第一初居住地，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明人杨循吉曾到过周庄东南沈万三的住宅遗址，在《苏谈》中留下记载：“沈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亦不甚宏壮，殆中人家制耳。”顾震涛也说“元沈万三宅在周庄，甚小”。可见，沈万三确实不像大多数财主，没有将大量资金用于大兴土木，而是作为流动资金在外周转，以赚取更多的利润，使财富不断增加，这就是他能成为江南首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位于周庄镇南市街的沈厅并不是沈万三那时的家，它是沈的后裔沈本仁于乾隆七年（1742）花巨资建成的。这处住宅原名敬业堂，清末改称松茂堂，七进五楼门，占地面积两千多平方米，有

屋宇百余间，是一座颇具特色的江南宅第。

致富源自多方面投资回报，“聚宝盆”引发民间出嫁带脚炉

沈家元末迁来周庄，在沈万三的经营下，短短数十年间，由一地地道道的农民成了天下闻名的豪富。连身处深宫的马皇后都说他“其富敌国”，可见他的巨富是世人皆知的。可他是如何致富的，对于老百姓来说却始终是个谜。于是就有了种种猜测，最常见的说法是清人褚人获《坚瓠集》中所载的沈家偶获聚宝盆的说法。时至今日，江南女子特别是渔家女出嫁的时候，陪嫁品中还少不了“聚宝盆”（即脚炉）。《秀水县志》的记载是“万三父游姑苏，于废宅得数罂黄白，遂用饶富”。《循陔纂闻》中更明确指出“万三父陆道判游姑苏赘沈氏”，又将沈氏巨额家财说成是“废宅得宝”，甚至把万三的父亲说成是洞庭商人陆道源，万三乃从母姓沈。明弘治《吴江志》载，“沈万三秀有宅在廿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又说陆道源“悉以田产送沈万三家”，这一点在《南浔志》也有类似记载，说陆在晚年当道士前，将其家产分别给了两个人：一个姓葛，另一个就是沈万三。明人董谷《碧里杂存》说沈家还从事高利贷经营。从上述种种史志记载分析，除了带有神秘色彩的聚宝盆一说属于无稽之外，沈家的财产来源应该是多方面的投资回报。

嫁女张士诚家所以暴富；谈富色变富土镇改名同里镇

沈家的暴富应该说还与张士诚有关。阴太山《梅圃余谈》中载：“张士诚称王，勒万三资犒军，又取万三女为妃。”在张统治苏州期间，他需要得到江南地主势力的支持，自然也会给沈氏这样既是姻亲，又曾多次资助大周政权的豪强地主以种种经营特权和优惠，从而加速了沈氏家属的敛财进程。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当朱元璋大军压境、兵临城下之时，一些豪强世族还纠集族人助张死守。《吴门表隐》卷七载：“三家村，在平江路北。张士诚时，止存仰、胡、沈三姓，聚族死守娄门。”顾颉刚先生考证认为沈姓即沈万三家族。然而，也是因为这一点，尽管沈家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主动犒劳天子军，并“助筑都城三之一”。据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四记载是“自洪武门

至水西门",包括正阳门(今光华门)、通济门、聚宝门(今中华门),共计长十多公里。但还是没能博得朱的好感,落得个巨额资产籍没入官,本人放逐云南边陲的下场。其余江南豪富也被迁籍苏北。朱元璋打击江南豪强势力的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江南民众谈"富"色变,以致于周庄附近的富土镇也改名为同里镇了。

(原载《姑苏晚报》2008 年 10 月 28 日)

南濠街上两名士

南浩街(古称南濠街)一带自古为苏州南北货行市的集中地,商业繁盛。在这喧闹的市廛之地,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两位读书登科第的贤达之士,那就是明代的都穆和杨循吉。

都穆(1459~1525),字玄敬,祖籍丹阳,宋代迁居苏州相城,继而移居南濠里。他 7 岁能诗,自幼笃学,博览群书,于濠上教书近二十年,名声大噪于吴下,人称"南濠先生"。有一次,巡抚都御史何鉴拜访吴宽,偶然在吴处看到都穆的诗文,颇为惊异,力劝吴宽推荐他参加科举考试。果然一试而领弘治乙卯(1495)应天乡荐,再试而中弘治己未(1499)进士。甲子年(1504)授工部都水司主事。不久,因父丧回家守制。服除后复官工部,分理器皿、厂事。丙寅年(1506)改任南京兵部武库司,辛未年(1511)升工部虞衡司员外郎,次年进礼部主客职,负责管理外国及少数民族入贡品及使者住宿等事务。其间曾奉使关中册封庆阳王妃。54 岁时上书乞休,同僚争相挽留,都无法改其初衷。吏部尚书杨一清十分看重都穆的学识和品行,奏请皇上加封都穆为太仆寺少卿。

都穆"秉性孤介,擅弘博之才,持忠贞之节",为官清廉,动依法制。他在工部任职时,部下掘得金子,想要私分,都穆知道后严加斥责,"若曹何敢污吾"。与崇信伯费某出使关中,临别时庆阳王妃赠以大量钱物,也被他一概婉拒。因此,他回苏时囊中无余资,乡间无

田庐圃墅。尽管如此，他也从不因贫困去曲意奉承达官贵人，哪怕是借米度日，“以盐椒啖口”，也常以“天壤间必不令都生饿死”自慰。大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有一次，都穆路过光福，当地的富室大户竞相邀请，可他并不领情，却到并不富有的何名世的山庄，“笑谈论文留连五日而返”。

归老后的都穆扫迹公门，潜心读书。据说，苏州城里有户人家操办婚事，适逢夜间大风雨，将烛火尽数吹灭，遍求不得火。于是有人便想到了“南濠都少卿家有读书灯在”，派人前往叩门，还真的得到了火种。可见其老而好学如此。

都穆文祖韩（愈）、欧（阳修），诗宗陶（渊明）、孟（浩然），长于撰述。其同科进士李廷梧出知桐庐，与他同舟南归，并邀他偕修《桐庐县志》，他欣然前往，毫不推辞。为郎中时，他奉使关中，回来途中也不忘访问山川形势，故宫遗迹，作《西使日记》。嘉靖年间，诏修《武宗实录》，需要采集苏州资料，知府徐谿在承天寺设纂修局，首先想到了都穆，敦请他主持其事。完成后，巡抚李充嗣又请他校对《三吴水利通志》。继任知府胡缵宗还特意写了“南濠书院”匾额，褒扬其甘耐寂寞、久居寺中、醉心著述的精神。嘉靖五年（1526），太仓知州刘世龙慕名前来聘请都穆撰修《太仓州志》。志刚完成，都穆就病卒。尽管志书马上刻印，都穆还是未能亲睹。该志书崇祯二年曾重刻过，可惜不久即散佚了，只有祝允明所作的序文保留在清王昶纂《直隶太仓州志》卷 63 中，从中可以窥见一些当时的修志情形。

都穆是精神上的富有者，物质上的贫穷者。除了上述著作外，他还著有《金薤琳琅录》、《南濠文跋》、《游名山记》、《南濠文略》、《南濠诗略》、《工部器皿志》等数十种。尽管他家境贫困，常缺吃少穿，甚至典衣度日，乃至 67 岁亡故后，家中竟无钱为他办理后事，完全靠官府的抚恤资助才得以殓葬。但他留给后人的却有数千卷藏书和等身的著作，他贫而好学的精神是不朽的。

杨循吉（1456~1544），字君谦，南濠人。从小跟舅舅刘昌学《易》，弱冠领成化丁酉（1477）乡荐，甲辰（1484）举进士，授礼部主

事。性好读书,每到得意处,常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因而得了个"颠主事"的雅号。弘治初,他因病奏请致仕归,年方31岁。

归田后,杨循吉结庐支硎山天峰院,自号南峰,日事课经读史,以著作为乐。他嗜书如命,只要听说某处有好书,总会千方百计购求或缮写,常常因购书而节衣缩食。到晚年,本来"素封"的家境,已因购置十余万卷藏书而变得一贫如洗。他在《题书橱诗》中写道:"吾家本市人,南濠居百年。自吾始为士,家无一简编。辛勤一十载,购求心颇专。小者虽未备,大者亦略全。经史及子集,无非前古传。一一红纸装,辛苦手自穿。当怒读则喜,当病读则痊。恃此用为命,纵横堆满前。当时作书者,非圣必大贤。岂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奈何家人愚,心惟财货先。坠地不肯拾,坏烂无与联。尽吾一生已,死不留一篇。朋友有读者,悉当相奉捐。胜遇不肖子,持去将鬻钱。"爱书之情溢于言表。

杨循吉非但爱书藏书,亦喜撰书。特别是有关乡邦文献的地方史志尤多。弘治壬子(1492)回乡途中,其同榜进士陆希远敦请他修辑《章丘县志》,他说:"章丘,吾乡先哲范文正公读书之地也,敢有他辞?"历数月而成志4卷,共分12个条目:建置总论、乡镇、山水、物产、贡赋户口、公宇、祠宇、邑令题名、人物、登用、古迹、杂志。明董复亨称:"章丘,岩邑也,旧盖有志,白杨君谦之志行而旧志废矣。君谦,吴人,有史才。"明陈德安在《章丘名义辨》中说:"章丘故有志,吴郡杨君谦作也,其事备,其词文,其志之最优者欤!"都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德元年(1506)修《孝宗实录》,礼部派人到江南采访事迹,苏州亦开局编纂,知府请循吉总其事。他因便撮纪大略成《苏州府纂修识略》6卷,分政事、治水、赈济、诸邑蠲免、收抚海贼、差役、钞关、课程、水政、谳狱、人物、文词等15目,以苏州府公牒一通冠卷首,并附记奏疏碑记及有关时事的内容。成书于嘉靖八年(1529)的《吴邑志》16卷,是他应吴县县令苏祐之聘撰写的首部吴县志。《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志"较他志乘为典核",颇重有关国计民生之大事的收录。另外,如《宁海州志》、《金山小志》、《金陵杂志》、《庐阳

客记》、《吴中往哲记》、《苏谈》、《辽小史》、《金小史》、《吴中故语》、《吴郡志略》、《奚囊手镜》等近千卷书均出自杨循吉之手，其中不乏名品佳作。他为文特长撰述，得提要钩玄之法，89岁犹能著撰。晚年又自定诗文集为《松筹堂集》。

杨循吉醉心于地方文献的编纂，对于修志颇有心得。所著《苏谈》中有《史明古修志》一则云："史明古修《吴江县志》，欲列山川为一门，吴江本无山。循吉因论问及，明古曰：横山亦在吾邑境内。循吉曰：横山是吴县山，吴江但得一角耳，岂可相割与乎？时都玄敬亦在座，相与一笑。"正德年间，王鏊编成《姑苏志》60卷，派人将书稿请杨循吉过目。杨正忙于其他事务，一看题签就说："不通不通，府志修于我朝，当称《苏州府志》。姑苏，吴王台名也。以此名志，可乎？"尽管杨的看法不一定精当，苏州先贤范成大修志也不称《平江志》而作《吴郡志》，王鏊是有先例可援的，故王鏊留传给后人的志书并未依杨氏改称《苏州府志》而仍用《姑苏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杨循吉在当时，特别是在编修方志方面是有相当高的地位的。

都、杨两人的共同点就是都很爱藏书、读书和著书，又都住在南濠街。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将他们作为藏书家收入其中。只可惜杨氏藏书在其身后"悉散佚，阅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刘凤《续吴先贤赞》）。所幸两人著作大多数留传下来了，这是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我们后人珍惜和研读。

（原载《阊门·石路》，王利生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

链接：《金阊街巷史话》，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清官况钟

况钟(1383~1443),字伯律,号龙岗,别号如愚,明代江西靖安县人。自幼努力上进,24岁即被县令俞益选用为礼曹吏,九年任满被荐入礼部。尚书吕震奇其才,荐授仪制司主事,不久又被擢为四品郎中。宣德五年(1430)出任苏州知府。

"自洪武开国以来七十余年,苏州无一人能满任者。"郡守多不称职,尽管朝廷屡遣官吏督责,均告无效,号称全国最难治理的十郡之一。尚书蹇义、胡濙等以况钟勤谨兼能大力推荐他,因"赐敕"赴任。("赐敕",即皇帝的书面命令,放宽其职权,可以便宜行事,奏章可以直送皇帝)

况钟上任伊始,为洞悉郡弊,佯作不省吏事,碌碌无为,一任群吏所欲为。过了一段时间后,突然召集僚属,当堂历举罪证,依律杖毙数人,并惩治罢免了常熟、昆山等12名县级贪官庸吏。这一下,苏州吏治为之一振。况钟到任的头八个月,共清理案件1518件,经他问的案,百姓不叫冤,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况钟深知苏州赋役一向繁重,在巡抚周忱的支持下,锐意改革,力奏减免70余万石税粮,并制定许多合理的征粮输赋办法,真正减轻苏州农民负担,招抚流民回乡。还设置"济农仓"以防饥备荒;设置善恶簿以行劝惩;设置通关勘合簿以防诈伪;设置纲运簿以防运夫侵盗;设置馆夫簿以防非理需求。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除暴安良,深得民心,被苏州人民尊称为"况青天"。人们熟知的《十五贯》故事,就是况钟为民伸冤、执法如山、机敏善断的几千件冤、假、错、奇案中的典范性事例。

况钟严于律己,生活十分俭朴,每饭仅一荤一素而已。为杜绝吏役舞弊现象,凡衙内奏章榜谕、诉讼文字,他均亲自动手。他虽刀笔吏出身,却极重文教,对寒门儒生之贤良者关怀备至,常以薪俸周济他们,培养荐举了一批有用之材。治苏数年成绩斐然,朝廷多

次褒劳;在向皇帝述职后辞别时,皇帝还特赐宴赐诗,恩宠有加。

况钟刚正廉洁,孜孜爱民,担任富甲天下的苏州知府13年,家里竟未置一间房,未添一垄地,却获得了苏州人民的由衷爱戴。宣德六年(1431),况钟因母丧回籍,苏城局面陡变,以成均为首的恶吏复辟旧政,不但不免秋粮,且加倍苛敛,并奏控况钟仗势贩药材牟利,奔丧时收受贿赂。宣德帝令都察院详加勘察,查明为诬告。于是准奏苏城百姓的联名上书,让况钟提前复任。正统五年(1440),况钟第三次离任,这次是九年任满,依例要官升一级。临行,他不给朝中权贵带任何礼物,而是"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苏州人民依依不舍,饯行的人数百里不绝。经过张翰等180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留任。朝廷决定擢况钟为按察使,"正三品俸,仍视府事"。返任时,"民欢迎者不远数百里之遥",欣喜之情"若赤子得慈母"。当年民间传唱的歌谣正是民心的体现:"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恩,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况青天,朝命宣;宜早还,在新年。"正统七年夏,积劳成疾的况钟曾两疏乞求解任,未允。十二月(1443年初)卒于任所,吏民聚哭,"如哭私亲,七邑绅耆人等俱奔赴哭奠。邻郡苏松常嘉湖之民,赴吊者络绎弗绝"。翌年春,况钟灵柩运回靖安时,苏州"倾城出送,白衣冠两岸夹舟奠别,出苏之境略不断绝"。况钟活着时,苏州人民就自发地为他建生祠,户户挂他的喜神(肖像),像天神般敬他,祝他健康长寿。在他逝世后,苏州七县各市镇无不建祠,岁岁奉祀。在苏州阊门外杨柳湾还为他建立衣冠冢,并在府学内建祠设祭。道光六年(1826)在苏州府署一墙之隔的五显庙原址、况钟丁忧(死了父母)期间读书和会客处另建专祠以志纪念,同治十一年(1872)又重加修葺。现存西美巷,是苏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原载《江苏清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清廉勤政的贺御史

贺霖,字时望,江西鄱阳(今波阳)人。其祖祖嗣,字思恒,永乐九年(1411)进士,授刑部主事,历官郎中,擢行在大理少卿,谳鞫明允。明宣宗元年(1426),汉王高煦以叛逆罪废为庶人,协从受诛,议欲屠所部。祖嗣力言不得滥杀无辜,乃止。正统九年(1444),出知光州,不久就告老回家,69 岁去世。贺霖就是在这样非常正气的家庭中成长的。成化五年(1469),贺霖考中己丑科张昇榜进士。弘治元年(1488),以监察御史擢任苏州知府。上任之时,正值盛夏,苏州百姓望而知其仁,都很欢迎他的到来。

贺霖在知府任上,非常廉洁,处事谨慎,既不偏激也不随便。居家生活崇尚节俭朴素,从来不搞宴请。即便有稀客造访,情属不得已留餐,也决不动用公款,而是拿出自己的薪俸请客,不过备一只鸡和一些菜蔬而已。每天早上升堂处理公务前,往往要让差人封闭府衙门,以防别人行贿。哪怕是很小的诉讼案件,也一定要依据当时的法律定罪,从没有发生过臆断专行的事。

贺霖并不是一位因循守旧的官员,来苏上任伊始,即着眼于弊政的改革。“凡旧政之堕者、过者、不及者悉痛整齐之,无时刻少休。”

以前,每逢岁首,地方政府官员都要例行迎春活动,以劝农事。按照当时的惯例,立春前一日,郡守(即知府)要率大小官吏到娄门外柳仙堂迎春,一路上鸣锣开道,盛设仪仗,中间有观音朝山、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的戏文造型,并以春牛殿后。届时观者如市,男女老少都争相用手去摸春牛,据说可以占新岁造化。当时有句俗话叫“摸摸春牛脚,赚钱赚得着”。

袁宏道曾写过一曲《迎春歌》描述当时的盛况:“东风吹暖娄江树,三衢九陌凝烟雾。白马如龙破雪飞,犊车碾水穿香度。铙吹拍拍

走烟尘，炫服靓装十万人。罗额鲜明粉彩胜，社歌缭绕蔟芒神。绯衣金带印如斗，前列长官后太守。乌纱新缕汉宫花，青奴跪进屠苏酒。采莲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如虎，窄衫绣裤捶大鼓。金蝉缠身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观者如山锦相属，杂沓谁分丝与肉。一路香风吹笑声，千里红纱遮醉玉。青莲衫子藕荷裳，透额垂髫淡淡装。拾得春条夸姊妹，袖来瓜子掷儿郎。急管繁弦又一时，千门杨柳破青枝。独有闭门袁大令，尘拥书床生网丝。”

立春日，太守（知府）在府堂将春牛打碎，称为打春。农民也竞相用麻麦米豆抛打春牛，里胥则用米粉做成的春球相互馈赠，预兆农业丰收。

贺霖认为迎春活动太过奢靡，所花的费用动辄逾千金。到任后，就将此类虽属“惯例”，但仍不失为“浪费”的开支尽数革除。他还尽量减少各种摊派，减轻本郡人民的负担，因而深得百姓的爱戴。

贺霖廉洁又勤政，即使在弘治二年（1489）因劳累过度，不得不告假养病期间，一些重要公务，他还硬撑着病体亲自过问和处理，不满一年就累垮了身体，终于病逝于任所。死后，“囊无余财，妻子贫窭而归”，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见祖先，未带江南一寸绵”。

苏州百姓为天不假年，痛失清正廉洁的父母官而悲悼，一时间，前往吊唁者不绝于道。为了纪念和表彰贺霖，明正德年间王鏊编的《姑苏志》、清冯桂芬编的同治《苏州府志》，都为他列了传，载入苏州史册。他的家乡人民也不忘把这位清官收入同治《鄱阳县志》，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贺御史霖墓，在青山渡”。

（原载《江苏清官》，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朴学大师顾炎武

顾炎武小传

顾炎武(1613~1682)，昆山千灯人。初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之为“亭林先生”。幼笃学，九经诸史皆能背诵。年十四为诸生，屡试不售，遂弃举业。专精古学，读书一目十行。性耿介，绝不与世人交，唯独与同乡归庄友善，一起参加复社，从事反宦官权贵的斗争。亭林先生相貌丑怪，行事亦很怪异，不喜夜饮，当时就有“归奇顾怪”的说法。南明鲁王时，参加江南一带人民的抗清起义，遥授兵部职方司主事。后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周游四方，载书自随。所到之处，耕田种地，联合同道，黾勉复兴。康熙时，诏举他为博学宏词，以及大臣熊公锡等荐举他修《明史》，均秉承母亲遗言“后人毋事二姓”而未赴任。晚年，卜居陕西华阴，卒于山西曲沃。他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凡是国家典章制度、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以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莫不穷究原委，开有清一代之风。

千灯印象

早就听说在昆山东南有一著名古镇叫千灯了。从昆山最早的旧志《玉峰志》记载得知，千灯原名千墩，又称茜墩。吴淞江从吴门至此，江之南北有墩及千，此处一墩为第一千个，故名。这第一千个墩就是少卿山，高 5 米，是一个占地约 2000 平方米的土墩，在镇东北。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这里陆续发现了许多承载古代文明的器皿。经过 4 次考古发掘，先后出土过涵盖马家浜、崧泽、良渚三期文化的陶器、石器和骨器，证实了该墩乃江南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典型例证。

千灯又是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爱国学者顾炎武的故乡。他的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言，早在我们孩提时代就铭记在心了。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数百年来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数年前，终于有幸到了倾慕已久的古镇。在千灯文化站负责同志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古镇，感受了古镇那份宁静与朴素。

顾炎武故居位于镇南（原千灯中学是其部分），据说原有八字墙、门厅、轿厅、大厅及廊、备弄等。1997 年文物管理部门耗资 150 万元，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修，其中门厅、轿厅、大厅及砖雕门楼均移建清初建筑，厅内挂有吴大澂、沈周等一批名人字画。顾氏祖坟在原千灯中学内，其中有顾炎武曾祖、兵部侍郎顾章志及顾炎武嗣母王氏等墓。历经“文革”后，1985 年由省政府拨款修复了顾炎武墓，从荷花池内清理出的几件石人、石马、王氏牌坊断柱及顾章志墓志铭等，不规则地散处在墓地上，几棵古柏因其不成材而幸存。墓地南部亭林祠亦已修复，其中有顾氏世系介绍及顾炎武著作目录、部分顾氏著作实物、研究顾炎武的文章等陈列，最为抢眼。

出顾炎武故居往北，有一条国内最古老的也是最长的宋代石板街。该街主干道长 800 米，整条街由 2070 块宽 30 厘米左右、长约 2 米的石板铺成，石板下面是下水道，设计得相当合理，也很有特色。石板街南部不到顾炎武故居处，有一段街面很窄，远远望去，两边屋檐间仅剩“一线天”。街的中段有一个曲折，称为棋盘街，那里有一处“楼下河滩”，下河滩的踏踱级旁墙壁上还有一凹陷处，据说是为了晚上下河滩放置灯火的地方。可惜的是，街东侧小河上没有一座古桥。据文化站同志说，原有启秀桥、重凝桥、种福桥 3 座古桥，已被移到周庄去了。

千灯有塔有寺，也有名人故居，还有一条颇具特色的石板街，人文资源毫不逊色于周庄，完全可以作为江南古镇的典型代表加以保护和开发。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学者，他的好学也是屡见载籍的。

“每出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轮蹄所经，必咨询其山川风俗、古今沿革治乱之迹。所至厄塞，即老兵退卒，询其究竟，发书勘验同异，披寻搜讨，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畅其说而后止。”可以说他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真正践行者，因此他于政治、经济、经史、舆地、金石诸学，无不贯通，就不足为奇了。他力倡实学，注意研究历史与现状，并漫游各地实地考察，与文献相参稽印证，开创了有清一代注重考据的朴学学风。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著录，顾炎武一生的著作多达 117 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的话，丝毫不会感到夸张。顾炎武最著名的著作是《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和《音学五书》。

顾炎武曾参与“复社”活动，甚至举兵抗清。崇祯十二年，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失败，“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退而读书，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国志书、一代名公文集，间及章奏文册之类，进行深入研究。遍游各省，载书自随，考察山川形势。广泛搜集史籍、实录、地方志、文集、说部笔记、邸抄中有关国计民生及舆地沿革资料，至康熙元年编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以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张元济称此书“无非欲昭示后世，使凡有国有家者知此（指兵防、赋役、水利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数事，推而至于其他”。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部历史地理学名著。全书内容大体可分为六类：一地图，二山川，三兵防，四水利，五赋役，六屯垦。讲求利弊是贯穿本书的主线，它集中体现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侧重各地水利、贡赋等，为研究明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同时又因辑录了一些今已失传的或罕见的地方史志、碑刻资料，为后人书籍辑佚带来了方便，开创了后世利用、整理地方志资料的先例。《肇域志》是《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姊妹篇”，侧重各地沿革、建置、山川、名胜资料，图谋为匡复明室之用。这两部著作既是其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是其读志用志的典范之作。

顾炎武 30 岁以后潜心学问，凡读书必作笔记，“积三十余

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日知录》是一部可以同宋洪迈《容斋随笔》等相提并论的读书札记性的学术著作，堪称顾氏力作，目的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顾氏生前曾刊八卷，世称符山堂初刻本。至康熙中，门人潘耒从其家求得手稿，经再三校勘，于闽中刻成三十二卷行世，即为遂初堂刻本，时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当时为了避文字之祸，潘耒在刊刻时作了不少删节。道光年间，黄汝成以遂初堂刻本为底本，参以钱大昕等四家校本，汇集九十余家研究成果，成《日知录集释》32 卷。1994 年，岳麓书社出版《日知录集释》的秦克诚点校本。

《日知录》是一部内容丰富、考据精审的史学著作。全书不分门类，而列一千零二十余条目。顾氏自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梁启超称其“论一事必举证，犹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如在卷二十《古人不以甲子名岁》中，文虽不长，却参考了三十余种书，列证六十余条，旁证十余条。

《音学五书》其实是五种书的合集，共 38 卷，包括《音论》3 卷，综述韵学源流；《诗本音》10 卷、《易音》3 卷，分别以《诗》、《易》用韵考定古音；《唐韵正》20 卷，名为订正《唐韵》读音，实为《诗本音》的详细注解；《古音表》2 卷。顾炎武是第一个对上古音进行系统的分部研究的人，他审核了《诗经》全书一千九百多个韵字，与《广韵》音字比较，归纳为古韵十部。该书一扫前人叶韵之说，开清人锐意研究古音之先河，奠定了清代古音学的基础。

顾炎武也是一位修志大家。据《顾亭林年谱》记载，顺治十六年，“抵邹平，订其县志”，编校了顺治《邹平县志》8 卷；康熙十二年“夏四月，往德州订州志”，即康熙《德州志》10 卷；康熙十七年，对康熙《山东通志》之“山川古迹稍为刊改”。此外，顾炎武还编纂过《历代宅京记》20 卷、《营平二州史事记》、《山东考古录》、《昌平山水记》、《北平古今记》10 卷、《十九陵图志》等史志类书籍。

顾炎武的操守

古人很看重人的操守，因此，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之事，被传为美谈。顾炎武同样很注意操守，谦抑自持。他曾说："文须有益天下，不贵多，立言不在一时。"因此，他积三十多年之功，才写成《日知录》。又说："近代文章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得其皮毛者乎？"故其所著述，大抵主于敛华就实、救弊扶衰，绝非词章家所及也。康熙丙辰(1676)，东海两学士在京城宴请顾炎武，刚过三巡，顾即起身告辞。学士说："还有些菜肴要请您品尝，到时我派人张灯送您回寓所，如何？"顾先生说："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可见，亭林先生在平时很注意"瓜田李下"之嫌。

顾炎武于学无所不通，堪称"通儒"，但是他绝不是目空一切的狂傲之徒，相反，很注重学习同时代学者的长处，而不以己之长攻人之短。他曾写过一篇《广师论》以明志，把自己和当时著名学者作了一次对比，其谦虚的态度溢于言表："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

王锡阐、傅山、吴任臣、朱彝尊等人都是当时一流学者，至今犹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席位，顾炎武在这篇《广师论》中，以人之长，较己之短，迥然有别于以己之长，攻人之短的"文人相轻"的恶习，表现出一种"文人相亲"的气度。如此多产的学问家、修志大家，尚且谦逊不迭，瞄准他人之长，以《广师论》自励。吾辈同仁，岂有不见贤而思齐之理乎？

顾炎武曾坚辞清廷征召，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康熙戊午(1678)，诏举博学鸿词，廷臣争欲荐之。炎武以嗣母遗命，驰书坚辞。"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

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意。不过他对徐氏弟兄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小外甥徐元文是顺治状元，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人品口碑尚好，所以顾炎武曾勖勉徐元文说："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这是顾炎武的一生抱负，一部《天下郡国利病书》就是为此而编写的。自汉以下，堪当此语者，殆无几人。他期望小外甥能深体此意。但对大外甥徐乾学则疏远得很，甚至很有点鄙弃之意。徐乾学是康熙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藏书甚富，有《传是楼书目》行世，名气比元文为大，但人品欠佳，热衷利禄，阿谀权贵。

顾炎武的道德学问是古今公认的。康熙十八年(1679)"开《明史》馆，时炎武甥徐元文为监修官，发凡起例，引据累朝事实，出炎武酌定者为多。当时馆阁名儒暨海内士大夫语及真实学问，无不敛衽称亭林先生"。清代学者阎若璩认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的史家，仅钱牧斋、顾炎武、黄宗羲三人而已。而乾嘉学派中无论是经学研究的吴派、皖派，抑或是史学研究的浙东、浙西派，都莫不祖尚顾炎武。章学诚推顾炎武为开国儒宗。阮元《国朝儒林传稿》也以顾氏居首。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自序》说："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

(原载《姑苏晚报》2010年3月21日)

"泽被东南"张国维

张国维，字玉笥，东阳人。崇祯七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宽厚得士大夫心。属郡灾伤，辄为请命。筑太湖、繁昌二城，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迁工部右侍郎，总理河道。

——乾隆《苏州府志》卷四十二名宦

一百年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社团组织南社第一次雅集选择在苏州虎丘附近的张国维祠，是深有寓意的。去年，苏州投资1000余万元对该祠进行了修缮。11月13日南社成立100周年正日，中国南社纪念馆在这里正式对外免费开放了。

张国维(1595~1646)，字玉笥，浙江东阳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番禺知县。他在任期间，兴学校，课农桑，以德化民。崇祯七年(1634)，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安庆等十府，主持兴建繁昌、太湖二城。疏浚了松江、嘉定、上海、无锡等地河道，修筑了吴江、江阴、苏州等县桥、塘堰、漕渠。清顺治二年(1645)，他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总兵方国安叛降清廷的事情发生后，他就把两个儿子召来，问他们对于生死的态度。长子张世凤当即表示决不苟且偷生，次子张世鹏回答得略有迟疑，张国维就用石砚扔了过去，幸亏没砸中。张世鹏见父亲如此盛怒，哭着说："从容尽节，慷慨捐躯，儿等甘之如饴，只是想到老祖母年迈八旬……"午夜时分，张国维穿戴整齐，向母亲诀别，并从容赋《绝命书》三章，又写："忠孝不能两全，身为大臣，谊在必死。汝二人或尽忠，或尽孝，各行其志，勿贻大母死，使吾抱恨泉下！"写完，掷笔于地，把遗书交给次子，投园池而死，时年五十有二。南社选址张国维祠举行首次雅集，就是看重张国维"宁死不降，以身殉国"的气节。

张国维殉国后，吴中百姓在苏州虎丘山区建造了张国维祠作为纪念，并且建了一个"泽被东南"的牌坊。那么，张国维到底做了哪些"功德"，让吴中百姓，甚至革命志士如此怀念呢？

崇祯八年(1635)，时任巡抚都御史的张国维，同巡抚御史王一鹗，亲自实地踏勘，深入了解水情。他在奏章中说："臣搜泉兴浚，单骑驰驱，手口拮据，靡事不为"；"臣尝单舸巡汛，探溯河渠，各绘水图，括以说略"；还说"惟吴泽国，民以田为命，田以水为命，水不利则为害"。兴修吴江石塘，勘核全坍应修1055丈，半坍2086丈；平望应筑内外塘760丈，并修长桥、三江桥、翁泾桥。他针对太湖洪水下泄不畅问题，曾于崇祯九年(1636)上书请求开浚吴江县长桥两

侧的泄水通道，说“太湖翕聚众水，吴江仰承委灌分注吴淞、娄江以入海，其长桥七十拱与九里石塘一带诸水窦皆宣泄之分，必由今桥拱旁架浮图阁，淤遏水势，渐致闭塞，则拆卸不容缓，石塘诸窦年久亦多壅淤成陆，并宜一体开浚，以免农田之患”。《明史》上说，张国维“建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并有成绩”。他的治水成绩，既保障了吴中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江南赋税重地的粮食丰收，堪当国家功臣。

张国维还将积累了数十年治水的经验，写成并刊刻了一部70万字的水利专志《吴中水利全书》，成为我国古代篇幅最大的水利学巨著。《吴中水利全书》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该书先列东南七府水利总图52幅，次标水源、水脉、水名等目，又辑录了包括宋、元到明崇祯时有关诏敕、章奏、下逮、论议、序记、歌谣，是研究苏、松、常、镇四郡的一部至关重要的水利文献。这部志书已经收入广陵书社出版的《中国水利志丛刊》之中，苏州市方志馆有藏。

（原载《廉石千秋》——苏州清官廉吏史话）

金圣叹与哭庙案

金圣叹(1608~1661)，原姓张，名采，字若采。后改姓金，名喟，明亡后改名人瑞，圣叹是他的法号和笔名。他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无意功名。

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的文学理论和评论业绩，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稗官野史，他都爱评点，其文艺思想散见于各书的评点中。经他评点的名著有《离骚》、《庄子》、《史记》、《杜诗》、《水浒》、《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节评的有《左传》、《国语》、《国策》等。尽管归庄称他批评的《西厢记》、《水浒传》为诲淫诲盗之书，但是有一点是不容否定的，那就

是他的点评往往手眼独出，似有神助，文字雅训透脱，精妙绝伦。因此，“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柳南随笔》)。特别是金圣叹将《水浒》七十回后的情节全部删节，续上他自己写的“梁山伯英雄惊噩梦”，作为全书的结局，颇受读者欢迎。据说，赛珍珠就是因为译了金本《水浒传》而获诺贝尔文学奖，驰名世界文坛。郑振铎对金圣叹评价很高，“能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颇有许多可以永传者”。

金圣叹晚年死于“刀斩”，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哭庙案”。

哭庙案，实际上是一起清初文人学士领导的反贪官的群众运动。据无名氏《痛史》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初一日，顺治皇帝死亡的哀诏传至苏州，巡抚朱国治按规定率其僚属于次日起在府堂设幕哭灵三天。初四日，诸生倪用宾、丁观生等百余人到府堂跪进揭帖，向巡抚朱国治控告吴县县令任维初典守自盗，私粜漕粮千石，酷刑逼税，杖毙乡民等罪行，得到众多市民的响应，纷纷要求驱逐任知县。为息事宁人，朱巡抚摘去了任的大印，“著本府看守土地祠”，但任维初逢人便说：“是朱抚院向我要银子，我才粜粮的。”朱做贼心虚，怕有牵连，就下令逮捕了 5 名为首的“闹事者”，不再追究任的责任了。次日，本来就不满清廷统治的金圣叹又带领诸生和群众前去文庙祭哭，以示抗议。巡抚便以“惊忧哭灵，意在谋叛”的罪名逮捕了金等 13 名抗粮哭庙案的首犯，具疏刑部复准。据说，当时江宁府刚审讫金坛县造反案，因此，不及细审，以为同类，18 名诸生被叛斩刑，其中 8 名籍没家产，妻儿充军。抚臣恐怕民心有变，将“案犯”悉数押解南京。本来定于七月十三日未时用刑，结果还提前两个时辰弃市于南京三山街。临刑前，圣叹大叹：“断头，至痛也；籍家，至惨也！而圣叹以不意得之，大奇！”

金圣叹世居苏州养育巷海红坊(今海红小学)，死后葬吴县藏书乡五峰山下博士坞。据说随葬品中有一件金批《三国演义》手稿，抗日战争时期，被修筑军火库的日军发掘盗走。金圣叹墓前原立吴中保墓会吴荫培手书“文学家金人瑞墓”碑，1960 年 3 月 17 日公布

为吴县文物保护单位，现已修复。

（原载《苏州日报》2000年12月16日）

链接：孙中旺编著《金圣叹研究资料汇编》，广陵书社2007年6月版。

民不能忘“豆腐汤”

“豆腐汤”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家常菜以外，苏州的老百姓还将它用作对清康熙年间江苏巡抚汤斌的褒扬。

汤斌是睢州人（今属河南），清顺治九年进士，康熙二十三年由内阁学士擢升为江苏巡抚。在苏州为巡抚的短短两年里，他勤政爱民，生活节俭，终年以韭菜、豆腐羹下饭，荤腥鱼鸡从不入衙署。于是，苏州人民就用他常吃的豆腐，加上既是菜汁又是其姓的“汤”字，来形容他的清正廉洁。

作为一名封疆大吏，汤斌严于律己，屏绝一切请托，杜绝官吏间的馈赠，使江苏吏治廓然大清。他又非常关心民间疾苦，奏免了江南因水灾积欠的赋税，豁免了因避赋外逃的人丁，解救了数万灾民的生活困难。百姓为感谢汤巡抚的再生之德，意欲为他建生祠，而他却极力阻止。

汤斌在苏州做的另一件深得民心的大事就是禁毁上方山的五通神。自古以来，苏州多迎神赛会和淫祀邪说，而上方山的五通神更是其中翘楚。一些奸巫淫尼大肆宣扬五通神的法力，稍有不敬，就会兴妖作怪，甚至弄得人家破人亡。因此，百姓人人害怕惹祸上身，只好经常去顶礼膜拜以图消灾。苏州有句老话叫做“上方山的阴债还勿清”，上代“借”的阴债，下代还得还。百姓深受其害，却敢怒而不敢言。汤斌来苏后，立义仓，复社学，重修泰伯庙，以继承圣学为己任，多次亲至学宫为诸生讲课，希望革除陋习，化俗于敦。据史志记载，为破除迷信，汤斌到上方山用绳索系于自己的脖子上，

将五通神塑像抛入湖中，并纵火焚毁庙宇，奏请永禁全省370多处淫祀。数日后，汤斌乘船过石湖，突然间，有两个木偶从水底浮出跃入船中，一干随从吓得浑身发抖，不知如何是好。而汤斌却镇定自若，叫手下不要慌，静静守候，不一会儿，便抓获两名装神弄鬼的家伙。经审问，得知他们是受妖巫指使，威吓汤巡抚，图谋复兴五通神的。不料这位汤巡抚硬是个不信邪的人物。据说，有人曾在上方山掘得一块石碑，上面刻着“肉山酒海遇汤而败”八字，是仙人张三丰所书的预言。

康熙二十五年，汤斌擢升为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当百姓听说他要离苏时，数万人为之罢市六天，天天到巡抚衙门痛哭挽留。汤斌动身赴京时，除衣被外，身无长物。苏城百姓又自发地奔走相送，自苏州城一直到江北，一路上，送行的人连绵不绝，直到汤斌渡过淮河为止。为了纪念汤斌，苏州胥门接官厅便有了“民不能忘”这座石牌坊。康熙二十六年汤斌过世后，苏州百姓又在郡学之西为他建祠，道光八年入祀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另外，虎丘、穹窿山都有供奉汤斌的祠庙。可见，为民办好事，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民不能忘”这座牌坊，在苏州耸立了将近三个世纪，直到“文化大革命”才遭拆除。

如今，知道“豆腐汤”故事的人也许已经不多了，但苏州人民并没有将这位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好巡抚遗忘。“民不能忘”牌坊已载入了世纪珍藏品《老苏州》画册。

（原载《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一期）

以清节为天下第一的陆燿

陆燿(1723~1785)，字青来，一字朗夫，吴江芦墟人，官至湖南巡抚。在乾隆朝，以清节为天下第一。

陆氏世居吴江芦墟，陆燿曾祖埈，元祖铨。父亲陆瓒曾官保德

州吏目，位卑而德劭，精汉隶。为官不名一钱，上司嘉其操守，常借口索取其书法作品而给予丰厚的回报，瓒却全部用于修葺保德官舍。燿自幼承庭训，笃志于学，事母家居，虽家无隔宿之储，却不以贫故少挫其志，奋励以古贤达自期。中乾隆十七年会试，授内阁中书。会遭父丧，回乡守孝。服除后，入军机处，洊历户部郎中。皇上知其才，授山东登州府知府，调济南，升任运河道按察使司、布政使司，既而巡抚湖南。

陆燿曾说："院司贪，守令不能不贪。利莫大于阜民财，害莫深于夺民食。使上司不贪，则州县不致以苛累病民，何待督责敲扑愁痛之声人人骨髓哉！今或有抗差殴役生事变矣，此非百姓之过，有司之过也；亦非有司之过，大吏之过也。"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铸就了他清廉为民的为官之道。

初至湖南巡抚任所，有位盐商抬来白金三万两。问其故，盐商说："这是老规矩了。前任巡抚号称廉净，却也照收不误。今天先送这些，以后会按时送来。"陆燿坚决不收，并且明言禁止再送。盐商为难地说："如果大人不收，那么，这些白金就没有去处了。"陆燿说："那就用它如数平抑盐价吧！"一时间，湖南的盐价为之低。

非但大事如此，在小事上他也不含糊。湖南水多，藕的价格很便宜，幕客们都肆意乱吃。有一天夜里，陆燿病了，很想吃藕粉，可是巡抚衙门居然找不到如此价廉的藕粉，于是，只能派人四出求助。

陆燿为巡抚时，正是和珅当朝，全国各地的官吏以重金贿赂和珅已习以为常，但陆燿却从来不送一物，也不惧怕和珅借口嫁祸。哪怕是送给皇上，也只是一般土产而已。乾隆知道他廉洁，总是很高兴地接受他的土产。陆燿为山东布政使时，某次晋京入觐，守城门的胥吏对封疆大吏入城必索重资，而陆燿实在身无长物，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只好把衣被放在城外，充作一般人员，仅带一个仆人入城。进城后，从朋友家借用被褥，用毕归还。

他不但为官清廉，教育子女亦称楷模，从不让他们仗着老子是封疆大吏而搞特殊。在湖南巡抚任上，因有事要让他儿子还江南，

临行,再三叮嘱随行的塾师陈驾千:“过郡县,勿使官吏知吾子。”且行李也很简单。一路上果真无人知道巡抚之子过境,以实际行动做到了不扰民。他官至巡抚,却崇尚节俭,从不奢华,也懂得感恩。在他箱子里一直珍藏着一件破棉衣,他时常拿出来展视,说:“此吾风雪中就塾师读,吾母分己衣中絮足之,以衣我者也。”睹物思情,借以怀念自己的母亲,也以此告诫子女及随从要以节俭为本。

对于民生问题,陆燿却能竭其所能。某年湖南大旱,那时恰逢陆燿有病在身,可是为了百姓,他还是拖着病体,每天冒着酷暑奋战在抗旱第一线,最后终于积劳成疾,因病离任。几天后,即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卒,终年63岁。

据光绪《吴江县续志》记载,陆燿身后财产仅为几箱替换的旧衣服。按说,巡抚的俸禄可谓不菲,可他从不挥霍浪费,将节省下来的钱,在京师贾家胡同捐建了一所江震会馆。直到光绪年间,每逢岁时节令,在京的吴江人还常常要到江震会馆去祭拜陆燿的神位。

陆燿学优品端,精析理义,洞达事物,读书讲求实用,曾详究前人言行、政绩、故事,辑国朝经世之文成《切问斋文抄》,又自撰《切问斋文集》。他认为“观于人之慕善、耻不善而知性之本善”,要让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惟明善,而性善乃可得而见焉”。以为读书人“坐而言,当即起而行也”,光说不做等于没说。他的观点很切合事理,假如依此行事,“如布帛菽粟之可衣食”,实用性很强。比较遗憾的是,也许是因为经费问题,也可能是没时间,陆燿没在有生之年完成朋友沈刚中的托付,将《分湖志》校订出版。可以告慰陆燿的是,所幸《分湖志》稿本辗转被上海图书馆收藏,如今已经人整理刊登在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与苏州政协文史委员会联合编辑的《苏州史志资料选辑》总第33辑上了。

(原载《苏州政协》2009年2期)

链接:《吴江官吏勤廉故事选》,鲍玉荣主编,广陵书社2006年4月版。

近代杰出的政论家、文学家王韬

王韬,原名利宾,字兰卿。道光八年(1828)十月初四日,生于苏州城东南 50 多里的甪直镇。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卒于上海城西草堂。

王韬的祖先原是昆山籍，祖父王科进始迁居甪直，以经商为业。父亲王昌桂,9 岁已尽读“十三经”,被乡里人视为神童,终身以教书为业。王韬就出身在这诗礼之家。5 岁时,由母亲口授字义,讲述古人节烈故事。9 岁通说部,读经书。12 岁起,从父读书吴村,生平学问从此开始。18 岁以第一名入县学,其文颇得提学使张小坡称赏。次年,便在陈墓镇设馆授徒,博涉群书。同年秋天,随父亲及业师顾惺到南京应试,不第。自此便绝意仕途,返乡教书。

道光二十九年,王韬家乡水灾,教书收入随之减少。同年六月,又遭父亲去世变故。九月,应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之聘,到上海墨海印书局供职,一连干了 13 年编校译书工作。直到同治元年(1862),清军会同洋枪队攻克太平军上海近郊驻地王家寺,获王畹《上忠王攻上海策》,怀疑王畹就是王韬(按:历来著作家,凡是述及王韬的事迹,几乎无书不错,将嫌疑当信史),受清廷通缉。不得已,从上海乘轮船逃避香港,开始了长期的流亡生活。

王韬是有名的政论家,在墨海印书局工作时期,曾上书江苏巡抚徐有壬、上海道吴煦,主张与英、法等帝国修好,并仿效西方,实行某些改革。以“和戎、防海、弭盗三大端进言,前后凡十数通,皆蒙优答”,然当局“用其言而仍弃其人”。

从咸丰元年闰八月到光绪十年三月，王韬起居香港期间曾两次出国,先后游历了欧洲的巴黎、伦敦、苏格兰、爱丁堡和日本的神户、横滨、东京,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得到了更多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得出了中国非

变法不能图存的思想认识。为此，他与香港同人集资置下英华书院,改为中华印务总局,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报纸——《循环日报》,自任主笔。这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家以政论为主的报纸,每日头版必有一篇论说。王韬先后在此报上发表了数百篇述评,提倡洋务,鼓吹变法,明确指出清廷官场中因循、苟且、蒙蔽、粉饰、贪罔、虚骄等各种弊端,认为取士、练兵、学校、律例等方面都应加以改革。为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王韬还提出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纤、造轮船,允许民间自立公司的变法主张。较康有为、梁启超变法还要早 20 年,许多文章被国内外报刊争相转载。另外,对帝国主义侵华、排华的行径,他也作文抨击,体现了一位旧知识分子朴素的爱国热诚。为挽救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他还提出过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在港期间,王韬还结识了许多洋务派知名人物,不断呈献改良主张,逐渐得到李鸿章的好感。光绪十年三月,在李鸿章的默许下,王韬自香港移家返沪,寄居淞北寄庐。次年,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光绪十四年，被推为我国第一所教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格致书院的山长。十九年,孙中山先生来沪,由陆皓东介绍与王韬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王韬对孙中山的变法大加赞赏。

王韬还是一位著名的中外文化交流实践者。他反对“闭关自守,嚣然自大”,主张向西方学习。在上海墨海书局工作时期,他就广泛接触了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思想,与西方学者伟烈亚力、艾约瑟等合作编译《西国天学源流》、《格致新学提要》(一作《格致新学提纲》)等书籍,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热切希望西方之学术技艺大兴于中土。居港期间,曾应英国理雅谷之招,去苏格兰佐译中国经籍《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三经。参观了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博物院、图书馆等文化教育单位,并在牛津大学以汉语讲学。回港后,辑成《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两部外国史,意欲增进国人对外国的了解。此后,他还应日本学者的邀请,东游日本,前后百余日,每天与日本人士及驻日中国使馆中人交游,诗酒往还不绝。这

—中日文化交流的盛事，记录在王韬所著《扶桑游记》中。

值得一提的是，王韬一生共用过4个名，8个字，14个别号。其字号不仅保持历史文人所用名号的高纪录，而且还与他一生的事迹有很大关系，所以从名号上考察，也略可考出其为人。利宾是其小时候的名字，到18岁入县学后，便改名瀚，字懒今，号蘅华馆主及忏痴庵主。在墨海印书局时，除了以子久为字外，还因其家乡在唐代以有陆龟蒙隐居而得名甫里，他作为一名甫里人，求食上海，寄居北门外，加上甫里和上海寓庐俱邻吴淞江的缘故，常以淞滨逋客、沪北宾盟、瀛洲钓徒、甫里逸民等为号。改名韬，字仲，一字子潜，自号天南遁叟，都是35岁遁迹香港后的事。至于子诠、紫诠两个字号，实际上是取子潜两字的同音字，无晦则含有韬的意义。弢园是他居香港时的寓庐名字，所以50岁以后，又自号弢园老民。淞北玉鲈生是他冶游所用的别号，因此他写《海陬冶游录》和《花国剧谈》，以及替人家序跋香艳的作品都用这别字。他到过英国，游过日本，故而又有欧西词客、泰东诗渔两个别号。在香港充任报馆职务以后，常自号遁窟废民。57岁从香港返居上海，更号淞北逸民，自以为从此安居沪地，与世无争，为天地间的逸民了。

王韬一生的著作着实不少，总计达50多种，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多产作家。

（原载《江苏地方志》1995年第一期）

链接：《韬园老民自传》，王韬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版。

状元女婿徐枕亚

民国初年，上海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专门以香艳骈句写言情小说的作家。由于他们的小说行文缠绵悱恻，动辄有所谓“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等俳名，几成滥调，因而被称为“鸳鸯蝴

蝶派”。常熟人徐枕亚是其中高手，并因写《玉梨魂》而成为清代末科状元刘春霖的乘龙快婿。

徐枕亚的母亲满脑子封建思想，性情暴戾，虐待媳妇。枕亚之嫂吟秋就是因为不堪凌辱而上吊自杀的。不久，他的妻子蔡蕊珠也不容于婆婆，其母硬逼他们离婚。不得已，他们举行了违心的离婚手续后，到上海秘密同居。不料蕊珠因产后失调而逝世，他伤痛之余，撰写了《亡妻蕊珠事略》和 100 首《悼亡词》。

事出意外的是，刘春霖有个女儿沅颖，年已三十，犹待字闺中，她因喜爱《玉梨魂》小说入迷，爱屋及乌，竟害起了相思病。这时又读到百首《悼亡词》，深许枕亚为一多情种子，更加钦慕，由通信而诗词酬答。不久，枕亚遂向刘家求婚，可是刘春霖的择婿意向是科举中人，显然不是门当户对。正在两难之际，女儿沅颖急中生智，提出先由徐枕亚拜樊云门（樊山）为师。云门和春霖素有交谊，云门作伐，春霖也就答应了。不久，徐枕亚北上举行婚礼，当时《晶报》上登载《状元小姐下嫁记》记录了此事。

《玉梨魂》主题是抨击封建礼教，1912 年在《民权报》上连载完毕后，即由民权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24 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又把小说改编，搬上银幕。其影响之大，十余年间竟刊 30 余版，销售达 30 万册左右，成为民国初年最畅销的小说。小说内容为一寡妇和儿子的教师的热恋故事。据说，这位刘小姐在洞房花烛夜，就在床头大审夫婿，问他书中的女主角是否就是他的情妇。搞得徐忙不迭地辩白，为此，闺房不时掀起风波，常闹个不停。不过，据时萌先生考证，徐枕亚于宣统元年至三年（1909~1911）在无锡鸿山脚下西仓镇的鸿西小学堂任教，借寓于离校甚近的名书家蔡荫庭家，并兼任其家庭教师。蔡家有寡妇陈佩芬，出身书香门第，子梦增从徐氏读。其时徐年方 20 余岁，陈氏长其几岁。最近从一徐氏后裔处发现了当年枕亚与佩芬的往来书札和诗词 93 页，经对照《玉梨魂》，鉴定徐氏流传于世的笔迹，及笺纸上的年号、字样，似可确证，《玉梨魂》是一部以作者亲身经历为蓝本的纪实性文学，是一篇人性受扼的血

泪史。

由此看来，当日刘沅颖小姐掀起的醋海风波并非空穴来风。所幸娇生惯养的刘小姐下嫁后，生活很不习惯，不久一病缠绵，就香消玉殒了。枕亚一再悼亡，颓丧消极，悄然回到常熟南乡黄泥镇。晚境落拓可怜，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慨，1937 年在贫病交迫中逝世。

（原载《苏州日报》2000 年 11 月 27 日）

双林巷走出曲学宗师

20 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位戏剧学大师。一位是王国维，另一位是吴梅。王国维以其深厚的历史研究功力，独到的艺术鉴赏眼光和广博的中外文化视野，在世纪初完成了《戏曲考原》、《唐宋大曲考》、《宋元戏曲史》等重要著作，开创了古代戏剧研究的新时代。吴梅虽带有老派学者的学术个性，却也以深厚的传统曲学、戏剧学知识为根底，集度曲、制曲、藏曲、教曲、演戏于一身，继往开来，对传统曲学的曲的本体论、创作论和中国戏剧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在明清戏剧史的研究中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明清戏剧研究的基础。

“藏曲之富，海内无与伯仲”

吴梅（1884~1939），字瞿安，一字灵鹣，晚号霜厓，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光绪十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他出生在一户旧式仕宦人家。

吴梅始居葑门祖宅，清末筑宅双林巷。双林巷故居坐北朝南，前后三进，前二进为楼厅，东有厢楼。藏书室“奢摩他室”和“百嘉室”均在楼房东首。他的曾祖吴钟骏，字崧甫，号晴舫，于道光壬辰（1832）以一甲--名登第，曾任翰林院修撰、浙江学政、湖南乡试正主考官，官至礼部侍郎。未满 60 岁时卒于福建学政任上。吴梅的祖父吴清彦，由荫官至刑部员外郎，42 岁卒。吴梅父亲吴国榛，县府试

皆名列前茅,也英年早逝,去世时才 22 岁。当时吴梅 3 岁,10 岁时又丧母。

吴梅 8 岁时,嗣给叔祖吴长祥为嗣孙。因此,虽然他祖上可称吴中望族,儿童时代却颇不幸,由其嗣祖抚养长大。但他仍得了教育。12 岁时,他从潘霞客(字少霞)读书,在四五年时间里,尽管八股文没学好,却读了姜夔、辛弃疾的词和王实甫的《西厢记》、高则诚的《琵琶记》,并对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反复诵读,并开始填词作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吴梅获县试第一名(府元),开始戏曲创作,写成《风洞山》传奇。他体会到,写传奇、杂剧,仅仅会作词是不够的,还须会谱曲,"欲明曲理,须先唱曲"。于是,他经常有意识地与江南曲圣俞粟庐研讨揣摩,途径渐开。

1905 年秋天,黄摩西介绍他到东吴大学堂任教。1907 年,为悼念秋瑾死难,作《轩亭秋》杂剧(因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而名)。1912 年起吴梅先后在南京第四师范、上海民立中学、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光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主讲词曲,教授古乐曲。1935 ~ 1936 年两年中,吴梅在任教与著述之余,频繁参加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词社、曲社及学会的活动,还为俞平伯校正《荆钗记》中《七夕》谱。

1937 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在苏州多次投弹,吴梅携家避难于城西木渎镇。后又向校方请假,经南京而至武汉,不久又转至湘潭。1938 年 6 月底,携家迁桂林。12 月,应东南大学时的学生李一平之约,从桂林抵昆明。 1939 年 1 月又应李一平之请,抵云南大姚县李旗屯,于 3 月 17 日下午 3 时逝世。后事由李全力协助料理,名墓道为"霜园"。抗战胜利后接骨至苏州,遗骨葬于常州丁堰公社湾城大队朱家村。1984 年 11 月,江苏省及苏州市有关部门召开了吴梅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1986 年 6 月,迁葬遗骨于吴县藏书乡小王山麓,并举行了悼念仪式。

吴梅是个正直、清高,有骨气,有同情心,讲道德,重品质的学

者。他虽未直接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他曾为“百日维新”呐喊，写过《血花飞》传奇；为秋瑾的被害写过《轩亭秋》杂剧，又是进步团体“南社”的最早社员。1921年，军阀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并统率西北边防军时，曾礼聘吴梅为秘书长，吴梅作了一首《鹧鸪天》，以“懒向王门再曳裾”为由拒绝了。吴梅一生节俭，老屋毁于兵火后，一直租屋居住。直到1911年始在苏州蒲林巷筑宅，1928年改建成楼。他在生活上别无奢望，唯一的嗜好就是爱书。有时为了买书弄得“饘飧不继，室人交谪”也在所不惜。吴梅“藏曲之富，海内无与伯仲”，但他并不居为奇货，秘不示人，除准备有计划地出版《奢摩他室曲丛》，将许多珍本秘籍公之于世外，他在苏州蒲林巷住宅藏书的百嘉室和奢摩他室，犹如公共图书馆，任由学生翻看查阅。1924年吴梅在北大时的学生任中敏在毕业之后，专程到苏州拜访，在吴梅蒲林巷家里住了一年多，尽读奢摩他室所藏词曲珍本，编出《散曲丛刊》和《新曲苑》34种，为戏曲和散曲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地。

对于吴梅的藏书，郑逸梅《霜厓先生别传》称：“某大学图书馆拟出若干万金收购之，先生不让也。”其藏书在解放后都被其后人捐献给了国家。

“近世乐曲之学，实自先生启之”

吴梅学有专攻，又多才多艺，他能诗词，能文章。

当然，吴梅的主要成就在曲学和戏剧史的研究方面，他一生中，结合其教学和演出实践，完成了《奢摩他室曲话》、《顾曲麈谈》、《曲海目疏证》、《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瞿安读曲记》、《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校勘记》、《长生殿传奇斠律》、《霜厓曲跋》等戏曲论著多种。这些论著研究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考述曲的特性、构成、演唱为中心的戏曲本体论，二是描述宋金元直至明清时期，包括散曲、戏曲在内的“曲”的发展史。前者以《顾曲麈谈》为代表，后者以《中国戏曲概论》最为完整，并代表着他剧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顾曲麈谈》共四章，第一章“原曲”主要探讨曲的源流、曲的特性、曲的音乐和文字构成、体式，是吴梅曲学理论最重要、最有心得的成果。即考辨宫调、曲牌、曲韵为中心的曲律论，以铺陈结构、摛文布采为主的制曲（文本创作）论，以依腔订谱、按声习唱为内容的度曲论。第二章“制曲”，即词曲创作。所谓“剧”是杂剧和传奇的通称，一般来说短篇称杂剧，篇幅长的称传奇，也有人以南词为传奇，北曲为杂剧。但不管怎么分，都逃不出一个“剧”字。吴梅认为“大抵剧之妙处在一真字”，“剧之作用，本在规正风俗”，因此，填词之道“（一）结构宜谨严”，“（二）词采宜超妙”，“（三）宾白宜优美”。清曲作法，与作剧曲大同小异，惟格律较谨严而已。第三章“度曲”，从“五音”、“四呼”、“四声”、“出字”、“收声”、“归韵”、“曲情”七方面分述度曲大旨。第四章“谈曲”，主要“取元明以来曲家、遗事轶闻汇而集之，以为词林之谈屑，而实亦吴骚之掌故也”。自元迄清曲人剧作源流于兹可见一斑。卢前在《长洲吴先生行状》中称，《顾曲麈谈》“流布至数十万册，近世乐曲之学，实自先生启之”。

《中国戏曲概论》分上、中、下三卷，分述金元、明、清三个时期包括散曲、戏曲在内的“曲”的发展史。在吴梅看来，曲是宋金词调的别体，南曲是北曲的后裔，因而从金元开始追本溯源。他在书中说：“今日流传古剧，其最古者出于金元之间，而其结构，合唐之参军、代面，宋之官剧、大曲而成，故金元一代始有剧词可征。参军、代面，以言语、动作为主。官剧、大曲，虽兼歌舞，而全体亦复简略。若合诸曲以成全书，备纪一人之始末，则诸宫调词，实为元明以来杂剧传奇之鼻祖。”卷上分金元总论、诸杂院本、诸宫调、元人杂剧、元人散曲五个部分，首考源流，次言杂剧院本。卷中和卷下所列类目完全一样，只不过前者为明，后者为清，均依次为：总论、杂剧、传奇、散曲四个部分。卷中列明杂剧96种，并分析了与元剧相异处数端：“元剧多四折，明则不拘”；“元剧多一人独唱，明则不守此例”；“元剧多用北词，明人尽多南曲”；“元词以拙朴胜，明则妍丽矣”；“元剧排场至劣，明则有次第矣”。此外，同卷上一样点评了一些代

表作。明人传奇，吴梅列了43种佳作。他说："有明曲家，作者至多，而条别家数，实不出吴江、临川、昆山三家。"吴江派代表人物沈璟，很讲究音韵，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重文采，昆山一派经魏良辅改革后，曲调细腻婉转，表演优美，歌者皆宗之。但明杂剧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元杂剧媲美。清人戏曲，虽有南洪北孔，名震一时，吴梅亦罗列了146种杂剧，但稍逊于明。清人传奇可算得上佳构者，吴梅列了100种，其中有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占花魁》、《永团圆》，孔尚任《桃花扇》、洪昇《长生殿》等名作。但在谈到清人散曲时，吴梅称"一代名手，不过数家，清曲衰息，固天下之公论也"。

吴梅也是一位努力于剧作的作家，是"这时代里作古剧的文士的中坚"（郑振铎《文学大纲》第四册）。吴梅剧作虽富，但自选甚严，他从自己的作品中仅选出《湘真阁》、《无价宝》、《惆怅爨》合为《霜厓三剧》作为其代表作，于1933年木刻行世。三剧作中《湘真阁》是他据旧作"润色少作"，故事乃本余怀（淡心）的《板桥杂记》。大意是：明末名士姜垓（如须）有感于"功名似纸，朝局如棋"，辞去京师任职，回故里山东莱阳。后到金陵，与妓女李十娘相遇湘真阁下，两下有情，自此闭关谢客，对酒看花，以涤洗胸中闲愁……吴梅作此剧初稿时，正当清末，他想通过《湘真阁》，从一个侧面反映明末社会生活，表现知识分子面貌，表达其内心对"溺声色而谈气节"的文人学士的不满，有一定的政治寄托。

"七个半弟子"

由于吴梅的博学多才，在短短56年的生涯中，不但著作等身，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在某些方面固然"不能尽其所学"，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不能不算是吴梅的另一成就。词曲研究界著名学者如任讷、卢前、王玉章、唐圭璋、王季思、万云骏、钱南扬、汪经昌、蔡莹等皆出其门下。

过去一般说吴梅先生"七个半弟子"之中，当有蔡莹一个，而且是相当出色的一个。蔡莹，浙江吴兴人，为吴梅著名词曲弟子之一。

著有《元剧联套述例》一书，署“吴兴蔡莹述”，中华民国22年(1933)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任中敏(1897~1991)，名讷，号二北，晚号半塘，是吴梅学生中曲学研究成名最早、成就最高者。先后编出《散曲丛刊》15种、《新曲苑》34种，正式提出散曲学的概念。他的专著《唐戏弄》、《教坊记笺订》、《优语集》持论精严，有日本学者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在文化人类学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任二北的《唐戏弄》。”1987年出版的《敦煌歌辞总编》收1300余首，是迄今搜罗最完备的敦煌歌辞集。

卢前(1905~1951)，原名正绅，字冀野，号小疏、卢前，别号饮虹，别署江南才子、饮虹簃主人，是与吴梅本人风格最似的学生。生前与任中敏齐名，有“南卢北任”之称。他所编著的《饮虹五种曲》、《元人杂剧全集》(收130多种)、《关汉卿杂剧》、《明杂剧选》、《元曲别裁集》、《饮虹簃所刻曲》、《明清戏曲史》、《广中原音韵小令定格》等，校订的元杨朝英辑《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都很有影响。

钱南扬(1899~1987)，原名肇基，一作绍箕，字南扬，以字行。平湖曹桥吴汇埭村人。1919年8月，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中文科，从许守白学戏曲，从钱玄同学声韵，从刘子庚学词，从吴梅学曲，是吴梅在北大时的学生，以研究南戏为主。

王季思(1906~1996)，学名起，字季思，是吴梅主讲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时的学生，也是国内外著名的戏曲专家。他治曲从考查作家生平，研究故事流变，札记戏曲用语入手，先后完成了《西厢记》的校注和元人百种曲的笔记。论著有《从莺莺传至西厢记》、《玉轮轩曲论》、《玉轮轩古典文学论集》、《玉轮轩曲论新编》等。

唐圭璋(1901~1990)，是吴梅学生中对词学研究最有成就的专家，有“词学大师”之称。他毕生从事词学研究和教学，著述数百万字，主要编有《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著有《宋词三百首笺注》、《南唐二主词汇笺》、《宋词四考》、《宋词纪事》、《校注词苑丛谈》、《元人小令格律》、《唐宋词简释》、《词学论丛》、《梦桐词集》

等共 20 多部专著。他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以其雅俗共赏而畅销全国。

吴梅出于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毕生倾注曲学研究，其贡献是巨大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他作了全面而简洁的评价，不妨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其文曰："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评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

（原载《姑苏晚报》2009 年 12 月 20 日）

版本目录学泰斗顾廷龙

顾廷龙小传

顾廷龙（1904~1998），字起潜，号匋誃，又号隶古定居主人、小晚成堂主人，笔名路康。江苏苏州人。是当代海内外学界公认的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主要著作有《吴愙斋年谱》、《顾廷龙文集》等。先后主编了《合众图书馆丛书》、《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重要图书，为保存、整理、研究、利用中国古籍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可他却自谓："我干的最多的是图书馆工作，整整六十五个年头。说起来，我做的工作很普通，归结一下只有六个字：收书、编书、印书。"

躬耕典籍里　陶然墨林中

顾廷龙生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平江路横巷混堂巷乃其出生之地。后因其祖父顾祖庆购得新居而迁至严衙前（今十梓街 26 号）。1932 年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39 年 7 月应张元济、叶景葵之招，创立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任总干事、董事。至 1953 年捐献给上海市政府时，馆藏量已经有 25 万册，其

中有金石拓片1万种。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并入上海图书馆后，又任上图馆长达23年，后为该馆名誉馆长、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文化部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特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兼任教授，也是上海市第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第五、六届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

顾廷龙先生一生任职于图书馆，敬业爱馆，护书如命，其学养久为前辈所赏。1937年日寇攻占上海后，租界成为“孤岛”，故家旧藏，纷纷外流，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诸先生都忧心忡忡，深恐我国历史文献日渐沦丧，于是筹设私立合众图书馆，谋求抢救保护，并各出所藏，供众阅览。1939年5月，叶、张先后致书任职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南下，主持馆务。顾廷龙有感于叶、张二老的诚意，复函称“惟以勤慎忠实，严自惕励，生计可维，身心有托，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矣”。这可谓他献身图书馆事业的最好写照。

顾廷龙初到上海，即不顾旅途的劳顿，拟成《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他力主“孤本不孤”，务使旧本秘籍刻印流布。当时上海币值暴跌，物价飞涨，原先筹措基金不断贬值，他一秉初衷，以“不求近效，暗然日章”、“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为信条，因陋就简，惨淡经营。为降低成本，甚至自当抄书匠，手写上版，一夜之间，抄写三千小楷，权当练字，终于印成《合众图书馆丛书》一、二集。收书凡18种，大都为清代先哲未刻稿本抄本。

合众图书馆自1939年8月开办，至1953年2月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虽未正式对外开放，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莘莘学子，均视它为探究历史文献之最佳场所。顾廷龙先生甚至为专题研究者提供专架，以便节省时间，收事半功倍之效。朱启钤、陈钟凡、陈寅恪、陈垣、邓之诚、王重民等

经常通信咨询，顾廷龙先生无不一一作答。

顾廷龙先生在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期间，一秉“合众”初衷，坚持将旧本秘籍影印流布。且在上图自设工场，从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前，先后有30余种馆藏珍贵文献公之于世。其中以宋本《唐鉴》、《孔丛子》及乡先贤《侍郎葛公归愚集》、《韵语阳秋》尤为罕秘。

顾廷龙的工作准则是“专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自上世纪30年代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开始，直到1998年辞世，他70年如一日地信守和实践自己的诺言，全身心地耕耘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园地上。1992年，做过胃恶性肿瘤手术后，许多同志建议他在有生之年整理一下自己的日记、信札、笔记，他总是笑答：“我要首先完成该为前人做的事！”90年代，在担当《续修四库全书》主编之余，他完成了《尚书文字合编》的定稿出版和《王同愈集》的校勘出版。直到1998年因结肠癌再次住院手术，他仍每天坚持《严元照年谱》的修订工作。

八年寒暑完成《续修四库全书》

顾廷龙先生于目录版本之学，早年受外叔祖王同愈启迪。负笈燕京期间，正值以金石目录版本称雄海内的章钰寓京，常相请益。1937年夏，章氏去世，其藏书以手抄本、手校本寄托燕京大学图书馆，旧刻旧抄之善本暂寄五年，普通本捐赠燕大图书馆。顾廷龙先生用10个月时间纂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16卷30万字，除了书名、卷数、朝代、里贯、版本诸项外，还录题跋。凡涉及章氏友朋，酌注里贯事迹，以详渊源，体例之善，为版本目录学上所罕见。1941年，顾廷龙又与潘景郑先生合辑《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此书图文相辅，纲举目张，至今仍为研治明代版本学之准绳。

近数十年间，古籍联合目录中最有价值者有二：其一《中国丛书综录》，其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这二书皆为顾廷龙主编，故目录版本学泰斗之誉，出于自然。前者起步于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时，195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综录》为古典

文献丛书,计分3册,全书包罗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全国主要高等院校图书馆收藏丛书2797种，体例之善,有目共睹。顾廷龙曾说过:“不是自己有所研究,就不能理解图书馆资料的内容,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图书资料的运用,也不会重视图书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编纂,开创了中国古籍全国性书目的先河,在体例上既继承了中国图书目录学、版本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发展和创新。自1977年10月启动,至1996年大功告成,历时20年,涵盖全国782个收藏单位,约6万条目。顾廷龙先生以耄耋之年,不辞辛劳,从商讨制订收录范围、著录条例、分类方法,到业务骨干培训、全国普查、版本鉴定、巡回检查验收,以至最后复审、定稿、付印,都亲自出马。顾廷龙先生自称是“一部最费心力,最有意义”的书目。它不仅对全国古籍善本作了一次摸清家底的整理,而且是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前提。在1986年9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正式出版后,李一氓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称:“这部目录是全国的古籍善本书目,包罗宏富,任何一部从前的书目都赶不上，这是近年中国图书事业的最大成就。……要讲精神文明的话,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神文明最具体的表现。”

从1994年起,顾廷龙先生出任《续修四库全书》主编,此乃其毕生事业之最高峰。《续修四库全书》前人虽屡有所议,但均未付诸实施。现《续修四库全书》共计收书5213种,分装1800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齐,较之《四库全书》超出1852种,几近《四库全书》百分之五十。而入选之书既包括《四库全书》成书以前脱漏、摒弃、禁毁及存目中确有价值之书,又补选乾嘉以至辛亥革命以前重要学术著作,而所采底本,尤臻上乘。如此一代旷世盛典,在顾廷龙先生主持下,以八年时间,大功告成,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此功可谓大矣。

在书坛中独树一帜

顾廷龙先生亦是一名金石文字学家和书法家,正、草、隶、篆诸

体俱精，榜书、小楷皆能。早年私淑吴大澂，自云："廷龙童年得篆文《论语》、《孝经》于家，喜而摹之，取以校读本，喜其诎屈，迄未详为谁氏之手笔也。过庭请问，乃知吴窓斋先生集古文字以书者。于是识先生之名而惜不获见焉。比长，从伯舅王蕙宬先生习古文字之学，繇秦篆而进窥古籀。遂读先生所著《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于是于抚习书法之外更得研求先生之学术矣。"又云："余弱冠始习许书，从事段、桂、王、朱之书，得识文字之义例。四年而后，读器铭卜辞，其文字则真商、周遗型矣。"在其上海求学期间，他得前清秀才孙伯南指点读了《说文解字》，又从胡朴安、闻宥、刘三等学者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与书法。在燕京大学时，又常与容庚、商承祚同研书法。先取吴大澂一路，后攻钟鼎金文。所作丰茂雄浑、质朴古雅。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为多处博物馆、纪念馆收藏。

顾廷龙先生金石文字、书法艺术为世所重数十年不衰，固然有其师出吴氏的渊源，同时还得力于其非凡厚实的扎实功底和博学广识的文化素养。1996 年顾廷龙书法展在上海图书馆新馆举办，当时新闻称："顾老闻名遐迩，但却淡泊名利，故而受到人们的敬重。他的书品好，人品则更好。他总是谦虚地称自己不是书法家，而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工作者，在为整理古籍而写字。顾老从不以名家自居，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充分体现出来，每一笔，每一画都是一丝不苟，顾老以他的学识和素养在书坛中独树一帜，赢得了极高的声誉。"其 1936 年至 1996 年间的 105 件书法精品被收入 1996 年出版的《顾廷龙书法选集》。正如该书《编后记》所云："顾廷龙先生为我国当代著名学者，尤擅书法，真、草、隶、篆无所不精，榜书、蝇头小楷更见功力。其书法独具神韵，名重海内外，堪称一代大家。观其书，处处洋溢着金石之气、学者之风。且作品形式多样，尺牍、题跋、匾额、题签、碑文、中堂、立轴、横披、册页、扇面皆涉，使人赏心悦目。"此外，他还主编了《明代书法》、《清代书法》（1989 年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顾廷龙的苏州情结

顾廷龙是地道的苏州人，在苏州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为了求学，为了事业，他数十年旅居京、沪两地。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暇顾及家乡，但他一直心系故土，十分关心家乡的文化事业。他把自己收藏的一部分图书、拓片捐赠给了苏州博物馆。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他非常关心苏州园林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多次与陈从周等专家一起来苏州实地踏勘，并陆续为整修一新的苏州园林名胜、文物古迹书写了数量可观的匾额和题词，如曲园的“乐知堂”、怡园的“藕香榭”匾额以及虎丘“平远堂”、石湖景区的“吴中胜景”牌坊等，多出自顾廷龙先生的手笔。1989 年 9 月，苏州市为隆重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一千周年诞辰，特在天平山南麓范公祠前，用花岗石建起一座精美的“先忧后乐”牌坊，请顾廷龙先生书写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1993 年，他又为苏州园林博物馆题写馆额。

顾廷龙先生非常关心苏州的史志事业，凡是苏州为修志需要，向他求援时，总是有求必应，对苏州的文化事业可谓竭尽所能。记得 1987 年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所编《苏州史志资料选辑》准备更换封面题签，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顾老。顾老的字端正雅健，深得颜鲁公神韵，不论从封面的美观，还是与史志的“真”、“善”，结合得是那样的和谐。因此，从第八辑起我们一直用着顾老所写“苏州史志”四字。进入上世纪 90 年代，《苏州市志》进入了总纂评审阶段，封面设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我们再次想到了顾老。如今由顾老题写书名的《苏州市志》已荣获全国一等奖，顾老的字已随《苏州市志》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并必将随志书垂之永远。1995 年底，苏州市方志馆批准筹建。翌年 1 月中旬，市地方志办公室将家乡筹建方志馆的消息报告了顾老，并请他为方志馆题写馆名。不久，市志办就收到了顾老题写“苏州市方志馆”墨宝，横竖各一幅，并附信表示祝贺。他说：“修志必须有常设机构搜集资料，专业性强，不是图书馆可照顾得到的。”在传阅墨宝和贺信之余，有人提出：馆牌题

字没有落款和印章，终觉美中不足。幸而顾老在信中提到“如有不合，尽可重写”一语，故我们又向年届九十三岁高龄的顾老提出补写名款和加盖印章，并以繁体字“蘇”取代原简化字的请求。半月后，我们居然收到顾老重写“蘇州市方志馆”条幅，署款为“九三老人顾廷龙题”，并盖有阳文朱印“顾廷龙印”。收到此等字体圆润遒劲，行气布局堪称完璧的墨宝，我们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如今，苏州市方志馆已向社会开放十年多了，馆藏各类书籍已经超过 2 万册，经常有修志同行慕名前来苏州参观学习，而且总爱在挂着顾老题写的馆名旁留影，长眠于故乡的顾老有知，也该含笑九泉了。

（原载《姑苏晚报》2009 年 6 月 16 日）

友情链接：《苏州近现代人物》第二辑，古吴轩出版社 2008 年 12 月版。
《顾廷龙年谱》，沈津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 10 月版。

潘承洞与哥德巴赫猜想

提起哥德巴赫猜想，人们往往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我国著名数学家陈景润和他的陈氏定理(1+2)。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家以诗化笔触的大力讴歌。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由于徐迟的一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8 年发表在《人民文学》第 1 期)，让陈景润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科学家，也让哥德巴赫猜想成了在中国最著名的数学难题，激发了无数民间人士梦想成为陈景润第二。事实上，在哥德巴赫猜想领域成绩卓著、载入史册的还有一位苏州人，他的名字叫潘承洞。

潘承洞(1934.4.14~1997.12.27)，苏州潘氏潘祖谦的六房孙，195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次年考取本校著名数学家闵嗣鹤教授的研究生。1961 年山东大学数学系任见习助教，一年后任

讲师。1978 年被破格提升为教授，1979 年 10 月任山东大学数学系主任，1984 年 7 月任副校长兼数学研究所所长，1987 年 1 月任校长，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自从公元前 3 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其《几何原本》中提出数论后，1742 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给当时住在德国的大数学家欧拉的一封信中，提出了把一个整数表示成素数之和的推测，即(1+1)的推测。欧拉的回信中说，他相信这个猜想是正确的，但他不能证明。这就是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1948 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证明了(1+C)，将“猜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弄清 C 是什么数字，全世界的数学家可谓绞尽脑汁。

十年过后，中国 24 岁的潘承洞第一个得到关于算术数列中最小素数的上界定量估计，证明了 L≤5488。一下子把 C 从天文数字降为常数 5488。1961 年，时任山东大学讲师的潘承洞提出《表大偶数为素数与一个不超出 5 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即(1+5)，又将 5488 降为 5！这一重大发现受到数学界的高度重视，著名数学家王元认真进行了审查，完全正确！华罗庚又将潘承洞的论文推荐给《中国科学》等刊物发表，国际数学界受到强烈震动。次年，潘承洞又证明了(1+4)，使中国在“猜想”研究领域，在短短五六年时间内 3 次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令世人为之瞩目。1973 年，陈景润发表(1+2)后，潘又发现了新均值定理，推算出“陈氏定理的简化证明”。1979 年，他在国际数论会议上用英语作了 1 小时的报告，再次轰动国际数学讲台。1981 年他又与胞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潘承彪合作编著了《哥德巴赫猜想》一书，提出研究“猜想”的一种新尝试，为最终解决“猜想”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再一次得到了国内外数学界的高度评价。

潘承洞生前是中国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出版著作 6 部，发表论文 50 多篇。他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成果，与王元、陈景润同获 1982 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与华罗庚、陈景润、王元四人

被国际数学界称为中国数论学派的代表。

论教育，潘承洞是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应该说他是位好老师。在他30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开过十几门基础课、专修课，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2000年7月，以37岁的年龄出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展涛，成为当时“全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就曾师从潘承洞学习数论专业。潘承洞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提纲挈领，讲透精华，注意传授思维方法、治学门径，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论职务，他又是一位称职的校长。1987年潘承洞出任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校长时，适逢新科技挑战之际。他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上，在发展原有重点学科的同时，创建了一批新学科，如生物化学、中文信息处理、原生质体培养等，增设26个科研机构，努力将山东大学办成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综合性大学。

就潘承洞的成就和成绩而言，1979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4年被评为我国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还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这些荣誉，他当之无愧！他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更是我们苏州人民的骄傲！

（原载《苏州日报》1999年7月3日）

苏州风俗

吴中年俗之乞讨

在生活尚不富裕的时代，号称鱼米之乡的苏州一带也不乏乞讨者。每逢寒流袭击苏州，玄妙观的露台上总会有冻死的乞丐。苏州有两句俗话叫做“冬至大如年”，“有得吃么吃一夜，唔不吃么冻一夜”，浅显的俗话中倒也蕴涵了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意境。

旧时，每年阴历十二月初一起，就会有乞丐化了装到店家门前乞讨，苏州人称之为叫化子。大概是因为乞讨者为了达到目的总要想方设法向被乞者说些好话，“阿爹好婆”、“叔叔阿姨”地乱叫一气，这“化”字，估计是来源于僧道的“化缘”之意。

那么，旧时的叫化子是如何叫化的呢？据说，到了腊月，他们便装扮成灶公灶婆，握了打狗棒挨家乞讨，俗称“跳灶王”。也有装成钟馗，沿门跳跃，做出驱赶鬼怪的形状，旧称“跳钟馗”。或者就简单地蒙上一个麻袋作牛，另外一个牵了他走，到了店家门前，就说：“黄牛到，生意好，讨个铜钱买药料，药杀黄牛弗来讨。”也有头上套一个扎成乌龟形状的箍，脸架一副稻草做的假眼镜，手中握一把破芭蕉扇，连跳带演地唱道“大乌龟，哪哼叫？咖咖咖，小乌龟，哪哼叫？丢丢丢”等，不一而足。除了“跳灶王”跳到廿四为止，其余都要讨到大年夜。

年关在即，在农村也有叫花子光顾，大概也集中在那段时间。为了打发叫花子，乡下人在做送灶团子和年糕的时候总忘不了做些“叫花糕”，其形制当然没有像用于走亲访友的黄松糕那么考究，简单地捏成条形便是了。

吴中年俗之祭灶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苏州旧时风俗，家家都要祭灶，送灶神上天。祭灶作为春节的前奏，苏州人十分看重。

祭灶就是祭祀灶神。关于祭灶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礼记·月令》，可见这一风俗由来已久。据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说是当年姜太公帮武王平定纣后，有功的将领都一一受封为神，但是苦于没有足够的神位，很多小兵小卒未及封赏，于情于理，不应该忘记他们的战功，于是，姜太公想到了封他们为灶神，分别受供于每家每户。这样，既可以止住士兵的胡闹，又可以监视百姓的一举一动。据说，灶神名隗，形状像美女；也有说神姓张，名单，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个女儿，都名察洽。晋朝葛洪的《抱朴子》上说，灶神每月最后一天就上天去陈述人间的善恶功过，罪大的“奇纪”，减寿三百天；罪小则“奇算”，减寿一百天。也就是说灶神每次上天“汇报”，都涉及到他所在家庭人员的寿命。难怪，祭灶之俗，久盛不衰。据《史记·武帝本纪》记载，为了延年益寿、长生不老，贵为天子的汉武帝还“亲祠灶”呢。

不过，最早的祭灶是在夏季。其原因东汉蔡邕在《独断》中说：“夏为太阳，其气长养，祀之于灶。”直到宋代，才改为十二月二十四日，这在吴自牧《梦粱录》和周密《武林旧事》中都有记载。宋田园诗人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序》说：“腊月二十四夜祀灶，其说谓灶神翌日朝天，白一岁事，故前期祷之。”

苏州旧时风俗，十二月二十四日家中要“掸檐尘”大扫除。当夜祭灶，供设的食品中少不了米粉团子和麦牙糖，这团子称为“谢灶团”，糖称为“元宝糖”。麦牙糖粘牙，灶神吃了以后，可以少说坏话多说好话，正如旧时灶门上常写的对联：“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送灶时，将贴在灶台上的灶君像揭下，连同元宝、千张等冥镪

一起焚化。有时还用花纸糊扎成轿子，把灶神马纸放入轿内同焚。如果无轿，就折支马尾松，让灶君骑马上天。一边烧一边念："一蓬青松一蓬烟，供送灶神上西天。"

过去祭灶有所谓"官三民四"之说，就是民间二十四日举行祭灶，官府则在二十三日；还有说是"北三南四"，即北方和南方有别。苏州民间有"廿四团子廿五蛋，吃仔就滚蛋"的说法。灶神从廿四上天后，要到除夕返回，因此，元旦还有接灶神的习俗。

吴中年俗之年关与岁朝

"年"字在古文字中是一个人肩上有一捆稻的象形，表示一年的收获。后来文字变化，写成了由上面一个"禾"代表"稻禾"，下面一个弯背背稻的人形象形"千"，现在这个字已经成了"年"的异体字，而所谓的规范字已很难看出"年"字当初的样子了。于是，有人附会说，"年"是远古时候的一种怪兽，每年定时出来危害人类。据说，野兽都怕火，聪明的人类祖先便用火保护自己不受这怪兽的侵袭，后来发现劈啪作响的竹子效果最好，于是，就有了最初的鞭炮（又称爆竹）。又说红纸像火，因此，进入文明时代后，还有用贴春联的办法表示的。现在提起过年，一般都说是除旧迎新，不管是放鞭炮还是贴春联都是为了表达喜庆的气氛。

事实上，在日子越来越好过的今天，人们是很难想象，过去过年对于穷人来说却是一个"年关"。因为借了人家钱物的人，按不成文的规定，都得在过年前还本付息。苏州有句俗话叫做"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不知从哪天开始，苏州又为被债主逼得走投无路的"杨白劳"式的人物搞了一个借口，说是，过年还不起钱的人，可以到虎丘山上牛王庙去躲债，一旦欠债人到了此庙，债主就不能再来逼债了。躲过了年关，这笔债就又有了一年偿还期，所以，苏州人又把此庙称为"赖债庙"。当然，今天的苏州人已经开始学着外国人，用明

天的钱来圆今天的梦，潇洒地向银行贷款，换新居，搞装修，甚至分期付款买大型家电等，根本勿须“赖债庙”了。

苏州还有一个与过年有关的旧俗就是闯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苏州盘门外青旸地成为“日租界”，设立洋关，过往船只都得履行验关手续。但是每当除夕之夜，商船常有闯关之举，且屡禁不止。据《苏州明报》记载，进入民国以后，苏州关监督每逢除夕，还得循例布告并公函税务司查明，除夕通夜验关，禁止闯关，自旧历元日(即年初一)起，停关三天，初四日照常开关。

守岁，是苏州人过年的传统习俗，吃了年夜饭后，一家人围炉而坐，吃着糖果炒货，达旦不眠。以前守岁时，一般要在屋内点两枝守岁烛，让它们生花报喜。孩子们往往在热闹了一阵子以后，难熬长夜，大人就以老鼠做亲来哄他们，说是深夜将有迎亲仪仗可以看到。现在的除夕夜，大多数人家都收看春节联欢晚会，听除旧迎新的钟声。那一夜爆竹、烟花不断，节日气氛十分浓烈。吴中习俗，初一忌动扫帚、刀、剪等物，所以，除夕夜家家都要将房屋打扫干净，烧好菜肴，缝制好新衣。

农历正月初一称岁朝。旧俗，清晨开门，放爆竹三声，叫开门炮仗，象征连升三级。晚辈要依次向长辈叩头拜年，家长又要率晚辈向邻居贺年。亲友在途中相遇也拱手互道“恭喜”。还有以拜帖请人送至亲友处贺年的，叫“飞帖”，也许就是现在流行的贺年卡的前身。岁朝早餐，以年糕、圆子为主，取其高兴团圆之意。新年中，亲友往来，都以青橄榄泡茶招待，俗称元宝茶。以前，家家户户还有挂喜神(先祖遗像)，供以香烛、年糕、茶果等，依长幼瞻拜的习俗，意思是不忘先祖。事实上，就是所谓的“摆年夜饭”。初一早晨，有些人还要到庙里去“烧头香”，求菩萨保佑来年的平安幸福。苏州人最喜欢去“烧头香”的地方要数玄妙观和西园了，每年那天都会人满为患。

吴中年俗之拜年

苏州与我国其他地方一样，有新年互相“拜年”的习俗。一般来说，新年是指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在此期间，按照苏州旧俗，每家的长辈都要带着一家老少到亲友家去拜年。不过吴俗有“拜年拜到初十”的说法，因此，“拜年”通常要在初十前进行。当然，也有不拘旧俗的，说是“有心拜年，寒食未迟”。

据汉代东方朔《占书》上说：“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晋议郎董勋答简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缕金以相遗，改旧从新之意也。”后人有在“七人八谷”之后加上了“九天十地”的附会，作为拜年十天时间的代称。

作为拜年习俗，在新年期间，有终年不相走动的人家之间也会相互拜年，当然，有的仅仅是在门首门簿上写个姓名，更多的是投一个拜年帖子于门上粘贴的被称为接帖的红纸袋中，这接帖上面一般写着“接福”或“代童”。据《艮斋杂记》记载：“拜年无论识与不识，望门投帖，宾主不相见，登簿而已。”长洲、元和、吴县三县的县志也都说，俗尚拜年，有从未识面，互相投帖，以多为荣者，此风不行于守礼清门。另外，佛门寺庙之间也有相互投帖贺年的习俗。范来宗有一首《拜年诗》是这样写的：“走贺纷阗岁钥更，素非识面也关情。添丁夸列怀中刺，过午飞留簿上名。羽士禅师同逐逐，东家西舍尽盈盈。春明旧梦还能记，驰遍轮蹄内外城。”这大概就是吴中拜年旧俗的真实写照。

吴中年俗之接财神

每年农历正月初五这天，苏州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有接财神的习俗。据说那天是“路头神”，也就是“五路财神”的诞生之日，因此，接财神也叫做“接路头”。事实上，许多人生怕财神爷被人抢先接走，往往从初四夜里就开始接财神了，那天夜里爆竹声声，热闹非凡，此情此景丝毫不减除夕的辞旧迎新。

旧时商家为了来年生意兴隆，一般都要举行接财神仪式，时间大多定在初四半夜至初五子时，因为那正是两日之交。有钱人家接财神时，祭品必备元宝鱼和羊头。所谓元宝鱼，其实就是鲤鱼。苏州话“鲤”与“利”同音，所以鲤鱼成为吉利的食物。有趣的是苏州人平时不吃鲤鱼，因为在苏州人的意识中，鲤鱼又是要跳龙门成仙的，食之不祥。为了这个缘故，苏州人将接财神用的鲤鱼称为“元宝鱼”。这是一个很妙的口彩，既符合接财神人的心态，又具有神似的形态。那鲜蹦活跳的鲤鱼，被善做生意的鱼贩在鳍上穿以红绳，或在尾巴上贴上红纸，放在篮筐里，翘头翘尾的，活像个大元宝。精明的鱼贩在初四这天专门把鲜活的鲤鱼送到人家门上，既可讨得“送元宝”的吉利话头，又可从中获利，不会遭到拒绝。至于羊头，那是因为“羊”字和银洋之“洋”谐音，同样是讨发财吉祥的意思。如果是生活比较寒碜的人家，或则主人生性忌杀生，不愿太糜费，还有就是遇到丧事的人家，也得接财神，但是形式就比较简单，只供些瓜果香烛而已，说是迎财神于酩酊饱飧之余，美其名曰接素路头。商家一般要等接了财神，然后开市。初五早晨将预先制好的旌旗悬挂在财神牌位前，祭毕开店。有些商店在这天只是象征性地开业“应市”，以期新春大发，招财进宝。这天，除了接财神，还有吃财神酒的习俗。在旧社会，商店职工最怕过财神日，因为这天是商店解雇职工的日子。如果

老板不通知你去店里吃财神酒，那就算是被解雇了，第二天就不必再去上班了。由此看来，接财神这天，老板想的是发更多的财，职工却担忧有没有吃财神酒的座位，一年生计是否有着落。真所谓富者求财神，贫者愁更深。

那么，财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有人认为五路神是指元末抗御外侮的何路，也有人说是指从祀南朝陈黄门侍郎冯先希之五圣，还有人说是五祀中的行神，更有人说五路是东西南北中。反正各有各的理由，但是有一点，都不影响大家的发财愿望。这天设酒食酬劳为路头酒，新年休业后的开市为路头生意，庙宇进香为烧路头香，甚至还有叫花子扮成路头上门要钱的。总之，财神确实为许多人提供了生财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这一天，陕西郃阳人却称为送穷鬼、在天色未明之时，家家起身，争先恐后地燃放爆竹，自房内放到大门外，为的是吓走穷鬼。在放了爆竹以后还要立即大扫除，也是从房内扫出大门。并且要将纸窗糊好，地板上的洞也得塞住，以防穷鬼窜入，这叫做塞穷窟窿。据说，那天，当地人家家吃馄饨，为的就是塞住喉咙这一窟窿。

南方接财神，北方送穷鬼，一送一迎，一喜一惧，一积极，一消极，一正一反，一表一里，目的相同，做法迥异，相映成趣。

（原载《东南文化》2006年增刊1之《追风问俗》）

链接：

千里殊风，百里异俗，势则然也。苏在《禹贡》扬州之域。爰自泰伯来吴，言游北学而归，其流风遗俗，备载前典。下逮秦汉以迄于元，治化隆污而风俗美恶系之。若夫时序节物，乃其素尚；方言占候，概有所传。民知务本，故农器相土地之宜；民知养生，故鱼吴擅川泽之利。至于岁时燕享礼乐，文物焕然可观，则又见夫上之人，作新斯民之效也。故列序如左，庶有考焉。

谨按《隋书·地里[理]志》曰：杨[扬]州于《禹贡》为淮海之地，吴越得其分野。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业。虽无积蓄之资，然亦无饥馁。其俗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异居，此大抵然也。其人并习战，号为天下精兵。俗

以五月为斗力之戏，各料疆[强]弱相敌，事类讲武，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其俗皆同。然数郡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君子尚礼，庸庶淳庞，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华谊论》云："吴有发剑之节，赵有挟色之客。"《郡国志》云："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按诸说，吴俗盖古如此。自宋以来，文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惟所谓"尚礼淳庞"、"澄清隆洽"之说则自若，岂诗所谓美教化移风俗者欤？抑观唐景，有云："处家无不孝之子，立朝无不忠之臣，文为儒宗，武为将帅，非夸也。"南渡以后，实为左翊右扶，郡道德仁义，沉浸醲郁，风流笃厚，迥异前闻。岁时游赏，号称繁富，而乡饮燕鬯，彝与间举，所谓和而节之以礼者哉！若夫营栋宇、丰庖厨、嫁娶丧葬，奢厚逾度。损财无益之地，蹶产不急之务，有如朱长文《续记》所云："殆其末流之弊欤？"

吴中自昔号繁盛，四郊无旷土，人无贵贱，往往皆有常产，以故俗多奢少俭，竞节物好遨游。岁首，即会于佛寺，谓之岁忏。亲友有经岁不相面者，多于此时相见，或庆或吊纷然。议姻亲、觇婿妇，亦多决于此时。正旦，则家饮屠苏，门燃火盆。立春日，门题帖子，以春盘辛菜为会集之供。十三日，以糯谷爆于釜中，名孛娄，亦曰米花。每人自爆，以卜一岁之休咎。上元影灯巧丽，他郡莫及。有万眼罗及璃球者，尤妙天下。以糖丸春茧为节食。又按吕荥阳《岁时杂记》云："外郡惟苏、杭、温、华侈，自非甚贫者，必有灯。浙西率以琉璃灯为最，亦有用云母及缯楮者，品类虽多，而皆为琉璃掩其名焉。"宋宣政间，盛季文守郡，邦人范周作宝鼎现词投之，报道当时风致，大蒙嘉奖，至今歌之。咸淳戊辰，黄万石为守，时值闰正，郡民诧于闻见，援乾道癸巳故事，陈□张灯，灯牌有云"天上斗辰，犹指两，人间灯火不妨重"。又有"天回乾道双元历，人庆咸淳两度春"之句。元之元贞二年，郡官王都中因耆老状请，于是张灯三夕以乐丰年。迨春和景明，用六柱船载箫鼓以游，虎丘、灵岩为最盛处。寒食则拜扫坟墓，多作稠饧冷粉团以祀先。按《岁时杂记》："二浙民俗以养火蚕，故于此日禁火。至清明，则插柳于檐。"按《荆楚岁时记》："清明插柳，盖以是日取榆柳火，顺阳气也。"二月之望，浮屠氏以为佛涅槃日，诸寺院作佛事，谓之双林会。上巳日，士女皆于池亭流觞曲水，效修禊故事。四月八日，浮屠浴佛遍走闾里。重午，以角黍、水团彩索、艾花、画扇相饷。夏至，复作角黍以祭。七夕有乞巧会，杂饤时菜，皆以巧名，令儿女辈悉预，谓之小儿节。七月十五日，僧舍悉预营斋供，俾入荐亡，谓之盂兰会。嘉熙间，郡守王公遂怪其不经，谓孝子顺孙，若从其法则是，自以父祖为饿鬼，心忍之乎？以时思亲，当祭诸庙。于是作文禁止之。是岁竟不敢作。至重九，以

菊花、茱萸，尝新酒，食栗粽、花糕。十月朔，再谒墓祀先，谓之烧衣节。是日开炉，不问寒燠，皆炽炭于堂。俗重冬至而略岁节。入腊，则并力舂一岁粮，藏之土瓦瓮中，经岁不蛀，谓之冬舂米。十六日祭厕姑，男子不得至。二十四日祭灶，妇女不得预。二十五日食赤豆粥，云辟瘟，举家大小无不及，下至婢仆、猫犬皆有之。家人有出外者，亦贮其分，名曰口数粥。是夕爆竹及傩田间燃高炬，名照田蚕，岁节祭飨用。除夜祭毕则复燃火盆，焚苍术及辟瘟丹，家人酌酒，名分岁。食物有胶牙饧、守岁盘。夜分祭瘟神，易门神、桃符之属，迨旦则持杖击灰积，有祝词，谓之打灰堆，乃彭蠡庙中如愿故事，吴人独传。此一岁风俗之大略也。

（辑自洪武《苏州府志》卷第十六风俗）

苏州的轧神仙庙会

每逢农历四月十四日，苏州城里的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去“轧神仙”。俗称这一天是“神仙生日”。神仙者，苏州人几乎是家喻户晓——八仙之一的吕纯阳。吕纯阳姓吕名岩，字洞宾，号吕祖。唐代贞元十四年(798)四月十四日生，举进士不第，遇“正阳真人”钟离子而得道。传说得道后的吕仙发誓要救渡天下众生，他不仅浪迹人间，乐为百姓治病解难、灭妖除害，而且为人随和，性格幽默，是老百姓心目中见义勇为的神仙救世主形象。

位于阊门内皋桥东的福济观，俗称神仙庙，亦称吕祖庙。宋时为李王祠，淳熙某年的四月十四日，朐山王大猷来吴，从岩中道院陆道坚设云水斋，得异人授神方，为人治疗风疾颇见神效，人们认为是吕仙借王大猷之手为民治病。在元至大四年(1311)重建时，将祠改称福济观。明景泰间再建时设吕仙祠。自此以后，每年四月十四日吕仙诞辰前后 3 天，观内香火鼎盛。观中例必打醮，前来顶礼膜拜者络绎不绝，其中尤以医生、花农和妓女为多。据说，这天吕仙会化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混在人群中，专为身患疑难杂症的人治病。因此，有病在身的香客显得格外虔诚，希望以自己的诚意感动吕仙相助，助他早日康复。

民国11年(1922)曾募修山门。30年代,地方政府为防火灾,试图封锁神仙庙,取缔烧香。然而轧闹猛和做临时买卖的人,仍保持着往年的热情,轧神仙的热闹景象丝毫不减当年。日军侵占苏州时,部分庙屋被拆毁,渐至大部分房屋圮坏。“文化大革命”时期,神像全毁,殿宇被拆改为民房,现仅存山门残迹。但轧神仙之俗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从前,人们轧神仙是为得“仙气”,交好运。为讨得好口彩,苏州人将这天早晨提的第一桶水称为“抢仙(先)水”;蒸食米粉五色糕称“神仙糕”;帽铺制作垂须钹帽出售,则称“神仙帽”;虎丘花农将出售的各种盆景花卉称“神仙花”;还有卖乌龟的叫“神仙乌龟”等等,无不冠以“神仙”二字。渐渐地,各种小商贩们瞄准了轧神仙的人流,在每年四月十四前数日即开始在阊门内下塘街设市摆摊,甚至连苏北的皮老虎、无锡的惠山泥人也会特意来苏凑热闹。集市品种越来越多,除了传统的花卉以外,有儿童玩具、小百货、工艺品、服装等等,应有尽有。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过去需要吕仙相助治疗的一些“疑难杂症”,已不必有劳吕仙即可医治。尽管有少数信徒每逢四月十四前后还要在神仙庙遗址焚香跪拜,但是大多数人去轧神仙的本意已不再是想碰到神仙交好运了。苏州的轧神仙庙会已完成了由地方性的民俗特色庙会向以买卖物品为主的商业集市的转变,其规模越来越大。近年来,一些厂家也开始利用这一庙会,直接设点摆摊。由于厂商的联合参与,神仙庙边上小小的阊门下塘早已人满为患,无法容纳数万计的轧神仙人了。80年代,有关部门发出通知,将轧神仙地点改在附近的吴趋坊,1992年又换到马路更阔更长的中街路,并由公安部门维护交通秩序。现在苏州的老百姓可以真正放心安心地轧神仙了。

1998年,经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由江苏亚细亚集团实施南濠街(今作南浩街)北段解危安居改造工程,并取得苏州市道教协会的同意,将神仙庙移建南濠街中段。自此,1999年以后一年一度的

"轧神仙"庙会也随之移至石路南濠街。

(原载《江苏地方志》1998年第二期)

链接:《金阊街巷史话》,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八月十八游石湖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四大传统佳节之一中秋节。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隋唐时期,江南就有在八月十五土地神生辰那天欢庆的习俗,人们认为丰收在望的果实是土地菩萨保佑的结果,为土地神过生日是理所当然的事。中秋时分,炎夏刚过,严冬未临,天气高爽,气候宜人,此时月光为一年中最皓洁、明亮,赏月之俗便应运而生。中秋风俗中最富有特色的要数"走月亮"和吃月饼。据说,"月饼"一词,最早载于南宋著述,而盛于明朝。关于江苏人吃月饼,还有一段生动的民间故事:元朝末年,统治者为防止人民造反,规定十户人家合用一把菜刀,并由元人掌握,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泰州张士诚利用百姓的反元情绪,秘密在月饼里夹了一张号召起义的小纸条散发到每家每户。中秋之夜人们掰开月饼,看了传单,便纷纷夺取菜刀,举行起义,攻陷高邮。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为了纪念,将起兵时作为传递信息的月饼赏赐给臣民,从此,中秋吃月饼习俗更加普遍。苏式月饼至今还保留着用一小纸作衬的形式,正是元末遗意。

苏州除了上述习俗外,还有八月十八游石湖习俗。石湖位于苏城西南4公里,是太湖东出水的一个分支。湖水经越来溪北流,汇于上方山下,形成一个内湾。相传早在春秋时已为巨浸,越人伐吴曾掘溪进兵,横截山麓,凿石开渠,湖底皆石,故称石湖。石湖北面有行春桥,俗称九环洞桥,每年八月十七夜十一时到十八日凌晨一时,可见石湖串月奇景。届时,月光初起,人桥洞中,正对环洞,一环

一月，九个环洞可见九个水中之月。也有人说在宝带桥同样能见此景观。不过，据有关资料记载，石湖串月除了横串外，还有竖串之说。据说上方山塔上原来有一根垂挂的铁链，只有在农历八月十八晚上，月光透过铁链的孔，人从孔中望去，恰巧能看见一串圆月。因此，苏州人自古喜欢到石湖去赏月。其实，这正是古时候走月亮的遗意。

太平天国的奇风异俗

在金田起义前，就有广西许多农村妇女参加了洪秀全的拜上帝会组织，她们是冲着该组织宣称的“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成为其会员的。该会有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作为会员守则，模拟基督教的形式建礼拜堂，向教徒宣传，要信奉皇上帝，杀灭清妖，并于1851年1月11日起义。1853年定都天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明确规定，在经济上妇女与男人有同等地位，在婚姻上废除封建的买卖婚姻，而且用命令禁止了中国封建社会自五代以来长期束缚妇女肢体的缠足恶习，这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是一件值得称颂的事。也正因为这点，史学界把太平天国运动称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

然而，太平天国定有一种奇特的分别男女制度，初期叫做“女营”或“姊妹营”，后期叫“姊妹馆”。我们可以从潘钟瑞的《苏台麋鹿记》中了解到当时姊妹馆的一些情形。这种制度规定，父母夫妻都要隔离，只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例外，其他夫妻同宿就是犯了天条。直到定都天京才废除隔离男女制度，但是，战时仍实行。攻克城市，秩序大定后，即解散女营。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女营制度是有违人性的，但是，就当时太平天国的实际情况来说，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因为攻城略地、行军打仗，毕竟不能拖儿带女啊！

在太平天国时期，还有一种奇特的政制，那就是开裳制。我们常把衣裳连称，事实上，在古代“衣”和“裳”是有区别的，上为“衣”，下为“裳”。开裳制，说白了就是通常说的开裆裤。在社会生活中，父母为了便于不太懂事的孩子的大小便，一般让他们穿开裆裤，但等到儿女年龄稍长，即至多七八岁就不再给穿了，其中尤以女孩为然。使人忍俊不禁的是太平天国却把这种幼儿穿的开裆裤作为后妃命妇的专用品，普通百姓的妇女们是没有这个福分来享受的。至于那些开裆裤开裆的长短，还得视品级而定，品级越高，则开裆越长。按规定：七品一寸，六品二寸，五品三寸，四品四寸，三品五寸，二品六寸，一品七寸。诸王如东王、北王等妃则为一尺二寸。若天王后妃所穿的裤子，则仅仅在裤脚管下稍缝几针，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开裆裤。据说，当时“宫中”还因此禁止秋千之戏，因为哪怕是一般后妃命妇，穿着开裆裤在秋千架上荡来荡去，风动裳开，毕竟太不雅观了。

目前学术界有人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实际上是“洪杨”之流利用拜上帝会这一邪教组织进行的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有预谋的活动，不能站在反清的立场上将此拔高为“农民革命运动”。

链接：

太平天国在苏州

1851 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起义，建国号为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苏州的老百姓习惯上称他们 为“长毛”。1860 年 5 月，太平军一举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天王洪秀全命忠王李秀成乘胜东征，连克丹阳、常州、无锡。江苏巡抚徐有壬退守苏州，不日命大名镇总兵马德昭“首令民装，次令迁徙，三令纵火”，准备出逃。马德昭遵令纵火，顷刻间，号称“人世间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的阊门外南濠街、山塘至虎丘一线，阊门内中市街至接驾桥、吴趋坊等处市肆被化为灰烬，清军一些游兵散勇乘机大肆洗劫。6 月 2 日，太平军攻克苏州，继而略定苏南。到了中旬，忠王李秀成在常州以东的苏南地区建立苏福省，省会定在苏州。

苏福省初由忠王李秀成总理全省军务，后来李去了上海前线，遂由后军主

将陈坤书主持军务，以逢天安刘肇钧、左同检熊万荃总理全省民务。省下设郡、县两级，各郡设总制，县设监军，各县城还分别派遣佐将2名主持其军、民政务。乡官局是当时的基层政权组织。苏州城区在娄、葑、齐、盘、胥、阊六门各设乡官局，玄妙观附近地区另设城心局，全城共7局。各局，乡官一般由军帅或师帅担任。乡官局的主要任务是清查户口、编造户册、颁发门牌、发放口粮、处理民间诉讼、协助太平军作战、维护社会治安、疏通河道、发展农业生产、协助地方当局办理科举考试等。

太平军攻克苏州后，为巩固政权，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军事上首先加固防卫设施：改阊门为大西门，胥门为小西门，盘门为南门，葑门为小东门，娄门为大东门，齐门为北门，并将城墙上的雉堞一一削平，“仅留炮口之地，每距数百步，搭盖芦篷一屋……又接连造瓦屋如长廊，中设更鼓，每夜派人打鼓坐更”；“各将领宅前皆建瞭高台（或称望妖台），凡四至五层不等”。城中玄妙观的弥罗宝阁顶上有全城最高的望妖台。

经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社会秩序得到恢复和稳定，李秀成经常率领将领到胥、盘两门外视察田稻长势，并作出恢复商业的决定，首先将山塘街恢复为“买卖街”。为了防止敌人以经商为名混入城内，太平军始终禁止在城内经商。

在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的三年半时间里，太平军在苏州建了许多王府，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东北街的忠王府（今苏州博物馆及其东西两侧部分建筑）。忠王府主体建筑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有照墙、大门、仪门、正殿、后堂、后殿等，纵深约140米。大门左右翼以八字墙，前踞石狮，抱鼓石和石狮镂刻精细。仪门、正殿、后堂的梁、枋、桁间均饰有彩绘，艺术水平很高，有山水、花卉、鸟兽及绚丽的锦文，取材大多寓意福禄寿、吉庆有余、百事如意、锦上添花等。其他还有钮家巷的英王府、南显子巷的听王府（今苏州市第十五中学内还有一处保存完好的具有太平天国风格的建筑）、滚绣坊的某王府、吴衙场的吴习玖衙（1966年在大厅屋顶翻轩隔层中发现了“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黄三升为调派部队事致吴习玖书”、“太平天国战士花名册”等12件文翰）、白塔东路的忠殿左同检熊万荃衙以及铁瓶巷的女馆（已随干将路的拆迁而消失）等。人民路邮电局所在的慕园，据传为慕王谭绍光的居住地。桃花坞大街苏州电扇厂厂址是纳王府所在。另外，桃花坞大街还有康王府和劝王府，一时尚难确认位置。苏州博物馆内有一尊铜炮，长178.5厘米，炮口内径12厘米，炮身铸有双钩阴刻正书“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苏福省造”、“重一千斤”、“红粉四十八两”三行铭文，系1975年在娄门内城河出土，据说就是当年太平军使用过的武器，尽管现在

已经不能使用，但仍可供游人瞻仰。

苏州的时令食品

据报载，许多蔬果的营养价值，会随着季节的转换发生明显变化，说是7月份的西红柿每100克可食用部分的维生素C含量，是1月份的两倍。同样，黄瓜、胡萝卜中所含营养成分也差不多夏季是隆冬时节的2到1.5倍，而冬季上市的蔬菜在夏季，其营养成分也大约减少一半。由此看来，所谓反季节蔬菜，从营养角度讲也不宜大事提倡。

苏州人自古饮食有时，讲究时鲜。苏州习俗有春尝头鲜，夏吃清淡，秋品风味，冬食滋补的说法。春季，碧螺春新茶上市，苏州讲求“明前茶”，即清明前采摘的嫩牙制成的茶叶；明后茶，虽然只差几天，其价值已不可同日而语。春笋上市，苏州人餐桌上的家常菜一般是“腌笃鲜”：笋、鲜蹄膀与咸肉一起煮汤。夏季则是咸菜(雪里蕻)豆瓣汤、咸菜冬瓜汤、番茄蛋汤唱主角。立夏则要尝鲜，主要是青蚕豆和自制的咸鸭蛋。秋风起后，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最佳品尝时节。

苏州是水乡，水产品鱼腥虾蟹四季不断，却各有最佳上市时间。有所谓“麦熟螺蛳稻熟蚬”、“小暑黄鳝赛人参”的说法。至于鱼，也十分讲究时令：农历一月塘鲤鱼，二月刀鱼，三月桂鱼，四月鲥鱼，五月白鱼，六月鳊鱼，七月鳗鱼，八月鲃鱼，九月鲫鱼，十月草鱼，十一月鲢鱼，十二月青鱼。民间推崇“菜花塘鲤鱼”，在油菜花开放期间，水产品中要数塘鲤鱼身价最高。甲鱼苏俗以桂花开放后至初春为贵，“菜花甲鱼”犹如“菜花塘鲤鱼”，亦为食用的最佳时机。过此，便称为“蚊子甲鱼”，苏州人忌食。

就蔬菜而言，苏州人也颇讲究。入秋以后，一般不吃丝瓜和茄子，据说秋茄有毒。而青菜经霜打后，吃口酥烂甘甜，苏州人喜食。

还有荠菜,苏州人喜欢在春季包春卷食用。

糕点在苏州人的生活里也有四时八节的应时品种。从年初起,依次为:大年初一吃汤圆,正月半吃元宵,二月初二要吃撑腰糕,清明时节要吃青团子和酒酿饼,四月初八浴佛节吃乌米糕(即阿弥糕,木渎藏书一带的人还有吃乌米饭的习俗),四月十四乃神仙糕,五月初五要吃粽子,有句俗话云"吃仔端午粽,老来有人送"。类似的还有常熟、张家港一带有夏至吃馄饨的习俗,俗称"夏至不吃馄饨,死后没得坟墩"。七月十五豇豆糕,八月中秋吃月饼,九月九要吃重阳糕,冬至日要吃冬至团,腊月初八吃腊八粥,腊月廿四吃送灶团,有所谓"廿四团子廿五饭,吃仔就滚蛋"的说法。过年时节,每家都要购置一定数量的桂花糖年糕和猪油年糕备用。

除此以外,一年四季的应时食品尚有:春季焐熟藕,夏季绿豆糕、薄荷糕、米蜂糕,秋天则有糖芋艿、水红菱、鲜肉饼,冬季有南瓜饼。

苏州的小吃

苏州的小吃具有浓郁的乡土风味,一向集中在玄妙观,品种五花八门,如小米子糖、灰汤粽、汆鱿鱼、凉粉、藕粉、千张百叶、酒酿圆子、豆腐花、糖粥、梅花糕、海棠糕、焐酥豆、五香茶叶蛋、鸡鸭血汤等。其余如面、馒头、小笼、锅贴、馄饨、汤圆等,应有尽有,说得出,吃得到。每个摊贩常只经营一二种擅长的食品,有的商店品种较多,但也互有特色,各树一帜,相争于市。有名的如观振兴面店、王源兴酒酿豆浆店、小有天藕粉店,五芳斋则以五香排骨、两面黄闻名。

据1935年1月《苏州明报》记载,文魁斋的梨膏糖、一枝香的瓜子、采芝斋的楂糕,同是苏州著名糖果,东脚门王文元(即王源兴)的豆腐浆在掌灯时分即已告罄。露台上的糖粥、御道东的海棠

糕、东边的小肉线粉，都是玄妙观里的出名食品。东岳庙照墙前“小无锡”面摊，供应的肉丝中面，原汁原汤，鲜味醇厚；观应殿前“聚兴斋”供应葱油蹄膀面，葱香蹄酥，浓油重味，质量上乘；据60年前苏州美食家所撰《醇华馆饮食胜志》记载：“东脚门皇天原告团之春卷，入口松酥可喜。”豆腐花也是玄妙观有名的小吃，最早是张根大在露台大香炉旁设摊，辅料多样，有虾米、蛋皮、榨菜、大蒜、味精、酱油、辣油等，具有鲜嫩可口、价廉物美的特点。1981年四川峨嵋电影制片厂还专门到苏州来，将解放前一直在玄妙观的薛永庆豆腐花摊作为外景摄入电影。玄妙观后面，清真馆的葱油饼、牛肉包、牛肉汤、韭菜包也颇负盛名。

除此以外，有案可稽的还有山门口“挑碗阿大”的铜鼓菱、“三元阁”前的锅贴摊、“都姆阁”前春和面馆供应的各式炒面、民国处在“活神殿”照墙畔的血汤担，湖州人开设的乐口福小食品店供应的千张包子、鲜肉粽子，升美斋的鸡鸭血汤、水晶汤团，都是顾客百吃不厌、风味独特的小吃。

1956年、1981年，平江区人民政府为保护文物，两次调整玄妙观内摊店布局，西脚门成为风味小吃一条街，有20多个小吃摊经营各类小吃。90年代，苏州的著名传统小吃开始转入酒楼餐厅，先后有旧学前“美食林”小吃时节、太监弄“满福”风味小吃、天天快餐店二楼小吃部、大井巷口翠福园，嘉余坊、学士街等美食街经营南北风味的小吃，并不断引进和创新，品种达数百种之多。

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就是，大量外地小吃的涌入，在满足现代苏州人口福的同时，也冲击了苏州传统的小吃。观前街、石路两大传统商业中心周边的小吃，已经完全丧失了苏州特色。有人曾经试图在山塘街上开设糖粥店，终因无法维持基本开销而作罢。相反的，所谓的“好人民间小吃”却在苏州大行其道，先后开出了4处。

刚刚结束的苏州玄妙观前美食节（2009年3月28日~4月5日）9天之内，100万人次的客流量，650多万元的营业额。这组数据对于苏州商业氛围最强、人流量最大、海内外游客最为集中的观前

商圈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如果放到玄妙观广场的小吃展上,对于5000平方米区域内100多家参展商家来说,对这些平时卖小笼包子、生煎、馄饨、烤肉串、臭豆腐、肉丸的小老板们来说,每天几千元甚至上万的营业额委实是笔大买卖。重庆毛血旺、内蒙古烤肉串、云南昆虫宴、绍兴周老汉臭豆腐、台北芙蓉虾蟹、巴西烤肉、韩国油炸冰淇淋、朝鲜打糕、印度飞饼……这里有着全国各地甚至全球的著名小吃。据统计,本次美食节参展企业总共有100多家,参展的小吃品种超过了300种。但略显尴尬的是,参展的苏州本地小吃餐饮企业只有10家,小吃品种只有20个左右。"姑苏小吃"品牌的势弱是影响本地小吃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据说,平江区有计划在观前地区打造姑苏小吃一条街。而平江区餐饮商会小吃分会也正在研究整体"包装"小吃企业,组团走出去,打响"姑苏小吃"的品牌。

救救苏州的传统小吃吧!

苏州方言

方言是地方文化的载体,它镌刻着一个民族和地方民众厚重的文化积淀和历史记忆,是一个具有明显地方特色的标志性语言工具,是维系地方群众之间感情和文化一体化的媒介,是反映地方文化心理和习俗演变的活化石。美国一位语言学家曾说过:"一种语言从地球上消失,就等于失去一座卢浮宫。"民俗学专家张志春教授说:"方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文化的'活化石',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的流变,应该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苏州话,一直是吴语的主要代表方言之一(上海话也是吴语的代表方言,但实际上苏州话和上海话差别很小,苏州话比上海郊区一些吴语方言更容易被上海市区人理解)。

苏州话以软糯著称,所谓"吴侬软语"就是由此而来。昆曲和评弹都使用苏州话,并流行于整个吴语太湖片。现代新派苏州话有28

个声母,43 个韵母,7 个声调，这个声韵调系统也是吴语的一般情况。而老派的苏州话则具有 27 个声母,49 个韵母,7 个声调。苏州郊区很多都保留了翘舌音声母,故部分地区具有 33 个声母。

苏州话是吴语的代表,在历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近代中国有四大白话:京白、韵白、苏白和粤白。苏白在明代从江南的流行语言成为士大夫的流行语言。越剧、昆曲、评弹都以苏白为标准音,甚至一开始的京剧都曾使用过苏白。古人云:“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之而雅;俗者,则随而俗之。”上层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上层人物大多以苏州话为荣，甚至不同地区的人交流也有使用苏州话的。和官方“普通话”京白相对而言,苏州话在当时社会的地位相当于民间的“普通话”。

苏州是古代吴国的中心,语言也很古老,在汉代扬雄《方言》和许慎所著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就已指出吴方言与中原方言的不同之处。到了明清时期,一些通俗小说,如“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作品中,收录了不少苏白。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更是将人物的对白全部采用了苏白,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上海妓院中妓女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不但要琴棋书画的技艺,更要能讲一口苏州话,苏州话的吃香程度似乎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话。据说,当时的妓女都以自称为苏州人为荣。不过,如果追问她是苏州哪里人的话,她们却只知道苏州阊门了。事实上,大量的妓女都是冒用了苏州人的名牌,究其原因,除了苏州话确实好听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州历史上有过像陈圆圆、柳如是、赛金花这样的大牌名妓。曾几何时,姑苏城被大明士绅名流列为游学天下必得一游的五大都会之一,上至后妃宫眷、官宦妻女,下至民间匹妇乃至江湖艺女,更以穿着苏式服装,学说苏白,操唱吴歌,引为骄傲。尤其对各式妓女来说,衣必吴妆,话必苏白,擅长吴歌,成为必备之技能,非如此不足以自抬身价。

说苏州话古老，是因为苏州话中至今还保留一些很古老的词语。如苏州人常挂在口头上的程度副词“穷”,表示“非常”、“最”、

"很"这样的含义。我们可以在《墨子·天志上》中找到实例:"故天子者,天下之穷贵也,天下之穷富也。"

当然,苏州话也在慢慢地发生变化,除了苏州评弹等曲艺形式中还保留着较为纯正的老苏州话外,到了五六十年代,苏州话中的翘舌音已消失。70 年代起,青年一代中尖团音开始消亡。走进年轻一代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听到"言情"说成"现行";"切菜"说成"吃菜";"好像"说成"好样";"观前"说成"肝炎";"实践"说成"实现";"产业"说成"菜叶";"宣传"说成"显然";"七个方面"说成"吃葛方面"等等,不一而足。苏州话也有新的发展,如把信口开河的瞎说八道说成"说书"等。近来又有一种在形容词前添加"勩"的句型颇为流行,如"感觉勩忒好奥!"

链接:叶祥苓《苏州方言志》,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版。

又:

人之囿于方言,非特五方也。同一吴语,而郡邑异之,乡城异之,界于他邑之边鄙者又异之。大抵口与耳相因,或袭古义,或讹土音,其所由来久矣。

如相谓曰侬,谓不慧曰獃,俗又曰呆。

谓不任事曰缩肭,《汉书·五行志》"王侯【侯】缩胸【肭】"。

谓嬉戏曰薄相,薄音勃。

谓机巧曰俍利,乡音讹为还赖。

谓睡声曰唿涂,北人谓之打呼,吴人则曰打唿,"唿涂"二字疑即呼字之反切。

谓葬理整齐曰修娖,娖音捉,《唐书》:"中和二年,修娖部伍。"

谓搬运曰搋,搋,力展切,《南史》:何远为武昌太守,以钱买井,不受钱者,曰搋水还之,今吴语"搬汤搋水"。

谓以齑腌物曰盐,去声。《礼记·内则》:"屑姜与桂,以洒诸上而盐之。"

谓指镮曰手记,郑康成《诗笺》云:"后妃群妾以礼御于君所,女史书其日月,授之以镮,当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今俗亦呼曰戒指。

谓绦帨之蕊曰苏头,晋挚虞云:"流苏者,缉鸟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苏。"

谓苇席曰芦菔。

谓虹曰蠉，蠉，许侯切。

嘲笑人曰阿哙哙，亦为招呼之词。

助语词曰子，曰哉，曰且，且音嗟，曰那，若声之转而讹者。

呼儿曰倪，呼章曰滅，呼吴曰红，呼季曰倨，呼归曰居，呼王曰巷平声，呼弹曰团，皆虞邑之方音也。（县志）

（辑自道光《虞乡志略》卷8方言）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昆曲

发源于江苏昆山，诞生于明朝嘉靖年间的昆曲，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被誉为世界戏剧的三大源头之一，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百戏之师”。许多地方剧种，像晋剧、蒲剧、上党戏、湘剧、川剧、赣剧、桂剧、邕剧、越剧和广东粤剧、闽剧、婺剧、滇剧等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的哺育和滋养。

中国戏曲自形成以来一直在舞台上流传，随着时代的变化，从剧本到声腔、表演不断变革，而昆曲则变化较少，对戏曲传统特点保留较多，剧目又极为丰富，被称为“活化石”。昆曲实际是昆剧，但是这个名称，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开始使用，过去大多写作“昆曲”、“昆腔”。经明代隆庆、万历之交“昆腔之祖”魏良辅改革后，梁辰鱼又用新腔创作了《浣纱记》，把昆曲搬上戏曲舞台。至清代康熙、嘉庆年间，昆剧由于革新而迅速兴盛。其时在苏州城镇、乡村，人们对昆剧迷恋到了如醉如狂的地步，组织业余班社，举行唱曲活动，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几至“倾城阖户”、“唱者千百”。在昆剧鼎盛时期，以苏州为中心，其流布范围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独霸剧坛二百余年。

在18世纪后期，地方戏兴起，昆曲由于过于文雅和繁难，便呈衰落趋势。1949年前，在全国范围内除“国风新型苏剧团”及“半付昆班”竭力延续昆曲艺术生命之外，已没有一个职业性表演团体，老艺人有的回家务农，有的摆摊糊口。

戏曲的表现手段为唱、念、做、打(舞)之综合,这四个方面及其综合在昆曲中要求最高,昆曲演员必须在这几个方面兼备,舞台呈现亦最为完美与出色。其他剧种演员为提高技艺都要学昆曲,如京剧演员梅兰芳即有深厚的昆曲功底并能演昆曲;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之代表作《林冲夜奔》即以昆曲形式演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的戏曲事业,在党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方针指引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抢救和继承昆剧、发展苏剧,早在50年代初,中共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对苏、昆剧工作就十分重视。全国重大昆剧活动,也都在苏州举行,这对苏州的戏曲艺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中国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19个国家之一。2003年3月,文化部命名昆山市为“中国昆曲之乡”。

木偶昆曲是一种以木偶来表演昆剧的独特戏剧形式。吴江市七都镇洪福木偶昆剧团始建于清道光年间,颇具江南戏曲特色,是全国唯一一家木偶昆曲祖传戏班。该镇为保护传承木偶昆曲这一传统民间艺术,于2004年制定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十年规划纲要,并与苏州市艺术学校联手招收学生,进行木偶、昆曲的专业教学,培养传人;同时,在系统收集、挖掘整理的基础上,建立展馆,形成完整的实物和声像资料体系;恢复组团,借助虎丘中秋曲会等载体,演出《西厢记》、新《牡丹亭》、《白蛇传》中的相关剧目,使木偶昆曲再放光彩。经过4年的努力,木偶昆曲目前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目前,苏州市共有24个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18名。本市公布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34名,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10个。

链接:《昆曲探源》,陈兆弘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5月版。

吴梅与昆曲

吴梅(1884~1939),字瞿安,一字灵鹣,晚号霜厓,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于光绪十年农历七月二十二日庚午出生在旧式仕宦人家。吴梅的曾祖吴钟骏,官至礼部侍郎,未满60岁即卒于福建学政任上。祖父吴清彦,由荫官至刑部员外郎,42岁卒。父亲吴国榛,县府试皆名列前茅,可惜22岁即英年早逝,当时吴梅只有3岁。吴梅8岁时,嗣给叔祖吴长祥为嗣孙。12岁即从潘霞客(字少霞)读书,习八股文,但吴梅不善作八股文,每遇作文,往往请潘师之子、吴梅的同学潘承庠(养纯)代笔,却读了姜夔、辛弃疾的词和王实甫的《西厢记》、高则诚的《琵琶记》,并对词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填词作曲。光绪二十七年(1901),写成《风洞山》传奇。在创作实践中,吴梅深深体会到,写传奇、杂剧,仅仅会作词是不够的,还须会谱曲,"欲明曲理,须先唱曲"。于是,他经常有意识地与江南曲圣俞粟庐研讨揣摩,途径渐开。

1912年起吴梅先后在南京第四师范、上海民立中学、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光华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教,主讲词曲,教授古乐曲。在南京期间,吴梅又曾拜访了金陵度曲家仇涞之,认为其"转调换气有广陵先生之规"。在上海任教之余,吴梅撰写了《顾曲麈谈》,奠定了他在曲学研究中的地位。吴梅在北京前后共5年,搜求了戏曲书籍不下2万卷,并以此为基础开始撰写《南北词简谱》。1927年春,东南大学停办,吴梅举家回苏,潜心校订《奢摩他室曲丛》152种,分散曲(11种)、杂剧(65种)、传奇(76种)三类,并作序。交商务印书馆,次年出版初集、二集35种;1933年,三、四集均印就,却因"一·二八"事变,致使书及存版尽毁。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在苏州多次投弹,吴梅携家避难

于城西木渎镇。后又向校方请假，经南京而至武汉，不久又转至湘潭。1938年6月底，携家迁桂林。12月，应东南大学时的学生李一平之约，从桂林抵昆明。1939年1月又应李一平之请，抵云南大姚县李旗屯，于3月17日下午3时逝世。后事由李全力协助料理，名墓道为“霜园”。抗战胜利后接骨至苏州，遗骨葬于常州丁堰公社湾城大队朱家村。1984年11月，江苏省及苏州市有关部门召开了吴梅先生诞辰百周年纪念会。1986年6月，迁葬吴县藏书乡小王山麓，并举行了悼念仪式。

吴梅是个正直、清高，有骨气、有同情心、讲道德、重品质的学者。他虽未直接参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他曾为“百日维新”呐喊，写过《血花飞》传奇；为秋瑾的被害写过《轩亭秋》杂剧，又是进步团体“南社”的最早社员。1921年，军阀徐树铮任西北筹边使，并统率西北边防军时，曾礼聘吴梅为秘书长，被吴梅作了一首《鹧鸪天》，以“懒向王门再曳裾”为由拒绝了。吴梅一生节俭，老屋毁于兵火后，一直租屋居住。直到1911年始在苏州蒲林巷筑宅，1928年改建成楼。他在生活上别无奢望，唯一的嗜好就是爱书。有时为了买书弄得“饘飧不继，室人交谪”也在所不惜。吴梅“藏曲之富，海内无与伯仲”，但他并不居为奇货，秘不示人。除准备有计划地出版《奢摩他室曲丛》，将许多珍本秘籍公诸于世外，他在苏州蒲林巷住宅藏书的百嘉室和奢摩他室，犹如公共图书馆，任由学生翻看查阅。1924年，其学生任中敏专程到苏州拜访，在吴梅蒲林巷家里住了一年多，尽读奢摩他室所藏词曲珍本，编出《散曲丛刊》和《新曲苑》34种，为戏曲和散曲的研究开辟了新领地。对于吴梅的藏书，郑逸梅《霜厓先生别传》称：“某大学图书馆拟出若干万金收购之，先生不让也。”在解放后其藏书都被其后人捐献给了国家。吴梅毕生以教学为生，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不仅在课堂上对戏曲发展、对曲文品评如数家珍，而且能随时唱曲，引吭高歌。既教学生写诗、填词、作曲，认真批改他们的作业，又教他们识工尺谱，译简谱，为昆曲擫笛，乃至排练表演。

吴梅学有专攻又多才多艺。他的诗得力于我国近代著名诗人“散原老人”陈三立(1852~1937),其文得力于盛霞飞,词得力于彊村遗民。又精鉴赏,擅于剧作。1935~1936 年两年中,吴梅在任教与著述之余,频繁参加南京、上海、苏州等地的词社、曲社及学会的活动,曾受邀入苏州道和曲社、上海琴社、中央大学潜社,并任南京紫霞曲社社长,经常与名家切磋曲艺,以曲唱和,十分频繁。他不仅能为人操鼓板,还能粉墨登场,曾演过《西厢记》中的莺莺、《牡丹亭》中的陈最良、《荆钗记》中的老旦、《千钟禄》中的解差等角色,戏路颇广。在北京期间,还指点过梅兰芳、韩世昌(被认为可与梅兰芳比肩的著名昆曲正旦)、白云生等著名演员。1921 年巨商穆藕初在苏州桃花坞西大营门五亩园创办“昆曲传习所”,吴梅每次回苏州都要去拜访那里的全福班老艺人沈月泉、沈斌泉等,同他们共商技艺,并给“传”字辈的学生们讲授剧本。曾几何时,他与俞粟庐成了当时传习所最好的艺术顾问。

吴梅的主要成就在曲学和戏剧史的研究方面。他一生中,结合其教学和演出实践,完成了《奢摩他室曲话》、《顾曲麈谈》、《曲海目疏证》、《中国戏曲概论》、《元剧研究》、《瞿安读曲记》、《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校勘记》、《长生殿传奇斠律》、《霜厓曲跋》等戏曲论著多种。这些论著研究的重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以考述曲的特性、构成、演唱为中心的戏曲本体论,二是描述宋金元直至明清时期,包括散曲、戏曲在内的“曲”的发展史。前者以《顾曲麈谈》为代表,后者以《中国戏曲概论》最为完整,并代表着他剧史研究的最高成就。

吴梅也是一位努力于剧作的作家,是“这时代里作古剧的文士的中坚”(郑振铎《文学大纲》第四册)。吴梅的剧作,据徐调孚《霜厓先生著述考略》(增补稿)为 14 种,除异名同实者,实为 10 种:《风洞山》(传奇)、《血花飞》或《血花霏》(又名《苌弘血》,传奇)、《轩亭秋》(杂剧)、《落茵记》(杂剧)、《绿窗怨记》(传奇)、《湘真阁》(杂剧,原名《暖香楼》)、《无价宝》(杂剧)、《惆怅雯》(杂剧)、《东海记》(传

奇)、《双泪碑》(传奇)。此外,《白团扇》(传奇)仅见广告,剧本未行世;《义士记》(即《西台恸哭记》)原为《霜厓四剧》之一,后存而复删,亦未见流传。

吴梅剧作虽富,但自选甚严,他从自己的作品中仅选出《湘真阁》、《无价宝》、《惆怅爨》合为《霜厓三剧》作为其代表作,于 1933 年木刻行世。《霜厓三剧》从主题、思想上讲,已消失了早年鼓吹革命、关注社会现实生活的光芒,它是吴梅戏曲理论定型后向历史取材的创作思想的体现。其价值主要表现在艺术上,结构的曲折、严谨,语言的优美清新,以及格律的精工富艳等方面,都堪为旧剧本作者的范本。其中《惆怅爨》共四剧五折,吴梅前后历时 16 年创作而成,是他最为得意之作。

吴梅的散曲成就也是世所公认的。他生当散曲创作之末世,所作非但谐律合谱,在内容、形式上亦多可称道,实堪称为散曲创作的结穴者。其散曲作品主要收录在卢前编《霜厓曲录》中。此外,吴梅的诗也不容忽视,就其自编的《霜厓诗录》而言,非仅数量超过《词录》、《曲录》总和(诗 381 首、词 137 首、曲 171 首),其内容也远较词和散曲丰富,其一生经历、过从交往、政治观、文学观,均可从《诗录》中见之大概。

吴梅博学多才,在短短 56 年的生涯中,不但著作等身,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们在某些方面固然"不能尽其所学",但在另一些方面,则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南卢北任"(卢前、任中敏)、钱南扬、王季思、唐圭璋、蔡振华、王玉章、常任侠、徐震堮、陆维钊、胡士莹、潘景郑等,其中任中敏、唐圭璋、徐震堮等好几位都是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吴梅出于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毕生倾注曲学研究,其贡献是巨大的。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他作了全面而简洁的评价,不妨作为本文的结束语,其文曰:"特是曲学之兴,国维治之三年,未若吴梅之劬以毕生;国维限于元曲,未若吴梅之集其大成;国维评其历史,未若吴梅之发其条例;国维赏其文学,未若吴梅之析

其声律。而论曲学者，并世要推吴梅为大师云！”

友情链接：《苏州近现代人物》第一辑，古吴轩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昆曲六百年》，周兵、蒋文博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吴梅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版。
《吴梅研究》，邓乔彬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版。

苏州评弹

评弹，又称苏州评弹、说书或南词，是苏州评话和弹词的总称。是一门形成于明末清初、用苏州方言表达的古老、优美的说唱艺术。它以说为主，“说法现身”，一人多角，布景、道具、服装均出于一口，生、旦、净、末、丑都表演于一身，噱、弹、唱、演多种艺术相结合；文学上叙事体与代言体，散文与韵文相结合，具有自身完整的表演体系；对苏州其他曲种，如苏州文书、宣卷、什景书等都有过较大的影响。

评话通常一人登台开讲，内容多为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和叱咤风云的侠义豪杰。弹词一般两人说唱，上手持三弦，下手抱琵琶，自弹自唱，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的传奇小说和民间故事。评话和弹词均以说表细腻见长，吴侬软语娓娓动听；演出中常穿插一些笑料，妙趣横生。弹词用吴音演唱，抑扬顿挫，轻清柔缓，弦琶琮铮，十分悦耳。经过历代艺人的创造发展，曲调流派纷呈，风格各异。

评弹有说有唱，大体可分三种演出方式，即一人的单档，两人的双档，三人的三个档。演员均自弹自唱，伴奏乐器为小三弦和琵琶。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主要曲调为能演唱不同风格内容的〔书调〕，同时也吸收许多曲牌及民歌小调，如〔费伽调〕、〔乱鸡啼〕等。〔书调〕是各种流派唱腔发展的基础，它通过不同艺人演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流派唱腔。据马如飞的《杂录》记载，乾隆皇帝南巡时，苏州艺人王周士曾在御前弹唱，后随乾隆帝至内宫演出，出尽

风头。王周士告病返苏后，建立艺人行会组织光裕公所，从此苏州评弹大盛，名家辈出。大致可分三大流派，即陈（遇乾）调、马（如飞）调、俞（秀山）调。经百余年的发展，又不断出现继承这三位名家风格，且又有创造发展自成一家的新流派。如“陈调”的继承人刘天韵、杨振雄；“俞调”的继承者夏荷生、朱慧珍，他们均自成一家。其中“马调”对后世影响最大，多有继承并自成一派者，如薛（筱卿）调、沈（俭安）调、“琴调”（朱雪琴在“薛调”基础上的发展）。周（玉泉）调是在“马调”基础上的发展，而蒋（月泉）调又出自“周调”。

由于评弹的情节曲折离奇，表演扣人心弦，形式雅俗共赏，故数百年来流传于江、浙、沪城乡，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

评弹的演出场地，通常称作书场，评弹艺人苏州人称之为说书先生。清朝的书场一般都是茶馆书场，苏州人有所谓的“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说法，指的就是早上到茶馆喝茶听书，晚上孵混堂泡浴。民国期间，苏州先后有过 117 家书场。20 年代，苏州的评弹艺人已有近 2000 人。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书场也发展到专门说书的清书场、新式书场、旅馆书场、花色书场。20 年代，上海广播电台开始播放苏州评弹，人们称之为空中书场。80 年代，苏州电视台又推出了电视书场。

对于评弹艺人的培养，解放初期，苏州曾经成立吴县评弹协会。1959 年春，筹建苏州专门戏曲学校；1961 年改名苏州戏曲学校，次年建立苏州评弹学校，专门培养评弹演员。尽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一度停办，但在陈云的直接关怀下，于 1980 年复校。

2000 年 9 月 4 日，为弘扬传统曲艺，由文化部和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在苏州开明大戏院和人民影剧院开幕。2006 年 5 月 20 日，苏州评弹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链接：《苏州评弹旧闻钞》，周良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1 月版。

《苏州评话弹词史》，周良著，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版。

特殊读音的苏州地名

人们常以“吴侬软语”来形容苏州话。初到苏州来的外地人虽然觉得苏州话好听，却闻而不明其意，原因就是“时有古今，地有南北”所形成的各种方言在音、韵、调上的差异。苏州话中“黄”、“王”不分（或称同音），因此，在提到这两个姓时，必定要讲清楚“三画王”还是“草头黄”。苏州的一些地名，往往因方言的关系辗转误读，致使一条很好的路名或街名在苏州人口中变成意想不到的特别与奇怪，并且这一读别的音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约定俗成。一些外地人，哪怕是同属吴方言的上海、常熟人，如在苏州问路问到这几个地名，如不按此音相问，也不能顺利得到满意答复。今汇集一些这方面的地名，供大家参考。

黄鹂坊，很有诗意，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写过“黄鹂巷口雏欲语，乌鹊桥头冰未消”的诗句。到了宋代，不知什么原因改称黄牛坊了。而现在苏州人却称之为“黄泥坊”。

吴趋坊，是苏州最古老的坊之一，“吴趋”是古代歌曲名。晋代陆机曾写过《吴趋行》，诗中写道“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因此，“吴趋”的称法最迟不晚于晋，因而，“吴趋”也就成了苏州的别称之一。“吴趋”两字，苏州人读作“鱼翅”。

临顿路是因吴王率军追击东夷，临时驻军停顿稍息之处，得名较早。唐代诗人陆龟蒙曾家住临顿里。苏州人将“临顿”两字读如英国首都“伦敦”。

养育巷、由斯弄、钩玉弄（1972 年改称塔影弄）都很雅，苏州人却将他们化雅为俗，分别称之为“羊肉巷”、“牛屎弄”、“狗肉弄”。

阊门外鸭蛋桥，其名很俗，一些苏州的文人墨客又将它化俗为雅，写作“阿黛桥”，也许是因为这一带民国时期曾是妓女集中的“红灯区”的缘故。

宜多宾巷，本作糜都兵巷，是为纪念宋代朝议大夫糜弈而命名的。不知什么原因什么时候改写为“宜多宾巷”了，并读别作“耳朵饼巷”。耳朵饼是一种不规则半圆形的饼，形如耳朵，甜中带咸，故名。

乔司空巷，因宋左丞相乔行简所居而得名，苏州人却称之为“乔师姑巷”。师姑在苏州话中是指尼姑，听来总觉得有点奇怪。

泰让桥，是为纪念吴国先祖泰伯奔吴让贤之举而命名，苏州人都叫它“太阳桥”，与原意相距甚远。

观前街的全称应为玄妙观前街，民国时期这条街曾开设了许多钱庄、金店，总之是管钱机构（单位）的集中地，老百姓因此将这条街戏称为“管钱街”。

护龙街是人民路的旧称，在环卫设施普及之前，苏州人普遍用马桶作为方便的容器。每当凌晨，居民都把马桶摆在自己家门口，让环卫人员集中运到指定地点清倒，因而在街的两侧摆着各种各样的马桶，人们形象地将这条贯穿苏城南北的街称为马桶街，而读音又恰巧与护龙街、卧龙街接近。

铁瓶巷，相传是因唐朝初年有一仙人在此枕铁瓶而卧，并遗留下一个铁瓶而得名，苏州人却称作“铁皮巷”，现在该巷已成为干将路乐桥以西的一部分而消失了。

都亭桥，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寿梦在阊门内建都亭驿，专门用来招徕四方贤士。据《吴地记》记载，唐时基址尚存。现在苏州人一般称作“都林桥”。

塔倪巷，据说是孙权建报恩寺塔（即北寺塔）时，造塔所用之泥一直堆到这里，因而得名塔泥巷。如今作塔倪巷反而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诸如此类音转、读别的地名，苏州还有很多。如称“马医科”为“蚂蚁（音米）窠”，称“游马坡巷”为“油抹布巷”，称“蔡汇河头”为“柴河头”，称“乘马坡巷”为“陈麻皮巷”，称“马大箓巷”为“马达头巷”，称“日晖桥”为“石灰桥”，称“莲目巷”为“莲蓬巷”，称“织里桥”

为“吉利桥”，称“西津桥”为“西星桥”，称“因果巷”为“鹦哥巷”，称“南濠街”为“南傲街”，称“梵门桥弄”为“眼门桥弄”，称“邵磨针巷”为“撞木钟巷”，称“葑门”为“府门”，称“(大小)柳枝巷”为“柳贞巷”，称“谢衙前”为“象牙前”，称“殿基巷”为“田鸡巷”(田鸡即青蛙)，称“镇抚司前”为“镇福寺前”，称“盛家带”为“盛家对”(不知哪家错)，称“中由吉巷”为“中油鸡巷”，称“调丰巷”为“调粉巷”等。从字音、字面上看，都与原名相距很远，甚至觉得有点儿滑稽。

另外，苏州人对附近城镇的地名也有特殊读法。如称吴江“芦墟”为“芦区”，“震泽”为“进闸”(不知是否有出闸)；吴县“陆墓”为“落亩”；称“浒墅关”为“许墅关”，称“唯亭”为“移亭”，称“阳澄湖”为“扬长湖”(不知是否有避短湖)，等等。

致于上述地名为什么这么读，一般苏州人是讲不出道道来的，恐怕还有待方言专家来分析研究。

(原载《江苏地方志》2000年第六期)

苏州历史地名臆说

翻开苏州的地方志，经常会看到一些地名古今不同的记载，如《吴郡图经续记》“姑苏山”条云：“或曰故胥，或曰故馀，其实一也。”那么，不同文字何以能够表示同一个地名呢？除了该地本身有几个名字以外，唯一的解说就是以不同的语言称呼同一个地名了。明代卢熊的《苏州府志》上说：“故胥台，台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苏，盖吴音声重，凡胥、须字皆转而为苏，故后人直曰姑苏。隋平陈，乃承其讹，改苏州。或者谓胥与输音相近，兵家不取。或又谓吴中鱼禾所自出，苏字兼之，故曰苏。”众所周知，在太伯奔吴时，今苏州一带在中原人眼中尚属“被发文身”的“荆蛮”之地。直到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还在“勾吴”下面注曰：“勾音钩，夷俗之发声也，亦犹越为于越也。”由此说来，地名的读别问题古人已经意识到是由于吴地的

方言“声重”,因此,我们不妨从音韵角度作些探索。今就苏州旧志中一些常见的地名作点臆说,或有一二可取者。

纵观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籍,通假字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以春秋时期吴国的称呼为例,《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奔之荆蛮,自号句吴。”《左传·宣公八年传疏》用“工吴”,金文中有“攻吴”的写法。《吴越春秋》一般作“勾吴”,但又有“故吴”的,其文曰:“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余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吴。”尽管此处所指吴国尚在今无锡梅里一带,甚至有人认为不在江南,但就其实质而言,当与迁都苏州的吴国一脉相承,所以仍然可以说是吴国的早期名称。《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有云:“吴旧号‘句吴’,盖方俗之辞,犹越之为‘於越’也。又说者曰:‘吴者,虞也。太伯于此,以虞志也。’”如果上述“工”、“攻”、“故”真的像“勾”一样是发音字,主体落到“吴”字身上的话,应该是同音字才合理,事实上,它们的韵母分别是“ong”、“u”、“ou”,只是声母相同。因此,我大胆臆说,所有这些都是中原人根据吴人发音的音译,而用一种语言音译另一种语言往往找不到一一对应的词,于是我们的先人便想出了反切之法,也就是说用第一个字的声母与第二字的韵母构成需要表示的字音。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勾吴”有那么多的写法就不足为怪了。至于后来省去“勾”音,只称“吴”,除了古人认为“勾”是发语词无意义的原因外,也可从音韵方面作解释。此类省去声母的现象不只是吴地,胶东半岛方言中将“日”念成“一”(入声字)也是这种情况。“吴”字在今天的吴方言中有三种读法:“Wu”、“ou”(浊上声)、“n”(鼻音)都是零声母,也失去了声母。“吴”字意义应该是吴地先民的图腾“鱼”,即所谓的“被发文身,以象龙子”;从文字的结构来看,它是鱼头、鱼身和鱼尾的象形,与“鱼”字同源,只是较鱼字省去了身上的鱼鳞纹。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旧方志上将“吴城”记作“鱼城”,《吴郡图经续记》上说“宜为吴城,谓之鱼城,误也”。其实“吴”与“鱼”在吴方言中同音(“n”)、同意不同形,确切地说是异体字,根本谈不上错不错。本文开头提到的“姑苏”,《吴郡图经续

记》认为与“故胥”、“故馀”所指相同。笔者认为这三种说法最初时候可能也是“句吴”的记音，理由是它们的首字声母相同，“苏”字在吴方言中读“Sou”，韵母与“吴”的第二种读法相同，“馀”字现在汉语中与“鱼”同音，在古代也应该与“吴”的第三种读法相同；再从字形分析，“苏”字由草字头和鱼、禾组成，如果是形声字的话，“鱼”很可能就是声符，这样无疑与“鱼”是同音字了；从文字学角度说，“馀”字是“余”的后起字，它的初始形状也应该是“鱼”的象形，古代汉语中常常用以表示第一人称，时至今日，吴方言中的第一人称尽管各地略有差异，但是还或多或少与“吴”、“鱼”的几种发音相接近，如苏州城里多数人将第一人称念同“鹅”；城郊如长桥一带则说“奴”；吴江盛泽作“吾”；吴江黎里称“n 鹅”或“n 奴”；吴江震泽人是“n 啊”等等，也许这“余”字表示第一人称最初就是来自吴方言也未可知。

类似的情形在苏州的城门名上也有体现，今分述如下：

阊门，《吴越春秋》云：“立阊门者，以象天门，通阊阖风也。”《淮南子》曰：“排阊阖，沦天门。”注云：“阊阖，始升天之门也；天门，上帝所居紫薇宫门也。”《吴郡图经续记》则说：“其西曰阊门者，象天门之有阊阖也。”元代高德基《平江纪事》云：“阊门，旧名阊阖门，阖闾时所名也。旧有重楼阁道，吴之丽谯也。夫差从此门出兵伐楚，改为破楚门。吴属楚，遂名阊门。”这些记载都是比较可靠的史志类文字，作者试图从阊阖门的原始意义上解释当年伍子胥取这个名字的原因，恰恰没有说明“阊阖门”为什么在许多书上都记作“阊门”。笔者以为，在古人看来这根本不用解释，“阊门”是“阊阖门”的切音，简单地说“阊阖门”念得快点，即古书上所谓“急读”就成了“阊门”。

“相门”，旧志上记作“将门”或“匠门”，《吴地记》云：“匠门，又名干将门。”《吴郡图经续记》则曰：“曰将门者，吴王使干将于此铸宝剑。今谓之匠，声之变也。”宋代的朱长文在编志时已经注意到了古今音的变化，提出了“声之变”的理念。其实“将”也好，“匠”也罢，

都是“干将”两字的合音，因为在音韵学上，如今现代汉语中的“g k h”与“j q x”在古代是同一套声母。

葑门，《吴郡志》云：“《续图经》谓作封门，取封禺山以为名。封禺，今属吴兴，亦未有据。按《史记正义·吴世家》‘吴东门’解云：阖闾城无东门。引《吴俗传》：越伐吴，伍子胥见梦越军，令从东南入，越王乃回向三江口岸，筑坛祭子胥，乃开渠自罗城东开门入吴，至今犹名示浦门，曰鲃鲋门。又《伍子胥传》‘吴东门’解亦云：东门，鲃门，谓鲋门也，今名葑门。越军开示浦，子胥以涛荡罗城开此门，有鲃鲋随涛入，故以名门。顾野王云：鲃鱼，又名江豚，欲风则涌。”《吴郡图经续记》：“方言谓封曰葑，葑者，茭土胶结，可以种植也，其事或然。”《吴地记》云：“东南角又有鲂鳏门，吴曾鲂鳏见，因号。”不论是从历史事件，还是从文字的字面出发，古人都在寻找着该城门得名之由。依笔者拙见，苏州地处水乡，东城门以鱼命名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鲂”是鳊鱼的古称，徐珂《清稗类钞·动物》“鲢”字条下说：“俗呼白鲢，亦名鳏鱼。”而鳊鱼和白鲢在苏州地区是最普通不过的鱼，《诗经·小雅·采绿》曰“其钓维何？维鲂与鳏”，可见，在春秋时期，这两种鱼已很多。可是宋范成大的《吴郡志》在引《吴地记》时将“鲂鳏门”改作“鲂鲋门”，从字面上看，也就是说将“白鲢”换成了“江豚”。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音韵方面考察，就会发现它们的切音都是“Fu”，正是今天苏州人对“葑门”的读音。其实“封禺”未必是指吴兴的封禺山，也是记音的反切上下字。

上述种种纯系个人一时忽发奇想的臆说，合理与否，尚待进一步研究。

（原载《传统文化研究》第九辑，白山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苏州书事

苏州人的刻书、藏书、著书、读书

哲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让人聪慧,读书让人睿智;读书是一种情调,读书也是一种享受。一人读书是一种清净的快乐,可以细细品味读书的愉悦;与他人共同读书,则能把愉快放大,让书的阳光温暖我们的生活。

苏州人爱书,由来已久。

苏州历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士宦隐退之邦,撰著之多,雄冠东南。唐以前,书籍的流传都赖手抄。南北朝时,吴郡陆澄家有万卷藏书,在当时已堪称私家藏书之首。据史料记载,唐大和九年(835)苏州已有民间刻印的历书在市场上出售。宋元以后,苏州各级地方官府、郡学书院,以及寺庙相继进入刻书行列,坊刻、私刻不断增多,客观上为大量藏书提供了条件。宋元两代,苏州有案可稽的藏书家已有 11 人,其中叶梦得藏书超过 10 万卷。到了明代,苏州成为全国刻印书籍的中心地区之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说:"凡刻书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就官刻而言,在府县中,苏州刻书最多。从事刻书业的书坊,苏州多达四五十家。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出现的翻刻、仿刻宋版书热,也发端于苏州私刻,延及坊刻、官科,其中精刻、精印者几可乱真。自万历至崇祯的数十年间,有许多湖州、歙县的刻工移居苏州,进一步推动了苏州刻书业的发展。当时许多刻书家又是藏书家,所以刻印都较精审。其中沈辨之的野竹斋、王延哲的恩褒四世之堂、金李的泽远堂、顾春的世德堂、苏献可的通津草堂、郭云鹏的济美堂、徐时泰的东雅堂等私家刻书为收藏家所称赏。有明一代,苏州藏书家已有64 人。

清代,苏州的江苏官书局以其刻书时间之长(1865~1914),品种之多(206 种,1632 册),为全国各大书局之冠。在众多的书坊中,

有不少是明代延续下来的。由于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嘉道以后，部分书坊不再自己刻印书籍，转而以贩卖书籍为主。当时的私家刻书仍较发达，较有名的如吴志忠的璜川书屋、段玉裁的经韵楼、王鸣盛的洞泾草堂、顾广圻的思适斋、谢家福的望炊楼、潘祖荫的滂喜斋、毕沅的经训堂等。而藏书则崇尚宋本，苏州也不乏名家，许多藏书家都精研目录、校勘、版本之学，其中黄丕烈的士礼居特聘顾广圻等名家校书，所刻均堪称善本，黄氏家藏两百种宋版书，也是一般藏书家不能企及的。

民国时期，除文学山房、扫叶山房等仍有木版印刷的书籍外，大多数书坊转以收购及发行古今图书为主。其中毛上珍丽记刻字铺(1935 年发展为印刷所)等实际上已迹近小型印刷企业。私家藏书多承祖业，如潘家、顾家均是。公共图书馆逐渐成为藏书的主体。据民国 20 年统计，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藏总数为 10528 种，87060 册。此外，东吴大学、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苏州蚕桑学校、苏州农业学校、苏州中学、、振华女校及晏成、慧灵、景海、桃坞、翠英、英华等学校都有图书馆，大多有数量不等的藏书，是民国时期苏州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后，苏州各大企事业单位相继建立图书馆。据 1985 年统计，苏州图书馆藏书 84 万册，苏州大学等 9 所大学共有 266.37 万册图书，10 所职业大学有 27.32 万册，29 所中学、23 所中专和职业中学共有 136.92 万册，22 个产业工会、4 个区工会及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已有 757 个图书馆(室)，藏书量为 111 万册，市区 12 家医院及医学会拥有 14.86 万册，苏州博物馆资料部藏书近 7 万册，西园寺和灵岩山寺藏经楼所藏经书 9 万多册。累计藏书总数为 640 余万册。其中已作善本上报的古籍有 1411 部 38029 册。

近年来，苏州广播电视报连续举办“十大青年藏书家”的评选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州人爱读书、爱藏书的风气至今绵延不断，经久不衰。据 2008 年 10 月 12 日为期 15 天的苏州书市落下帷幕之时的统计，共计销售各类图书 15 万余册，每天 1 万多册的销

售量，比上年增长了 12.3%，更说明了苏州爱书人之多。

从历史上的刻书、藏书，到今天的“苏州阅读节”[1]，更有为数众多的编书、出书单位和个人，共同打造了苏州“书文化”的繁荣。以 1996 年 8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江苏艺文志·苏州卷》为例，共计 4 册，约 260 万字，著录了上古至清末苏州籍及定居苏州人士 9178 人的全部著作 3 万余种，为全省 11 个省辖市之冠。[2]之后，2005 年和 2009 年先后由广陵书社出版了《苏州民国艺文志》上下两册和《苏州当代艺文志》5 册，作为《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的补充；2008 年 12 月，广陵书社又出版了《东山艺文志》20 多万字。所有这些，无不显示着苏州作者之多、著述之盛。

王蒙说：“一个经常读书的人，他会更沉静，他会更文雅，所以读书关系到我们的一生。”（《光明日报》2009 年 4 月 30 日）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中央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正是迎合了当今社会的终身学习的潮流。苏州人与生俱来的温文尔雅，恐怕与悠悠爱书情结不无关系。

链接：江澄波等《江苏刻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

苏州藏书楼

中国是世界上最爱读书和藏书的国家之一，延绵数千年的藏书文化是中华民族堪为珍视的传统。就江南而言，早在春秋时期，

---

1 今年 4 月 23 日历时半年的第五届苏州阅读节开幕，主题为“阅读让苏州更美丽”，期间，将举办 20 多项主题活动和 1200 项系列活动。

2《江苏艺文志》南京、无锡、扬州卷均只有上下两册，常州、镇江、南通卷各为 1 册，盐城卷与淮阴卷、徐州卷与连云港卷，均为合 1 册。

常熟言偃从孔子学,成为道启东南的文学始祖。江南逐渐开化,从"披发文身""好勇尚武"向读书崇文转变。据史料记载,汉代有个朱买臣,家里很穷,却喜欢读书,每天要到穹隆山里打柴补贴家用,每当休息时候,总要在一块大石上读会儿书,并将书藏在山上的破庙里。后来朱买臣衣锦回乡,当了会稽太守。朱买臣读书的石头被后人称为朱买臣读书台,庙也改称藏书庙,庙的所在地叫藏书乡(今藏书镇)。这恐怕可以算是江南最早的私人藏书故事了,这座藏书庙也许就是最早的私人藏书楼。

南朝齐吴郡人陆澄,家藏图书万余卷,博学多闻,王俭称之为"书橱"。他应该是江南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藏书家。家里是否有专门的藏书楼,不得而知。唐宋时期,藏书的风气更盛。据1995年出版的《苏州市志》"图书"卷记载,家中有万卷以上图书的明代以前的藏书家有陆龟蒙、徐修矩、朱长文、章甫、贺铸、叶梦得、卫湜、俞琰、陆友、袁易、沈景春、张雯、虞堪等十多家,其中叶梦得家藏书超过10万卷,与宋宣献同称两大藏书家,家中建藏书楼绀书阁,列藏书目录供众人检阅。可惜在绍兴十七年失火,藏书楼连同全部藏书化为灰烬。元代著名藏书家杨维桢非常推崇叶梦得,他说"夫书之能藏者不难,能读者难;能读者不难,能用者难也。书藏而不读与无等,读而不用与不读等"。叶梦得一生抄书、校书、藏书、读书,从不间断,真正做到藏而能读,读而能用:用于整理、研究图书,用于著书立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藏书家。

全国各地曾有过近千处藏书楼,其中江浙两省最为集中,特别是江苏苏州的吴县和常熟、浙江宁波的藏书家和藏书楼最为突出。吴晗《江浙藏书家考略》收录了490位藏书家,在该书序中称"以苏省之藏书家而论,则常熟、金陵、维扬、吴县四地终为历代重心"。苏州就占了其中两家:常熟和吴县。

吴县(今已融入苏州城区)先后出了150多位藏书家,有案可查的藏书楼有沈周的有竹居、吴宽的丛书堂、徐澄的望洋书堂、顾德育的安雅堂、沈与文的野竹斋、钱谷的悬磬室、吴岫的尘外轩、俞

弁的紫芝堂、刘凤的清举楼、顾苓的云阳草堂、彭年的寒绿堂、范必英的万卷楼、惠周惕的红豆书屋、何焯的赀砚斋、顾嗣立的秀野草堂、蒋重光的赐书楼、陈墉的西畇草堂、周锡瓒的水月亭、顾之逵的小读书堆、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袁廷梼的五砚楼、葛香士的澂波皓月楼、张绍仁的绿筠庐、汪士钟的艺芸书舍、顾沅的艺海楼、蒋凤藻的书钞阁、潘祖荫的滂喜斋、叶昌炽的明哲经纶楼、王仁俊的籀郘簃、吴梅的奢摩他室、张炳翔的仪许庐、邓邦述的群碧楼、曹元忠的笺经室、潘承厚的宝山楼、潘承弼的著砚楼、王謇的澥粟楼、顾鹤逸的过云楼等几十家。

常熟的藏书家在《中国藏书家考略》、《江浙藏书家考略》中都收录了 84 人。1990 年出版的《常熟市志》专门设立了《藏书著述》编，辑录了 130 多名藏书家。曹培根先生据《江苏艺文志·苏州卷》等书统计，常熟历史上有名可查的藏书家有 270 多人。其中知道藏书楼名的有虞子贤的城南佳趣、陈察的虞山精舍、孙楼的博雅堂、赵琦美的脉望馆、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钱曾的也是园、庞泓的步云楼、席鉴的扫叶山房、吴蔚光的拥书楼、陈揆的稽瑞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瞿绍基的恬裕斋、黄廷鉴的红豆山房、钱培名的小万卷楼、瞿镛的铁琴铜剑楼等 80 多家。潘祖荫的《滂喜斋丛书》所收《稽瑞楼书目序》称："吾乡藏书家，以常熟为最。常熟有二派：一专收宋椠，始于钱氏遵王绛云楼、毛氏汲古阁，而席氏玉照殿之；一专收精抄，亦始于钱氏遵王、陆孟凫，而曹彬侯殿之。"而且常熟的藏书家大多秉承藏书致用的原则，张海鹏提出"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张金吾也抱着"乐与人共，有叩必应"的态度，将私藏提供大家使用。据《常熟市志》记载，铁琴铜剑楼、脉望馆、爱日精庐和徐兆玮的虹隐楼 4 处藏书楼现尚存，并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铁琴铜剑楼与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浙江湖州陆心源"皕宋楼"、浙江钱塘丁丙"八千卷楼"合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铁琴铜剑楼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常熟市区以东古里镇，始建于清乾隆

年间，原名“恬裕斋”，创始人瞿绍基取“引养引恬、垂裕后昆”之意，命名其藏书室。瞿氏第二代，绍基之子瞿镛，对鼎彝古印兼收并蓄，在金石古物中，瞿氏尤为珍爱一台铁琴和一把铜剑，“铁琴铜剑楼”由此得名。瞿镛时聚书已达 10 万多卷，有“南瞿北杨”之称，享誉海内外。晚清四大藏书楼中，铁琴铜剑楼巍然独存。该楼始建于嘉庆元年(1796)，原有四进，其中第一、二两进毁于抗日战争中。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恬裕斋”所在，曾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因避光绪帝载恬之讳改称“敦裕堂”。收储多为乡邦文献以及未收入《铁琴铜剑楼书目》之宋元明本及旧钞批校诸书，长篇巨著不多，累计比储后楼者为少，分置东西两壁书箱中；第三、四两进即今仅存之楼，亦即“铁琴铜剑楼”所在，是坐北朝南三楹回式楼房，中有小天井相隔，每进二层，面阔三间 8.87 米，进深七架 6.65 米，楼结构为垂檐硬山造，用叠落山墙，江南呼为马头墙。下檐施撑拱，雕有精巧的夔龙纹，装饰显示了苏南一带的建筑风格。此楼的第三与第四进楼上供藏书之用，第三进楼下则为读书处，第四进楼下为家祠，同时收藏古物、石刻，楼下右方原有梯登楼。瞿氏藏书向来对读者开放，甚至为远道而来者提供食宿之便，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除部分遭劫外，绝大部分藏书于建国初由瞿氏后人捐赠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等。

解放后，该楼由国家接管。楼名最初为孙星衍所书，1982 年李一氓先生重书楼额，同年 11 月公布为县文物保护单位。1986 年，省政府拨专款修缮一新，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1 年，常熟市人民政府再度拨款修葺，楚图南先生再书楼额。于楼内用图文并茂的版面介绍、展览柜的实物介绍、当代书法名家的墨迹介绍，反映该楼旧藏面貌，褒扬瞿氏世代爱书、藏书、护书、献书的事迹和对祖国文化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命名为铁琴铜剑楼纪念馆，于 1991 年 12 月 5 日正式对外开放。为保护开发好历史文化资源，并进一步弘扬传统文化，2002 年市对铁琴铜剑楼纪念馆进行了整体维修，力图营造出当年藏书楼的文化氛围，并用图文并茂的版面、部分实

物和当代书法名家的墨迹，反映古代私家藏书楼的原有风貌。2003年6月18日通过近半年时间整修，修缮一新的“瞿氏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重现风采，并对外开放。

随着岁月变迁，现留存于世的藏书楼已经为数不多，即使基本留存下来的，命运也大都岌岌可危。有的已“书去楼空”，仅存的楼也被张冠李戴移作他用了。还有一些藏书楼，由于历史变迁、家道变故，残破不堪岌岌可危，有的甚至一拆了事难觅影踪。而他们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光辉业迹却永照千秋。历代经藏书楼保存流传下来的大量珍贵典籍，多成为现代许多图书馆的镇库宝藏。有的藏书楼其楼虽已不在，而其藏书实辗转递藏至今。如常熟赵宗建的旧山楼，虽然现仅存坐东面西的平屋三间和一株树龄约二百余年的红豆树，但其曾藏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最负盛名，是经钱谦益、钱曾、季振宜、何煌、黄丕烈、汪士钟诸家递藏的秘籍。清末民初旧山楼藏书大量散出，为丁祖荫缃素楼所得，丁氏去世后，藏书大量流入市肆。1938年5月，《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从丁家散出，郑振铎叹为国宝，并称这是仅次于敦煌卷子的重大发现，特筹资九千元，辗转从居为奇货的书商处购归。该书所有242种元明杂剧现藏国家图书馆。苏州黄丕烈是嘉庆年间东南藏书家之巨擘，在苏州城内迁过几次家，用过多个藏书楼名，如百宋一廛、陶陶室、士礼居等，他购求宋本藏书不遗余力，人称“书淫”。明末清初，常熟的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昆山徐乾学的传是楼和季振宜的静思宜、怡府的乐善堂等藏书相继散出，大多成为黄丕烈家藏，与周锡瓒的水月亭、袁廷梼的五砚楼、顾之逵的小读书堆并称当时吴郡四大藏书家。黄氏藏书在其身后为汪士钟的艺芸书舍所得，其他周、袁、顾三家为瞿氏恬裕斋所得。道光年间，汪氏藏书的部分和陈揆的稽瑞楼、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最后又成了铁琴铜剑楼的藏书。

古人谓典籍聚散有“五厄四劫”之说，私人藏书往往人存书聚，人亡书散。藏书聚之难，护之尤难。苏州历史上这么多的藏书楼，现

在大多已烟消云散，黄丕烈的百宋一廛、顾沅（湘舟）的艺海楼、邓邦述的群碧楼、顾鹤逸的过云楼、吴梅的奢摩他室、王謇的瀣粟楼都仅存遗址，不复为藏书之用。但历代藏书家不辞辛劳，有的人为收藏传代典籍而节衣缩食，甚至倾家荡产。他们留下来的诸如薛福成的“存古开新，兴贤育才”等遗训，对当今继往开来的图书馆事业工作者来说乃是至为宝贵的一笔精神财富。

铁琴铜剑楼虽然已是一个纪念馆，但其藏书在解放前后，已由瞿氏后人本着先人“化私为公”的遗愿，先后多次将全部藏书捐献给国家，使之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瞿氏五代藏书楼主瞿绍基、瞿镛、瞿秉清、瞿启甲、瞿济苍、瞿旭初、瞿凤起都淡泊名利，以藏书、读书为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民国数朝，以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著称于世。然而瞿氏藏书得以五世连绵、百年不散，一因藏书有方，二因护书有功。藏书有方，瞿氏对于藏书除平日有专人管理外，“每岁必取出一曝”，曝书有一定时日，所藏书因保存得法而能完好如新，历久不蠹。护书有功，自 1860 年至 1930 年数十年内，瞿氏藏书险遭四次大难，五代楼主“宁舍腴田百十亩，不弃秘笈一两橱”，多次将珍本善本分散转移各地，力保藏书不被损毁。不仅显示了瞿氏世代人的爱国热忱，也标示了藏书家恢弘中华民族文化典籍的远见卓识。

传统私家藏书楼就其基本性质来讲是私人财产，藏书是一种个人行为，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以个人力量支撑庞大的私家藏书行为显然已经难以为继。有人说，当今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知识和信息的获得可以依靠方便快捷的网络，似乎连纸质图书都将走向式微，更不用说藏书楼了。其实那是忽略了公众阅读的习惯，数字和网络追求的是目的和结果，而纸质图书的阅读，追求的是过程和行为，决不可替代。作为传承历史文化载体的图书，以及图书的承载体藏书楼和藏书文化对于百姓具有很强的感召力和教化功用，只要引导得当，支持有力，藏书楼这一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底蕴的老树必将能够焕发新生。

（原载《传统文化研究》第十五辑，群言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友情链接：庄吉编著《昆山历代藏书家》，2007年内部资料。

山塘的书院学舍

在苏州，一提起山塘，人们往往就会说，这条街很古老，曾经很繁华，特点是古桥多、寺庙祠堂多、牌坊多、会馆公所多。不错，自从唐苏州刺史白居易开挖山塘河、修筑七里山塘以来，这河、这塘便成为连接苏城最繁华的阊门地区与“吴中第一名胜”虎丘的水陆两道纽带。于是，历代骚人墨客或陆行或放舟，徜徉其间，吟诗作赋，留下了不少描写山塘景色的题咏诗文，清乾隆年间陆肇域、任兆麟所编《虎阜志》多有收录。至于山塘的民风民情，顾禄的《桐桥倚棹录》述之较详。今天，我们仔细翻阅这些先人留下的旧志，仿佛看到当年金阊门外，山塘涵波，万瓦鳞次，花晨月夕，画舸填塞，珠帘翠幔掩映于山光塔影之中，近山村落，小渚萦回，野田疏豁，与云岩之平远秀丽相映发。此情此景毫不逊色于六朝故都南京秦淮河上的风光。在漫长的岁月里，七里山塘上曾演绎过“唐伯虎点秋香”的浪漫，冒辟疆与董小宛的痴情。每当春秋佳日来临，文人雅士常泛舟山塘，“知之也深，爱之也笃”，屡有购地建别业其间者，或为读书休闲，或为退隐山林。曾几何时，这里俨然成了仕宦和学子的集散地，渐渐地，这里便有了类似今天学校、图书馆功能的书院、社学以及私人藏书楼。

人们常说苏州人文荟萃，但高层次的人才（过去的状元、进士，今天的院士、高工等高科技人才）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有大量的基础教育作为其前提的。资料显示，山塘作为明清时期苏州“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却也是苏州的基础教育基地。今试就山塘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书院、社学以及私人藏书楼作点钩沉，供

同人参考。

和靖书院，在虎丘云岩寺西，原系和靖先生尹公焞在绍兴年间的读书处。嘉定七年(1214)，“郡守陈君茀始因郡人黄士毅等请，即三畏斋之旧，绘像建祠”。宋端平二年(1235)，提举曹豳奏请即和靖先生西庵祠为书院，以“和靖”为额，建三省、务本、时习、朋来四斋。刘宰《新建和靖书院记》略谓：“初，(尹)先生退自经筵，来馆于此，犹榜曰‘三畏斋’，其持敬不倦如此”；曹君“以为貌像之有严，虽有慰典刑之仰，而佩衿之益远”，不如“略仿先朝四书院之制，立祠筑室以舍学者，买田收谷以食之，而储书其中，庶履其地必思其人，诵其书必求其旨”。用刘宰的话来说，当时“吴人迷于佛而不知返”，曹君此举“不惟有以光昭我高宗皇帝之圣德，抑有以美教化移风俗”。后来，提举马述增建君子堂。嘉熙四年(1240)，提举陈振孙又建藏书堂。咸淳初，李茀建燕居堂以奉先圣。文肇祉《虎丘山志》云：“至元中，和靖书院为发宋陵贼杨总统毁之。”延祐元年(1314)，移置郡治(在乌鹊桥北，宋常平提举司故址)。明嘉靖十七年(1538)，吴县知县汪旦仍建祠于故址。顾湄说：“虎丘名流不乏，而理学先贤惟和靖一人。”黄干《新建和靖先生祠记》云：“先生讳焞，洛阳人。年二十，师伊川程子。举闱策士议元祐党人，不答，遂弃举子业。靖康初，以布衣召，不至。诏褒为和靖处士……每迁辄力辞”，“凡二十辞”。金人陷洛，焞全家遇害，他死而复苏，绍兴九年(1139)来到平江(今苏州)，自此寓居虎丘西庵十年。“考先生之所学，笃于践行，不为虚语。”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位注重务实的学者。无怪乎陈、曹、马、李诸君对他如此推崇，要将他的祠堂一再增建了。

正心书院，在斟酌桥西，明崇祯十六年(1643)，吴县知县牛若麟建以祀先贤周、程诸子，后为学舍，称正修讲院。若麟去任后，百姓将它立为生祠。徐汧撰《去思碑》。巡抚马祜改名正心书院。归圣脉作记。顺治初，为陆孝廉坦卖卜处。坦，字履常，世居山塘里，好读书，举崇祯乡试。与杨廷枢、郑敷教、许元溥合称吴门四孝廉，俱以名义自持，为乡里清议所宗。乾隆年间书院已废。

清和书院，在虎丘二山门外左偏，亦名吴郡守祠，建于康熙六年（1667），祀苏州知府吴道煌。道煌，字瑶如，宛平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康熙二年（1663）知苏州府。他以宽厚仁政深得民心。时民困于赋，积逋累数百万，道煌悉停止，曰："吾愿以一官缓民须臾死。"终因欠赋而被罢官。去后，民思之，遂立祠虎丘，宋德宜有记。徐崧《过清和书院吴园次郡侯》云："风前帐卷扬轻罗，雨后窗开对绿波。最是重阳前二日，晚晴天气以清和。"

讲德书院，在绿水桥东，亦名韩中丞祠，祀巡抚都御史韩世琦。建于清初，乾隆十九年（1754）重建。吴伟业写了《讲德书院记》，说江南素来是赋税较重的地区，韩公在任巡抚期间，奏请免除了"十五年以前旧赋"，并"撤姑苏驻防之兵（满兵）还京师"，有"惠泽于兹土"。"吴民欢欣鼓藻，拜首叩门者日累万人。公推让不居，曰：此乃朝廷如天之赐，抚臣何力之有？"为了报答韩公，苏州的父老乡亲商议给他设立专祠，创为讲院，让"黄发儿齿，循阶及序，相与论说敬君事上之礼"，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为国效力，以体现韩公归德于上，"仰答朝廷之盛心"。惜毁于咸丰十年（1860）战火。

道南书院，原在黄鹂坊桥，是明南京兵部尚书杨庄简公成的专祠。后移至虎丘二山门内二程夫子祠隔壁，祀宋龟山先生杨时，亦名杨文靖公祠，明兵部尚书杨庄简公成、端孝先生大漼、忠文先生廷枢附。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布政使杨朝麟建。乾隆三年（1738）奉旨发帑修葺。乾隆三十二年重修。

静宁书院，亦名慕公祠，在井亭弄，祀巡抚慕天颜。天颜，字鹤鸣，静宁人，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康熙九年（1670）任江苏布政使。凡七上疏，要求"减浮粮，除荒坍，治淮黄，宽涸田，调守令，均田役，给囚粮"。居七年，擢巡抚，复以逋赋不征再请酌蠲，开浚白泖河，东南百姓受益焉。故为之建祠。

养正书堂，在白莲泾虎丘清节堂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改设私立养正初等小学堂。

查公书院，文《志》载："在君子亭西偏，明河南布政使查应兆读

书处,子懋光亦居之。”应兆,字瑞征,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除工部主事,官至河南布政使。谢归,徜徉山水间,筑室虎丘西原,人称查公书院。《虎阜志》云:“今废。”

都官书院,文《志》载:“龚曾之读书处。”《虎阜志》云:“今莫考。”

甫里书院,在虎丘山下塘,旧在长洲县治东,乾隆四十九年陆龟蒙裔孙肇域移建虎丘,咸丰十年毁,只剩头门。光绪十五年甪直镇绅士沈国琛等捐巨款在甪直鲁望祠畔重建书院。

普济社学,在普济桥西。明初苏州卫奏建,以教官军子弟。成化二年(1466)提学御史陈选修,兼育民间俊秀。隆庆元年(1567),知府蔡国熙、知县魏体明重修。

艺芸书舍,在山塘,道光年间汪士钟的藏书处。当时堂宇轩敞,树石萧森,堂中悬阮元隶书楹联:“种树似培佳弟子,拥书权拜小诸侯。”苏州藏书家,自康雍之间碧凤坊顾氏、赐书楼蒋氏后,嘉庆时以黄丕烈百宋一廛、周锡瓒香岩书屋、袁廷梼五砚斋、顾之逵小读书堆为最,后尽归士钟,可见艺芸书舍的藏书,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堪称苏州之最。我们今天还可以从汪士钟所编《宋元书目》中了解其所藏的善本书。可惜的是,咸丰庚申以前,汪氏藏书已开始散失,佳本往往被聊城杨以增所得,兵燹以后,遂荡然无存。

除此以外,山塘上有案可稽的历代文人读书处尚有:太仓王锡爵昆仲的读书处东岭草堂;编修汪钝翁的读书别业丘南小隐;词人戈载筑在星桥南的校词读画斋;朝议程秉义所筑在青山桥西的吟啸楼;都转蒋华的藏书楼万卷楼;顺庆太守皇甫录的近峰别业;行人姜垓的山塘小隐;大学士吴一鹏的玉涵堂;画家陈芑汀的白堤花隐;处士邢参在西原的读书处;太守任兆炯在斟酌桥畔的一榭园;御史程梓园的则学草堂等

许多年过去了,山塘也因种种原因不再繁华。历史的尘埃已湮没了这些名人的足迹,但是这山塘还是那条山塘,这里有着苏州的文化、苏州的人文,这古老的山塘上每座房子、每一座桥梁、每一个

建筑物都是山塘历史的一部分，值得人们去研究。这里钩沉的书院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们曾经是苏州文人读书以及教育子弟的场所，如能深入研究，也许能对回答为什么苏州人文荟萃有所启迪，可能对今天的教育事业发展有所帮助。

（原载《七里山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

苏州的书店

苏州自古人文荟萃，书香门第特多，又是文人雅士经常聚集之地，书籍的需求量相当之大，客观上刺激了刻书业的发展。到了明代苏州已是我国三大刻书中心地区之一。与其他行业一样，最早的书店是集刻印发售于一体的前店后坊式书坊。清代嘉庆、道光以后，一些书坊不再自己刻印书籍，转而以贩书为主，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最早书店。在苏州旧式书市中要数创办于光绪年间的文学山房最为有名。

清朝末年以来，苏州书市大体有三个中心：自察院场至饮马桥一带为旧书肆集中地，察院场到玄妙观则为新书市场，玄妙观广场折入牛角浜是小书摊。在辛亥革命到解放初期那段时期，苏州除了新华书店以外，先后存在过37家私营古旧书店。我国许多文坛名流对苏州的书市津津乐道，谢国桢、郑振铎、阿英等，访书是他们每到苏州的“必修课”，特别是“淘旧书”的乐趣是非圈内人难以体会的。苏州历史上也是出藏书家的地方，所以一些从故家流传出来的稀有之本，往往能在不经意中于旧书店淘得。据谢国桢的《江浙访书记》记载，民国元年，傅增湘先生在苏州书贾杨馥堂手中购得的原刻本洪武《苏州府志》，几乎已成海内孤本。之所以称“淘”不说“买”或“购”，那是因为对买方而言，称意的好书需要花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

吾生也晚，未赶上与诸名家同淘旧书的好“辰光”，然而吾生也

幸，却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苏州书市在经历了一段沉寂以后，又勃发了更加辉煌的生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州的集体、个体书店纷纷开张。笔者 80 年代中期来苏工作，适逢其盛，很大部分工余时间是在书店度过的，饱尝了淘书之乐。临顿路上的学术书苑、凤凰街的古香阁、公园路上的百花书局和新文化书店、民治路的企鹅书店、富仁坊的苏州书店、沧浪亭附近的慈纯书店和吴中书城、苏高中边上的教育书店、十梓街苏大西侧大家书店和东吴书屋、乌鹊桥路上的考试书店、十全街的艺术书店等等，都曾留下我淘书的足迹。这些书店尽管面积不大，可却各具特色，如学术书苑侧重法律，百花书局以评弹书籍和磁带为特色。书店中也不乏慧眼独具的经营者。因此在多年的“淘书生涯”中，我也屡有收获。记得曾在原沧浪区法院位置上的新苏州书城购得马叙伦的《石屋余沈》和《石屋续沈》，在因城建拆迁而移址乐桥西侧的苏州书店喜获徐邦达的《历代书画家传记考释》，在古旧书店则得到了补白大王郑逸梅的《清娱漫笔》。这几册书可谓品高价廉，每本都在一元以下。这在书价不断攀升的大环境下无异是很具吸引力的。

曾几何时，苏州在城市做大的同时，书生意也在不断扩容。威尼斯商厦首开图书中心，接着苏州的一些大商场如人民商场、“一百”、“长发”、苏州商业大楼等相继开办或大或小的书市；东环路上有了图书批销中心，观前改造以后的苏州新华书店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书城，爱书之人徜徉其间，往往会忘却时间的消逝。与此同时，苏州的个私书店也在悄悄的发展，不说“小企鹅”变成了“大企鹅”，“古香阁”开了干将路分号。苏州的图书市场虽然几度乔迁，却红火不减当年。在西北街、东北街和锦帆路先后开出的拾得、太白、陶然旧书店，以及苏州古旧书店的特价专柜，颇受囊羞的读书人欢迎，在那里或许可以体味到郑振铎们淘旧书的乐趣和真谛。

如今，经过市场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上述许多书店都已成为了过去时。而临顿路下塘文学山房后人江澄波先生开的文育山房（现已经搬到大儒巷），尽管面积不大，却依然是爱书人淘书的

好去处！

链接：

从“沧”与“沦”混用想到的

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书店自然就是读书人的“粮店”了。苏州向多文人，据说，清代汪钝翁曾以状元作为苏州的土产，使自夸本乡土产多的同僚们哑口无言。如今，虽然早已远离科举时代，但喜文爱书的现代苏州人毫不逊色于古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苏州的书店是越办越红火，而且还首先推出了书籍“论斤购买”的“绝招”。

笔者忝列文人之列，也很喜欢书，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嗜好就是逛书店。对我来说，逛书店犹如女人逛服装店，百逛不厌，每此都或多或少有点收获，但也总免不了有些遗憾。记得有一次在书店买了一册中国社科院出版社出版的《胡绳诗存》，回到家里“细睹为快”，发现其中有《苏州杂咏》六首，当即展卷吟咏。其二《旧学前》曰：“沦桑历尽古苏州，十里烟花处处楼。北塔应知扶杖客，踟躇难觅旧桥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首句第一个字“沦”是“沧”字之误。我们先不去追究这到底是作者笔误还是编校失察，一本实际字数不足3万字的诗集，就算没有其他差错，对读者而言，已经是够“伤心”的了，更何况这书是自己“精心”挑选的呢？

近年来，打击假冒伪劣商品的呼声日高。安徽商界为响应1996年初在全国范围内的“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率先向社会作出“假一罚十”的承诺，但终因“王海”们的“火眼金睛”，致使安徽省44家大中型骨干商业企业这一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假一赔一”规定，近乎向消费者开出“空头支票”的重诺，因难以“贴现”而偃旗息鼓。今年的“3·15”刚过，从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上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似乎仍不容乐观，惟独对书刊的质量好像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记得也是在1996年，上海的三大报纸曾有过“咬文嚼字”活动，虽然仅局限于某一天的报纸，但是对报社的老总而言，却需要莫大的勇气，在书报界开了个欢迎“王海”捉错的好头。这种做法有利于提高编校人员的责任心，进而达到提高报纸质量的目的。

质量是一切商品的生命，书报也不例外。试问，一本错字连篇的书，读者何堪卒读？有时编者的一时疏忽，还会闹出笑话。有一次，笔者在书店里翻阅一本天津某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佛寺》，发现目录上有几个苏州的寺庙，便想浏览一下，想不到“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此书竟然将“灵岩寺”与“云岩寺”

(即虎丘寺)混为一谈,大意是说:灵岩寺就是虎丘寺,距苏州七里。这样的错误恐怕不能怪罪于盗版(假冒)了,电脑扫描仪最先进大概也不会聪明到能自己将"云"字改为"灵"吧! 热衷于胡编乱造的编书匠们,请不要忘记文责是要自负的。

(原载《姑苏晚报》2001 年 4 月 6 日)

从《天堂苏州》邮册之憾谈起

前不久,朋友送我一本 2007 年中国国内旅游交易会(4.19~4.22)上发行的《天堂苏州》邮册,装帧精美,外面还有个套子。本人不集邮,在某周日整理书橱时,拿出来玩赏。该邮册除封面封底外,共 16 个页面,每页上都有与本页主题有关的彩照,并配以相关的简短美文和精美邮票,可以说是集艺术和收藏价值于一身。但这有限的文字却太经不起推敲了,其中有 6 页上有这样那样的差错,实在太遗憾了,有失苏州的水准啊!

首先,扉页语:"水陆并存"、"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

原文采用竖排,理应使用竖式双引号的,却使用了横式的,怪别扭的。

第二,虎丘页:司徒王荀及其弟司空王珉各自在山中营建别墅。

很显然,"王荀"乃"王珣"之误。

第三,太湖页:漫月冷波千倾练,苞霜新桔万株金。(白居易《宿湖中》诗)

上句错了两字,应为"浸月冷波千顷练"。

第四,小桥流水页:乌篷船悠然划过流水,留下乃水声,带不走岁月苍苍……梦里寻梦,浆声灯影后,或剩下小桥、流水、人家。

也错了两处:"乃水声",明显漏字了,补全了似乎应作"桨声欸乃水声潺潺";后文"浆声"当作"桨声"。

第五,雨巷页:江南多雨。每当雨季,江南四处一片烟雨迷雾、

青砖小瓦、马头骑墙、水榭回廊商铺街巷，无不是一幅云蒸霞魅仙的界景致。

“云蒸霞魅仙的界景致”太过拗口，疑是“云蒸霞蔚的仙界景致”之误。

第六，桃花坞木版年画页：千门万户瞳瞳日。（王安石《元日》诗）

“瞳”乃“曈”之误。前者指眼睛之瞳仁，后者指日初出渐渐明亮的样子。

作为一本在大型活动期间发行的纪念邮册，当然有其应有的价值。但是出现这样不该有的差错，总觉得美中不足。难不成，最后一定要将其价值定位在错版上吗？实在不敢恭维！

无独有偶，今年元旦前岳母得到一本苏州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制作的台历，每周一张，台历上介绍了许多苏州历史上的人物。知道我从事地方志工作，喜欢有关苏州历史的人和事，于是，岳母便将此台历送了过来，我也很喜欢。不过，细看之下，却有点高兴不起来。总共介绍了 54 个有关苏州历史的人物，居然有 4 处明显的差错。其一，将“苏舜卿”误作“苏瞬卿”；其二，将“盛宣怀”误作“盛宜怀”（标题和行文共 2 处）；其三，将苏州刺绣名家沈寿的号“雪宧”误作“雪宦”，其著作“《雪宧绣谱》”也误作“《雪宦绣谱》”；其四，将唐代雕塑大家“杨惠之”误作“扬惠之”。除此以外，还有封面上将“2009 己丑年”误作“2009 已丑年”；冯桂芬条将冯的著作“《校邠楼抗议》”莫明其妙地误作“《校分萨抗议》”。合计差错达 8 处！实在是有辱斯文啊！

苏州之谜

苏州号称有一万年的人类史、六千年的人工稻作史、三千年的文明史、2500年的建城史。在这悠悠岁月里，由于“文献不足征”，迄今存在着许多谜！2009年国庆前，苏州电视台要做八集《姑苏之谜》的专题片，在国庆60周年大庆期间播出，内容包括阖闾大城之谜、阖闾墓之谜、孙子兵法之谜、西施之谜、沈万三之谜、建文帝之谜、唐伯虎科举案之谜、太平天国杀降之谜，希望我配合提供点史料，最后还让我说了点观点，也算是“触电”了。2010年春节前，那帮记者又来了，说是要续作八集《姑苏之谜》的专题片，在春节期间播放，商定下来的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干将剑之谜、周瑜墓之谜、寒山寺古钟之谜、紫禁城之谜、张士诚之谜、伍子胥之谜、韩世忠之谜。关于周瑜墓、张士诚、韩世忠我写过文章，直接将文稿提供给电视台用，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到底是谁，就难说了，只能提供旧志上的有关记载。不过这次那几位电视台的老兄有点“得寸进尺”，直接把我接到了演播室，要让我集中对这几个话题讲说……节目做完了，也播放了，无非是熟人说“在电视里见到你了！”可是这谜还是待解之谜！

顺便说一下，事有凑巧，正当电视台将我邀到演播室做《姑苏之谜》续集时，另一拨记者也找到了我。由于当时正值媒体炒作曹操墓，说是有媒体称在苏州找到了曹操的后人，要我发表看法。我

说：最权威的人物资料当是墓志铭，除了一些溢美之词外，其他都是真实可信的！而要了解家族的世系，最好是找到家谱、族谱，妄加猜测是不可取的！苏州是否真有曹操后裔？能够找到家谱、族谱，一查就清楚了。我在没见到家谱、族谱之前，不敢妄断！

以上只是历史长河的点滴，涉及某地、某人、某事。大而言之，地球怎么演化而来？人类又是怎么从低级向高级进化而来的？金字塔、巨石阵、湖怪、麦田怪圈等等，一个个未解之谜，无时无刻不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在远古时代，在良渚文化时期，在尚未出现金属的时代，人类是如何在米粒大小的玉器上穿孔的？战国时期的屈原曾经发出过《天问》，时至今日，许多问题在人类能够上天的同时，始终是个难解之谜，也许这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迷人之处！

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人是猴子变的。可是为什么今天还有这么多的猴子未进化为人？鄙人妄加猜测：也许人类并非在进化，而是在退化！犹如其他动植物一样，正在走向灭绝！在世界各种族人类的潜意识里，都有类似“上帝”、“玉皇大帝”之类天神的传说，也许这不是传说，而是“记忆”，或者说“遗传基因”的留存。这些天神就是外星人，具有超越人类认知的外星人。地球其实是他们的实验厂，他们利用地球上智力最高的灵长类猴子作为试验品，犹如地球人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在实验猴子身上加入外星人的智力基因，造就了能够“进化”为人类的猴子——类人猿。今天我们掌握的克隆人技术，也许外星人早就用过了。凭借外星人高超的智力基因留存，古代人才创造出了今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文明。经过数千上万年的“退化”，今人已没有能力解开那些谜了……

岁月悠悠话姑苏

众所周知，姑苏是苏州的别称。据现存史志资料记载，姑苏之名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元和郡县图志》)。“苏州”要比“姑苏”晚出近千年。然而，因山而名的姑苏究竟在哪里？“姑苏”两字的含义是什么？曾经作为吴国强盛的标志性建筑姑苏台是哪位吴王首建？这些问题历来是史家考文征献、探寻争议的热点。今就涉猎所及，作点综合分析。

一、姑苏的含义

卢熊《苏州府志》记载：“姑胥台，台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苏，盖吴音声重，凡胥须字皆转而为苏，故后人直曰姑苏。隋平陈，乃承其讹，改苏州。或者谓胥与输音相近，兵家不取，或又谓吴中鱼禾所自出，苏字兼之，故曰苏。”考之汉魏典籍，“姑苏山……或曰姑胥，或曰姑余，其实一也”。(《吴郡图经续记》)

《史记·河渠书》：“上姑苏，望五湖。”

《国语·吴语》：“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

《韩子·喻老》：“句践入宦于吴……故能杀夫差于姑苏。”

《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

《墨子·非攻中》：“至夫差之身……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

《越绝书》：“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

《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丁亥入吴，焚姑胥台。”

《潜夫论·边议》：“事有激会……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姑胥。”

《淮南子·览冥训》：“过归雁于碣石，轶鹍鸡于姑余。”

高诱注：“姑余，山名，在吴。”

30年代，历史学家卫聚贤曾撰文《姑苏台》，认为：苏在虞韵，胥、余俱在鱼韵，虞、鱼古同音，虞虢之虞，青铜器称吴，吴城《吴郡志》作鱼城，句吴金文称“攻敔”、“工虞”。以此证明苏、胥、余、吴为同音，句、姑声近，姑苏即句苏，姑苏台即句吴台，以其为句吴所建，因名句吴台。

1979年《杭州大学学报》发表周生春《姑苏考》，认为：姑是岵之假借字，“岵，山有草木也，从山，古声”（《说文》）；“多草木，岵”（《尔雅·释山》）；“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扬雄《方言》）。并由此推论，上古时代，姑苏（姑胥）大约兴旺地生长着一种称做苏或胥的植物，山即因此而得名。按倒置命名法，当作姑苏或姑胥，姑苏即苏山，姑胥即胥山。

《复旦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刊载周振鹤、游汝杰《古越语地名初探》认为：江浙一带古越语地名的一条规律是齐头式地名只有前加式，即以发语词冠首，未见有倒置式地名。姑苏乃越语地名，姑是发语词，苏另有它义，不可以汉字汉义强解之。董楚平、金永平等撰《吴越文化志》依据郑张尚芳《越人歌的解读》，用侗台语中文字形式较古的泰文为主进行译解古越语，认为“胥”对古越语sa“称心满意”，上古“胥”sa、“苏”saa只是长短元音的区别，反正是音译，所以可以随意用。姑kaa一般认为是词缀，台语ka kra词头确很发达，今泰文tra头字中有古作kra的，作单词含义为“地块”，那么，“姑”也许对tra的古代形式kra，姑苏即含“令人称心的地块”。

1986年《苏州大学学报》又登载王珏《“姑苏”新解与上古见章系互谐》一文，从古代训诂入手，“读姑为诸”（《毛诗传》）。又从音韵角度，说明“胥、苏、馀”三字古代为同音异文。再根据《越绝书》“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认定“姑中、铜姑”为一地二名，词义均是“铜官”。“姑”就是“官”的记音，“姑中”即“官中”，“铜姑”即“铜官”。在吴越方言中“铜”与“中”的读音很相近，“中”是“铜”的记音。“姑中”即“官铜”，其结构是大名冠小名。并由此推断，《越绝书》“朱馀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馀”中“朱馀”为“姑苏”的

记音(姑可训诸,诸、朱同音,苏、馀为同音异文,见前文),即官盐,倒过来就是盐官。

总之,诸说各有所长,每种解释都是费了不少功夫,或从文字角度或从音韵方言入手,转了不少弯,尽量做到了自圆其说。

二、姑苏台的始建者

关于姑苏台的始建者,见诸史籍的当推吴王齐玄最早。张大纯《姑苏采风类记》引槜李李日华(1565~1635)《六砚斋随笔》曰:"吴王璧羽训其子齐玄曰:尔维保太王统绪,无底失坠,余于地下怀尔勋,从兹以往,尔姑苏我民乎?于是,起姑苏之台以志之。姑苏之名始此。据此,则台为齐玄所筑,而阖闾、夫差增崇廓大之,以为游观之地,非始于二君也。"张紫琳《红兰逸乘》转引《漂粟手牍》所引《缉柳编》亦有类似记载:"姑苏台者,吴王齐玄所造也。昔吴王璧羽尝与楚战,弗利……王训其子齐玄曰……齐玄于是起姑苏之台以志之。后十余世,巫臣复通吴于上国而楚人惧。"虽非孤证,却均见明清人著作中,不知李日华《缉柳编》所据为何。顾颉刚先生说:"《缉柳编》不知何书。璧羽、齐玄俱见《吴地记》后旧本原文,齐玄为柯庐之父。"又云:"《吴地记》后所附之文及《缉柳编》所载,当出妄人伪造。"

王謇《宋平江城坊考》亦曰:"《缉柳编》之说甚凿,此亦一篇伪《古文尚书》也。又案《红兰逸乘》璧羽,一作阙羽……'齐玄'二字,见《礼记·文王世子篇》古者太子'齐玄以养'也。二君在寿梦前,故不著于《春秋》。然究其实,则不可考矣。"《史记·太伯世家》云:"十九年夏(公元前 496 年),吴伐越……越因伐吴,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越绝书》云:"胥门外有九曲路,阖庐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中窥百姓。"《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亦云:"阖闾出入游卧……治姑苏之台。"据此,则阖闾时已有此台。然而,在分析吴王亡国之因时,《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却云:"吴王(指夫差)不听(子胥谏),遂受(神木)而起姑苏之台。三年聚材,五年乃成……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绝书》、《国语·吴语》亦有类似记载。《吴

郡图经续记》曰："据《左氏传》云：'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而《吴越春秋》言阖庐昼游苏台。盖此台始基于阖庐，而新作于夫差也。"董览《吴地记》亦云："阖庐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夫差复高而饰之。"这一说法一直为后世史志所沿用，几成定论。

三、姑苏台的兴废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姑苏台曾几经兴废。从史料来看，"(阖庐)十九年夏，吴伐越。越王勾践迎击之槜李。越使死士挑战……败之姑苏，伤吴王阖庐指，军却七里，吴王病伤而死"(《史记·吴太伯世家》)。这是吴越交战中，首次言及姑苏的一仗，姑苏台也首次经历战火的洗礼。按太史公的行文，似乎姑苏台曾落入越手。史书虽未言及姑苏是否受损，但作为吴国的离宫，当不会轻易让于敌手，吴国是在阖闾受伤的情况下退兵的，可以想见，姑苏不会丝毫不损。夫差十四年，夫差方会诸侯于黄池，"越王勾践乃率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国语·吴语》)。此次被焚损伤肯定不小，但尚不致完全成为废墟，否则，"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后，吴王就不会"帅其贤良重禄以上姑苏"(《国语·越语》)。越灭吴后，也不会"徙治姑胥台"(《越绝书》)了。因为姑苏台毕竟是"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巨构。越灭吴后，不徙治城内吴都，而徙治此台，其一说明此台乃吴国象征，占领此台即意味着占有吴国；其二说明这一宫廷建筑群("横亘五里"不可能是单体的姑苏台)未遭致命损伤，尚可作为都治。但是到了北宋，此"虽楚章华，未足比也"的宏伟建筑，已"莫知其处"(《吴郡图经续记》)。为弥补这一缺憾，绍兴十四年，郡守王在盘门里河西城下建姑苏馆，既而，"又作台于城上，以姑苏名之。虽非故处，因馆而名，亦以存旧事也。……此台正据古胥门，门迹犹存"(《吴郡志》)。此虽南宋的仿古建筑，却"体势宏丽，为浙西客馆之最，中分为二，曰南馆、北馆"(同前)。是绍兴年间金国使者往来的"国宾馆"。既而"元统三年冬，郡守济南张侯新修此台"(元陆友

仁《吴中旧事》)。“范文穆公成大晚岁卜筑于郡之盘门外十里……别筑农圃堂,对楞伽山临石湖。所谓姑苏前、后台,相距亦止半里耳。”(同前)据此,则南宋至元,在楞伽山附近临近石湖处尚另有相距仅半里的姑苏前后台。“至明成化九年,知府邱霁重改建(盘门姑苏驿)于胥门外,前临胥江。本朝顺治二年,毁于兵燹。七年,兵巡道胡以泓修建。嗣复毁,仅存接官亭官廨。康熙九年,飓风尽圮。”(《姑苏采风类记》)至此,姑苏台(馆、驿)的仿古建筑亦在苏州的版图上消失了。虽至今尚未有人动议仿建,但“姑苏”这一苏州的别名,却并未因此而失。

进入新世纪,又有人想起“姑苏”,于是在百花洲公园建了一个“姑苏馆”,在灵岩山东南的由姑岭上建了个“姑苏台”。

四、姑苏台始建于何处

春秋时盛极一时的姑苏台所在,也是众说纷纭的话题。《越绝书·记吴地传》记载“去县三十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则云“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国语·吴语》韦昭注又曰“在吴西近湖”。唐《元和郡县图志》记作:“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艺文类聚》卷六引《吴地记》云:“吴王阖闾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史记索隐》曰:“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史记正义》则确指“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苏山上”。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姑苏台和苏州之名,“因山为名”的说法起于唐代。唐以前的记载仅指出“吴西”、“近湖”和“去县”的距离,一作“三十里”,一作“三十五里”。至唐又有“四十里”之说。然而唐人言之凿凿的姑苏台在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的《吴郡图经续记》中却说“今人殆莫知其处,尝欲披草莱以访之,未能也”。明杨循吉《吴邑志》亦云:“按横山即今踞湖山,所谓西北麓姑苏山者莫知其处,或云即胥台山是也。或又云湖口胥山是姑苏山,今未知孰是,宜两存之……合而观之。踞湖、姑苏通一山耳。”如此说来,可能是“山因台而名”,非“台因山名”。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文出而始有姑苏山之名,亦称胥台山。此前尚未见

到“姑苏(姑胥)山”之名。《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遂栖吴王于姑胥之山”,看来作“姑苏(姑胥)台所在之山”解似乎更为合理。

卫聚贤认为:七子山为吴县最大最高之山,以此山为句吴国最大之山,而名为句吴山,音转为姑苏山。其上建台为姑苏台。高心夔《吴县图》、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都认木渎镇东南之和合山(亦属横山)。顾颉刚于50年代曾到横山西端实地去考察,发现是一小山,“其下有姑苏庙(亦名夫差庙),山中有一石池,登其巅则群山环绕,说为吴王苑囿亦近似。顾寻其遗迹,欲得瓦砾残片乃渺不可得”,甚感不解,后阅《吴县志》方豁然认定胥山为姑苏真址。其后,周生春、周振鹤、游汝杰诸君不管对姑苏两字作何解,都认为姑胥台在胥山综合起来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

1.姑苏山之名始见于唐人著述中,不符合“台因山名”的说法。仅见于《史记》和《吴越春秋》的“姑苏(胥)之山”两例,其中心词均为“山”,即姑苏台所在之山。而胥山得名较早,《水经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坛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也”。汉枚乘《七发》“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则认为胥山乃因伍子胥而得名。总之,得名于吴越对峙时期。

2.姑苏山是位于横山西北麓群山环抱中的小山丘,以常理是不能“高见三百里”,亦不符合“近湖”的地理环境,以此山为姑胥台所在者,盖以《史记正义》的误导。且山下有夫差庙,似乎认为自杀于姑苏的夫差,亦应受祀于姑苏。而胥山则“在香山东南太湖口”(《木渎小志》)。且皋峰山“山顶有石筑基址,传为吴王殿基,或云即是姑苏台址”。见民国《吴县志》该志注引冯志云:“旧志:台在姑苏山,误。《太湖备考》胥山条下辨之甚详。”皋峰山是胥山东部的高大山峰,山顶平坦,山体长可3000米,符合“横亘五里”(任昉《述异

记》)的说法。

3.《越绝书·吴地记传》记载,阖闾曾"徙治胥山……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可见,姑胥之台为胥山上的建筑,胥山上除姑胥台外,尚有可作为诸侯国临时都治(类似于清承德避暑山庄)的宫廷建筑。这点《国语·越语》"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及韦昭注"姑苏,宫之台也"可证。姑苏被焚,吴被越灭后,《越绝书·记地传》又有勾践"徙治姑胥台"的记载,足以证明"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并非姑苏台单一建筑,而是一宏伟建筑群,且并未完全被付之一炬,并成为越国占有吴国的标志而徙治。由此而成为苏州一带的代名词被写入诗文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就是最著名、最典型的一例。

五、后记

1989 年钱公麟在《东南文化》上发表《春秋时代吴大城位置新考》,提出了吴国晚期都城——吴大城位于灵岩山侧的观点,否定了唐宋以来史志记载的郡城说。2009 年 12 月,古吴轩出版社出版的《文明寻踪》一书,收录张照根、孙明利《春秋晚期吴国都城探寻》,用 2000 年以来苏州博物馆在该地区的考古发掘,进一步申证此论。不过,《文明寻踪》同时还收录了张维明《吴王阖闾都城考——关于苏州木渎春秋古城遗址的讨论》,认为伍子胥建造的阖闾大城为新都,木渎为此前的古城。古城由"两城一台"(大城、小城和姑苏台,大城边上有小城)组成,新城则有大城和子城,且大城套小城。2010 年 6 月 16 日,苏州市文广新局、苏州市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苏州市考古研究所联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个重要信息:考古调查与发掘表明,在苏州西南部山区木渎、胥口一带山间盆地内,曾经存在过一座春秋晚期具有都邑性质的超大型城址。媒体称"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先生认为,这个成果是我国东周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2010 年 6 月 23 日,笔者与本办同仁在当地人的带引下,实地察看了五峰山考古挖掘现场和鼎鼎大名的姑苏山。虽然不懂考古,

但也亲身体验了什么叫考古发掘。到底这些挖掘能代表什么,不敢妄下雌黄！在那里还听到了木渎人很牛的一句话:“了解苏州从木渎开始”,似乎有点道理！因为毕竟木渎的由来也好,灵岩山上的馆娃宫也罢,还有那山前的箭泾都是那时吴国留存下来的信息！至于姑苏山,尽管花费了点力气登顶了,却因为空气质量太差,根本无法“登姑苏,望五湖”。实在扫兴！

对于吴大城的争论,我不想卷入,但是也想表达一下看法。我基本赞成张维明说法。木渎之城,当是类似于后世避暑山庄那样的行宫,《越绝书》“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可证避暑之意昭然。它既是今天苏州古城内阖闾大城的前哨和屏障(南面是越国,西面是楚国),又是与阖闾大城同时存在的吴国强盛的代表。所以《国语·吴语》在描述越国打败吴国时表述为“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显然将“焚姑苏”作为取胜的标志,将“大舟”作为战利品看待了。姑苏台的建造“三年聚材,五年乃成”,肯定不是单体建筑,应该是个建筑群,否则不会有“横亘五里”的说法了。

(原载《传统文化研究》第八辑,白山出版社2000年版,文章名为《姑苏新考》)

西施之谜

绝代佳人西施,与貂蝉、王昭君、杨贵妃是我国古代四大美女。西施的故事已通过文学的或艺术的形式流传了两千多年,今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但是,历史上的西施其人其事,真正的结局如何,却是一个难道其详的千古之谜。

西施,姓施名夷光,是春秋末期越国苧萝村人(今属浙江省诸暨)。据说,诸暨县城南门二里的诸暨山下有很多姓施人家,分居东、西二村,夷光居西,故称西施。“父鬻薪,母浣纱。”她出身贫寒,但貌美动人,举手投足之间无不得体,以致于东村丑女连其皱眉都

觉得很美，于是就有了“东施效颦”的典故。

西施以其美貌成为春秋时期吴越争霸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为了报夫椒之战中其父吴王阖闾因伤而亡之仇，挑起了吴越之战，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被迫入吴为奴。三年后，受尽凌辱的勾践及其随臣被放回国。为了雪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同时采纳了范蠡的美人计，选派貌似天仙的西施献给吴王，欲以美色乱吴朝政。公元前476年，越王勾践终于抓住了一次复仇良机，乘吴王夫差率精兵北上中原争霸之际，突袭吴国，一下子扭转吴强越弱的被动局面。三年后，勾践再次起兵伐吴，吴王夫差兵败自刎，吴国被灭。当时，作为吴王宠妃的西施，在这历史转折期，何去何从，归宿如何？由于“文献不足征”，成了千年不解之谜。

最早记载西施下落的书籍当推《墨子》，书中《亲士》篇这样记述：“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长。故曰：太盛难守也。”这就是说，吴亡之后，西施被沉于江，死因是她太美了。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68年，距吴国灭亡只有七八年时间，按理说，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记载过于简略了。冯梦龙在他的《东周列国志》中也认为西施沉江的结局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不过，人民群众对这位绝色美人的悲惨下场难以接受，于是逐渐形成了西施随范蠡泛舟五湖的传说。这一说法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越绝书》云：“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唐代陆广微的《吴地记》进一步说：“嘉兴县南一百里，有语儿亭。勾践令范蠡取西施，以献夫差。西施于路与范蠡私通，三年始达吴，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岁能语，因名语儿亭。”这段文字对西施和范蠡的关系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虽未必可信，但能启发思考。《吴越春秋》记载：“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一般认为“鸱夷”是当时盛酒用的皮袋。可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复国后，范蠡功成身退，“浮海出齐，变名姓，自谓鸱夷子皮”，说明《吴越春秋》中的“鸱夷”也可以作范蠡的代称讲。

明代剧作家梁辰鱼的《浣纱记》,干脆将这段历史作了人性化的处理,以西施和范蠡的恋爱故事为主要线索来写春秋时期的吴越交战,并且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皆大欢喜为结局。据说,苏州的蠡口、蠡墅,无锡的蠡园等地名都是当年范蠡同西施出走时停留、歇脚、居住过的地方。如今在吴江南部与浙江交界处还有一个叫施家港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施姓人家,不知与西施一族有无关联。至于范蠡化名陶朱公,经商致富的说法,大体有两种:一说到山西,另一说到宜兴。看来有许多地方值得进一步研究。

(原载《苏州日报》2001年6月12日)

吴王阖闾墓之谜

关于吴王阖闾墓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史记》云:"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冢,取土临湖。葬经三日,白虎锯【踞】其上,故名虎丘山。"(据《吴地记》引,今本《史记》无此文)《史记集解》引《越绝书》说:"阖闾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铜棺三重,凇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员之口三千,槃郢、鱼肠三千在焉。卒十余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吴越春秋》云:"阖闾葬虎丘,凿池四周,池广六十步,水深丈余。"(顾湄《虎丘山志》卷2"泉石"转引)汉代以后的地方志书中也往往有记载,《吴地记》云:"吴王阖庐葬其下,以扁诸、鱼肠等剑各三千殉焉,故以剑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丘。唐避讳曰武丘。剑池,浙中绝景,两岸划开,中涵石泉,深不可测。"(《吴郡志》卷16引))《图经》云:"秦皇经此山,欲发坟求剑。忽白虎蹲其上,失剑不能得,地裂为池,或名秦皇试剑池。王元之以秦皇事诡,作铭辨之。"(顾湄《虎丘山志》卷2引)

宋王禹偁《剑池铭并序》:"虎丘剑池,泉石之奇者也。《吴地记》

引秦皇之事以为诡说。考诸旧史，则无闻焉。矧儒家者流不可语怪，因为铭以辨之。铭曰：茂苑之侧，震泽之湄，岩岩虎丘，沉沉剑池。峻不可以仰视，深不可以下窥。我疑乎太极作怪，化工好奇。水物设险，山娅忌危。陷其泉也，盖取诸坎；磔其石也，以象乎离。艮有止兆，蒙无亨期。构此屯难，成乎险巇。直恐夏后，弗能导之。岂惟秦皇，而能肇兹。盖其始也，一气发泄，两仪分别，争融斗结，击搏而裂。断壁双揭，摩云不彻，翠秃青残，挫锐而中绝；寒流下咽，奔山未决，雪壅雷收，拗怒而曲折。蹙束湍濑，呀槎洞穴。鳅翻成窟，龙战有血。匪自人力，盖从天设。谁谓一拳，登之惟艰；谁谓一勺，挹之不竭。池实自然，剑何妄传？我欲涉道，如池之渊；我欲立节，如石之坚。位以道取，名以节全。濡笔池心，勒铭山巅。破众惑焉，言予心焉。”

清代顾湄《虎丘山志》收录文徵明虎丘剑池诗称：“虎丘剑池，相传深不可测，旧志载秦皇发阖闾墓，凿山求剑，其凿处遂成深涧。王禹偁作《剑池铭》尝辨其非。正德辛未冬，水涸池空，得石阙中空，不知其际。予往观之，赋诗贻同游者。吴王埋玉几千年，水落池空得墓砖。地下谁曾求宝剑，眼中我已见桑田。金凫寂寞随尘劫，石阙分明有洞天。安得元之论往事，满山寒日散苍烟。”又该志卷十《杂志》收录两条，其一引自《说类》，云：“阖闾墓中石铭云：吴王之夜室也。呜呼！平吾君王，弃吾之邦。迁于重冈，维冈之阳。吾王之邦。”其二云：“虎丘山，《吴越春秋》、《越绝书》之类皆以为阖闾所葬，有金精之异，故名。然观其岩壑之势，出于天成，疑先有是丘，而阖闾因之以葬也。”

可见，虎丘、剑池得名所自，古人早已提出异议。宋朱长文云：“剑池，古人淬剑之地也。”（《虎丘新志》引）但是对于阖闾墓之说，好像都是认同的。

上世纪20年代，李根源在苏州为母守墓期间，曾遍访苏州西部诸山，其中犹留意于古代名人墓葬及名人石刻，著有《吴郡西山访古记》、《虎丘金石经眼录》等吴中文献。据说李“在虎丘东岩最高

处，架梯攀岩，斩除榛莽，发觉石刻二块，一为明吾翕等见阖闾幽宫题记。内载：‘长洲令吾翕、吴令胡文静、昆山令方豪，闻剑池枯，见吴王墓门，偕往观焉。万年深閟，一旦为人所窥，岂非数耶？命掩藏之。正德七年上元前一日志。’一为王山椿等见阖闾幽宫题记。内载：‘正德七年正月，郡士王山椿、侯权、任云藩、祖与之登虎丘，于时剑池水涸，传观阖闾之幽宫。千年神密，一朝显露，可悼也已。’是池中实秘有吴王墓门，殊未可指为诡说。”（见《虎丘新志》）

1955年虎丘山整修名胜古迹，对剑池进行了疏浚，当时有谢孝思、胡觉民等人下到剑池底部勘察。次年7月27日，胡觉民在《新苏州报》上撰文介绍说：“去年夏天，为了整修虎丘山的名胜古迹，疏浚剑池时，在池底看到一个洞穴，这洞穴的深处，发现‘吴王阖闾墓’的墓门”。1978年10月，又曾将剑池池水抽干清淤，发现剑池北端最狭处有个“人”字形穴，高约3米，可容单人出入，洞底横叠三块石板，最上面一块已经脱位，斜倚在下面的石板上，为人工所为。有人用手摸测洞穴北端底部石板的厚度约16~18公分。此处与春秋战国洞室墓形制相像，估计这里就是墓门。为保护虎丘塔基，两次都没有移动石板进行试掘。

2008年6月4日，为了对虎丘剑池西侧“别有洞天”景点拆除重建，又一次让剑池见底，也只是作了清淤处理。“阖闾墓”之谜何时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得耐心期待！

历史上的金阊亭在哪里

在新改建的南浩街南新桥西堍，有一座作为“南浩十八景”之一的金阊亭。据史志记载，汉武帝时代，朱买臣被任命为会稽太守后回苏州，当时他没穿着官服张扬，住在阊门附近的旅社中。一些当地官吏有眼不识泰山，竟然“与买臣争席”，不得已“买臣出其印绶”表明了身份。事后，这些官吏为表示对刚上任的顶头上司谢罪

之意,便凑钱在阊门事发地点造了一座亭子,名为"金伤"。由于地近阊门,后来便谐音为金阊了。古书中都写作金昌,这就是金阊亭的由来。

南朝宋,金阊亭发生了一起击杀废帝事件。据《宋书》记载,景平二年(424),辅政大臣司空徐羡之等因为继位不久的宋少帝游乐无度,不亲政事,便将他废为营阳王,幽禁于吴郡。次年,又指派邢安泰等人在金闻亭杀掉废帝。不想年仅 19 岁的少帝孔武有力,没有被一下子制服,逃出阊门,最后被追杀者用门栓击毙。从这一记载来看,金阊亭的位置应该在阊门内离阊门不远处。

但是,据唐宋的方志记载,金阊亭似乎又在阊门外。《吴郡志》载:"要离墓,在阊门外金昌亭旁。"又云:"梁鸿墓,在金昌亭南。皋伯通以要离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之。"并引唐《吴地记》云:"在太伯庙南,与要离坟相并。"陆龟蒙也说:"伯鸾(即梁鸿)墓,在吴门金昌亭下几一里,尝作文以祭焉。"另外,汉陆绩坟,《吴地记》亦记作"在阊门外太伯庙西"。而泰伯庙,在东汉永兴二年(154)就由郡守麋豹建于阊门外,直到吴越钱武肃王始迁到阊门内下塘,这一点史志上都有明确记载。由此看来,南朝宋以后,唐代或更早一点,金阊亭已移建城外。之后历经金兵和蒙古铁骑南下,苏州城遭到两次毁灭性的破坏,特别是游牧民族出身的蒙古兵,认为城墙、城门不利于骑兵自由出入,因此命令将有碍于兵马的城墙、城门夷为平地,并要求抛荒农田植草,供牛马牧食,极大地破坏了江南先进的经济和文化。所幸不久,元朝统治者发现没有城墙的城市,不利于地方治安,意识到这点后就重新修筑了苏州城门和城墙。据元高德基《平江纪事》记载:"阊门,旧名阊阖门……至元修曰金昌门。作亭门内,名金昌亭。然吴人呼阊门已久,不能遽改,名之如故。故亭亦圮焉。"说明到了元代,金阊亭又重建在城内了。加之,原来作为亭子参照物记载的泰伯庙已于五代移建阊门内下塘,好事者又将专诸巷内两无名古墓说成是要离、梁鸿墓,并说在巷内发现了"古要离之墓"的碑石。尽管明清以来的史志都说金阊亭在阊门内,又有人

考证阊门外上塘街上的普安桥为古金阊关即金阊亭遗址，但是金阊亭历经迁徙的事实是不容掩盖的。

（原载《苏州日报》2000年8月7日）

周瑜墓之谜

最近安徽芜湖地方志办公室的郭静洲先生撰写了一篇《周瑜墓址考析》的文章，列举了目前史学界的几种说法，其中安徽四种：一宿松县城外圭山，二庐江县，三芜湖县，四巢湖市潘湾，分别依据的是民国《宿松县志》、民国《庐江县志》、民国《芜湖县志》和宋李素光的一句“青山坟绕周瑜墓”。另外，江西新淦也有周瑜墓遗迹。其中，芜湖一说，还有1978年秋北大教授侯仁之先生考察楚王城时提出的“九女坟”疑为“周瑜坟”的讹称的推测。郭先生根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建安十四年，孙权以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次年，周瑜回吴议事，在返回江陵道经巴丘时，创伤复发而亡。“权素服举哀，感恸左右。丧当还吴，又迎之芜湖。”同书《庞统传》又说：“瑜卒，统送丧至吴，吴人多闻其名，及当西还，并会昌门。”明白无误地告诉后人，周瑜死后，孙权亲自到芜湖去迎接他的灵柩，并派庞统送回东吴。庞统西还之时，还与吴中故旧相会于昌门（即阊门）。

那么，周瑜墓到底在苏州什么地方呢？现存最早的方志唐陆广微所撰《吴地记》记载：“周瑜坟在县东二里。”后面的方志都承袭此说，迄今没人深究过此说的真伪，也没有发现过碑碣之类强有力的证据。不过，周瑜墓在苏州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据史志和考古显示，三国时期，许多东吴的显要人物的墓葬在苏州，比如破虏将军孙坚坟和讨逆将军孙策坟在苏州盘门外，俗称孙王坟。尽管《吴郡志》，特别是卢熊的《苏州府志》有一篇《孙王墓辨》认为，阊门外山塘八字桥西有大冢，土人呼为破虏墩，谓即孙坚之坟。但都没

有出苏州的范围。另外，偏将军步骘坟在吴县西北三里。据《江苏日报》记载，1944 年虎丘马路开辟时，在望山桥畔还发现了吴将甘宁墓。墓前有碑，尽管碑体字迹模糊，但尚能看清甘宁的名讳。墓室“建筑之坚固，虽现时代之水泥建筑，尚远不能及”。可见当年建筑之精，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至于周瑜，除了其坟地的记载外，史志上还说，在建安三年，孙策为周瑜治第于吴，并因此而有了周将军巷的地名。到了宋代，成了太尉周虎的居处，遂改名为武状元坊。明代，周瑜故宅的雍熙寺西又改建为府城隍庙（今景德路东尚存工字殿）。据说庙方丈室前有棵柏树是周瑜手植，叫周将军柏。种种迹象表明，周瑜尽管原籍安徽庐江，但是在他死前 12 年已在当时的吴国中心吴县筑室居住，吴县无疑可作为他的第二故乡了。自古道“欲求其墓，先求其家”，因此归葬于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事有凑巧，不久前，笔者遇到王学雷先生提起此事。他说，在 1997 年 4 月底，他曾参与过一次考古发掘，地点在阊门外黑松林（大概在今交通技校一带）。上面的墓制是明式，一对夫妇合葬墓，记得有落款是正德年间的墓碑，上面有“葬于武丘乡周公墩”字样。明墓下压着一座体制较大的墓葬，大墓周围还有四座小墓，看形制很像三国时候的。联想明墓碑文上的“周公墩”，也许此墓正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周瑜墓。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连考古简报都没写。更何况，此墓在苏州城的西北，《吴地记》记载的周瑜墓却在“县东”。不过，笔者查了一下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的《吴地记》校注本，发现在流传过程中类似“东”、“西”相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比如，“吴公子庆忌坟在县西北三十五里”，“西”字下面就有“吴、樊、曹、局本作东”字样。那么，周瑜墓的记载，会不会是“西”误作“东”呢？

（原载《苏州日报》2001 年 3 月 20 日）

灵岩秀绝冠江南

江南多佳山水，是郊游踏青的好去处。在苏州城西南 12.5 公里处，有一座高 182 米的“吴中第一峰”灵岩山，就是值得一往的地方。山虽不高，却多奇石，也颇有气势，据说旧有灵芝石而得名。在远处遥望，此山又颇似巨象回顾，因此又名象山。山体由坚强的花冈岩组成，山麓掘材产石可制砚，故又名砚石山。山下木渎镇，相传是因为春秋时，吴王得越贡神木而筑姑苏台，积材三年，连沟塞渎，由此得名。镇上有一条山塘老街，直达灵岩山下。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灵岩山就被吴王选中辟为王室苑囿，在山上营造馆娃宫，与西施游乐于此。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如琴台、吴王井、玩花池、西施洞等。今天的灵岩山寺及寺西废基就是当年馆娃宫遗址，寺西行至山顶最高处是当年西施弹琴的琴台遗址。循着灵岩塔再西上有小斜廊为响屧廊遗址。半山腰落红亭西有一山洞即西施洞，传说曾作为囚禁越王勾践的囚室，民国 32 年改称为观音洞。山下有香水塘，又名脂粉塘，相传是因吴国宫女常在此洗妆，天长日久水中便有了香味。香水塘南通太湖的水道称为一箭河、箭香泾、采香泾，据说是宫女们由此到香山采香的通道。

在落红亭一带山路右侧为灵岩奇石荟萃处，旧有“十二奇石”、“十八奇石”之称。如石佛、鼠儿石、石髻、袈裟石、石鼓、上山马、下山兔、和合石、牛背石等。石黿俗称“乌龟望太湖”；醉僧石即石人，俗称“痴汉等老婆”；石鼓有二，一大一小，又称石射堋，在百步阶旁，据说石鼓自鸣即有战事，民国时期江浙战争前就有鼓鸣之兆。灵岩十八景旧传为：馆娃宫、响屧廊、琴台、佛日岩、吴王井、玩花池、灵芝石、披云台、望月台、划船坞、石室、石城、石鼓、石射堋、石鼉、石幢、醉僧石、采香泾。

山麓有韩世忠墓、诗人张永夫墓，东麓有米芾书朱乐圃墓

表，山顶有“琴台”、“吴中胜迹”，是明大学士王鏊手笔，均值得瞻仰眷顾。

再来人之墓——诗人张永夫墓

从御道上山的时候，在山脚下可以看见再来人之墓——诗人张永夫的坟墓。

张永夫名锡祚，性好诗，无他嗜。始居横山，从吴江叶燮游学。后移住葑门南园，再徙木渎下沙塘，颜其居曰“啖蔗轩”。家贫，工诗，以课徒卖卜为生。食贫厉节，甚至数日不举火。有时采杞菊为食，而吟诵诗书之声往往从老屋之中传出，晏如也。性耿介，不事交游，与沈德潜同为叶横山（叶燮）高足。何义门太史（何焯）闻其名，同陆元公稹亟访之。有怜悯他的穷困境遇者，欲稍加润泽，助其一臂之力的，先生夷然不屑也。他形似野鹤，又如瞿昙，不戴帽，好着屐，哪怕是妇人小孩见之，也莫不知为张先生而起敬焉。著有《锄芽集》，高淡淳古，不减陶韦（东晋诗人陶渊明与唐朝诗人韦应物的并称）。后来更加百无聊赖，终于穷饿而死，时年五十二。身后无子女，是友人木渎山塘人盛青嵝出资为其营葬灵岩山麓，并立石表墓，陆稹题其碣曰“诗人张永夫之墓”，好事者每携酒酹之。

后青嵝入京师，馆藩邸，并游蜀幕，大约是二十年之后，归居家中。适逢八旬寿宴之际，官绅毕集，忽有东省贵客投刺入，乃一翩翩年少，风度不凡，却无人识其面者，合座惊异。客请少闲与主人谈，谓曰：“先生忘之乎？某前生即君挚友张永夫也。”主人愕然。客微笑曰：“试数彼去世若干年，范式何人为张邵死友。某今已春秋十八，幸人翰苑，梦寐不忘故人。且稔君悬弧令旦，故远来庆祝。不然，何以得知之？”主人犹不信。客曰：“无虑也，吾两人当日诗歌唱和，凡他人所不知者，试各诵数篇，如何？”主人颔之。及背出，果不差一字。主人乃狂喜，于是遍告诸宾，欢饮连觞三日。最后，那少年拿出囊中金百两，答谢主人为其前世营葬而去。自后，亦无人知其身世也。青嵝不久亦殁，此事便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因为有再来人奇事，人奇事亦奇，故当地人都称“再来坟”，至

今津津乐道。民国七年，里人还将张墓加以重修，现在所见诗人片碣，犹是青嵝手立。墓对香水溪，墓畔遍植寒梅。诗人孤高，一如梅花之冷香也。而沈德潜所选《灵岩三家诗》，即先生与野鸿（黄子云）、青嵝之作也。

吴中第一碑：韩蕲王神道碑

在灵岩山西麓，进山不远，有两条岔路，左手边通往韩世忠墓的墓冢，右手边通往韩世忠墓的墓碑。

韩世忠（1089~1151），字良臣，陕西省绥德县砭上村人，是与岳飞齐名的抗金英雄。生前转战沙场，身经百战，毕生为国尽忠，身上布满刀痕剑伤，临终前双手仅存四指完好无损。他英勇善战，在镇江金山一役，以少数多，以数千宋兵大破万千金兵；在南京黄天荡一战，差点活捉金兀术，威赫一时。可惜当时奸臣秦桧当权，继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受害后，韩世忠也被革除兵职。赋闲后的韩世忠一度住在苏州沧浪亭，因此沧浪亭曾叫过韩园。宋绍兴二十一年病逝，十月，葬在灵岩山西麓，时年 68 岁。

韩世忠墓在灵岩山西南麓，墓地约 2 亩，封土高出地面 3 米，是韩世忠和他 4 位夫人的合葬墓（二夫人便是梁红玉）。正中一碣，书“宋韩蕲王墓”。惟年久失修，四周之垣渐见倾圮。1956 年韩世忠墓即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1990 年 6 月 8 日，墓园修复开放。2008 年 9 月，苏州一位私企老板无偿捐款，修缮韩世忠墓园，工程耗资近 600 万元。并议定日后由企业派专人无偿维护墓地，使这一南宋遗迹终得以保护。

顺着右边山道进山，不远处就能看见耸立着一块高大墓碑，透过饱经风霜的斑剥印痕，我们还能看到周必大书丹、宋孝宗御笔的“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十个尺二大字。这就是人称韩蕲王神道碑。

据史料记载，当年，高宗皇帝敕使徐伸护葬，吴、长洲二县负责承办，当时有墓无碑。直到乾道四年，也即韩世忠作古17年后，宋孝宗才顺应民意，为韩世忠平反昭雪，追封为蕲王，修墓立碑。原建有高楼三成以覆碑，不知何时，覆碑之楼已倾塌不存，惟有巨碑独存山麓。碑高二丈二尺五寸，连龟趺高三丈余。正面题有“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为宋孝宗亲题。分二行，字径一尺二寸。居中有字曰“选德殿书”。碑文为当时端明殿学士赵雄奉敕所撰，直学院侍讲周必大所书。碑文长达一万三千九百字，分八十八行，每行百五十字。所记事迹，亦可与《宋史》参考。好事者多梯而拓之，全文见《金石萃编》。满清因碑文有诋讥胡族之语，被剜数处。碑额之高，碑文之多，均为天下第一。

1939年5月墓碑被大风吹倒，碎为十余块。灵岩寺僧妙真主持广化善缘，于1946年将碎碑拼起，立为两块。碑座的趺[illegible]，现在还剩两大块，墓碑前面的山坡上一块，墓碑背后的山坡上一块，很是凄凉。

关于这块碑的来历，当地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传说。由于碑体巨大且碑质又不是附近山上所产，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已无法知道其如何运之此地，于是百姓便将此疑问质诸游客，而这一问题无疑是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石块的由来。游客们自然是瞠目不知所云。在吊足了游客的胃口后，乡民会很得意地告诉你一个碑载船的故事。说是当年运碑的是一艘大船，碑石放在船上，船身吃水正好齐舷，加上船夫，载碑之船竟无法行驶。在这当口，有个聪明不亚于曹冲的人想出了别具一格的办法，将碑系在船底，以碑载船，人立在船上撑行，才把此具碑运到了目的地。传说总归是传说，究竟经不起进一步追问。如果有人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这么重的碑石要系在船底，以什么作绳索，如何系法？凭乡民的学识，他们当然只能摇头。但奇怪的是，这个传说甚合物理学上的阿基米德原理，因为以船载碑，恰到船舷，说明此船的载重只能是碑的重量，已无法增加撑船的船夫了。如果将碑放到船底，水的浮力正可以减轻点碑的重

量，这样船夫就可上船撑船了。看来最先想出这一说法的肯定是位聪明绝顶的劳动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悟出了这个科学道理，只不过没有像阿基米德那样将它上升为理论罢了。

（原载《姑苏晚报》2009 年 4 月 8 日）

链接：《韩世忠年谱》，邓广铭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 3 月版。

唐伯虎点秋香事迹考略

自从冯梦龙于明天启四年（1624）编撰梓印《警世通言》后，其中有一篇《唐解元一笑姻缘》就是为世人熟知的从追求秋香到卖身投靠、甘作书僮的“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特别是通过评弹这一艺术形式的加工处理，故事的流传范围更其广泛，并逐步演绎成为《三笑姻缘》。更有人因为唐伯虎号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而附会唐原有八个妻妾，再加上秋香，就成为《九美图》等等。

据考证，华鸿山比唐伯虎小 27 岁。唐伯虎于嘉靖二年（1523）去世时，华鸿山尚未登科，而华考上进士时（嘉靖五年），唐已病故 3 年。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唐到华家卖身投靠的事情发生，纯属小说家言。其实，真正点秋香者另有其人，而且小说原型还不止一个。

一、吴人陈元超。明王同轨《耳谈》记载：“陈元超，吴人。父以疏论严氏谪死。元超少年，倜傥不拘。尝与客登虎丘，见宦家从婢姣好，笑而顾己，悦之，迹至其家，求佣书焉。留侍二子……”接下来就记述如何取悦主人，既而，遂愿与秋香成婚事。王同轨，字行父、黄冈人，约明光宗泰昌中前后在世，由贡生官江宁县知县。所著《耳谈》十五卷，每条皆记所说之人，以示征信。可见，此事亦非无稽之谈。

二、无锡人俞见安。据黄姣起《西神丛语》记载：“俞宪，号是堂。次子见安，偶从舟次见一女郎，心悦之，买舟尾其后。至吴门，知为

某富室青衣……近人以其事为唐寅，余询其从孙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号美娘，盖好事者驾言子畏耳。”黄蛟起，字孝存，无锡人，所著《西神丛语》都记无锡之事，因此，俞见安也应该是无锡人。而女郎主人家在苏州，与世传唐伯虎至无锡访华氏婢女正好相反。且婢女名美娘，非秋香。

三、江阴吉道人。清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认为“唐解元诡娶华学士家婢秋香事，乃江阴吉道人，非伯虎也”。其文略谓，吉父为御史，以建言遣戍。吉于洞庭学道。有一次游虎丘，适逢兄丧，有孝在身，上身穿麻衣，而下身却穿着紫绫裤。正巧，有一上海的大户人家也带着家眷游虎丘。他们的丫鬟秋香见到吉的打扮，忍俊不禁地朝吉笑了一下，而吉就以为她喜欢自己，于是，改名换姓投身为仆，既而竟成好事。华为吉的本姓，非婢女之主家姓，主家又是上海人氏。

四、唐伯虎。《唐伯虎全集》辑录《蕉窗杂录》文：唐寅于金阊见一画舫，珠翠盈座，内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顾己，乃易微服买小艇尾，抵吴兴，知为某仕宦家也……

纵上所述，诸书所录故事情节基本相同。只不过主人公有吴人陈元超、无锡俞见安、江阴吉道人和吴门唐伯虎之别，女主角亦有秋香和美娘两种；“一笑”之处，有虎丘、舟中、金阊三处；婢女主家亦有吴门富室、上海大户、吴兴某仕宦家诸说。可见，此风流韵事在吴中广为流传，初本无定数。后因冯氏结集梓行，又唐伯虎较他人名声更大，且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故此风流韵事就非他唐寅莫属了。

（原载《吴县报》1996 年 1 月 25 日）

链接：《唐伯虎全集》，周道振、张月尊辑校，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 年 3 月版。

玄妙观的无字碑

旧志记载，苏州玄妙观原有十八景，无字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块无字碑，其中最有名的要数三块：第一块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禅泰山，巡视东海之滨，要想树碑立传，却觉得自己功高盖世，无话可书，于是就树了一块无字碑；第二块是唐代女皇武则天所树，她树无字碑的意思是千秋功过让后人评说；第三块就是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东边的无字碑。

玄妙观无字碑高约 6.5 米，宽约 2.7 米，碑座束腰处浮雕憨态可掬的狮兽，碑身上也有隐约可见的边框纹饰。据史料记载，此碑原本是有字的，刻的是明初文学家方孝孺撰写的一篇碑文。碑文内容是记述洪武四年（1371）清理道教，改玄妙观为正一丛林，设置道纪司，革除了宋宣和年间徽宗赵佶赐给天庆观（即玄妙观）的五十顷地处昆山县的香火田，用来充实军饷的事情。后来，朱棣以武力从他的侄子朱允炆（即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改年号为永乐，要方孝孺为他起草诏书以安定天下，方孝孺誓死不从，结果惨遭杀害，且被株连十族，甚至连方孝孺所写的书也一并遭禁。玄妙观这块刻有方孝孺所撰碑文的石碑，据说是因为立这块碑时，有一位老人在旁说道："一人推得倒，万人吃不了。"转眼间，老人不见了。传闻这碑要是倒了，碑下会涌出水来淹没苏州城的。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便用短墙围起来，使人不得接近。碑的前面，有寸把阔的石阶数十级露出在围墙外，叫做五十三参，其实并没有五十三级。尽管此碑有此传说而没有被砸碎毁坏，却也难逃磨去碑文的命运，于是一块原本有文的碑，就这样变成了一块无字碑。

然而这块无字碑的故事并未到此为止。苏州天官坊陆氏后人陆泳德说，他在东吴法学院上学时，有幸师从王佩诤先生，第一次作文是写自传。陆根据父辈讲述，说他家本不姓陆而姓朱，是五六

百年前建文帝的后代，家中有一条数百年遵循不替的家规：不准与凤阳朱氏、湖南邓氏（据说也是建文帝的后代）通婚。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方凤岗说自己是方孝孺的后裔。想当初，方孝孺因忠于建文帝，惨遭灭族之灾，而建文帝的下落也一直是史家追寻之谜。两家居然都有后代，意外地坐在同一个教室，这真是个惊人的巧合。另据传闻，方孝孺的后裔不止一支，其中一支改姓施，在苏北泗州（今泗洪县）；另一支来到吴江莘塔，改姓迮，后迁居昆山周庄。据说沈厅和张厅之间的迮厅就是方氏后人的宅院。到底方家后人是如何逃过灭族之灾，寓居吴地的，看来这篇无字碑背后的文章，值得进一步研究。

（原载《江苏地方志》2002年第三期）

链接：

古迹

无字碑　明洪武四年清理道教，更元妙观为正一丛林，置道纪司，革香火田以充军饷。方孝孺记革除忌讳，划去方丈。今三清殿东无字大碑是也。

三步桥　在三清殿左，相传雨后有鱼从穴出。

铜亭　在祖师殿庭，无年号款识。

七星池　在东岳殿内，池中七井犹存，虽大旱年，池水不涸。

钉钉石阑干　在三清殿露台之左，相传仙迹。

月牙池　在弥罗宝阁前甬道之东。

杨芝画壁　在弥罗宝阁下楼梯左傍，壁上绘洛神、刘海蟾二像，高丈余，笔意灵动如生，人莫能及，洵绝作也。

按《画征录》云：杨芝，钱塘人，善写人物、鬼判，笔力雄健，愈大愈妙。尝云："安得三十丈大壁，磨墨一缸，以田家涤场大帚蘸之，乘快马以帚数笔，庶几手擘方舒，而心胸方畅也。"

七星坛　在水府殿内。

五鹤街　在三官殿内。

鱼篮观音像碑　在观音殿内。

麒麟照墙　在雷尊殿内。

灵雨坛旧址　在雷尊殿西，后改为育婴堂，再改为遗爱祠。

古柏山房　在官巷内元坛庙，柏形类鹤，宋时物也。

叶参卿七桧堂　在天庆观东。叶常守吴，既谢事，因居焉。作此堂以佚老。见其子清臣至大官，范仲淹有诗。（旧府志）。

贤行斋　在大云坊，以林少卿虙所居。朱长文记：虙字德祖，号大云翁。（同上）。

贺方回宅　在醋坊桥。方回名铸，本山阴人。有《访僧不遇诗》，为王荆公所赏。别筑在横塘，方回往来其间，尝作《青玉案词》。黄庭坚诗云："解道江南肠断句，只今惟有贺方回。"（皇甫汸《长洲县志》）。

张孝廉凤翼宅　在元妙观前小曹家巷，旁有小漆园，池亭树石具有致。县令江盈科尝题诗壁间，至今石刻犹存。

高士顾元振、元新宅　在碧凤坊。

渌水园　在碧凤坊，布衣朱襄侨寓于此。

（辑自《元妙观志》卷二）